

54

259044

(1)

54.9

# 目 錄

自 序

第一章 鴉片戰爭以前的社會狀況

第二章 產業落後原因的探討

第三章 歐人之來華貿易與中國之閉關主義

第四章 鴉片戰爭的發生及其影響

第五章 農村革命的展開——太平天國運動與捻民運動

第六章 統治階級典型的代表人物

第七章 從軍用工業到官辦工業的發展

- 第八章 第三階級的出現及其最初的政治要求
- 第九章 康有爲與戊戌政變
- 第十章 譚嗣同——急進的第三階級思想家的解剖
- 第十一章 義和團運動之歷史的意義
- 第十二章 成熟的第三階級思想的出現——梁啓超的貢獻
- 第十三章 民族運動的展開——同盟會的成立
- 第十四章 第三階級意識形態的曲線發展
- 第十五章 一九一一年革命底意義
- 第十六章 五四運動——第三階級的第一次活躍
- 第十七章 民族運動中的第四階級
- 第十八章 第四階級最初的政治主張
- 第十九章 陳獨秀主義——第三階級的最左翼
- 第二十章 五卅運動——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展開
- 第二十一章 革命形式的轉變——陳獨秀主義的發展及沒落
- 第二十二章 第三階級的右翼——聖賢主義的內容
- 第二十三章 民主派理論的解剖
- 第二十四章 帝國主義統治作用的深刻化——殖民地化的危機
- 第二十五章 經濟危機與農村革命
- 第二十六章 中國到那裏去

## 自序

在一切都是落後、混亂、黑暗的中國，連想在學問方面做點研究工作也是不可能的，即以文化中心的上海來說，連一個設備比較完備的圖書館也沒有，甚至連最普通的書報，也非自己出錢去購買不可，這痛苦是我這幾年來深切感覺到的。舉一個例來說，我爲要借一部“張季子九錄”，然而跑遍了上海各公共圖書館及各大學的圖書館，而且遠託南京杭州各方面的朋友代借，終於沒有借到（後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由宋雲彬先生在開明編



譯所借到了一部)；書店是有出售的，但代價須二十五元大洋，如果參考書都要出錢去買，那編著成一部書的代價，就非三千元不可了。這樣，祇有有產階級才配去做研究工作，然而有產階級是不願去做這些事的。至於出版界的黑漆一團，更是難以形容。研究家固然無從着手研究，即使研究偶有所得，亦無處發表。以上這兩種困難，第一種困難是使我這部“中國近代社會史解剖”不能寫得比較完整的原因；而第二種困難就是使我在一九三一年已經寫完的稿子，到現在尚未出版的原因。

一九三一年寫的稿子，到現在才出版的原因，一方面是以以前沒有出版的機會，另一方面又覺得還有出版的價值。雖然這部稿子寫完已將近兩年，但兩年來的事變，似乎是更證實了我以前見解之並無錯誤。因為如此，雖然我對於這二年前的舊作有許多不滿，而終於在多方設法之下使其出版了。

在這不景氣的年頭，賣稿根本是一件難事，而書買尤其不歡迎這一類的稿子，所以不能不自己籌款付印；這，如果不是朋友的資助，那末這部書是永遠沒有與讀者見面的機會的，而曲傳政邵力子丁默村諸先生之精神的物質的援助，尤其是可感激的！謹在此表示深切的謝意！

最初與我談到研究中國近代社會史的必要的，是安體誠(存齋)先生，時間是一九二六年初夏，地點是廣州大東路七十號我

的寓樓，現在我這部書出版了，而我最尊敬的最親愛的安存齋先生，已經死了六年多了——他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死於上海的。——我在悲悼感慨之餘，謹以此書，作為對於這位亡友的永久的紀念！

其華 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日上海

541.9  
832  
2

## 第一章

### 鴉片戰爭以前的社會狀況

中國的近代社會史，是一部西歐資本主義侵略下的封建社會崩潰史。在西歐資本主義侵入以前，中國社會是落後的自然經濟佔優勢的農業小手工業的封建社會；這種的封建的經濟形態，在中國經過了數千年的長期統治，直至西歐資本主義侵入以後，而直至現在，還在崩潰的過程中。



十八世紀中葉，在英國開始的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  
經過了哈格里夫（John Hargreaves），克郎登（Samup

(備)



Crompton), 阿克來特(Richard Arkwright), 瓦特(James Watt) 等的對於紡織機與蒸汽機關的相繼的發明, 至十九世紀初期, 已經完成了建立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偉大任務, 而對於落後國家開始殘酷的殖民地的掠奪。其對於中國, 這種殘酷的掠奪, 開始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更具體的說, 開始於一八四一年鴉片戰爭以後。所以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大關鍵, 在鴉片戰爭以前, 關門自守的中國, 在經濟上完全還是數千年前傳統下來的自然經濟佔優勢的農業小手工業的封建社會, 鴉片戰爭轟開了中國的封建壁壘, 開始了西歐資本主義在中國的侵略, 因而開始了封建經濟的崩潰, 所以要解剖中國近代社會史, 要從鴉片戰爭入手。

在這裏, 讓我們先來對於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社會狀況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在鴉片戰爭發生的時候, 西歐資本主義已有長足的發展, 但是中國的經濟狀況, 還是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經濟沒有多少差異, 產業革命在中國固然連影子也沒有, 甚至一般的商業也還很落後, 不過一種自足自給的小農經濟, 和西歐的先進資本主義比較起來, 不能不說是非常之落後的, 甚至我們可以說, 十九世紀的初期的經濟狀況, 和十世紀以前沒有多少質量上的差別。

歷代統治階級的經濟基礎, 是建築在農村中的封建剝削, 在



古代如此，在十九世紀初期，亦復如此。工商業的發展，可以破壞農村中的封建剝削關係，所以統治階級在歷史上就要以全力打擊工商業的發展，自春秋戰國至鴉片戰爭，中國歷代的統治階級，在這一工作上盡了極大的努力，而養成了歷史上的重農主義的習慣，試舉下列各例：

商鞅在“墾令篇”裏說：

“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合之，斯與徒者不常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田不荒，商勞則去商……則草必墾矣。……”

這種重農輕商的習慣，至漢代而尤甚，例如：

“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遊食之民，未盡歸農……民貧則姦邪生；貧生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生於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漢晁錯論貴粟疏）

“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同上）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善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同上）

漢文帝詔曰：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漢代重農輕商的情形，在下面的敘述中，尤為明白：

“我國古代學者之理想，政府之設施，莫不重農輕商，至漢益甚，名之為逐末，斥之為兼併；立國未久，即頒賤商之令。史記稱：‘漢興接秦之弊，諸侯并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乃約法省禁，輕田租，什至而稅一，故民增殖，蓋藏日富。’提倡農業，可謂至矣！獨於商業，惟恐抑之不至，不獨重稅以困商賈，復下令以辱之。高祖下令禁止賈人衣繡錦操兵乘馬，即其一例。其最酷者，則入市籍是也。商人一入市籍，即以嚴法繩之，漢初刑律，誦戍於邊者七科，四款所列賈人，五款故有市籍，六款父母有市籍，七款大父母有市籍，皆屬商人，商人受罰獨重，乖謬已極。惠帝雖曾弛商賈之律，而市井子孫，不得仕官為吏，仍有賤商之意也。”（陳燦：中國商業史第三八頁）

晉代繼承漢代的統治，在經濟政策上，依然扶植農村中的封建剝削關係，而打擊工商業的發展，例如：

“晉人趨重商業，政府欲使力農，故重征商稅……南朝既厲行商稅，北朝亦踵而行之。北齊北周，篡奪相繼，乘亂取國，商業雖極凋零，而軍事所需，仍仰給於商稅。”（同上四八頁）

漢晉以還，歷經唐宋元明，每代的統治階級 無不以保障農

村中的封建剝削及打擊工商業發展爲己任，到清代一仍其舊。例如康熙二十九年上諭：

“阜民之道，端在重農。”

又三十九年七月諭戶部：

“國家要務，莫如貴粟重農。”

雍正二年二月，諭直隸等各省督撫：

“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屢念民依，重農務本。”

又曰：

“四民以士爲首，農次之。工商其下也。農民勤勞苦作，以供租賦，養妻子，其敦龐淳樸之行，豈惟工商不逮，亦非不肖士人所能及”。

又令州縣歲舉勤勞儉樸之老農一人，給以八品頂帶，以示鼓勵。

七年諭戶部：

“農事爲國家首務。”

乾隆二年五月，諭農桑爲政治之本曰：

“朕欲天下之民，使皆盡力南耕。”

保障農村中的封建剝削，由帝王提倡於上，公卿大夫附和於下，例如清朝的所謂中興名臣曾國藩（曾國藩是統治階級最忠順兇惡的獵犬，最殘酷的屠夫，最無恥的帝國主義侵略下的順奴！



關於他，另有詳細的解剖。)之流，平日敦敦於勸重農事，於下面曾國藩家書中的一段，可見一斑：

“……余與沅弟，同時封爵開府，門庭可謂極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記得己亥正月，星岡公劄竹亭公曰：‘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爲業，不可靠他吃飯。’此語最有道理，今亦當守此兩語爲命脈。望吾弟專在作田上用工，輔之以書蔬魚豬早掃考實八字，任憑家中如何貴盛，切莫改道光初年之規模。……”(曾國藩致澄弟書)

統治階級爲要維持其對農民的剝削，以重農的美名，鼓勵農民增加生產，這正和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鼓勵工人努力生產，以遂其多量的掠奪是同樣的意義。

在統治階級這樣重農輕商的政策之下，工商業就很難發展，所以直至西歐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前，中國還完全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在十九世紀初期，全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五，從事於農業勞動。在統治階級的“勤勞儉樸”的鼓勵之下，終日從事於極度的勞動，過着最艱苦的生活。統治階級就全靠從他們身上，榨取血汗以維持其存在。

農業的生產方法，不待說還是和二千年以前沒有分別，完全人工灌溉的半自然的小農經濟，在中國自耶穌紀元以前，直至十九世紀初期，可說完全沒有變動；雖然這個時候在西歐先進國



家，已經開始農村中的大規模的機械生產，但在中國農村中，做夢也不會看到機械的影子。

機械生產的新式工業，在這個時候固然完全沒有，就是手工業也是限於範圍極小的家庭之內。獨立的手工業是非常之少的，大部分的手工業，僅僅是農業的副業。例如手工業中最重要紡織與建築，大部分是農業的副業。“男耕女織”是中國的古訓，在農村中，農民必須從事田地上的耕種，而農家婦女則必須從事於家庭中的紡織；田地中的耕種，限於白天，而且大部分的工作限於晴天，在暗夜和雨天，或是農閒的時候，農民也在家裏從事紡織。會耕種的農民，沒有不會紡織。紡織在當時不是專門工業，是一種極普遍的日常工作，不僅農家從事紡織，有許多商人乃至宦官人家，也以從事紡織自誇，如曾國藩即以此訓其內眷——其家書中有云：

“……自七月以來，吾得聞家中事，有數件可為欣慰者：……家中婦女大小，皆紡紗織布，聞已成六七機……”（曾國藩致弟書）

“……新婦始至吾家，教以勤儉，紡織以事縫紉，……”（致弟書）

“……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廚作羹，勤於紡織；不因其為富貴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

每年做鞋一雙寄來，各表孝敬之忱，各爭針黹之工；所織之布，做成衣襪寄來，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寄澤兒)

紡紗織布，在當時既成了極普遍的家庭日常工作；所以並沒有專門以紡紗織布為職業的匠人，除了少數織絹織綢的匠人以外，沒有獨立的紡織工人。不僅紡紗織布是農家的副業，就是育蠶與繅絲，也是農家的副業，而不能形成獨立的專門工業。而獨立的織絹織綢的專門匠人的數目，在農業人口的比例中，是極端的少數，就是在出產絲綢的省分，這些匠人也不過萬分之幾而已；在不產絲綢的省分，更是完全沒有的。

紡織工業既完全依附於農業，不能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而這種紡織生產的主要目的，也不是為到市場上去出售，而是為自己的消費——為消費而生產的，至少要佔生產總額百分之七五以上，為交換而生產的，不過百分之二五而已。

建築工人的獨立性，雖然較紡織工人明顯些，但大部分也是成為農家的附業。所謂建築工人，是指木匠，泥水匠，石匠。除了石匠比較專門一點外，木匠與泥水匠，一部分是農民兼營的。農民固然不能人人做木匠與泥水匠，但木匠與泥水匠，大都能在田裏耕種，而他們大部分的時間，也還是在田裏耕種。

此外的手工業部門，尚有銅匠，鐵匠，竹匠，銀匠，鞋匠，成衣



匠，理髮匠等等，都是規模極小的家庭工業。在這些家庭手工業中間，沒有現代資本主義工廠制度的剝削關係。這些家庭手工業的從業員，可以分爲三等：主人，夥計，學徒。但是牠決不像資本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狀態，學徒經過了一定的年限（普通是三年，特殊的是四年，但也有不足三年的），可以升爲夥計，夥計有了一點積蓄，自己可以獨立做主人，因爲這些小規模的家庭工業，不需要鉅大的資本，很容易措辦。所以在這些小規模的家庭手工業之間，沒有階級的對峙；主人，夥計，學徒，彼此在同一運命中生活着，這完全和歐洲中世的行會制度是一個樣的。

在十八世紀，規模較大的工場手工業，也不是完全沒有，如江西景德鎮的製瓷工業，南京的織緞工業，宜興的製陶工業。但當時的工場手工業，一般的說起來，還是非常稀少的。

手工業既不發達，而農產品又沒有多少地域上的差異——甲省的產物，往往乙丙丁省均有一一而且人民的消費，大部分是由於自己生產，所以市場的交換關係不能擴大，因而商業不能發展。

在十九世紀初葉以前，中國最大的商業是鹽，木，典當三種，而以鹽商爲尤甚。因爲鹽與木，不是各地都有生產的，而鹽之爲日常生活所必需，固不待說，木也是生活必需品之一，本地既缺

乏出產，就不能不依靠商人的運販。於是鹽商與木商，例外的發達起來。至於典當是一種特殊的商業，是調劑農村金融的唯一機關，人民以值錢的物件，向典當質押金錢，由典當收取重利。典當的利息，最低為二分，亦有三分五分者，純然是一種高利貸的剝削。當時的商業，原都是小規模的，但典當係一種高利貸的商業機關，貧民來典質物件者既多，勢不能不準備充分的資本，所以非有鉅大財力者不能辦，以故當時開典當的，不是大官僚，就是大地主，而大官僚之開典當，在清代末年，尤為盛極一時，如張之洞在湖北廣東開有許多典當，盛宣懷在江蘇之蘇州，無錫，常州，江陰，太倉，崑山，吳江，鎮江，松江等處，開有許多典當。

典當既需鉅大資本，非饒於財資者不能開，所以就成了地方商業的領袖。但在十七世紀，典當一業，還沒有如何的發達，其後民生凋敝，於是高利貸的典當營業，乃大為發展，往往以一縣之微，典當多至十餘家乃至數十家之多，鴉片戰爭以後，農村開始破產，而典當之畸形發展，乃益顯然，下紀天津典當業的情形，這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

“天津縣屬城鄉，典當凡四十餘家，每年冬有減利之則，由藩司出示，惠及貧民，平時利息，綢布衣服金銀首飾，每兩二分，羽紗絨呢皮貨，每兩三分，十兩以上，則仍二分；若銅錫器具，無論十兩內外，概係三分。年例於仲冬十六日起，至



年底爲止，原利三分者，讓作二分，原利二分者，讓作一分五釐。在典商所損無多，而貧民大爲方便。一進臘月，則爛其盈門，櫃上夥計，已有應接不暇之勢，櫃外人聲鼎沸，亂如紛絲，從日出起直至日昃，迄無甯晷，至歲底數日，人數尤多，事情尤瑣，大除夕城鄉當舖，一律向不閉關，紛紜一夜，竟有守候終宵者，至元旦日出，人數始稀。……”（張廉：津門雜記）

除了上述鹽，木，典當三種以外，其餘的商業，規模既小，都很難發展。因爲在西歐資本主義侵入以前，市場本極狹小，人民日常生活，極爲簡單，生活所需，大半由自己生產，自己消費。例如日常生活最不可缺的，是米，菜，油，鹽，柴，布，醬油，糖等，其中除鹽與糖以外，一般的都是自己生產。米麥固不用說，就是飯菜，也都是自有的。中國農民對於飯菜，向極儉陋，魚肉等輩腥，很少食用，而菜蔬瓜菓之類，又幾爲家家所有，不必求諸市場。布也幾乎都是家家戶戶所自備的，乃至油，柴，醬等物，大都能夠自己生產。至於糖的消費，在上述各種日用品中，比較不甚重要，而且廣東福建一些地方，有許多農家自能製糖。因爲如此，需要求之於市場的商品，就非常之少，而社會經濟也就保持着自足自給的小農經濟的特色。

歐洲戰爭以前的商業的不發達，可以用許多實例來證明，現

在我們以貨幣流通的數量來作為測量。如果商業發達，交換範圍擴大，則貨幣的流通數量必然很大；反之，自然很小。自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期，中國貨幣的流通數量極小。當時的貨幣，是銀兩與制錢，但制錢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貨幣，當時無論商人農民或手工業者，計算工資俸俸的，是以制錢為單位，甚至官俸也以制錢計算完納捐稅，也是以制錢計算的；一切商品的價值，除了極端少數的例外，也都是以制錢計算的。但是自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期，這兩個世紀中制錢流通的數目有多少呢？略見下表：

#### 順治康熙雍正三朝鑄造制錢額

年代	制錢鑄造額
1643年(順治元年)	71,663,902文
1644	443,151,160
1645	624,823,960
1646	1,333,384,194
1647	1,449,494,194
1648	1,682,424,200
1649	2,097,632,850
1650	2,521,663,850
1651	2,488,544,460
1654	2,413,879,080

1659	280,394,280
1660	291,584,600
1665(康熙四年)	295,879,800
1671	294,475,830
1676	281,365,280
1681	231,308,600
1686	289,936,700
1691	289,925,400
1696	287,063,050
1701	238,065,800
1706	288,075,800
1711	374,933,400
1717	399,167,800
1721	437,325,800
1722(雍正元年)	499,700
1725	675,160
1726	723,528,600
1727	746,304,000
1729	757,856,000
1780	1,048,759,660

自一八〇〇年起至一八三一年，鑄造制錢的數目，略有增加，每年鑄造之數如下：

地別	鑄造數
北京	899,856,000文
直隸	60,666,000
江蘇	111,804,000
江西	41,928,000
浙江	129,600,000
湖北	84,000,000
陝西	87,360,000
陝西(附加)	43,204,000
四川	129,259,000
四川(附加)	14,868,000
廣東	34,560,000
廣西	24,000,000
雲南	94,860,000
雲南(附加)	84,924,000
貴州	94,860,000
山西	17,472,000
湖南	47,880,000



伊犁	1,122,000
合計	2,052,219,000文

照這個數目看來，十九世紀最初三十年內，鑄造制錢的數目，雖然比之十八世紀稍多，但其總數也還是很微小，當時的人數即以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計，平均每人只得制錢七文弱。

商業的不發達，交換範圍的狹小，是十九世紀初期的經濟狀態。在十八世紀，乃至十九世紀初期，有許多鄉村——乃至內地城市，還行着物物交換的制度。經濟的落後，於此更可想見。

在這自足自給的小農經濟中，物價的低廉，較之現在，相去有數十倍之甚，如下列記載：

“清河與太原聯姻，兩家皆貴而賒，其記順治三年（按即1645年）婚費，會親席十六色，付庖銀五錢七分。蓋其時兌錢一千，只須銀四錢一分耳。而豬羊鷄鴨賤甚，準以今之價錢，斤不過一二分有奇，他物稱是，席之所以易辦也。”（龔煒：巢林華談）

以豐富會親之席，所費不過爲是，生活程度之低，於此可見。

直至十九世紀初期，物價還是很低廉，如曾國藩以二品京官，在京每月所用僅十幾兩：

“……男自六月接管會館公項，每月收房產大錢十五千文；此項例聽經管支用，俟交卸時算出，不算利錢。男除用此

項外，每月僅用銀十一二兩；若稍省儉，明年尙可不借錢，比家中用度較奢華……”(曾國藩致父書)

雖然曾國藩因爲自己儉省，所以費用不多，但亦足見當時物價之低廉，以京都房租以論，亦極低廉，曾國藩致父書中有：

“……男於八月初六日，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屋甚好，共十八間，每月房租京錢二十千文；前在棉花胡同，房甚偏仄，此處房屋夾埧，氣象軒敞，……”

生活程度的低廉，正是表示那時交換範圍狹小的自足自給的小農經濟的特色。

在這自足自給的小農經濟中，人民的生活，本來可以相當的安定，但是統治階級的殘酷的剝削，使社會生活形成相反的極端：一方面是統治階級由剝削得來的窮極奢侈的享受，另一方面是農民生活的極度的艱苦。這兩種相反的社會生活，雖沒有像資本主義制度下有產者與無產者之趨於激烈的鬥爭，但是統治階級之殘酷無厭的榨取，終於引起了農村的凋敝，因而引起了不安的騷動，在鴉片戰爭以前，這種騷動已經在南北各省普遍的發展。

在鴉片戰爭前後，雖然已經民有飢色，但統治階級的荒淫奢侈的生活，不足以述其高一，試舉一例如下：

“治河總督，當銅瓦廂決河以前，有南北兩缺，駐山東濟



寧者爲北督……南督駐江蘇清河縣之清江浦，以有歲修費五六百萬金，大小官吏，常乾沒其十之九，騷奢淫佚，乃稱著於道光時，卽飲食言之，略舉一二，幾有非帝王所可及者。

“某督常設宴，座客盛贊豚肉之美。酒闌，一客起去，偶見院中有豕尸數十，枕籍階下。異而詢之典廚，始知席次所陳之一簋，實集衆豕背肉而成。其法：閉豚於室，屠者人持一竿，追而撻之，豕負痛，必叫號奔走，走愈亟，撻愈甚；待其力竭而斃，亟剖背肉一樹，復及他豕，死五十餘，始足供一席之用。蓋其背受撻，以全力護痛，則全體精華，皆萃於背，甘腴無比，餘皆腥惡失味，不堪烹飪，盡委而棄之矣。至烹鵝掌之法，則用鐵籠籠鵝於地，熾炭其下，旁置醃醬，有頃，地熱，鵝環走，不勝痛，輒飲醃醬自救，及死，全身脂膏，萃於兩掌，厚可數寸，而餘肉悉不堪食矣。有食駝峯者，選壯健羶駝，縛於柱，以沸湯澆於背，立死，菁華皆在一峯，一席所需，恆三四駝。又有吸猴腦之法，尤慘酷，選俊猴，被以錦衣，穴方桌爲圓孔，納猴首孔中，柱之以木，使不能進退，乃以刀剃其毛，刮其皮，猴不勝痛，號極哀，然後以沸湯灌其頂，用鐵椎擊破顱骨，諸客各手銀勺入猴首中，探其腦吸之，每客所吸數勺而已。他如食一豆腐，製法有數十種之多，且須數月前購集



材料，選派工人，統計所需，非數百金，不能餐其一箸也。食品既繁，一席之宴，恆歷三四日始已……”（見清稗類鈔）

統治階級這樣窮極奢侈，當然是剝削農民而來。關於當時統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見於紀述者，已書不勝書。統治階級之殘酷的榨取，引起了農村經濟的凋敝，因而發生了不安的騷亂。但一般說來，這些不安的騷亂，還不致根本動搖封建貴族的統治；鴉片戰爭以後，由於資本主義的侵入，封建經濟纔開始崩潰，纔掀起了極大的騷動。

## 第二章

### 產業落後原因的探討

如上所述，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關鍵，因為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在政治上說，是一個獨立國家；在經濟上說，是自然經濟佔優勢的封建社會。但是鴉片戰爭以後，西歐資本主義的侵入，使中國在政治經濟上都發生了鉅大的變動：在政治上，中國由“上國天邦”的獨立國家的地位，降低到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戰敗國的地位；在經濟上，使封建的小農經濟開始破產，因而誘發了近代的產業革命。

但是在這裏發生了極重要的問題：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西歐資本主義已有長足的發展，何以中國的經濟還是如此落後？西歐先進國家，在十八世紀中葉就開始產業革命，何以中國相隔了一個世紀，產業革命還沒有發生？對於這一問題的正確的理解，是解剖近代中國社會史的第一步工作。

在這裏，我們首先要研究歐洲的產業革命是怎樣發生的？

馬克思恩格斯對於這一問題作了爲下的說明：

“……新大陸的發現，好望角的週航，就供給有產階級一塊新的發展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機關和商品的增多，都使當時的商業航海業和製造工業，受一種空前的刺激，因此使那革命要素便在頹廢的封建社會裏急激的發展起來。”（1848年宣言第一章）

接着，馬克思恩格斯又說明這種革命的情形：

“在封建時代的工業組織底下，工業生產是由同行組合一手把持，可是到了現在，這種工業組織已不復能應付新市場上日益增加的需要了；於是工場手工業便起來代替了他的地位。各業行東被工場製造家這種中等階級擠倒了；聯合的各行組合間的分工也被各個工場的分工代替了。

“接着，市場一天比一天擴大，需要也一天比一天增加；



這時候，就連工場手工業組織，也不復能應付了。於是又有蒸氣及大機器出來，演了一場工業生產的革命。從此大規模的近代產業，便取得了工場手工業的地位；豪富的實業家，產業軍的總領袖。近代的有產階級，便把產業界中的中等階級降服了。”

“近代產業建設了世界市場，其引線全在美洲的發現。有了這種市場，商業，航業，陸路交通，便成就了絕大的發達；這種發達，又轉而促進了產業發展。產業，商業，航業，鐵路，既這樣發達，有產階級也照這比例發達起來，資本愈加增多，且將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的階級都盡情推倒了。”

(同上)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也曾說：

“美洲金銀產地的發見，土著人口的勦滅，及其奴隸化與埋沒於礦山中；東印度的征服和掠奪的開始；非洲之變為販賣黑人的商業狩獵場，這些都是表現資本主義的曙光，這種清正純潔的過程，是原始蓄積的主要條件。”

由此可見新市場的發現，是誘發近代產業革命的第一個條件；由於發現了這些新市場，所以商品的銷路愈加推廣，而增加生產也就成了必要了。

增加生產既成了應付新市場的增加的必要，而這種必要自

然而必然地引起了生產力的改進；生產力的改進使生產方法進展到一個較高的階段，於是急激地完成了產業革命。

誰都知道，產業革命之急激的完成，是由於機械的發明。但是這些重要的機械的發明者，並不是專門的學者，大都是工人；例如一七六四年，英國發明吉尼紡績機（S. Pinning Jenny）的哈格里夫（John Hargreaves）；一七七一年發明水力機（Waterframe）的阿克來特（Richard Arkwright）；一七七九年發明騾機（Mule Jenny）的克朗登（Samuel Crompton）；一七七四年發明紡織機的加特來特（Edward Cartwright）；都是工人出身。這個事實是說明這些新式機械的發明，全由於新市場增加而引起增加生產的事實所“逼”出來的。如果沒有新市場的發現，那就沒有增加生產的必要，因而這些新式機械也不會發明，產業革命也不會發生。所以歸結起來，產業革命的發生，是由於新市場的發現。

新市場的發現，不僅使商品的銷路增加，而且是增加原始蓄積的最有力的方法。

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基礎，是建築在對於工錢勞動者的剝削。因此，資本主義制度的構成和發展，其第一個條件，就是需要能夠自由出賣勞動力，而且非出賣勞動力不能生存的勞動者的存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是一種大規模的生產組織；生產機關的



設備，工錢勞動者的僱用，就需要大量的資本，集中的大量資本的存在，是資本主義制度構成和發展的第二個條件。

創造這些條件的過程，就是“原始的蓄積”。這種原始的蓄積，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出發點。

誠如資本論所說，美洲金銀產地的發見，對於原始蓄積是有很大的貢獻。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舉出了許多實例。

無數的有組織的掠奪美洲的遠征隊到這新世界來用最野蠻的和最卑劣的手段，來掠取大量的金子。在祕魯的歷史上，曾經有這樣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西班牙戰敗了祕魯人，擄其酋長一人，該酋長所獻的贖身金，可以充滿拘留他的小室。像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

對於新發現的國家的貿易，是原始蓄積的一個最有力的方法，因為這種貿易常是取露骨的掠奪的形式。鶴衛特(W. Howitt)在他的著作中論當時這種露骨的掠奪，有這樣的一段：

“所謂基督的種族，對於他們所能夠征服的世界上每處地方和每種人民所施的殘暴及兇悍行爲，在世界歷史上無論那一個時代，無論那一個種族——不論這種族如何豬猛，如何野蠻，如何無情，如何無恥——是沒有能和他們比擬的。”

曾經做過爪哇副總督的拉夫列斯(Thomas Stamford Raffles)



),在論爪哇狀況的論文中,也曾說:

“表現一種罕有其匹的背信、賄賂、虐殺和卑鄙的圖形。”

例如荷蘭爲要得馬來卡(Malakkas)市,曾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三鎊英金賄賂葡萄牙總督,等到這位受賄的總督允許荷蘭人進這個城來(一六四一年)的時候,他們爲要節省這筆賄金,就跑到總督的邸宅,將他殺死了。

荷蘭東印度公司(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是荷蘭商業資本家掠奪東印度羣島的總機關。荷蘭政府給這個公司以印度貿易的獨佔權,由該公司一手包辦,供給香料與全歐洲。公司利用其地位,給土民以自己隨意決定的最低價格。土民不能承受這種苛遇,遂開始賣物與以印度洋上一大島爲根基的英國商人,及不屬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荷蘭人。爲要避免競爭和保持貿易的獨占,該公司就採用了非常的手段,差不多破壞了印度洋羣島全部的豆蔻樹。關於丁香的栽培,也取了同樣的手段,只餘一島栽植。以後又因爲這些手段還不足維持歐洲市場的高價,於是更破壞以前由殖民地輸出的香料;荷蘭常常焚燒大量的肉桂、丁香、豆蔻,以致香聞數哩。

在有些地方,這班商業資本家的代表更完全像強盜一樣。凡是他們所到的地方,荒涼滿目與人烟消滅的事實便隨着出現。爪哇的巴約頑基(Banuwangi)地方,當一七五〇年,有一萬以上

的居民，經過這班商業資本家之無厭的酷求，到一八一一年只剩不滿八千人。

英國東印度公司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是英國掠奪印度的基礎。牠除掌握東印度的政治統治外，並且享有茶的貿易，對華商業以及歐洲貨物輸送的絕對壟斷權。東印度公司的利潤，常達百分之三百四十；至於不達百分之百五十的遠征，那是很少的。投下遠征的資本，每回增大數倍。巨萬財富，可在片刻獲得。印度東岸及諸島嶼間的航行和印度內地的貿易，也為公司高級職員所壟斷。食鹽、鴉片煙、藥材和其他商品壟斷，也是財富無盡藏的源泉。他們也是和荷蘭東印度公司一樣，隨意制定價格，任意掠奪不幸的印度人。甚至在許多地方，他們沒有投下一個先令的資本，可以獲得鉅大的財富。舉例來說，一位名叫沙利頑 (Cariffean) 的因公務向印度一個距離鴉片產地很遠的地方出發的時候，結下一種鴉片煙契約；他將這種契約出賣給一個名叫冰恩 (Binn) 的，得四萬金鎊。冰恩在同一天中又將契約出賣，得六萬金鎊。此契約的最後購買者明言他從此中還獲得巨利。據東印度公司的報告，自一七五七年至一七六六年，該公司從印度獲得六百萬金鎊。一七六九年至一七七〇年，英國商人差不多收買了印度糧食的全部，居奇不賣，以致印度發生了可怕的饑荒，後來纔以絕高的價格賣出。



原始蓄積的另一方法，就是黑人的買賣。黑人從非洲輸至加里普諸島(Goiffoans Islands)和美洲大陸。奴隸買賣的獨佔權，最初是於屬西班牙，後來讓給耶教的歐洲其他諸國——德國、法國和英國。買賣黑奴的利益，往往是賣出的價格，十倍於買進的價格。英國商人常因這種買賣，致成巨富。

利用黑奴在殖民地確立奴隸的生產，一方面掠奪殖民地土地，同時也是蓄積資本的有力方法。

由此，可見產業革命的發生，完全導源於新市場的發見。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為什麼不能發現這些新市場呢？

歐洲商業先進國家發見美洲的、非洲的、和亞洲的新市場，並不是偶然的；因為這些國家的國內市場很有限，手工業的進步，交換範圍的擴大，商業資本的發展，國內市場不能容納，於是向外找新市場的必要。哥倫布就是適應這種需要而完成了他的發現新大陸的偉績。這完全和哈格里夫發明吉妮紡組機、阿克來特發明水力機一樣，是適應客觀的需要。

這個需要在中國是不存在的。第一，因為中國的封建制度的剝削，較西歐封建剝削更甚，妨礙了商業資本及手工業的發展。第二個原因尤其重要，即是因為中國物質豐富，各地都具備有各種豐富的天產物可以維持一種自足自給的狀態。這種半自然經濟的自足自給的狀態，使其沒有向外發展的必要。第三個原



因，即是中國不僅有豐富的自然產物，而且有廣大的國內市場，更使其沒有向外發展的必要。所以當西歐商業先進國家進行對美洲的，非洲的和亞洲的新市場的侵略的時候，而中國還是維持其閉關自守的狀態。

中國既沒有找尋新市場的需要，自然也沒有改進生產力以增加生產的需要。既然客觀上沒有這種需要，自然不會憑空發生產業革命。這理由是顯然易知的。

單就這個理由，已足說明中國經濟落後的原因了。如果我們再進一步的探討，則還可以發現許多其他次要的原因。

例如上述原始蓄積的過程所需要的兩個條件，在中國都不存在。

如前所述，新市場的發現，是資本之原始蓄積的有力方法，商業資本家在這些新市場中用殘酷的手段掠奪殖民地人民的財富，用這些財富來創造偉大的近代企業。中國既沒有向外發展的必要，因而沒有新的市場發現，所以他不能如歐洲這些國家那樣掠奪鉅大的財富。中國雖然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但在這個國家是自然經濟佔強大的優勢，社會之經濟基礎是一種自給自給的小農經濟，要集中大量資本，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既不能集中大量的資本，自然不能建設近代的企業組織。

在另一方面，勞動力之原始的蓄積，在中國也不具備這個條

件。

在歐洲，勞動力之原始的蓄積，是由於農民被迫離開土地，成了一身以外別無長物，不能不出賣勞動力而成為工錢勞動者，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於西歐各國農民離開土地的狀況，作了詳細的說明，例如下面的一段：

農民離別土地，最先是以前農民成羣逃走的形式發生。因為封建諸侯之過度的榨取，使農民不能再在此種狀態下生活，不得不潛離土地，成為無家可歸的遊民而集中於都市。但是大部分是用強制手段驅逐農民離開土地。例如十五世紀的末葉與十六世紀的初期的英國，因為羊毛手工工場業的興盛，羊毛價格飛漲，以致在許多地方，權力階級把農民驅逐離開了耕地，把耕地變成了牧羊場。有一位學者哈里生（Harrison）在他的英國記（Description of England）中描寫當個時驅逐農民的情形，有這樣一段：

“若將每個諸侯采地的舊紀錄比較一下，便看見無數屋宇和小農場已經消滅了，現在土地所養的人民更少了，至於城市雖有些新的勃興起來，然許多舊的滅亡了。……許多村舍都被破壞，作為牧羊場，其中所存的，只有領主的屋子，我們可以說些出來。”

巴科在他編的史中也說：

“此時（一四八九年）對於耕地變為牧羊場的怨言都起



來了，定期租地、終身租地和任意租地（一大部分農民自由生活於此租地上）都變成領主的地產了。此事引起人民的衰敗……”

查理第八在禁止牧場經營的法律中，也有這樣一段文章：

“許多耕地和家畜——特別是羊——的大羣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因此使地租之增加愈多，農業的衰敗愈甚，而教堂租住所都被拆毀，數目可驚的人民都被驅散，致不能維持他們自己和家庭的生活。”

由此可見農民之變為工錢勞動者，是由於（一）手工工場業的發展，權力階級強迫農民離開了土地；（二）封建諸侯之過度的榨取，使農民不得不潛離土地。

這種現象在中國也不存在，因為：

第一，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中國的手工工場業還很落後，牠的發展還沒有達到強迫農民離開土地的程度。

第二，中國封建地主的榨取雖然很厲害，甚至超過歐洲封建諸侯的剝削程度，但因為中國土地肥沃，天然條件適宜，使農民雖在殘酷剝削之下，還能維持其水平線下的生活，而不致潛離土地——當然，這是說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情形。

農民之離開土地，到都市去出賣勞動力，一定是到了迫不得已的程度，纔出此下策，農民是有留戀土地和故鄉的天性的，所



以非到了不得已的時候，決不肯自願地離開土地到都市中去出賣勞動力的。所以馬克思以爲工錢勞動者是非出賣其勞動力不能生存的人們。

如上所述，中國的物產豐富，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農村生活能夠維持一種自足自給的半自然經濟的狀態，所以農民並沒有非離開土地不可的現象。

人們會舉出中國歷史上時常有的可怕的飢荒，成千成萬的農民不得一飽的事實來反對上面的結論。誠然，在中國歷史上，可怕的飢荒是時常遇到的，但是飢荒不是農村中獨有的現象，在城市中，也要受到飢荒的嚴重的影響。而且飢荒並不是長時間的，所以他並不會強迫農民離開土地。在農村遇到飢荒的時候，城市中也一樣飢荒，所以農民不會離開了農村集中到城市去。飢荒既不是長時間的，飢荒過後，農民一樣的可以從事半自然經濟的農業生產。

中國現在雖然有廣大的剩餘勞力，但在西歐資本主義沒有侵入以前，即在十九世紀中葉，農村經濟沒有破產以前，並沒有多少剩餘勞力出現。所以在當時，勞動力之原始的蓄積這條件是不存在的。

現在又要把話說回來。

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新市場的發現，是產業革命的引綫，

這所謂市場是指國外新發見的市場，上面所說的美洲、非洲與東印度羣島。

但有人會說，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某一個時期，中國雖然是閉關自守，可是中國與外國通商，遠在漢代以前；在漢代，曾與西域諸國貿易。在漢武帝時，中國與西域各國的通商的範圍，葱嶺以東，由罽羌以至鄯善、于闐、阻茲、鄯賓、焉耆、烏孫諸國；葱嶺以西，以達康居、康國、大宛、大月氏，更遠迄於安息、大秦（即東羅馬）諸國，均有通商往來。與印度貿易，也是遠在漢代已經開始，例如前漢書張騫傳中有：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買人往市之身毒國（即印度）；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不僅如此，在漢代，與地中海諸國亦有通商往返，而且水陸並行。

中國與阿拉伯通商，亦起源很早。在紅海的西岸，在波斯灣東岸，以及非洲的北部，也是很早就有中國商人的踪跡。

與南洋羣島各國的貿易，也是起源很早，隋朝就與暹羅通商。安南在漢時已為中國屬土。緬甸也很早就就是中國的藩屬。在梁時，中國已與馬來半島——即今之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等處；海峽殖民地即今之麻六甲、新加坡、檳榔嶼等處——通商；梁



書有：

“扶南國之南有頓遜國……東界通交州諸賈人，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

這裏所謂頓遜國，就是現在的新加坡。

爪哇與蘇門答臘，在宋時代已有與中國通商。婆羅洲在梁時就和中國通商。宋諸番志載當時中國與婆羅洲的通商情形有：

“番船抵岸三日，其王與眷屬大人到船問勞，船人用錦藉跳板迎，肅款以酒醴，用金銀器皿綠蓆涼傘等分獻有差；既泊舟登岸，皆未及博易之事，商賈日以中國飲食獻其王，故舟往佛泥（按即婆羅），必挾善庖者一二輩與俱。……幾月餘，方請其王與大人論定物價，然後鳴鼓以召遠近之人，聽其貿易。”

中國與非列賓通商，也是開始於宋代。

中國與日本通商，遠在隋唐之前。

中國既很久以前即與這些國外市場貿易，這些國外市場爲什麼不能作爲中國產業革命爆發的引線？

要答覆這個問題，可以從列下幾點來說明。

第一，中國雖然很早已經與這些國家發生貿易，但是這種貿易的發生，並不是由於手工業發展，商業交換範圍廣大的結果，



而是由國家邦交關係發生——中國一向以天朝上國自居，視海外各國都是蠻夷，非朝貢絕不許其入境，所以那時外國商人到中國來，都是朝貢而來。中國雖視外國盡為蠻夷，但一方面要極力拉攏這些國家，另一方面要誇示中國物產的富饒，所以中國商人到外國去，都是帶了絲綢之類的出產。爲要拉攏這些國家起見，所以對外貿易，處處以“仁義道德”“公正無私”自詡。例如明朝永樂年間，因西洋刺泥等國來朝，附載胡椒等物，與民互市，有司奏請徵稅，帝不許，曰：

“夷人慕義遠來，征稅則虧辱大體。”

因此，此種貿易決不能有多量的發展，更不能引起生產方法改良的要求。

第二，當時中國輸出的貨品，主要的是絲帛等物，尤其是絲。武育幹在中國國際貿易史中曾說：

“在此期中，中國與羅馬之主要商品，其由中國輸入羅馬者，仍以絲爲重要。良以此際中國製絲方法尙守祕密，而羅馬又需絲甚殷，此中國之絲所以仍源源輸入君士但丁堡等處也。在西歷五二七至五六五年時（梁武帝大通元年至陳文帝天嘉六年），羅馬皇交斯第尼（Justinian）之主要對外政策，即在重開華絲通路，蓋此等運絲通路，前爲波斯薩珊王朝（Sas-sanid）所阻塞，而羅馬君王，因欲恢復貿易之通

路，乃不惜與阿卑色尼亞之王結盟，強迫波斯重開，此其重視華絲，可見一斑焉。”

中國在閉門自守時代前的對外貿易，最主要的輸出品是絲。所以中國絲綢的生產，這二千多年來決不能說沒有絲毫進步。但是單是絲綢的生產的改良，事實這決不能引起各生產部門的革命。

在歐洲各國的產業革命，開始於紡織工業部門；由適應於紡織工形的發展的需要，引起了煤與鐵的生產方法的改革。而歐洲產業革命之所以在紡織工業方面開始，是由於歐洲這些先進國家對於新發見國家的商品侵略，以紡織品為主要輸出品，因而引起了紡織品生產的增加的需要。中國當時的對外貿易，既以絲為主要品，雖然可以因絲之輸出而引起絲之生產方法的相當的改進，但因為中國產絲的區域過於廣大，所以少數的輸出，並不足引起國內市場的絲之缺乏的恐慌，而且絲不比布疋，因為絲是一種貴重品，不能像西歐紗布一樣能大量的為市場所容納，所以中國縱然有絲的輸出，但總不能有大量的需要，因而絲的生產方法的改良，就受了很大的限制。

自然除了絲帛以外，也還有其他的輸出品，但因為中國地大物博，各種產物都很豐富，而輸出量並不鉅大，這並不鉅大的輸出量，決不能引起國內市場缺乏產品的恐慌，因為不能引起生



產方法的革命。

第三，當時中國與外國貿易，大都是物物交換的形式，很少能換得大批的金錢。例如中國與南洋羣島一些國家貿易，大都是物物交換。東西洋考有：

“商量物價，雖議價金多少，然非價金，實價椒也；如值金二兩，則價椒百石……，”

東洋列國考載：

“舟至彼中，將貨盡數取去，夷人攜入彼國深處售之，或別販旁國物品歸，或以夷貨償我。彼國值歲多珠時，商人得一旦珠攜歸，可享利數十倍；若夷人採珠獲少，則所償數亦倍蕭索，願逢年何如耳。夷人慮我舟之不住也，每返掉輒留數十人爲質，以冀後日之重來。”

當時的對外貿易既不能輸入大量金銀財物，且金銀財物，反有外溢之虞，如西域圖志所載：

“蕃商貪中國財帛，且利市易，率詭稱買使，真偽莫可辨。”

所以對於資本之原始的積蓄沒有絲毫意義。

第四，中國歷史上的統治階級，爲要維持其封建剝削，所以都是重農輕商，對於工商的發展，予以種種打擊，除上章所述漢晉兩代情形外，現試舉唐宋明各代情形如下：



在唐代，統治階級爲要保障農村的剝削關係，阻碍工商業的發展，所以厲行病商政策，例如？

“(一)借商錢 唐太宗曾行捉錢令，貨錢與商取息。自兩京陷沒，民物耗弊，肅宗遣鄭叔清等江蜀漢富商之財，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德宗時，以河南河北兵費不支，行借錢令，命杜佑索長安商賈所有貨物，及蓄積之錢帛粟麥，商民不勝其苦，長安如被寇盜，又括僦櫃質錢者，民間以物質錢，贖出時於母錢之外，復還子錢之謂也。

“(二)置常平倉 太宗曾置義倉常平倉以備荒。高宗以後，漸用義倉之款，以給他費，至神宗中略盡。玄宗即位，復行設置。其後第五琦請命全國平倉，蓄積本錢。趙贊請兩都江陵(今湖北江陵縣)成都(今四川省治)揚(今江蘇吳縣)汴(今河南)洪(今江西省治)蘇(今江蘇)各地常平倉各置本錢十萬至百萬緡，蓄積米粟布帛絲麻等物，市價昂貴，則貶價出售；市價低落，則加價收買。諸道設關征收商稅，以贍常平本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十之一。然軍用迫蹙，隨即挪用，不能備常平倉之用，徒多一病商之政而已。

“(三)宮市 宮中市場，向由官吏給價收買。德宗時，令中官市物於市，謂之宮市，不持文牒，抑買人物，或不約價；

又常使數百人於長安城中東市西市，以值百錢物，強與人易值數千錢物，或染舊衣敗繪，尺寸分裂而給之。又索進奉所經門戶之費，及僱人負荷進奉物品入內雇脚之費，人有齋物至市而空歸者。中官每出，沽漿賣餅之家，皆閉門以避之，……”(中國商業史：第六〇——六一頁)

唐時對商民所征捐稅亦極苛繁綦重，使商民不堪擔負，如：

“(一)稅鹽 唐初沿襲隋制，不征鹽稅。開元元年，檢査鹽課 稅法復興。肅宗時第五琦中鹽法，就山海井竈近鹽之地，置鹽院，籍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煮鹽資賣者論以法；代宗朝劉晏損益琦法，改爲民煮，官收商銷，與今之就場官賣相近。凡去鹽較遠之區 有常平鹽，鹽商不至，則平價糶民。並創緝私鹽之法，又以諸道有權鹽錢，商人舟過復須納稅，晏悉奏罷，商困稍蘇，國課亦裕。晏既罷政，鹽法大壞，加以豪商射利，鹽價加增，官收較少，而商民反受其累矣！

“(二)酒稅 唐代酒稅，變更數次 代宗時分酤酒戶爲三等，按月徵稅；德宗建中元年罷之。三年禁民私酤，由官置店酤酒斛每收錢三千，州總縣領。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凡設肆酤酒者，每年權錢百五十。貞元時，置官店酤酒，又許揚州汴州襄州河東等處權麴；浙西浙東鄂岳三處，則置官店酤酒，嚴禁私酤，此權麴法也。



“(三)茶稅 德宗時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其一，以爲常平錢本，此爲稅茶之始。貞元八年罷之。九年復於出茶州縣茶山及商人往來要路以三等定酷，十稅其一。穆宗時，帑藏空虛，復增茶稅 每百錢增五十。武宗時又增江淮茶稅，茶商所過州縣，須納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收稅，謂之搨地錢 茶稅甚重，私販乃起。文宗時，江淮之茶，每斤復增稅五錢，謂之剩茶錢。茶稅視貞元時已倍之矣。

“(四)坑冶 唐德宗時，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處，悉隸鐵鹽使。開成元年，改歸州縣，宣宗時，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 增銀冶鐵山數十，每歲征銀一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

“(五)雜稅 天寶亂平而後，庫帑空匱，軍用不足，豪商富戶所納率貸錢巨萬。諸道節度觀察使，復多征商稅以充軍用，商賈失業者甚衆。上元中以江淮壘壞敕令商旅牽船過處，準斛舫納錢 謂之埭程。名目孔多，賦歛繁重，商人安得不困 商業又安能興盛哉。”(同上第六一至六三頁)

在五代時候的統治階級，對於商業也極盡其壓迫苛求之能事。宋初雖厲行恤商政策，但不久：

“延至神宗變更舊制 增減稅額，大反其先人所爲；各州



自立比較，商稅輕重，皆由官吏自定。熙寧十年以前，諸州商稅，歲額四十萬貫以上者三州，二十萬貫以上者五州，以外諸州，分十萬至五千貫諸等。南渡以後，雖獨關市之征，然貪吏苛取百出，私立稅場，稅及緡錢斗米菜蔬束薪之屬。遇有士夫行李，則搜囊發篋，目爲興販。甚者貧民擔負徵物貿易於村落，亦指爲漏稅，輒加以罪。空身旅行，亦須納錢，紆道避免，則攔截叫呼，聞者咨嗟，號爲法場。與商民相刃相刺，不啻讎敵，宋初恤商之政，至此變更殆盡，商業亦受亦其累矣”(同上第六八頁)

明代的病商政策 有如下情形：

“明代中葉以後，閭閻不寧，商業零落，蓋內政不修，疵政百出，採造、商稅、鈔法，皆病商最甚者也。

“明開國時，太祖恐累商民，力求節省。成祖亦罷採五彩石，罷染色布；後忽派遣中使採辦物品。英宗時，工役繁興，徵求苛急。延至神宗，名目更多。中使分布各處，鎮守監督。憲宗時，購書採藥之使，絡繹於道。武宗信用劉瑾，漁利無厭，鎮守中使貪取私賄，歲辦物品，名目甚多。世宗營建齋醮，中使紛然雜出。熹宗之時，採造益多，光祿寺每向京師富戶強買，不給價值，物價太廉，商賈匿跡，戶部奏請編審，中使多意加派，民不堪命，相率避匿，乃強京師富戶爲商，官司

密鈎 若緝寇盜，商困如此，商業可知。莊烈帝立，雖欲易除積弊，然商人受害甚深，已難救濟矣。”（同上第九一至九二頁）

在清代，統治階級一本其傳統的重農輕商的政策，所以對於商業不加提倡，反而苛征不已。

統治階級對於商業既極盡壓迫的能事，商業自然不容易發展。統治階級對於國內商業尚且要予以種種打擊，對於國外貿易自然要更加壓迫了。各朝代於對國外貿易都有殘酷的限制而以元代以來為尤甚。

第五：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宣言上說：“近代產業建設了世界的市場，其引綫全在美洲的發現。”資本論中也指出“美洲金銀產地的發見，土著人口的勦絕”是“原始的蓄積的主要原因”，可見美洲的掠奪，極為重要，但是中國歷史上的對外貿易，不僅受到嚴酷的限制，而且當時與中國往返貿易的國家，以西域為最盛；但這些國家決沒有像美洲的豐富的金銀礦可供掠奪，而且中國商人在西域諸國貿易，也不像歐洲遠征隊在美洲那樣作露骨的掠奪，所以對於資本之原始的蓄積，不能有多大的意義。南洋羣島諸國，雖較西域諸國為富，但中國商人在南洋既沒有暴力作後盾，不像歐洲諸國的商人有政府作背景，施行整個的掠奪計劃，所以也不能在這些地方掠得大量金錢回來。

第六：歐洲商業資本的發展，向各方面找落後國家侵略，是十六世紀。在是這個時候，中國內部正陷於極度於度混亂狀態，在明末既有流寇之亂，而愛新覺羅氏入主中原以來，也是禍變相尋，很少安定。所以更沒有餘暇從事於對外的商業戰爭，而完全閉關自守。如此，則商業資本無從發展，新市場不能取得，因而也不會引起生產方法上的革命了。





### 第三章

## 歐人之來華貿易與中國之閉關主義

西歐商業資本的發展，在十六世紀已很有可觀，所以在這時候，商業先進國家如意大利，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等，已開始向東方掠奪殖民地新市場。最初到中國來要求通商的，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自從於十六世紀初期佔領麻六甲以後，即於一五一六年派人試航廣東，一五一七年（明正德十二年），復有商業隊率船至澳門，要求正式通商；明政府許以率船兩艘，在廣東經商。但當時葡萄牙商人不僅在澳門，且在福建浙江兩省沿岸，如

福州廈門泉州甯波溫州等處，經營商業，勢力漸盛。至明嘉靖十三年，因葡人有殘暴行爲，由明政府下令誅伐，處死葡人，有七八百人之多，商船之被毀者亦有數十艘。葡萄牙在閩浙沿岸，勢力遂日漸減弱。至嘉靖二十四年及二十八年，又經兩次排葡運動，浙閩沿岸，葡商乃全部被逐。但在澳門方面，仍有不少葡萄牙商人居住貿易，而且在嘉靖十四年，葡人已在澳門租得土地一方，年納地租二萬兩，作長住久居之計。此項地租於萬歷十年，減至每年僅納千兩。至清康熙六年，再減至六百兩，乾隆五年，更減至年納五百兩，直至鴉片戰爭時，尙是如此。但是葡萄牙人的經商，這時期中只限於澳門一隅，所以不能發展。自明至清，葡萄牙政府曾幾次特派大使來華，要求正式通商，均不爲中國政府所允准。

荷蘭於一五九五年（明萬歷二十三年）在南洋羣島設立東印度公司，作爲侵略殖民地的大本營；一六〇四年，曾派商艦直航廣東，要求通商，但均被拒。一六〇五年，荷蘭商艦佔領澎湖列島與台灣一帶，但商業未能發展。至一六六一年，復爲鄭成功所逐。順治十年（一六五二年），荷蘭政府曾遣使入貢，要求通商，但爲清政府所拒。一六五五年，又遣使入貢，重申前議。但清政府祇許其五年一貢，仍不准正式通商。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巴達維亞總督派使臣至北京要求通商，清政府僅允其在閩浙沿岸一帶，從事貿易。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復准其在廣州設立商館，



但正式締約通商的要求，仍為清政府所拒絕。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荷蘭政府又派使臣來華，要求締約通商，但因荷蘭使臣不允行三跪九叩首之禮節，幾為清政府所殺害。雖然後來該荷蘭使臣仍勉行中國禮節，但清政府仍待之如囚犯，狼狽而歸，毫無所獲。

西班牙於十六世紀中葉佔領菲列濱後，即與中國開始非正式的通商。中國商人至菲列濱首府馬尼刺（Manil），西班牙商人至中國之廈門泉州漳州一帶，相互貿易。當時中國人至菲列濱經商者頗多，如明史載：

“呂宋去漳州甚近，閩人以其地近而富饒，商販至者，達數萬人。”

但其後經過西班牙政府的虐待，甚至對於華僑作大規模的屠殺，而一六三九年之屠殺，中國人之被殺害者尤多。此後荷蘭政府對中國商人之至菲列濱者，仍予以種種嚴酷限制，以致中荷間之貿易，轉不如前，而荷蘭政府向中國所提出之正式通商的要求，亦迄未為中國政府所允准。

英國與中國之通商往來，較葡萄牙荷蘭西班牙為遲。英人之第一次到中國之澳門者，為一六二〇年（明光宗泰昌元年），但尚未有商業來往。一六三七年（崇禎十年），威代爾（Weddell）率艦隊抵澳門，曾在虎門與中國守臣發生衝突，英艦勝利，中國乃允

其在廣東一帶洋面經商，其後復在福州南台廈門等處，經營商業，但並未正式通商，且中國政府，向視外人為夷狄禽獸之類，待極不公平。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英人欲於廈門建立商館，但清政府不許。直至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滿清政府始准英人在廣州設立商館，但仍視英人為夷狄，不准其正式締約通商。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政府派馬戛爾尼（Earl of Macartney）為大使，斯當東（George Staunton）為副使，正式來中國要求通商，當時所提出的要求如下：

- (1) 准英國派員至北京，照管本國商務；
- (2) 許英商得至浙江之寧波舟山及天津廣東地方收泊貿易；
- (3) 英國商人，當做俄羅斯例，於京師設一商館，收貯貨物發賣；
- (4) 要求舟山附近無城砦之小海島一處，以為居留商人，收貯貨物之地；
- (5) 撥給廣東省城附近地方一處，居住英國商人，或準令居住澳門之人，自由出入；
- (6) 英國商人於廣東澳門，由內河運輸貨物，請免稅或減輕稅額；
- (7) 准英人自由傳教；



- (8) 英國商人，若中國皇帝許以居住權者，不強制以出稅；而居住之許可證，往往不能辨別真偽，以後可直接交付彼等。

馬戛爾尼到北京時，適值高宗(乾隆)狩熱河，命使臣至熱河賜見，強迫其行三跪九叩禮，馬戛爾尼不允，幾經週折，卒許其行謁見本國國王之禮。但此行結果，仍無所獲，清政府始終視英使之來為朝貢，不允締約通商，當時乾隆給英王敕諭兩通，語極傲慢，照錄如下：

“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嚮化，特遣使恭齋表章，航海來庭，叩祝萬壽；並備進方法，用將忱悃。朕披閱表文，詞意肫懇，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所有齋到表貢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遠涉，推恩加禮，已合大臣帶令觀覲，錫予筵宴，疊加賞賚，用示懷柔。其已用珠山(即舟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餘人，雖未來京，朕亦優加賞賜，俾普霑恩惠，一視同仁。至爾國王表內，懇請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賣買一節，此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向來西洋各國，有願來天朝當差之人，原准其來京，但既來之後，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內，永遠不准復回本國。此係天朝定制，想爾國王，亦所知悉。今爾國王欲求派一爾國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來京當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歸本國，又不



可聽其往來，常通信息，實爲無益之事。在天朝所管地方，至爲廣遠，凡外藩使臣到京，驛館供給，行止出入，俱有一定體制，從無聽其自便之例。今爾國若留人在京，言語不通，服飾殊制，無地方以安置。若必似來京當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飾，天朝亦從不肯強人之難。設天朝欲差人常住爾國，亦豈爾國所能遵行？況西洋諸國甚多，非止爾一國，若俱似爾國王，懇請派人留京，豈能一一聽從？是此事斷斷難行，豈能因爾國王一人之請，以致更張天朝百餘年法度？若云爾國王爲照料買賣起見，則爾國人在澳門貿易，非止一日，原無不加以恩視。卽如從博爾都、噶爾臣、意達哩亞等國，屢次遣使來朝，亦曾以貿易爲請。天朝鑒其惻忱，優加體恤，凡遇該國等貿易之事，無不照料周備，前次廣東商人吳昭平，有拖欠洋船價值銀兩，俱飭令該管總督，由官庫內先行動支帑項，爲代清還，將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爾國亦聞矣。外國又何必派人留京？如此越例斷不可行之請，況留人在京，距澳門貿易處所，幾及萬里，豈亦何能照料耶？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觀習教化，則天朝自有天朝禮法，與爾國各不相同，爾國所留之人，卽能學字，爾國自有風俗制度，亦斷不能效法中國，卽學會亦屬無用。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無貴重；爾國王此次齎進各物，念其誠

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製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派人留京一事，於天朝體制，既屬不合，而於爾國，亦殊覺無益。特此詳晰開示，遣令貢使等安程歸國。爾國王惟當善體朕意，益勵誠悃，永矢恭誠，以保佑爾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賞加賞各物件另單賞給外，茲因爾國使臣來國，特頒敕諭，並賜寶爾國王文綺珍物，俱如常儀；加賜緞羅綺文玩器具諸珍，另有清單，王其祇受，悉朕睦懷。特此敕諭。”

又敕諭云：

“爾國王遠慕聲教，嚮化惟殷，遣使恭齋表貢，航海祝釐，朕鑒爾國王恭順之誠，令大臣希領使臣等瞻覲，錫之筵宴，賚予駢蕃，業已頒給敕諭，賜爾國王文綺珍玩，用示懷柔。昨據爾使臣以爾國貿易之事，稟請大臣等轉奏，皆更張定制，不便推行。向來西洋各國，及爾國夷商，赴天朝貿易，悉於澳門互市，歷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霑餘潤。今爾國使臣，於定例之外，多



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統馭萬國，一視同仁，即在廣東貿易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紛紛效尤，以難行之事，妄行干瀆，豈能曲徇所請？此爾國僻居荒遠，間隔重洋，於天朝體制，原未諳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詳加開導，遣令回國。恐爾使臣等回國後，稟達未能明晰，因復將所請各條，繕敕逐一曉諭，想能領悉。據爾使臣稱，爾國貨船，將來或到浙江甯波珠山及天津廣東收泊交易一節，向來西洋各國，前赴天朝地方貿易，俱在澳門，設有洋行，收發各貨，由來已久，爾國亦已遵行多年，並無異語。其浙江甯波直隸天津等海口，并未設有洋行，爾國船隻到彼，亦無銷售貨物；况該處並無通事，不能諳曉爾國言語，諸多未便。除廣東澳門地方，仍准照舊交易外，所有爾使臣懇請向浙江甯波珠山及直隸天津地方泊船貿易之處，皆不可行。又據爾使臣稱，爾國買賣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貯貨物發賣，做照俄羅斯之例一節，更不可行。京城為萬方供極之區，體制森嚴，法令整肅，從無外藩人等，在京城開設貨行之事。爾國向在澳門交易，亦因澳門與海口較近，且係西洋各國聚會之處，往來便益，若於京城設行發貨，爾國在京城西北地方，相距遼遠，運送貨物，亦不甚便。從前俄羅斯人在京城，設館貿易，因未立恰克圖以前，不過暫行給屋居住，



嗣因設立恰克圖以後，俄羅斯在該處交易買賣，即不准在京城居住，亦已數十年；現俄羅斯在恰克圖交易，即與爾國在澳門交易相似。爾國既有澳門洋行，發賣貨物，何必又欲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疆界嚴明，從不許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擾雜。是爾國欲在京城設行之事，必不可行。又據爾使臣稱，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島一處，商人到彼，即在該處停歇，以便收存貨物一節：爾國欲在珠山海島地方居住，原為發賣貨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無洋行，又無通事，爾國船隻，又不在彼岸停泊，爾國要海島地方，亦屬無用。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況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貨物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別國紛紛效尤，懇請賞給地方，居住買賣之人，豈能各應所求？且天朝亦無此體制，此事尤不便准行。又據稱撥給附近廣東省城小地方一處，居住爾國夷商，或准令澳門居住之人，出入自便一節：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澳門貿易，劃定住址地界，不得踰越尺寸，其越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今欲附近省城地方，另撥一處給爾國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歷來在澳門定例。況西洋各國在廣東貿易多年，獲利豐厚，來者日衆，豈能一一撥給地方分住耶？至於夷商等出入往來，悉由地方官督

率洋行商人，隨時稽查，若竟毫無限制，想內地民人與爾國夷臣間有爭論，轉非體恤之意。覈之事宜，自應仍照定例，在澳門居住，方為妥善。又據稱英吉利國夷商，自廣東下澳門，由內河行走，貨物不上稅或少上稅一節：夷商往來納稅，皆有定則，西洋各國，均屬相同。此時既不能因爾國船隻較多，徵收稍有溢額；亦不便將爾國之稅例，獨為減少。惟應照公平抽收，與別國一體辦理。嗣後爾國夷商販貨赴澳門，仍當隨時照料，用示體恤。又據稱爾國船隻，請照例上稅一節：粵海關征收船料，向有定例，今既未便於他處海口，設行交易，自應仍在粵海關按例納稅，無庸另行曉諭。至於爾國所奉之天主教，原係西洋各國所奉之教，天朝自開關以來，聖帝明王，垂教創法，四力億兆，率由有素，不敢惑於異說；即在京師當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與中國交結，妄行傳教。華夷之辨甚嚴，今爾國使臣之意，欲任聽夷人傳教，尤屬不可。以上所論各條，原因爾使臣之妄說，爾國王或未能深悉天朝體制，並非有意妄干，朕於入貢諸邦，誠心向化者，無不加之體恤，用示懷柔；如有懇求之事，若與體制無妨，無不曲從所請；况爾國王，僻處重洋，輸誠納貢，朕之錫予優加，倍於他國。今爾使臣所懇各條，不但於天朝法制攸關，即為爾國王謀，亦俱無益難行之事。茲再明白曉諭：爾國



王當仰體朕，永遠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經此次詳諭後，爾國王或誤聽爾下人之言，任從夷商，將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嚴，各處守土文武，恪遵功令，爾國船隻到彼，該處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爾國夷商，徒勞往返，勿謂言之不豫也。其懍遵勿忽！特此再諭。”

馬戛爾尼此行，除得此兩敕諭外，可謂一事無成，失望而返。一八〇五年（嘉慶十年），英政府又遣使來華，以書幣贈諸清方，而清政府仍以朝貢視之；當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已愈趨強盛，使臣以英為獨立國家，獨立國家與獨立國家互相贈答，不能目之為朝貢，但清政府則以為使臣無禮，驅逐其回國。英政府之要求與中國正式通商，雖屢受侮辱，但仍不灰心。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英政府又派亞墨斯特（Amherst）為大使，來中國要求通商，又受侮辱而返，一事無成。

在鴉片戰爭以前，英人之在中國，不僅要求正式通商不遂，通商貿易不能自由，即其日常生活，亦備受苛酷限制。而中國官聽之視英，又以夷狄禽獸目之，其所受侮辱情形，有不勝於言者。當時清政府尚訂有防範洋商的章程如下：

- 1, 外國軍艦，不准駛入虎門以內；即其保獲商艦之軍艦，亦須停泊於江口以外，與商艦之解纜，當同時拔錨。



- 2, 婦人不可借來商館, 銃礮槍及其他武器, 均不得持入。
- 3, 所有航路引水人及買辦等, 概須我國澳門同知發給牌照; 非受買辦之直接監視, 不許外國艦船與其他商民交易。
- 4, 各商館不得使用八人以上之華人, 並不得雇用僕婦。
- 5, 外人不能與我國官吏直接交涉, 遇必要時, 必須經過公行之手續。
- 6, 外人不許泛舟江上; 惟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 得遊覽花園, 仍須攜帶翻譯; 苟外人有不正行爲時, 翻譯當負其責。
- 7, 不准外國人不用轎。
- 8, 外人買賣, 須經公行商之手; 卽居住商館者, 亦不許隨意出入, 防其與奸商有秘密交易之行爲, 且恐其受本地奸商之欺誑也。
- 9, 外國艦船, 得直航黃埔, 徘徊河外, 不能寄泊他處。
- 10, 公行行商, 不准負欠外人債務。
- 11, 通商時期已過, 外人不得在廣州居住; 卽在通商期內, 貨物購齊, 亦須裝載而歸, 否則可往澳門。

總之, 在鴉片戰爭以前, 中國政府抱閉關自守主義, 對於外商之來華貿易, 予以種種限制; 而無絲毫提倡獎勵之意。

在這個時候，外來華貿易，限於廣東澳門一處，而且不是與中國商人直接交易，而是經過“公行”（Co Hong）與“商館”（Factory）。公行就是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國際貿易的專營機關，也是外國商人所反對的一種阻礙外商在華發展的桎梏。

公行制度的起源，不能不遠溯到一七〇二年（康熙四十一年）的“官商”（Emperor's Merchant）。官商的性質，原是由官廳指派一人，為對外貿易的經手人；此人向官廳納銀四萬二千兩，由官廳給以包攬對外貿易的全權；凡外人至中國購買商貨，及外貨在中國行銷，均須由此類官商經手。當時與外人通商的地方，不僅限於廣東澳門一處，福建之廈門福州泉州，浙江之寧波舟山等處，都有外國商艦，而這些地方中外間的貿易，都是由官商包辦經手。一七〇三年（康熙四十二年），廈門官商組織公會，會員人數，限定八人至十人，以壟斷對外貿易。這種官商的公會，即是以後的公行，但那時在廣東方面，也還祇有官商而沒有公行。

一七二〇年（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始正式成立公行，而對外貿易事宜，全歸公行壟斷。當時外人因深感公行壟斷之行爲，對華貿易不易發展的痛苦，故要求清廷廢除公行制度，甚至以停止廣州貿易為要挾，故公行制度，中間經清廷一度廢止。但自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廷指定廣州為唯一對外貿易口岸後，公行制度，又一七五九年復活。復活後的公行制度，其職權較



以前更爲重大，不僅貿易上的一切由公行包辦，而且政府與外商間的交涉，亦以公行爲代理人。公行一方面代政府徵收稅課，一方面爲外商代納關稅；一方面傳達政府意志於外商，一方面又代外商轉陳一切要求意見於政府。公行既壟斷了對外貿易，對於外商自然有過於苛索的地方，所以大爲外商所不滿，一七七〇年（乾隆三十六年），英商以英金三萬鎊賄買中國當道，封閉公行。但政府與外人言語隔膜，直接交涉，頗感不便，人民亦以言語不通之故，無法與外人直接通商，故至一七七六年，政府又給行商十人以對外貿易的專利，而公行制度，又無形復活。行商之取得對外貿易專利權，須向政府納銀二十萬兩，方能得此。行商人數，約由十人至十三人，普通均稱爲“十三洋行”（The Thirteen Merchants），對外貿易，都由這“十三洋行”操縱。外人在中國經商者，都須與十三洋行交易，即外商住居之地，亦由十三洋行租給，名爲“商館”。公行行商在對外貿易上既有如此特權，故外商乃完全在其壟斷之下，普通外商船到埠，即由商館之運貨人收船上裝貨清單，交於公行行員，由其支付一切碼頭費用後，運貨於商館內。此項貨物，外商乃全不過問，由公行爲彼出售。公行將此種外貨脫售以後，即代外商採辦中國土貨，運往外國。凡外商之貨物脫售後，行商即於其中取“行佣”以資維持。“行佣”的數目，初時本抽百分之三，其後逐漸增加，至一八一〇年（嘉慶十五年）竟增加至



百分之一〇。行佣如此增加，固使外商難堪，而政府之苛捐雜稅，額外貢獻，亦為外商所不能忍受，如船舶之進口，首先在澳門官署納費，納費以後，沿途航行，尚須種種費用；及至納船鈔（噸稅）時，正稅以外，又尚有附加稅及手續稅，此外之額外貢獻，如於政府須有貢品，於監督須有禮物，於吏役須有賄贈，因不如此，便要發生種種阻礙。外商於此，本深惡痛絕，屢次要求改革，一八一〇年英商之呈請減行佣，即其一例。但在中國政府方面，當時根本不可與外洋通商，故不惜加以種種苛例，以為“洋人無利可獲，或可杜其僭來。”外商呈請改良，不能奏效，故最後乃出於武力的壓迫，此鴉片戰爭之所以發生也。

如上所述，在鴉片戰爭以前，外商雖頻來中國，要求通商，而中國總是深閉固拒，一種排外的閉關自守主義，顯然可見。這種閉關主義的發生，自有牠的歷史的根源。

第一：中國物產豐富，沒有仰給外國商品供給的必<sup>下</sup>，誠如乾隆給英皇敕諭中所謂“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這是實在的情形。中國的自然條件，比世界上任何國家更為優越，中國不僅有廣大的人口與廣大的領土，而且寒溫熱三帶的產物，無所不有，而且無不異常豐富。在西歐資本主義侵入以前，自足自給的小農經濟，頗可推持，不必“假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中國統治階級對於國內工商業，尚不求其發展，何

況對於外商？所以自足自給的小農經濟，是閉關主義的出發點。

第二：中國有數千年悠久的歷史，向以上國天邦自居，對外關係，不過千邦進貢，萬國來朝；於是夜郎自大，目光如豆，視天下如無物。但是歐州人來要求通商，並不是年年進貢，歲歲來朝，而是要求平等待遇，這自然是傲慢自尊的中國政府所不能接受。在中國政府看來，准許“夷商”在澳門貿易，已經是“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乾隆敕諭）而准許在澳門貿易，如今“於定例之外，多所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同上）

第三：中國歷史上的國際關係，既不過是千邦進貢，萬國來朝，所以一向與中國來往交通的，都是些弱小隣邦的商人，可欺而不足畏；而新來的歐洲人，則類皆軀幹高大，性情獷猛，且多攜有精銳武器之軍艦。中國的鄰邦如印度，爪哇，菲列濱等處之被歐洲人所征服，中國政府自然亦有所聞。當時中國政府一方面輕視外人，視為夷狄禽獸之族，而同時對於這些外來的強悍的夷人，也有相當畏懼之心，如康熙時代大員盧玉林論南洋事宜書中，對於外人之征服鄰邦，頗為注意，書中有云：

“紅毛乃西島番統名，其中有英圭黎，于絲蠟，佛蘭西，荷蘭，大西洋，小西洋諸國，皆兇悍異常；其舟堅固，不畏颶風砲火；軍械精於中土，性情陰險叵測。到處窺覷，圖謀人

國。統計天下海島諸番，惟紅毛西洋日本三者可慮耳。噶囉吧乃巫來由地方，緣與紅毛交易，遂被侵佔為紅毛市舶之所；呂宋亦巫來由分族，緣習天主一教，亦被侵佔為西洋市舶之所；日本明時作亂，閩廣江浙，皆受蹂躪，至今數省人民，言倭寇者，皆痛心疾首。”

可見清政府之閉關自守，除物產豐富，無待外貨以通有無，及歷史所造成的自尊心以外，還含有自衛的意義。





## 第四章

### 鴉片戰爭的發生及其影響

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關鍵，其重要的意義是不待解釋的。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原有市場不足以應生產力的發展，於是必須向外開拓殖民地；至十九世紀初期，世界上許多落後國家已被西歐先進國家掠奪殆盡，而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大，使這些先進國須不斷的開拓殖民地市場；在掠奪了非洲亞洲美洲澳洲的落後國家以後，終於光顧到中國來了。雖然歐洲的商業資本發達的國家，在十六世紀就開始到中國來，但中國與非洲美

洲那些落後的野蠻民族不同，中國有數千年的文明歷史，有幾萬萬的人口，有幾百萬方哩的疆土，當然不是像非洲美洲那些落後民族那樣容易被商業先進國家所屈服。這樣一個龐大的中國，無論他的內政如何腐敗，但究竟不是商業先進國家所能吞下肚去，所以雖然在十六世紀，就有西洋人到中國來，而直到十九世紀初期，中國還是沒有為西歐所征服。但是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的發展，已非僅僅是商業資本的發展可比。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國家武裝的勢力隨着強盛起來，不僅可以掠奪落後的民族，而且可以壓倒商業先進國家了。所以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那些商業先進國家不能完成侵略中國的志願，而英吉利很勇敢地來完成了這一志願，這就是中英鴉片戰爭之所以發生的根本原因。

祇有無常識的人，以為中英鴉片戰爭之發生，僅僅是為鴉片問題，其實鴉片問題，不過是一個導火綫而已，而鴉片戰爭的根源，早已潛伏在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與中國產業落後這一原因上。

中英鴉片戰爭，純粹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掠奪落後國家的侵略戰爭，而成爲導火綫的鴉片問題，不過是一種表面的理由；即使沒有鴉片戰爭，英國侵略中國的戰爭，也難免要發生的，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

英國是西歐資本主義最先進的國家，在十八世紀，已積極向



東方侵略。在伊里沙白女皇時代，即在印度之蘇拉特(Surat)地方，設立東印度公司(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作為侵略印度，爪哇，蘇門答臘的大本營，至十九世紀初期，印度已全部為英國所征服。英國在征服印度之後，更進而侵略受中國保護的緬甸；又於一八二四年，佔領新加坡及附近島嶼；一八二六年，佔領麻六甲；而英人在亞洲勢力的發展，乃益強大，當時那些商業先進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荷蘭等國，早已被英國的威力所屈服。法國自滑跌盧之戰失敗，拿破崙被俘以後，也不能與英國爭勝，環顧世界各國，能與英國爭一日之長者，唯俄羅斯而已。

英國自吞併印度及南洋羣島以後，更思向東侵略，集中視力於中國，而中國對於歐洲通商，又限制極嚴，英商在中國受種種侮辱苛待，英人至此，已忍無可忍，加以當時中國與俄羅斯較為親近，故英國尤不勝憤慨，適此時鴉片問題發生，英國乃決定向中國開戰。

在鴉片戰爭以前，鴉片之輸入中國，與年俱增。本來鴉片之輸入中國，遠在唐宋之際，但此時數量不多，流毒未深。至十七世紀，輸入漸多，為害漸烈。當時荷蘭與英國商人，由印度之Malwa, Benares, 以及Behar地方，輸入大宗鴉片於中國，中國斯時，尚未加以禁止。至乾隆年間，漸知鴉片之害，乃由清廷下令

禁止，將所存鴉片一千餘箱燒燬，且另定法律，嚴禁吸賣，該項法律規定：

“國內商人販賣者枷一月，杖一百，遣邊充戍卒三年；侍衛官吏犯者罷職，枷二月，杖一百，流謫三千里爲奴。”

一時鴉片貿易甚稀，但未幾法令漸弛，犯者又多。至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再燒鴉片三千二百箱，並重申禁令，但當時政治腐敗，賄賂公行，禁者自禁，吸者自吸，鴉片之輸入，反而年有增加。計一八一六年鴉片之進口數，僅三、二一〇箱，而至一八三八年，竟達二八、三〇七箱之多，茲將自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三八年這二十餘年間鴉片進口數，列表如下：

歷年鴉片進口表

年代	箱數（每箱120斤）	價值（西班牙幣）
1816	3,210	3,657,000
1817	3,698	4,084,000
1818	4,128	4,187,500
1819	5,387	4,745,000
1820	4,780	5,795,000
1821	4,770	8,400,800
1822	5,011	8,822,000
1823	5,822	7,989,000

1824	7,222	8,644,603
1825	9,066	7,927,500
1826	9,621	7,608,220
1827	10,025	9,662,800
1828	9,525	10,425,190
1829	14,388	13,749,000
1830	14,715	12,673,500
1831	20,183	13,744,000
1832	16,225	13,150,000
1833	21,659	14,222,300
1834	19,362	12,878,200
1835	?	?
1836	27,111	17,904,248
1837	?	?
1838	28,307	19,814,800

上表中鴉片進口的價值，以西班牙幣計算，值國幣若干，尚無正確統計。另據摩斯（Meorse）所著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史中統計自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至道光十年，此十年中輸入中國之鴉片及其他貨物之價值如下：



鴉片在進口貨中之地位表 (單位元)

年代	呢絨	五金	皮貨	鴉片	棉花	其他	總計
1821	3,276,692	464,301	478,824	9,430,450	5,054,859	313,616	21,480,018
1822	3,673,696	462,603	319,231	9,530,500	2,994,874	487,407	18,977,633
1823	3,610,130	852,592	269,443	7,421,600	4,106,208	413,427	18,351,360
1824	4,493,924	813,053	286,151	5,737,700	5,252,351	367,441	18,491,670
1825	3,921,528	773,371	336,112	9,782,500	6,231,542	364,668	23,269,060
1826	4,045,470	916,979	286,819	9,299,326	7,229,612	428,772	23,583,230
1827	2,105,655	1,397,150	243,636	14,934,496	5,804,290	697,217	26,573,709
1828	3,126,628	502,474	69,388	11,725,377	5,663,963	576,509	23,554,891
1829	3,170,406	717,676	198,666	14,079,694	5,030,100	737,135	26,060,640
1830	2,910,287	871,394	85,120	13,029,345	5,667,777	107,274	23,814,660

除了以上有統計可查以外，尚有許多偷運而無數可稽的，可見鴉片的進口，其數極多，而在進口貨中，佔最重要的地位。

鴉片進口既如此之多，其流毒之深，自無待言。所以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上諭軍機大臣禁絕鴉片，上諭中有云：

“鴉片流毒最甚，前已屢降諭旨，通飭各省督撫，各就地方情形，設立章程，嚴行查禁。惟鴉片多係來自外洋，聚於廣東，若不杜絕來源，是不揣本而齊末。現經有人條陳各弊，是否實在情形，着李鴻賓等確加查覈，如何使煙土不能私入，洋面不能私售，各地於貨船之外，不得另設船隻之處，悉心磋商，務將來源斷絕，勿令流入內地，以除後患。”

但當時清廷各官意見，頗不一致，有以爲不宜禁止者，如太常寺少卿許乃濟，於一八三六年（道光十六年）上意見書，主張承辦鴉片貿易爲合法，其詞如下：

鴉片使用過度則有害，然可爲醫藥。乾隆時代及其以前，海關則例列入藥材，每擔抽稅五兩四錢五分。至嘉慶元年，吸鴉片者有罪，處以枷杖之刑，以後刑之種類增加，又加以各種流刑及長期徒刑及絞刑，然增加苛酷之刑，未嘗實行，故吸者益衆。曩時鴉片尚與輸出之物交換，今也爲祕密之現金買賣。嘉慶初，輸入數止數百箱，至現時有二萬箱，現金之流出，概算殆在千數百萬元以上，可以一千萬兩計。因

此銀價騰貴，昔時銀一兩，可換銅錢一千文，今至千二百文乃至千三百文，於是野有餓殍之嘆矣。因防遏鴉片之輸入，乃至停止通商，此絕對的不可也。自來法令愈嚴，賄賂愈多，下級官吏愈多刻薄，惡人之爲惡，其計亦愈狡猾；防止秘密輸入而不能奏效者，似有絕大收入之希望存也。吸鴉片者社會之蠹賊也，吾人可以不顧；惟救濟國家流出之現金，其處置豈可不講哉！鴉片以醫藥輸入，既付關稅，自爲合法貿易，但須賣於公行員，更當以物換物，不得以販賣鴉片而將鑄造已成及整塊之現金輸出。官吏儒士兵士等，仍禁止吸食，犯者有刑。庶一面可以防止鴉片之濫用，一面亦不損政府之權威，又可防金屬之流出於外國也。”

此書上後，清廷交廣東總督與海關熟籌答覆。總督鄧廷楨，與海關及公行會商後，亦認爲應認鴉片爲合法貿易，但爲防害起見，規定辦法九條：

- 第一：凡輸入之鴉片，概可交換貨物，但置該貨物於保稅倉庫。當輸入船未出發之間，不許交換一物。
- 第二：派巡邏船及監視船，盡力防止秘密之輸入。
- 第三：就嘉慶二十三年之舊規定，無論何船，無論何種貴重物品，準輸入品三拆之金貨與其攜歸，其規定仍得繼續，惟一船取得之總額，不得過五萬先令。



第四：鴉片可照他之商品，賣於護商人。

第五：輸入稅一擔三兩，外附加稅三錢，計量費八分六厘，總計三兩三錢八分六厘。

第六：價雖不能一定，但鴉片須常保其自然之市場平準。

第七：通商僅限於廣東，未通過廣東稅關之鴉片，一概沒收。

第八：本國栽種之禁令，輕減幾分，以對抗外國鴉片。

第九：官吏學生士兵，不許吸食。

但當時清廷中仍以反對鴉片貿易者為多，如一八三六年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鱣，上疏反對，其疏有云：

“凡禍所存在之物，不可不禁。從前發佈，非能無為而治，咎在地方官吏奉行不力。外國人本不能獨力輸入鴉片，必待漢奸之協力。一方厲行禁止，一方對於種種惡行為，官吏又默許行之，如此輕視法律，則其無效也，不待贅言。嘉慶二十五年中，將外國商人等由澳門放逐伶仃島，此策甚是，其後何又將彼等召還耶？以茶與鴉片交換，不可用銀；夫既禁止銀幣之輸出，何不能禁止鴉片之輸入耶？如謂藉內地栽種，以停止外國之輸入，從此本國之鴉片，產出甚多，如福建廣東浙江山東雲南貴州等地，無上書主張禁止令之更加嚴重，要求執行矣。總之，鴉片之為物，使國民腐敗，使國民衰弱，有萬害而無一利。赤髯之英夷，以此輸入中國，實如黃蘭

人以手段征服爪哇之行爲，故中國亦將陷入此危難之地位。嘉慶二十五年，嘗命廣東總督，如外人有違法之行爲，寬恕至三，再三再四，犯而不改，然後斷然處置。今也鴉片之毒，使軍隊沉淪於腐敗墮落之淵，官吏與儒生，亦染斯毒，一般人民道德上之標準，從此低下。當此千鈞一髮之秋，復舉抑制之力，一切除去，則彼等滔滔，相率而就自滅之途，大禍尙堪沒想耶？”

同年，給事中許球，亦上疏主張全禁：

“往時豐富之金銀，至今日益形缺乏，因此不法之輸出，每年國家所失之數，在一千萬兩以上也。且其初係外國鑄之銀貨，今乃中國之塊銀，金銀溢出如此，十年以後，將至幾億矣！如此滔滔之勢，豈能防遏耶？是必鴉片之輸入與金銀之輸出，一同禁止，始爲正當之辦法，但解一方之禁，則他方何以維持其禁令乎？凡事先治己而后治人，此古聖人之格言。正本清源，不可不治本國民始。法令所定之刑罰，毫無容赦；以後檢查外商之行爲，或逮捕彼等；或將其倉庫船，由伶仃島令其返國；或宣告彼等，若再以倉庫船誘惑中國人，通商必至斷絕，其居留民亦不免受死刑；使其本國政府知如此之利害關係，外人必覺其自身之危險，竭力避其危難，不再有輕蔑我政府之事矣。……”



一八三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中，所陳尤爲痛切：

“考諸純帝之世，籌邊之費幾何，巡幸之費幾何，修造之費又幾何？而上下充盈，號稱極富。至嘉慶以來，猶徵豐裕，士大夫之家，以及巨商大賈，奢靡成習，較之目前，不啻霄壤。豈愈奢則愈豐，愈儉則愈高耶？竊見近來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於外夷也。蓋自鴉片輸入中國，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查例載凡洋船到廣，必先取其洋商保給，保其必無夾帶鴉片，然後准其入口，其初不過純袴子弟，習爲浮靡，尙知斂戢，……近亦漸染成風，外洋來煙漸多，另有蕩船載煙，不進虎門海口，停泊於洋中之老萬山大嶼山等處，粵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一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餘萬兩之多：此外如福建浙江山東天津等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無用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

清廷於黃爵滋上疏後，又嚴申禁煙之令。時湖廣總督林則徐上奏，中有：



“煙不禁，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非獨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

至此，清廷乃拜林則徐爲欽差大臣，至廣東查辦禁煙。林至廣東後，即與兩廣總督鄧廷楨等，移文英吉利，文如下：

“爲會禁鴉片煙事：照得天道無私，不容害人以利己；人情不遠，孰非惡死而好生？貴國雖在重洋二萬里外，而同此天道，同此人情，未有不明生死利害者也。我天朝因海爲家，大皇帝爲天之仁，無所不覆，即遐荒絕域，亦在並生並育之中。廣東自開禁以來，通流貿易，凡在內地民人，與外國番船，相安於利樂者，百數十年於茲矣。且大黃茶葉湖絲等物，皆中國寶貴之產，外國若不得此，即無以爲命，而天朝一視同仁，許其販運出洋，絕不靳惜，無非推恩外服，以天地之心爲心也。乃有一種奸夷，製爲鴉片，夾帶販賣，誘惑愚民，以害其身而謀其利，從前吸食之人尙少，近則互相傳染，流毒日深。在中原富庶繁昌，雖有此等愚民，貪口腹而殘生，亦屬孽由自取，何必爲愛惜；然以大統之天下，務在端風俗以正人心，豈肯使海內生靈，自甘爲毒，是以現將內地販賣鴉片，並吸食之人，一體嚴行治罪，永禁流傳。惟此貴國所屬各部落內鬼蜮奸人，私行造作，自非貴國王令其製造；即各國之中，亦即數國製造此物，並非諸國皆然。又聞貴國不准人吸食，

犯者必懲。自係知其害人，故特爲嚴禁。然禁其吸食，何如禁其販賣，禁其造作，乃爲清源之道；若自己不食，而仍敢製造販賣，引誘內地愚民，則是欲己之生，而陷人於死；欲己之利，而貽人以害，皆人情之所通恨，天道之所不容。天朝威振華夷，何難力制其命，而仰體聖明寬大，自宜誥誡於先。且從前未用公文，移會貴國王，欲將此害人之鴉片，求遠斷絕。我內地禁人吸食，爾協屬國禁人製造。其從前已經造作者，貴國王須卽全行搜盡，投之海底。斷不許天地間，更有此種毒物，非特內地人民，不受其害，豈不各享太平之福？並昭貴國王恭順之忱。如此則明乎天理，而上天不至降災；協乎人情，而聖人亦必嘉許。況內地既經嚴禁，無人吸食；卽該國仍行製造，終亦無處可賣，無利可謀，與其虧本徒勞，何不改圖生業？現在內地搜出鴉片，盡付油火焚燒；若再有夷船夾帶鴉片前來，不能不一體燒燬，恐船內所載他貨，亦難免玉石俱焚。是利未得而害已形，欲害人而先害己。天朝所以能服外國者，正有不測之神威，毋謂言之不早也，貴國王接到此文，卽將如何嚴禁斷絕緣由，速行移復，幸勿謊飾支延，竚切！須至移者。”

復諭各國外商云：

“諭各國夷商知悉：照得夷商到廣通商，獲利甚厚，不論



所帶何貨，無不全銷，欲置何貨，無不立辦；是以從前來船，每歲不及數十隻，近年來至一百數十隻之多。我大皇帝一視同仁，准爾貿易，爾纔得沾此利。倘一封港，各國何利可圖？況茶葉大貴，夷商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乃聽爾年年販運出洋，絕不靳惜，恩莫大焉。爾等感恩，即須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煙，帶來內地，騙人財而害人命乎？查爾等以此物蠱惑華民，已歷數十年，所得不義之財，不可勝計；此人心所共憤，亦天理所難容。從前天朝例禁尚寬，各口猶可偷漏，今大皇帝聞而震怒，必欲除而後已，所有內地人民，販鴉片開煙館者，立即正法，吸食亦議死罪。爾等來至天朝地方，即應與內地民人同遵法度。本大臣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是以特蒙大皇帝頒給平定外域屢次立功之欽差大臣關防，前來查辦，若追究該夷人積年販賣之罪，即已不可姑容，惟念究係遠人，從前尚未知有此嚴禁；今與明申約法，不忍不教而誅。查爾等現泊伶仃等洋之躉船，存貯鴉片甚多，意欲私行售賣，獨不思海口如此嚴拿，豈復有人敢為護送？而各省亦皆嚴拿，更有何處敢與銷售？此時鴉片禁止公行，人人知為鴆毒，何苦貯在夷躉久旋大洋，不獨枉費工資，恐風火更不可測也。合行諭飭，諭到該夷商等即遵照將躉船鴉片盡數繳官，由洋商查明何



人名下，繳出若干斤兩，造具清冊，呈官點驗收明燬化，以絕其害，不得私毫藏匿；一面出夷字漢字合同甘結，聲明嗣後來船，永遠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卽正法字樣。聞該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論，已來者盡數呈繳，未來者斷絕不來，是能悔過畏刑，尙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卽當會同督撫兩院，奏請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寬免前愆，並請酌予賞犒，以獎其悔懼之心。此後照常貿易，既不失爲良夷，且正經買賣，儘可獲利致富，豈不體面？倘執迷不悟，猶思捏稟售私，或託名水手帶來，與爾無涉，或詭稱帶回該國，投入海中，或乘間而赴他省覓售，或捕塞而繳十之一二，是該夷有心違抗，怙惡不悛，雖以天朝柔遠綏懷，亦不能任其藐玩，應卽遵照新例，一體從重懲創。此本次大臣自京面承聖諭，法在必行，且既帶此關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尋常查辦他務可比。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况察看內地民情，皆動公憤，倘該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圖，非但水陸官兵，軍威壯盛，卽號召民間丁壯，已足制其命而有餘。而且暫則封倉，久則封港，更可難絕其交通？我中原數萬里版輿，百產豐盈，並不藉資夷貨，恐爾各國生計，從此休矣。爾等遠出經商，豈不知勞逸之殊形，與衆寡之殊勢哉！至夷館中慣販鴉片之奸夷，本大

臣早已備記其名；而不賣鴉片之良夷，亦不可不爲剖白。有能指出奸夷，責令呈繳鴉片，並首先具結者，卽是良夷。本大臣必先優加獎賞，禍福榮辱，惟其自取。今令洋商伍紹榮等到館開導，限三日內回稟，一面取具切實甘結，聽候會同督撫示期收繳，毋得觀望諉延，後悔無及，特諭。”

林則徐到粵後，既雷厲風行以禁鴉片，復迫英商繳出鴉片二、五六六箱，焚之於虎門。英國之對於中國，久有侵略的野心，至此乃不能復忍，卒於一八四〇年十月，在廣東開始轟擊，此後戰事復延長於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各處，結果中國大敗，乃於一八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爲城下之盟，締結中英江寧條約。這是中外不平等條約的第一次締結，江寧條約的原文有十三條，其主要者有下列各點。

1. 中國賠償英國損失費銀21,000,000元；
2. 中國以香港全島，割讓於英國；
3. 中國允開廣州福州廈門上海甯波五處爲通商口岸，准外人居住通商，並得在各該處設領事館；
4. 廢止公行制度，許英人以自由貿易權；
5. 在上述五處通商口岸，英商應納之進口出口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
6. 議定英國貨物，向在某港按例納稅後，卽准由中國商人，



徧運天下，路經稅關，不得重行徵稅。

在這不平條約中，中國不僅損失了21,000,000元的鉅款，而且開闢商埠，割讓香港，並且損失了海關的自主權。自從以後，資本主義的侵略，可以長驅直入，毫無阻礙，而中國的封建壁壘，也被破壞無遺了。

中英鴉片戰爭發生的原因，是毋庸討論的，這不是誰是誰非的法律問題，而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對於落後國家的侵略的一幕不可或免的悲劇，至於於中國戰敗的原因，一方面當然是由清吏的庸弱無能，但是根本的問題，在乎一個是先進國家，一個是落後國家。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暴力的壓迫之下，無論落後國家有如何偉大的天才英傑，也是不能挽回這種失敗的悲運的。所以鴉片戰爭的結果，中國之失敗，簡直是自然而且必然的事。

鴉片戰爭是近代史的一大關鍵，其重要的影響，甚於一切歷史上的變動，因為鴉片戰爭的結果，締結了中英江甯條約，開始了帝國主義的露骨的侵略，詳細言之，其影響約有如下幾點：

第一：不平等條約的繼續締結。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與外國的一切條約，當然也有許多是極不平等的，然而總是中國站在有利的地位。但是中英江甯條約，完全相反，使中國站在最不利的地位。自從這破天荒的於中國不利的江甯條約締結以後，各國即繼英國之後，相率向中國要求締結最惠國條約（The Most



Favoured Nation Clause), 如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 美國遣古新(O. Cushing) 使華, 訂立“望廈友好通商條約”。同年, 法國亦援例要求, 訂立“中法黃浦條約”。一八四七年, 又與瑞典挪威締約。一八五八年, 又訂立中英天津條約與中法天津條約。這些條約, 都是中國站在最不利的地位, 無條件的將主權斷送殆盡。

第二：帝國主義武力侵略的發展。在鴉片戰爭以前, 中國雖然已極懦弱, 但究竟是有數千年文明歷史的大國, 有數萬萬國民與數百萬方哩的廣大疆土, 所以這些先進國家也還不敢對中國作露骨的侵略; 但是鴉片戰爭以後, 中國的懦弱無用, 已為衆所週知, 於是武力侵略, 有加無已, 鴉片戰爭以後, 帝國主義對華的武力侵略, 主要的有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的英法聯軍之役; 一八九五年的中日之役; 一九〇〇年的八國聯軍之役等。此外, 如緬甸戰爭, 安南戰爭, 琉球戰爭, 台灣戰爭, 朝鮮戰爭等, 外患相繼而至。

第三：是疆土的損失。直接因鴉片戰爭而損失的, 雖祇有香港一處(中英江甯條約第三條“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 給予大英君主, 暨嗣後世襲主位者, 長遠據守, 任便立法治理。”), 但此風一開, 帝國主義相繼威脅要求, 以致一八六〇年割九龍與英國; 一八五八年割黑龍江北岸及烏蘇里地方與俄國; 一八八五年割

安南與法國；一八八六年割緬甸與英國；一八九五年割台灣、朝鮮、及澎湖列島與日本；一八七七年割澳門與葡萄牙；一八九八年割香港附近島嶼四十餘處及大鵬深川兩灣一帶島嶼與英國。除割讓以外，尚有租借地與專管租界，亦等於割讓，計一八九六年將關東州（旅順大連灣等處）租與日本；一八九七年，將膠州灣租與德國（一九一五年轉移日本）；一八九八年，將威海衛租與英國；一八九九年，將廣州灣租於法國。專管租界及公共租界公共居留地的開闢，則有如下表：

專管租界表

地點	國別	約定期	開設年	面積(坪)
上海	法	1843年	1848年	424,465
沙面	英	1859年	1861年	1,000
沙面	法	1859年	1861年	1,672
鎮江	英	1861年	1861年	3,716
天津	英	1861年	1861年	1,159,158
天津	法	1861年	1861年	316,180
廈門	英	1861年	1862年	13,000
廈門	日	1861年	1762年	40,050
天津	德	1861年	1895年	188,883
天津	俄	1861年	1898年	1,087,423

天津	日	1861年	1898年	303,503
福州	日	1861年	1899年	
天津	比	1861年	1901年	265,137
天津	意	1861年	1902年	134,147
天津	奧	1861年	1903年	22,296
九江	英	1861年		
營口	日	1905年		
漢口	英	1862年	1862年	60,000
漢口	德	1862年	1895年	125,500
漢口	俄	1862年	1896年	62,000
漢口	法	1862年	1896年	34,200
漢口	日	1862年	1898年	50,000
蕪湖	英	1879年	1904年	
蘇州	日	1896年	1896年	100,000
蘇州	英	1896年	1906年	88,000
杭州	英	1896年	1896年	
杭州	日	1896年	1896年	1,334,245
沙市	日	1896年		108,875
重慶	日	1891年		143,080
烏魯木齊	俄	1891年		



塔爾巴 哈台	俄	1860年	
廈門	美	1890年	1899年
牛莊	英	1861年	
安東	日	1905年	
奉天	日	1905年	

## 公共租界表

廈門	1902年設定
上海	1863年英美兩國租界合併

## 公共居留地表

長沙	1904年開設	
濰縣	1904年開設	80,000坪
周村	1904年開設	480,000坪
濟南	1916年開設	288,000坪

第四：是商埠開放與商品侵略的急進。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外間雖有貿易，但未正式締約通商，外商在中國所受阻礙甚多。鴉片戰爭的結果，江甯條約第二條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其後又續開商埠，多至一百餘處，而資本主義商品侵略，在中國乃得大為發展。

第五：是關稅協定與關稅主權的喪失。中英江甯條約第十條規定“英國商民，居住通商之廣州等五處，應納進口出口之貨稅，

均置秉公議定則例。”又“議定英國貨物自在某港按例納稅後，即准由中國商人遍運天下，而沿路經過稅關，不得重加稅例。”在這裏雖然沒有明白規定百抽五的辦法，但翌年（一八四三年）所訂的通商條約上，規定海關進口稅均為值百抽五，中國方面不能再加，亦不能再在他處抽稅。本來海關抽稅標準，其衡定之權，全在自己國家，決非他國所能過問，如此則如認為某項進口貨有害本國產業的發達，可以提高其稅則以示限制。但自從關稅協定以後，中國即不能增加稅額，於是保護關稅的作用完全喪失，而外國商品也就如水之東流，無法遏止了。中英江甯條約本只限於英國，其後各國援例要求，均取得與英國同樣的特權，從此外貨踴躍輸入，破壞了中國原來的自足自給的小農經濟。

第六：是鉅額的賠款，中國在十九世紀初期，國家財政，本極困難，在鴉片戰爭中，消耗極鉅，再加以21,000,000元的賠款。鴉片戰爭以後，最重要的幾次賠款如下：

中英鴉片之役	21,000,000元
英法聯軍之役	16,000,000兩
中俄伊犁之役	9,000,000兩
中日台灣之役	50,000兩
中日戰爭之役	230,000,000兩
八國聯軍之役	450,000,000兩

如此鉅額的賠款，當然取之國人，於是更促進了農村崩潰的速度。

鴉片戰爭以後，資本主義侵略長驅直入的結果，一方面使中國原來的自足自給的小農經濟開始崩潰，另一方面由於這種經濟基礎的變動，使牠的上層建築，也開始動搖，於是展開了一部近代中國的革命史。





## 第五章

### 農村革命的展開——太平天國 運動與捻民運動

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對於落後國家的侵略，是使落後國家無可抵抗的。中國雖然一向自視爲上國天邦，以爲四海之內，唯我獨尊，但是在鴉片戰爭中，清兵的不堪一戰，清廷的舉止失措，懦弱無用的情形，表露無遺。但是民衆的反抗精神，其轟轟烈烈，與政府的懦弱無能，正是一個相反的對照。

鴉片戰爭開始的時候，廣東首當其衝。人民負擔獨重。當鴉片戰爭第一次在廣東議和時（一八四一年），廣東方面出賠款

6,000,000元與英國，這6,000,000元中除4,000,000元由藩司運司海關三庫發給外，餘2,000,000元，直接取諸於廣東人民（自然其餘的4,000,000元也是間接取諸粵人）。廣東人民本來已經感受經濟貧乏的壓迫，再加上官廳爲這2,000,000元的賠款，日夜搜括，惟恐不及，以致更引起社會極大的不安。而勝利的英國軍隊，又在各處恣意騷擾，奸淫擄掠之事，時有所聞，以致激起了農民的原始暴動——平英團運動。據清史所載，平英團的情形如下：

“……於是粵民種種不平之感，一旦迸發。初十日，英兵千餘，方自四方砲台回泥城，三元里居民，忽大樹平英團之旗幟，於是一時鳴金揭竿而起者，聯絡一百有三鄉。頃刻間，男婦數千人，各處壯丁雲集，四面埋伏，誓與決一死戰。義律（Captain Elliott）聞變馳救，陷重圍不得出。鄉民愈聚愈衆，頓至數萬。英人突圍不出，死者二百餘人。義律移書告急於知府余保純，保純以奔山命往解，翌日，始挾義律出圍。翌日，償金授受已畢，英軍遂於十二日撤去廣州，其大船有擱滯淺沙者，各鄉民復思截而火之，奪回償款之銀。義律懼，復移文總督，祈填出示曉諭，衆始解散。而佛山義勇，從陸路攻英人於龜崗砲台，先從上風縱毒煙以眯敵目，殲敵數十；又擊破應援之船，當事先後奏聞，詔責諸將調集各省官兵，何



不如區區鄉勇？……是時南海番禺兩縣，圍集義勇，晝夜演練，義律偵知內河有備，竟不敢報覆，翻然改計，遂復有廈門長江之師。”

這段簡單的敘述，當然不足以充分表現當時農民反帝國主義的原始暴動的精神，但已可看出農民暴動的力量，足以使帝國主義者畏懼。

當時平英團討英夷檄，有云：

“……爾自謂船廠無敵，何不於林制府任內攻犯廣東？爾前日被圍，何不力戰自拔，而求救於首府？此次奸相受爾籠絡，主款撤防，故爾得乘虛深入。倘再入內河，我百姓若不雲集十萬衆，各出草筏沈沙石整槍砲，截爾首尾，火爾艘艦，殲爾醜類者，我等即非大清國之子民！……”

因為統治階級對於資本主義先進國的投降，於一八四二年締結了中英江甯條約，中英之間，總算暫時歸於和平，於是平英團運動也就此銷沉下起。

但是鴉片戰爭的結果，一方面，資本主義侵略的長驅直入，很快的引起了農村經濟的破產——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戰勝了自足自給的小農經濟，於是資本主義商品侵略的發展，與農業經濟的破產，以同樣的比例發展起來。在另一方面，中國戰敗的結果，不僅在國際上揭破了這“上國天邦”的紙老虎的弱點，而且

在國內暴露了統治階級的無能。農村經濟的破產，使統治階級在稅收上不能不受影響，而戰後的賠款與種種善後佈置，在在需費。稅收既因農村經濟的衰落而減少，而支出反因戰敗的結果而大增。在鴉片戰爭以前，收支已不能相符，財政困難已極；鴉片戰爭以後，又來了這樣相反的現象，於是清政府在財政上更是焦頭爛額。爲要維持這種殘餘的統治，祇有加重對於民衆的剝削，於是盡力搜刮，備極殘暴。在鴉片戰爭以前，社會經濟本已有疲乏的現象，經過鴉片戰爭的蹂躪，尤其是鴉片戰爭後資本主義的積極的侵略，農村經濟已不能維持自足自給的狀態，而開始崩潰。安定靜默的社會生活，已經開始不安的騷動。在這種狀況之下；統治階級即使不加重其剝削，已不能維持原來的狀態；再加上統治階級的殘酷的剝削，於是農村經濟更快的崩潰，而社會秩序之不安，乃愈趨愈甚，生活於落後的封建社會的農民，在資本主義與本國統治階級的兩重剝削之下，饑寒交迫的結果，自然而必然地爆發了原始的武裝暴動——這就是一八五〇年開始的太平天國運動。

在統治階級及爲統治階級所蒙的無恥文人士大夫之流，對於太平天國運動加以“髮匪”“粵匪”“長毛賊”等的惡名，而事實上，這些惡名正反映了太平天國運動是真正的羣衆自發的反封建統治的革命運動，這種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歷史意義，正因統治階級



及其叢養的牙爪的誣蔑而愈加顯著。一個羣衆的原始暴動，在最短時間內，發動幾千萬的人民，佔據十幾省的區域，支持至十餘年之久，這種偉大的羣衆革命運動，是我們應該加以深切的認識的。

太平天國運動之所以發生，已如前述，是資本主義侵略與封建統治的剝削，這兩重關係之下，農村經濟急激破產的結果。因爲如此，太平天國運動在客觀上必然是接受了資本主義影響的反封建剝削的革命運動，在這種原始暴動中，當然不能有很正確的意識與路線，但這一定義是絕對無可非議的。當時農村經濟破產的最主要原因，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侵略；但是在客觀上，資本主義是一種進步的制度，中國的封建統治階級，對於資本主義的侵略，顯然已沒有抵抗的能力，而只是因了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加重其對國內民衆的剝削，以維持其動搖破產的統治。但是封建的統治階級的露骨的掠奪，加速了農村經濟破產的速度，於是統治階級對內的殘酷與對外的無能，就成了羣衆暴動的第一個對象，所以太平天國運動的第一任務，就是推翻滿清政府的統治。在太平天國的“奉天討胡檄”中，把這種反滿清政府的意識，表現得非常清楚。原文如下：

“真天命太平天國本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爲奉天討胡，檄布四方：



“若曰：嗟爾有衆，明聽予言；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虜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爲怪，中國尚得爲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膻播於四海，妖氣慘於五湖；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爲臣僕。甚矣哉！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中國名爲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胡虜目爲妖人者何？蚊魔（閻羅妖）邪鬼也，韃靼妖胡，惟此敬拜，故今當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魔。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淫污；決東海之波濤，洗不淨彌天罪孽。謹按其彰著人間者，約略言之：夫中國有中國之形象，今滿洲悉令削髮，拖一長尾於後，是中國之人爲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乃僞妖康熙，暗令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鬩狐同寢，言之痛心，談之污

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沾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條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國之男子而脅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言語，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國音，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視其餓殍流離，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污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女士皆哭泣道路，是使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鈔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起義興復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謀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污矣哉！昔姚弋仲胡種也，猶戒其子襄，使歸義中國。符融亦胡種也，每勸其兄，堅使不攻中國。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吳三桂之招引，竊占中國，惡極窮凶。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狐交媾成精，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合，並無人倫風化。乘中國之無人，盜據中夏。冠座之設，野狐升據，蛇窩之內，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犁其窟而鋤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凌辱，聽其嚇詐；甚至庸惡陋劣，貪圖蠅頭，拜跪於狐羣狗黨之中。今有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赫然怒。今胡虜羣犬也，公等讀書知古，毫不知恥。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



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諸公之所熟聞也。予總科滿洲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萬。以五千萬之衆，受制於十萬，亦可云醜矣。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盈貫，皇天震怒，命我天皇，肅將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罰。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左祖之心？或爲官，或爲民，當急揚徽之志。甲冑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夫婦男女，擄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招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執守緒於蔡州，擒安懼於應昌。興復久淪之境土，頂起上帝之綱常。其有能擒狗彘子咸豐來獻者，或能斬其首級來降者，或有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皇上帝當初之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豈胡虜所得而久亂哉？公等世居中國，誰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誅妖，執螯孤以先登，戒防風之後至，在世英雄無匹，在天榮耀無疆。如或執迷不悟，保僞拒真，生爲胡人，死爲胡鬼。順逆有大體，夏夷有定名，各宜順天，脫鬼成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而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蕩胡虜，其何以對上帝於高天乎？予興義兵，上爲上帝報瞞天之讎，下爲中國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賞，逆天有



顯戮。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這篇檄文的措辭，雖然有許多可笑的地方，但一種反滿清統治的熱烈的情感，充分地表露出來。在這措辭粗劣的檄文中，可以看出太平天國方面沒有咬文嚼字的才子，沒有尊王衛道的聖賢之徒，因而反映出太平天國運動是下層平民自發的革命運動。

太平天國的領袖，都是天主教的信徒，而天主教就成爲團結太平天國羣衆的中心思想。本來自從西歐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傳教就成了這些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侵略中國的一種手段，這種文化的侵略，可以麻醉中國人民的民族精神，可以緩和排外的心理。但是太平天國的天主教宣傳，事實上並不是替侵略國家盡了文化侵略的作用，而是用以團結羣衆，作爲羣衆的共同的理想追求的目標。因爲在一個原始的農民暴動中，事實上既不能有正確的理論指導，而又不能不有一個共同信仰的中心。所以原始暴動往往不能不染有迷信神怪的色衫，因爲如果沒有這種迷信，沒有這種神怪，就沒在一種理想的力來團結羣衆，就不能發動廣大的羣衆運動。太平天國運動是在鴉片戰爭以後，即在西歐資本主義侵入以後，牠的本身是資本主義侵略下的一種反動，然而多少受了資本主義的影響，所以已經相當程度的掙脫封建宗法社會的迷信，而以帶有濃厚的資本主義色彩的天主教來作用團結羣

衆的理想中心。太平天國的理想上的原則，可以“原道醒世訓”爲標準；“原道醒世訓”的原文如下：

“夫天下凡間，分言之則有萬國，統言之實則一家；皇上帝天父，凡間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國是皇上帝主宰理化，遠而番國亦然。遠而番國是皇上帝生養保佑；近而中國亦然。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羣。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爾吞我併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而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奸邪謀閉而不興，竊盜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爲大同。’而今尙可望哉？然而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於今夜退而日升矣。惟願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跳出邪謀之鬼門，循上帝之直道。時凜天威，力遵天誡；相與淑身淑世，相與正己正人，相與作中流砥柱，相與挽已倒之狂瀾，行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幾何乖漓澆薄之世，其不一旦變而爲公平正直之世也？幾乎陵奪鬥狠之世，不一變而爲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智不詐愚，勇不苦懦之世也。”

太平天國是一種積極的反抗滿清統治的運動，在受了資本



主義的侵略，封建的農業經濟的沒落過程中的農民暴動，事實上不能不受了資本主義的影響，帶有濃厚的反封建的色彩，所以如統治階級的獵犬，屠夫曾國藩輩之對於太平天國的“反叛行爲”，要大聲疾呼，指斥爲“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的名教之鉅變！”，我們看吧，屠夫曾國藩的“討粵匪檄”上，寫得如何“冠冕堂皇”(?)：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叙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唯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謂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自賈以取息，謂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讀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鉅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豈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爲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死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亂臣賊子，窮凶極惡，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朝；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污其宮



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此又鬼神所共憤，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太平天國運動的偉大的的歷史意義，可以在曾屠夫這篇反宣傳的檄文中表現出來。的確的！偉大的太平天國運動，把“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誠如曾屠夫所說“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關以來名教之奇變！”，以致孔子孟子，亦痛哭九泉。我們更可以從曾屠夫的檄文中，看出太平天國運動的確比明末的農民原始暴動——“尊王衛道”的史家所斥為“流寇”的暴動，更進了一步，李自成張獻忠，尚且敬畏神祇，而太平天國則對於先聖大賢，忠臣義士，以及一切廟宇道院，一掃而光。在曾屠夫這些統治階級的衛士們看來，當然比李自成張獻忠更為兇惡，但我們很明白，太平天國運動比明末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羣衆暴動，更徹底得多；太平天國已經踏出了封建宗法社會的牢籠，而開始接受先進的資本主義的影響，很勇敢地起來與封建宗法社會的一切禮教文化決鬥了！不錯，這是“開關以來名教之奇變！”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曾屠夫的話是非常之正確的！

太平天國運動雖然有十幾年的歷史，但因為無時無日不在與統治階級激戰中，所以事實逼迫他必須傾全力來與統治階級週旋，因而不及顧到內部政治經濟的設施，但在太平天國佔領區域內，社會經濟已經有了一個極大的變化，太平天國運動不僅是

一種反封建的運動，而且澈底地推翻了建築在封建剝削關係上的舊社會經濟制度。在太平天國統治的地方，舊有的統治階級被推翻，土地沒收為公有，再由公家分給農民。這種含有積極的建設資本主義意義的土地國有的辦法，是太平天國運動中最重要貢獻。而這種土地革命的制度，其詳細的辦法，規定在“天朝田畝制度”中。“天朝田畝制度”是太平天國的最重要的文獻，研究太平天國運動的唯一要件，現抄錄原文如下：

“凡一軍，典分田二，典刑法二 典刑報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卽以師帥旅帥兼攝 當其任者掌其事，不當其事者亦贊其事。又一軍一切生死黜陟等事，軍帥詳監軍，監軍詳欽命總制，欽命總制次詳將軍，待衛，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奏天王；天王降旨，軍師遵行。勳等臣，世食天祿，其後來歸從者，每年每家設一人為伍卒。有警則首領統之為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為農，耕田奉尙。

“凡田分九等，其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為尙尙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為尙中田，可出一千斤者為尙下田，可出九百斤的為中尙田，可出八百斤者為中中田，可出七百斤者為中下田，可出六百斤者為下尙田，可出五百斤者為下中田，可出四百斤者為下下田。尙尙田一畝，當尙



中田一畝一分，當尙下田一畝二分，當中尙田一畝三分五厘，當中中田一畝五分，當中下田一畝七分五厘，當下尙田二畝四分，當下下田三畝。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三人醜田，好醜各一半。凡天下田，天下人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飽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煖也。凡男婦每人自十六歲以尙，受田多逾十五歲以下一半，如十六歲以尙，分尙尙田一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尙尙田五分。又如十六歲以上，分下下田三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下下田一畝五分。凡天下樹牆下以桑，凡婦蠶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雞，二母麩，無失其時。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芋蔗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蓋天下皆是天父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煖矣。此乃天父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但兩司馬存其錢穀數於簿，上其數於典，錢穀及典出入，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



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姻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錢。如一家有婚娶彌月事，給錢一千，穀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總要用之有節，以備兵荒，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直等匠，俱用五長及五卒爲之，農隙治事。凡兩司馬辦其二十五家婚娶吉喜等事，總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舊時歪例盡除。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禮拜堂，兩司馬教讀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及真命詔旨書焉。凡禮拜日，五長各率男婦至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講聽道理，頌讚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凡二十五家中力農者有賞，惰農者有罰；或各家有爭訟，兩造赴兩司馬，兩司馬聽其曲直，不息，則兩司馬挈兩造會卒長，卒長聽其曲直；不息，則卒長尙其事於旅帥師帥，典執法及軍帥，軍帥會同典執法判斷之；既成獄辭，軍帥又必尙其事於監軍，監軍次詳總制，將軍，侍衛，指揮，檢點，及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奏天王，天王降旨，命軍師，丞相，檢點，及典執法等，直啓天王主斷；天王乃降旨主斷，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軍師遵旨處決。凡天下官民，總遵守十款天條，及遵命令，盡忠報國者，則爲忠；由卑陞至高，世其官。官或違犯十款天條，及逆命令，受賄弄弊者，則爲奸，由高貶至卑，黜爲農民。能遵條命及力農者，則爲賢爲良，或舉或賞；

民或違條命及惰農者，則爲惡爲頑，或誅或罰。凡天下每歲一舉，以補諸官之缺，舉得其人，保舉者受賞；舉非其人，保舉者受罰，其伍卒民有能遵守條命及力農者，兩司馬則例其行蹟，註其姓名，並自己保舉姓名於卒長；卒長細核其人於本百家中；果實，則其人並舉姓名於旅帥；旅帥細核其人於本五百家中；果實，則尚其人並保舉姓名於師帥；師帥實核其人於本二千五百家中；果實，則尚其人並保舉姓名於軍帥；軍帥總核其人於本軍中；果實，則尚其人，並保舉姓名於監軍；監軍詳總制，總制次詳將軍，侍衛，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啓天王；天王降旨，調選天下各軍所舉爲某旗，或師帥，或旅帥，或卒長，兩司馬，伍長。凡濫保舉人者，黜爲農。凡天下諸官，三歲一陞貶，以示天朝之公。凡濫保舉人及濫奏貶人者，黜爲農。當陞貶年，各省首領各保陞奏貶其統屬，卒長細核其所統兩司馬及伍長，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軍帥；至若其人無可保陞，並無可奏貶者，則姑置其人不保不奏也。旅帥細核其所統屬卒長及各兩司馬伍長，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師帥。師帥細核其所統屬旅帥以下官，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



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軍帥。軍帥將師帥以下官所保陞奏貶姓名，並自己所保陞奏貶某官姓名，詳於監軍。軍並細核所統軍帥，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詳欽命總制。欽命總制並細核其所統監軍，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一同舉於將軍，侍衛，指揮，檢點，及丞相。丞相稟軍帥，軍帥將各欽命總制及各監軍及各軍帥以下官所保陞奏貶各姓名，直啓天王主斷；天王乃降旨主斷，超陞各欽命總制所保陞各監軍，其或陞爲欽命總制，或陞爲侍衛；譴謫各欽命總制所奏貶各監軍，或貶爲軍帥，或貶爲師帥，或貶爲旅帥卒長；超陞各軍帥所保陞各官，或陞尙一等，或陞尙二等；或陞軍帥；譴謫各軍帥所奏貶各官，或貶爲下一等，或下二等，或貶爲農。天王降旨，軍帥宜丞相，丞相宜檢點，指揮，將軍，侍衛，總制次宜監軍，監軍宜各官，一體遵行。監軍以下官，俱是在尙保陞，奏貶在下。惟欽命總制一首，天王准其所統各監軍，保陞奏貶。欽命總制，天朝內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諸官，天王亦准其尙下互相保陞奏貶，以剔尙下相蒙之弊。至內外諸官，若有大功大勳，及大奸不法等事，天王准其尙下不時保陞奏貶，不必拘陞貶之



年。但凡在尙保障奏貶在下，誣，則黜爲農。至凡在下保障奏貶在尙，誣，則加罪。凡保障奏貶所列惡蹟，總要有憑據，方爲實也。凡設軍每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設一軍帥，次設軍帥所統五師帥，次設師帥所統五旅帥，共二十五旅帥；次設二十五旅帥各所統五卒長，共一百二十五卒長；次設一百二十五卒長各所統兩司馬，共五百兩司馬；次設五百兩司馬所統五伍長，共二千五百伍長，次設二千五百伍長各所統四伍卒，共一萬伍卒。通一軍人數，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凡設軍以後，人家添多，添多五家，另設一伍長，添多二十六家，另設一兩司馬，添多一百另五家，另設一卒長；添多五百二十六家，另設一旅帥，添多二千六百三十一家，另設一師帥，共添多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家，另設一軍帥。未設軍帥前，其師帥以下官，仍歸舊軍帥統屬。既設軍帥，則割歸本軍帥統屬。凡內外諸官及民，每禮拜日聽講聖經，虔誠奠禮拜頌讚天父上主皇上帝焉。每七七四十九禮拜日，師帥旅帥卒長，更番至其所統屬兩司馬禮拜堂講聖書，教化民，兼察其遵條命與違條命及勤惰。第一七七四十九禮拜日，師帥至兩司馬禮拜堂，第二七七四十九禮拜日，帥長又別至某兩司馬禮拜堂，以次第輪，週而復始，旅帥卒長亦然。凡天下每一夫有妻女子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則出一人

爲兵，其餘鰥寡孤獨廢疾免役，皆須國庫以養。凡天下諸人，每禮拜日，依職分虔誠設牲依饌奠祭禮拜頌讚天父上主皇上帝，講聖書，有敢怠慢者，黜爲農。欽此。”

在這裏最可注意的，如“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凡天下田，天下人人同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煖。”，“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等，這種近於原始共產主義的辦法，是寄托於農村土地關係的封建剝削所引起的反響，也是含有積極建設資本主義制度的意義。因爲這些寄托於土地關係上的封建剝削，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大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先決條件，必須要破壞這種封建的土地關係。就是說，必須要有激烈的土地革命。太平天國這種近於原始共產主義的急進的土地政綱，就是資本主義的土地革命的表現，也就是太平天國運動的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政治任務。太平天國運動之所以能夠很快的發展，在乎牠能夠得到廣大的羣衆的擁護；其所以能夠得到廣大羣衆的擁護，就在乎牠的急進的資本主義的土地政綱。因爲人民在殘酷的封建剝削之下，已不能維持其自足自給的安定生活，而封建的



剝削，是寄托在封建的土地關係之上，所以太平天國以解決土地問題和號召，很快就得到羣衆的擁護。然而太平天國運動之失敗，其原因亦正在乎經濟的落後，使這種資本主義的急進的土地政綱，還不能得到實現的社會條件，所以太平天國運動雖然在開始不久，就抓到了幾千萬的農民羣衆，然而因經濟過於落後之故，實現這種急進的資本主義政綱的社會條件還沒有存在，所以也就很快的失敗了。

關於太平天國運動失敗的原因，世間聚訟紛紛，有的說是太平天國內部不能團結之故，有的說太平天國太沒有紀律之故，有的說是單純的軍事上的錯誤，有的說是沒有與國際上取聯絡，有的說是行爲太過激烈之故……其實這些都是次要的乃至毫不足重視的原因。太平天國運動之所以失敗，其唯一的主要的原因，就在資本主義革命的條件還沒有長成，代表封建勢力的統治階級，雖然因爲西方資本主義的商品侵略而開始動搖，然而整個的社會經濟，還是封建的小農經濟，雖然在這一反封建統治的偉大的羣衆運動中，含有急進的資本主義的意識，然而第三階級還沒有長大起來，第四階級更不用說，整個的運動，是建築在沒有獨立的經濟基礎的農民身上。在這鬥爭的場合中，在統治階級一方面，雖然因爲爲西歐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侵略而開始動搖，開始表現了庸弱無能，然而在國內，這究竟還是唯一有力量的統治



者；在羣衆一方面，因為缺乏獨立的經濟基礎的原因，雖然在實際形勢的逼迫之下，能夠一轟而起，然而究竟不能堅持過久，農民沒有獨立的階級基礎，本是非常散漫的，如果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農民的運動，總不能脫離原始無政府的狀態，太平天國運動之犯了這一毛病，不是偶然的錯誤，也不是任何領袖領導不當的過失，而是自然而且必然的現象。但是統治階級一方面，即使是極度的動搖，極度的無能，然而他還有他獨立的階級基礎，他有他數千年來遺留下來的精神工具——人倫名教一切舊的封建道德的意識與習慣。一個沒有階級基礎，沒有核心領導的原始的羣衆運動，要獲到勝利，那是非常困難，簡直是不可能的。因此，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簡直是自然而且必然的結果。

太平天國運動之含有急進的資本主義革命的意義，這是不待解釋的。然而落後國家的資本主義的革命，與資本主義先進國的統治階級之間是不能聯繫起來的，而且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統治階級，對於落後國家的資本主義的革命，必然取壓迫的態度。在這裏是一點也不是奇怪的。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以侵略落後國為其本身發展的捷徑。牠們是決不願意這些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起來的，因為惟其落後，才失了抵抗侵略的能力，才可以容許牠們這些先進國家的誅求無厭的侵略。如果這些落後國家按照了自已的模型，創造成一個健全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則原來這

些先進國家就失去了侵略的場所。因為如此，一切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要用盡一切的力量，來壓迫落後國家的資本主義的革命。太平天國運動之所以不僅不能到歐美先進國家的幫助，而且受牠們的壓迫，這是毫不足怪的。那些取消主義與社會法西斯蒂的夥計們，不能理解這種關係，以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與落後國家的封建勢力聯繫起來，是千古奇談，是“荒謬無稽”，其實他們自己纔是荒謬無稽！資本主義先進國家既不願落後國家的進步，自然而且必然地要壓迫落後國家的進步的革命運動，因而自然而且必然地要與落後國家的反動的統治階級聯繫起來。封建的統治階級雖然一方面也感覺到先進國家的侵略的痛苦，然而當國內發生了革命運動的時候，牠們就會立刻對外來的侵略者妥協，甚至不惜對外來的敵人作最卑鄙屈辱的投降，而以全力來鎮壓革命。鴉片戰爭以後，代表封建統治的滿清政府，何嘗不深恨這些“外夷”的跋扈，然而當太平天國運動起來的時候，牠們在“攘外必先安內”的美名之下，實行與侵略國家妥協，而一致的與國內革命為敵。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與中國統治階級聯繫起來對付太平天國運動，於是更快的促成了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關於這點，在下一章分析曾國藩——統治階級的典型的代表人物——的時候，再加以詳細說明。

太平天國運動的發生，牠的內容，牠的失敗的原因，略如上



述，現在我們要把話說回來。

太平天國運動的發生，起源於南方的兩廣，普遍到全國各處。兩廣之所以成了太平天國運動的發祥地，其原因是不難知道的，因為西歐資本主義的露骨的侵略，始於鴉片戰爭，但在鴉片戰爭以前，資本主義的商品侵略，在廣東一帶已有長期的發展。鴉片戰爭之後，廣東人民犧牲特大，負擔特重，所以廣東的農村經濟，比其他各省更為悲觀，而羣衆的原始暴動，也就在兩廣開始暴發。

統治階級後雖然戰勝了太平天國運動，然而牠不能解決農村經濟的危機，所以羣衆暴動了雖然暫時鎮壓下去，但是回復安定無波的社會生活，已經是不可能了，於是在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以後，不久北方又發生了被統治階級指斥爲“捻匪”的農民的羣衆暴動。

太平天國運動經過了曾國藩等的殘酷的屠殺與長期的鎮壓以後，總算暫歸消滅，但是當統治階級作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反革命戰爭的時期，因為南方及中部各省，大多在太平天國手裏，所以統治階級的籌餉籌款，只能限於北方，而北方數省的民衆，乃不堪其剝削。及至太平天國運動被壓鎮下去的時候，北方的民衆已經被剝削至無法生存了。關於當時北方民衆被剝削的狀況，據孟遠上總憲魏蔚州書中所說，有如下情形：



“……若夫大江以南，黃河以北，輸版圖而永臣服，取無不應，而令無不從者，似可無煩眷慮矣，而愚所憂正在此。撫山疇而見黃茂，入村落而見枯樵，謂可博婦子之嬉寧，未幾而入於貢稅矣，未幾而捐於力役矣，未幾而食彼碩鼠，填彼猛虎矣；有田之害，甚於無衣；饒裕之禍，烈於貧乏，是終歲之勤劬，不足以供一紙之迫呼，而百室之聚蓄，不足以供一夫之耽視，顧瞻當世，滔滔皆是。……”（見清朝文錄簡編）

所以太平天國運動剛才失敗，而北方的“捻”民運動就繼之而起。捻民運動完全是統治階級的殘酷的剝削，致民不聊生而所激起的反響。但是統治階級既能夠把太平天國運動鎮壓下去，自然對於捻民運動的鎮壓也可以得到勝利了。

一切的羣衆的革命運動暫時失敗了，在投降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條件之下，封建的統治階級暫時又穩定起來。

## 第六章

### 統治階級典型的代表人物——屠夫曾 國藩與國賊曾國藩的意義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狀況，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商品侵略，使中國自足自給的封建的農業經濟開始崩潰，而國內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的剝削，更促進了農村經濟崩潰的速度，於是激發了廣大的農村的革命運動——太平天國運動與捻民運動。但是產業革命在中國還沒有展開，第三階級還沒有生長起來，所以還沒有代替封建統治的社會階級。加以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對於中國農村的仇視，與中國統治階級的壓迫聯繫起來，把偉

大的革命運動鎮壓下去，封建的統治階級又得到了暫時的相對的穩定。但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侵略又深入一步，而農村經濟的破產，也更進了一層。

在這樣一個環境中，統治階級對內盡了牠的最殘酷的努力，對外盡了最屈辱的妥協，繼換來了一個暫時的相對的安定。在這反動的掙扎中，曾國藩是一位最出色的最偉大的代表人物，他真不愧是這一時代的統治階級的模型：在對於國內革命運動的鎮壓，他盡了最殘酷的屠夫的任务；在對於外來侵略的卑恭屈節的妥協，他盡了最可恥的國賊的作用。屠夫曾國藩與國賊曾國藩，就是這一時代的整個統治階級的縮影。在這一意義上，對於曾國藩的研究是非常之重要的。

首先，爲使讀者易於瞭解起見，我們可以把曾國藩一生的思想與事業，寫成下面的一個大綱：

曾國藩，他是：

聖賢道統的繼承人

宗法社會的擁護者

屠殺民衆的劊子手

對外妥協的賣國賊

無論在任何時代，在任何經濟制度之下，統治階級必須有適合於他的剝削關係的意識與理論，來擁護他的統治，來麻醉被壓



迫者的神經；統治階級依賴這種精神工具，比依賴十萬警衛軍還更重要。在封建剝削之下，自然也有適合於這種統治的意識的理論，而孔丘就是集封建意識的大成。孔丘的全部理論，就是替統治階級建立了思想上的警衛軍，替統治階級麻醉被壓迫階級，不准他們反抗；在擁護統治階級的剝削關係這一意義上，孔丘成了統治階級最大的功臣；所以一方面，歷代的統治階級，為酬庸這思想上的獵犬，意識上的鑲客——孔丘——起見，尊之為至聖先師，被歷代統治階級利用而被歷代統治階級崇拜；另一方面，一切忠馴於統治階級的人物，也莫不全部接受他的思想領導，尊之為聖賢之道。這所謂聖賢之道，切實點說，是擁護統治階級的剝削的封建的傳統意識而已。在十九世紀中葉，西歐資本主義勢力雖已開始侵入中國，但整個的社會經濟還是封建的形態，統治階級當然是封建剝削的執行者。在這樣一種封建統治之下，孔丘的聖賢之道，當然依舊是思想的正統，而滿清政府的最忠實的獵犬曾國藩，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的繼承者了。曾國藩一生的任務，就是維護這種神聖不可侵犯的聖賢的道統。曾國藩之所以受被麻醉者的崇拜，受統治者的恩寵，曾文正公專祠之到處設立，一方面固然由於他能夠殘酷的屠殺民衆，完成了剿滅“髮匪”與“捻匪”的任務，使統治階級得暫時免於覆滅，而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他對於聖賢道統之維護得力。

維其他是“聖賢之徒”，所以他的屠功戮業愈顯得偉大；也維其他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的繼承者，所以纔能成爲一代偉人，曾文正公的專祠纔能到處設立起來。

曾國藩的一生思想事業，的確處處是不離“賢聖之道”的，這在他的書翰文件等一切著作中，也顯然可以看出，試舉一二例如下：

在他的晚年，曾在南京兩江總督任內（同治十年），作“日課四條”，這就是他一生思想的正宗。日課四條的原文如下：

“一曰慎獨則心安 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自慊，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卽曾子之所謂自反而縮；孟子之所謂仰不愧，俯不作。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二曰主敬則身強 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



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吾謂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悚，氣爲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衆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強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 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屬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是於天之所厚我者，辜負甚大矣。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富人百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四濬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羣山四應。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視民胞物與，宏濟羣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



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則曰賊；誠如其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四曰習勞則神欽 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著之衣，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隨之，鬼神許之，以爲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勞，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羞，衣必錦繡，酣豢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昧旦丕顯，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無逸一篇，推之於勤則壽考，逸則夭亡，歷歷不爽。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練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己饑己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拯民。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唾棄於時，飢凍就斃。故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祇欽

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欲。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

曾國藩在這裏說了一大篇，什麼慎獨則心安也，主敬則身強也，求仁則人悅也，習勞則神欽也等等，無非是傳播“聖賢之道”而已，曾國藩就是以此自課，以此教子，以此治事。如同治二年寄子紀澤書中，有云

“……三綱之道，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是地維所賴以足，天柱所賴以尊。故傳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儀禮記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吾家讀書居官，應守禮義……”

又如咸豐八年寄子紀澤書中，有云

“……作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問仁一章，言敬恕最爲親切。自此以外，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爲泰而不驕；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斯爲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爾心境明白，於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則宜勉強行之，此立德之基也，不可不謹……”



又如道光二十二年致諸弟信：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蓋不讀書則已，既自命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為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然則既自名為讀書人，則大學之綱領，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

又如答劉孟詩書，中云：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即物求



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則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磨礱，雖不克衷之於仁，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惟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鑽奇零，無由底於縫源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餒焉。……”

這些所謂聖賢之徒，在表面上總是說得仁義道德，而實際上，他們就是社會上最殘酷，最野蠻，最慘無人道的惡魔！對於統治者的卑恭屈節的馴服，是聖賢之徒的本色；對於被統治者的殘酷的屠殺與壓迫，是聖賢之徒的天職。曾國藩既是聖賢之徒，自然不能例外。他除了對於愛新覺羅氏皇朝極盡其卑恭屈節的能事外，唯一的本領，就是屠殺民衆。在愛新覺羅氏皇朝二百幾十年的統治中，曾國藩是一個最偉大的屠夫。他生平得意傑作，就是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鎮壓了捻民運動——就是他所謂完

成了“剿滅髮匪”“剿滅捻匪”這兩大工作。在這兩大鬥爭中，他很忠馴地做了統治階級的獵犬，以最殘酷的手段來屠殺民衆。總計在他的一生，於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鎮壓捻民運動這兩大工作中，民衆直接被其屠殺的，在三四十萬以上，至於間接被其屠殺的，更不計其數。數十萬民衆的膏血，把他的頂子塗得鮮紅，把他的“功勳”弄得高過一切，把他的曾文公正專祠造得富麗堂皇。簡括的說一句，曾國藩的一生事業、名譽、功勳、財產，都是用民衆的膏血染成的。因為曾國藩能夠直接屠殺三四十萬的羣衆，所以曾國藩纔能算得偉大，曾文正公專祠纔能在各省各處建立起來。

太平天國運動與捻民運動，如前所述，都是羣衆自發的革命運動。然而統治階級對於這種運動的鎮壓，是用了最殘酷最野蠻最無人道的手段。他們是怎樣地製造了羣衆的暴動，又怎樣殘酷地鎮壓了暴動的民衆？請看下面的兩段：

“……若夫秦楚閩越之郊，界於鄰境之民，其流離鎮苦之狀，亦有繪圖而進者乎？始苦寇，既又苦兵。間嘗西遊楚岳，南至甌越，見兩軍相遇，兵未接刃，而奏凱獻俘者，半皆饑寒垂死之民。其幸而遁逃，而間牒四出，網羅靡子，父喪其子，夫喪其妻，囚繫於車輪馬足之下，悲啼泗泣，聲徹寤寐，雖有殘鷲，靡不心傷。其更有幸而脫網者，所謂殘黎者是也。



然而人已亡矣，廬已燬矣，方求一枝之棲，一炊之飽不可得，而蒞茲邑者，又將按畝而征其石田，計丁而稅其朽骨，而又將死於籬楚敲朴之下。願有爲之請獨請恤者，且曰：姑留此殘遺，爲異日賦稅地。而下之部議，輒曰：需餉時常設法征輸也。嗚呼：以需餉之一語，下塞天下請獨之口，上邀爲國持籌之名，願曾不知下之設法者，果何如設法耶？征輸者果一一克副其額否耶？不數年而仍獨於積逋之中，是徒使災黎受追比之苦，有司蒙考成之累，而朝廷不得見寬恤之仁者，此一語爲之也。更不僅是；新復之疆宇，遠邇之所觀瞻也。撫我則來，虐我則去，今天下之兵，不爲不強矣，乃何以力能關城邑，而不能靖伏莽之寇？智足伏大憝，而不足以銷負固之民？被蚩蚩者以爲均死耳，而吾之伏莽負固，猶得偷須臾之生，以冀倖於萬一也。……”(孟遠上總憲魏蔚州書)

“……間嘗西游江楚之間，南歷甌越之外，軍士雲屯，膚功日奏，願逆我顏行，而奔亡不及者，十不一二也。大半皆餓餓無歸，寇所掠苦之民耳。手無寸刃，體乏完衣，而與荷戈抗敵之徒，竝膺鋒鏑，心竊痛之。然猶曰兵威所指，崑石無分，自古不免。乃賊旣遠颺，營壘已定，而兵卒四遺，遍周村落，東西南北，惟其所之，深谷窮山，靡不搜逮；而攜妻繫子，棲遯於荒煙叢棘之中者，亦入網罟矣。老穉者被僇於當前，怯



步者刈棄於道路，嬌兒弱息，蓬頭垢面，拘繫於幙幃之側，委置於車馬之旁；迴念骨肉，頓離永訣，屍骸暴露，已飽蠅狸，而凜威吞聲，不敢啼號；星昏霧暗，惟聞慘嘆愁泣之音；悲淒嗚咽，中夜聽之，肝腸寸斷！嗚呼！誰非赤子；誰無至情，方聖天子嘉意好生，一物失所，猶屢軫惻，一夫含冤，猶令推詳，而抑知救民水火之兵，塗炭生靈，乃一至此！當斯之時，遠實不知忌諱，痛哭於高牙大纛之前，委曲陳說，爲之請命，一時諸將亦皆惘惘悲悼，聲淚交下，祇以本朝成例，無可如何，且健兒僂力疆場，志專在此，倘一禁阻，誰肯用命。雖然，壯士從軍，志專財帛，積例使然，誠難遏止；然罄其室廬，掠其儲餘，可也；何至窮山僻野，搜其子女，而必盡其種類？卽或欲者攜之，憎者亦可棄之，彼老穉何辜，必罹鋒刃？怯步何罪，遽當刈戮？豈亦例不可更耶？更可異者，一旦遷師移壘，飢軀裂趾，不任追馳，爲之索夫役於殘邑，擔簦負輿，動以百計，往往有夫舁其妻，父舁其子，相見不敢認識，而悲號不禁，又遭鞭扑，且有不欲俱生，而乘間奮死以奪者。而此方之民，又罹屠洗之禍矣。至於出兵將士，官有家奴，兵有隨役，皆給口糧，足供驅使，而今則所至之處，勦役民夫，官則數十，兵亦數名，以供芻牧灑掃，一營之內，每至數千。或則裹糧受役，或則忍餓服勞，稍有拂意，鞭笞隨之；且有迫脅致

斃，委填溝壑者。無論勞民奪時，致廢農業；萬一奸宄間入，叵測致釁，戒備之道，亦非所宜。而相習爲例，莫敢抗阻，應檄或遲，輒遭詈辱；初定之區，斯禍爲烈。其或眷墳墓而不逃，望吳越而莫走。而議者又謂用兵之地，吏須強幹，催科儉運，遑恤瘡痍，骨已朽矣，丁則當稅；田雖石矣，賦則難蠲。區區子遺，又將死於箠楚之下。嗟乎！嗟乎！此無惑乎負固之愚，聞風益拒；開復之地，萑符莫靖也。……”（孟遠上大司寇宋長洲書）

統治階級怎樣製造了羣衆暴動，又怎樣殘酷地鎮壓了羣衆的暴動，在這兩段文章中，寫得非常明白。統治階級對於羣衆的殘酷的剝削與壓迫，弄到羣衆求生無路，於是“彼蚩蚩者以爲均死耳，吾之伏莽負固，猶得偷須臾之生以冀倖於萬一”，而羣衆乃起而作亂。但是統治階級對於自己製造出來的社會的騷亂，祇有以流血的手段去鎮壓，而曾國藩就成了屠殺民衆的最殘酷的劊子手，雖然他是滿口仁義道德，聖賢名教，而他的一身，塗着屠殺民衆的血腥，從湖南到湖北，從江西到安徽，從江蘇到山東，從河南到河北，他把民衆的鮮血，灑滿了這些省份！

以一個滿口仁義道德的聖賢之徒，竟能如此殺人不眨眼的以殘殺民衆爲快事，表面地看，似乎是一件矛盾的事，然而事實上是很合理的。統治階級之所以能夠統治着大多數的民衆，不外



是利用兩種工具：一種是精神上的工具，另一種是武裝的工具。所謂精神上的工具，在封建時代統治階級就用了仁義道德人倫名教等等一類的鬼話來欺騙民衆，例如什麼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什麼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君者天也等，使民衆在這類人倫名教的聖賢之道的麻醉之下，以爲盲目的對於統治階級的恭順馴伏，纔是合乎聖賢之道，纔是合理的。自孔丘孟軻以來，士大夫在這一點上，爲統治階級麻醉民衆，盡了極大的勳勞。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的曾國藩，在這一方面，自然對民衆盡了極大的欺騙作用。但是當統治階級對於民衆的精神上的麻醉，還不足使其馴服的時候，自然祇有丟了聖經賢書而用刀槍來屠殺這羣不馴服的奴隸了，好在聖經賢書與統治階級的刀斧手，是沒有衝突的；聖經賢書上所講的大道理，是民衆應該無條件服從統治階級，統治階級的任何誅求，不准反抗，所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如果君要你死而你竟敢不死，當然刀斧手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來殺你，這不僅不背乎聖賢之道，而且正是忠於聖賢之道；聖賢之道說，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如果你敢不死，不是違反了聖賢之道嗎？因爲如此，聖賢之徒是刀斧手的理論指導，刀斧手是聖賢之徒的理論的實行者；對於保衛統治階級的利益上，聖賢之徒與刀斧手，兩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刀斧手固然要講聖賢之道，聖賢之徒何嘗不可以做



刀斧手？因此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的聖賢之徒的曾國藩，其做了屠殺民衆的劊子手，這是非常之合理的事。

曾國藩自從辦團練“剿粵匪”以來，對於“匪”及有“匪”的嫌疑的民衆，一向是主張格殺勿論的，他是怎樣殘酷的屠殺民衆，看他自己說吧！

曾國藩辦團練，完全是利用地方土豪劣紳，收買無知鄉愚，使其與羣衆爲敵。曾國藩的基礎，可說全是建立在土豪劣紳身上。沒有土豪劣紳，他就不能多量的屠殺民衆，也不能完成他的“中興”的偉業了。但這也是極自然的事，土豪劣紳不僅是曾國藩的基礎，而且是整個統治階級的支柱；土豪劣紳與曾國藩之互相爲用，也是非常合理的事。所以曾國藩每到一個地方，必聯絡這一地方的土豪劣紳（他尊之爲“公正紳士”），以爲己用，而第一件工作，就是屠殺。例如他初出辦團練時致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書中有云：

“……國藩奉天子命辦理本省團練事務，是用致書各州縣公正紳耆，務求努力同心，佐我不逮……國家承平日久，刑法尚寬，值茲有事之秋，土匪乘間竊發，在在有之，亦望公正紳耆，嚴立團規，力持風化，其有素行不法，慣爲猾賊造言惑衆者，告知團長族長，公同處罰，輕則治以家刑，重則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經過鄉里，劫掠擾亂者，格殺勿論。其

有匪徒痞棍，聚衆排飯，持械抄搶者，格殺勿論。……”

此外在曾國藩下列各項文書中，可以看出他之嗜殺成性，殘暴無比：

“吾鄉瘡痍之後，惟芟除土匪爲第一要務，二三十年來，應辦不辦之案，應殺不殺之人，充塞於郡縣山谷之間，民見夫命案盜案之首犯，皆得逍遙法外，固已藐視王章而弁髦官長矣；又見夫粵匪之橫行，土匪之屢發，乃益囂然不靖，痞棍四出，劫掠風起，各霸一方，凌藉小民而魚肉之。鄙意以爲宜大加懲創，擇其殘害於鄉里者，重則處以斬梟，輕亦立斃杖下；戮其尤凶橫者，而其黨始稍戢；誅其尤害民者，而良民始稍息……即吾身得武健嚴酷之名，或有損於陰騭慈祥之說，亦不敢辭。……”（與徐玉山太守書）

“國藩以前月下旬，於寓中設審案局，十日內已戮五人。世風既薄，人人各挾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謠言，幸四方有事而欲爲亂，稍待之以寬仁，愈囂張自肆；白晝搶劫都市，視官長蔑如也。不治以嚴刑峻法，則鼠子紛起，將來無復措手之處，是以壹意殘忍，冀回頹風於萬一。書生豈解好殺，要以時勢所迫，非是則無以鋤強暴而安我孱弱之民……”（與魁蔭亭太守書）

“湖南本會匪卵育之區，去歲從洪逆去者，雖已分其強



半，而餘孽尚在伏莽，卽素未入會之徒，習見夫粵匪土匪之橫行莫禦，惟所欲爲，亦且翳然不情，思一逞其恣睢，若非痛加誅戮，與草薶而禽獮之，則悍民不知王法爲何物……國藩在此，日內粗有條理，扎各處紳士，縛著名之痞匪，差爲響應，至則斬刈，不復敢言陰騰。書生好殺，時勢使然耳。”（與江岷樵書）

“……東南如衡永各郡，西南如寶慶各屬，實爲匪徒淵藪，亦宜逕駐彼處，搜求洞穴，與草薶而禽獮之……頃已在公館立審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審，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敝處所爲，止此三科。……案至卽時訊供，卽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昨城內捆獻土匪，本交善化縣，敝處聞信，卽提來已立梟二人矣……”（復歐陽曉岑書）

“……現在設法購拿各劫案首要諸犯，至則立予磔死，不復拘守常例……”（與朱石翹書）

“茶攸土匪，得開下一番刷剔，草薶禽獮，想已無復遺孽……弟在省會，亦乏善狀，惟以練兵除匪二者爲要，得不法之徒，立予磔死，以是獲猛厲之名……”（與張潤農書）

“本部堂辦理土匪痞棍，亦不能向鄉間無故海捕，但有事到案，或搶劫重情，卽立予嚴辦，決不稍寬，該縣惟宜動於

結案，遇痞匪則立斃杖下，不過數案，則宵小斂戢矣。”（批新化縣稟）

後來曾國藩在北方剿“捻”的時候，對於無捻區域之安分農民，甚至亦整村整鄉，剿洗無遺，其殘酷之狀，尤百倍於討太平天國之時，下列文書，可見一二：

“鄒家圩從逆已久，鄒老金竟敢挈家自捻來歸，妻妾之所自來，皆不可問；又與雒河之鄒目，往還不絕，其為甘心從逆，已無疑義；鄒學禮曾為苗沛霖局董，亦非善類，當此立法之始，若不將居心叵測之人，立予誅鋤，以後必節節阻撓，仰該員等將鄒老金與雒河之鄒目，一并嚴密查拿正法，鄒學禮如實係莠民，亦即正法……告示有云入莠冊者，在籍則擒拿正法，該員等但當遵示，立誅莠民，如全圩（三百餘戶）皆係莠民，請兵剿洗可也。……”（批委辦蒙城圩務稟）

“……良莠不齊，處處皆然，不獨三百零七圩；其准留之圩，果皆良乎？一圩之中，著名匪人，不過數人，嚴擊正法可也。若全圩從捻，派兵洗之亦可也……”（批委辦阜陽圩務及阜陽縣合稟）

“……各圩怙惡不悛之徒，既有所聞，應即隨時隨地，擒拿正法。該員等又謂恐此有所發，則彼有所逃，欲俟清厘既畢之後，同時查擊；不知亳州地面甚寬，該員等帶人甚少，斷



無同時能擊許多之理，各匪轉得從容闖去，殊屬因循姑息……必須隨時擒拿，使各估惡者知在外爲賊，即不得在家爲民，尤不得去來自由，混其身於時捻時民之間，總以當機立決，購線捕誅爲主。……”(批委辦亳州圩稟)

“……竊自捻逆擾亂以來，奔竄無常，而時戀蒙亳老巢，以爲歸宿，其節次回竄，皆有莠民爲之勾引，居則爲民，出則爲捻，若商賈之遠行，時出時歸，恬不爲怪。臣於雒河解圍以後，即擬查辦民圩，以清其源，……於甘心從捻者，則悉力搜擊，立予正法，計……蒙城擒獲積捻五十九名，亳州擒獲積捻四十六名，阜陽五名。其間或係著名捻首，聚黨豎旗，或係勾捻破圩，殺傷多名，或已降而復叛，或陽順而逆陰，均屬莠民之尤，法無可貸。臣恐擊獲後，有去犯逃逸等弊，預行頒發大令，由各該員訊明，即行正法，錄供具稟，蒙城亳州二屬，擒斬尤多……”(彙陳查辦民圩擒斬捻匪摺)

屠夫曾國藩不僅對於捻民及太平軍殘殺無赦，而且對於一切有反統治階級傾向的民衆，乃至一切民間祕密會黨，亦肆意殺戮，哥老會亦不能倖免：

“獲訊哥匪，立予正法，甚屬可嘉，最足銷患未萌……”

(批劉臬司稟拿獲哥匪正法)

統治階級對於一切有反抗性的羣衆與集團，往往加以“匪”

的惡名，例如太平天國被指爲“粵匪”或“髮匪”，捻民被指爲“捻匪”，而哥老會也被指爲“哥匪”了，甚至連販私鹽的人，也被指爲“梟匪”而要“格殺勿論”，如批錄營武強縣稟梟匪充斥由：

“……該匪等推載隘斤，志甚叵測，該將官及該縣會同督役勇，奮力冲擊，匪等公然抗拒，哨官亦有受傷，不法已極！現據殺斃十三名，生擒十九名，並奪獲車輛槍刀，將生擒各犯，交付在深州究辦，……如審非實係裹協者，卽一概正法……”

在其討伐太平天國及捻民的時候，兩軍接觸，曾國藩對於所獲俘擄，一概屠殺勿赦，其殘酷之狀，實爲歷史上所罕有。當其攻破南京的時候，屠殺太平天國之兵士與民衆，達十數萬之多，白起坑卒，其屠殺亦不過如此！

曾國藩本人對於民衆既這樣殘酷的屠殺，復鼓吹各地土豪劣紳及地方官吏，盡情殘殺，唯恐其殺人之不多。他簡直以殺人多寡，定部下功勛之高低，一時風氣所開，以殺人爲聖賢偉業，光榮之事，殺人愈多，愈爲能吏幹才；不能殺人，卽爲庸人，卽被斥黜。而各地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在曾國藩包庇鼓勵之下，終日尋人殘殺，無惡不作。舉例來說，江西貴溪縣劣紳姚步紘（孝廉），在地方藉辦團練爲名，派丁斂費，無惡不作；民衆稍有反抗，姚卽加以通匪罪名，隨意殘殺。當時貴溪民衆之被其殘殺者，多至數



百人。民衆在其鐵蹄之下，忍無可忍，乃至曾國藩處控告，但是曾國藩對於民衆此項控告，竟批了如下幾句：

“舉人姚步紘在本籍帶勇，雖不無武斷之處，亦尚有捍衛之功，前此縱有過失，應免追究。”

這是當然的，曾國藩本人就是土豪劣紳出身，他是封建統治的擁護者，而土豪劣紳又是封建統治的基礎，所以曾國藩自然要處處地方迴護土豪劣紳，而與民衆爲敵了。

雖然統治階級的走狗如曾屠夫之流，把太平天國及捻民，斥之爲匪，而加以種種莫須有的罪狀，其實太平天國與捻民運動，都是民衆自發的運動，民衆對於這種解放自己的運動之熱烈參加，是不待說的，所以太平軍到一個地方，即得到一個地方羣衆的熱烈的擁護，較之曾國藩等“官軍”到一個地方，祇有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來歡迎的狀況，大有天淵之別了。這一點，曾屠夫自己也承認的。例如他在湖南辦團練時給張石卿制軍的信上說：

“……近日官兵在鄉，不無騷擾，而去歲潮勇有姦淫擄掠之事，民間倡爲謠言，反謂兵勇不如賊匪之安靜，國藩深恨斯言！……”

太平天國軍民的一致，看曾國藩自己說：

“……臣等調查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據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內，神人共憤！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

古，屢次削平大難，焜耀史編。然如嘉慶川楚之役，蹂躪僅及四省，淪陷不過十餘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躪尚止十二省，淪陷亦第三百餘城。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黨，如李開方守馮官屯，林啓容守九江，蕭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攻破金陵後之奏稿)

當太平軍不幸失敗，金陵被攻破之際，十餘萬太平軍與民衆，竟無一降者，聚衆自焚而不悔，這是何等堅決壯烈的故事！而民衆對於太平天國領袖的愛護，有如下述者：

“……李逆(按係指忠王李秀成)權術要結，頗得民心，城破後竄匿民間，鄉民憐而匿之，蕭孚泗生擒李逆之後，鄉民竟將親兵王三清，捉而殺之，投諸水中，若代李逆發私忿者。李秀成既入囚籠，次日又擒僞松王陳德風，到營一見李逆，卽長跪請安。聞此兩端，惡其民心之未去，黨羽之尙堅……”(曾國藩奏稿)

統治階級對於民衆的屠殺，雖然極盡其殘酷的能事，而自翊爲“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屢次削平大難，焜耀史編。”然而對於外來的異族的侵略，却處處退讓，在“對外須先對內”的藉口之下，對民衆儘量地屠殺，對異族侵略反極度忍受。於是曾國藩才



僅做了屠殺民衆的劊子手，而且做了投降異族的國賊了。但這也是社會經濟條件所決定的，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也使滿清的封建統治感到不安，但祇要能夠“不抵抗”，能夠把些權利給外國，則尚可相安一時；即退一萬步說，即使爲帝國主義所滅亡，而統治階級還不失爲這一新殖民地的貴族，在印度滅亡以後，印度的王公不依然是印度的貴族嗎？雖然見了大不列顛人民要低首下心，但對於一般民衆，還不是高高在上嗎？但是民衆革命勝利以後可就不得了，不僅皇帝的寶座要被推翻，而且亡國大夫也做不成了，所以他們“甯贈友邦，毋貽家奴”不肯攘外而要安內了。

在太平天國運動正在發展的時候，一八五八年發生了英法聯軍之役；英法聯軍攻陷大沽口，京師震動，但是統治階級還是傾全力來鎮壓國內的革命運動，而對於外患反處處退讓。他們不僅不抵抗外來的侵略，而且勾結異族，共同鎮壓國內的革命運動，在太平天國時，曾國藩借洋兵以助戰，上海之能夠保守，蘇常之能夠克復，實出於洋兵幫助之力。可見在革命運動之前，封建統治階級與帝國主義是一致地聯結起來，對革命作戰。

曾國藩對於國人，雖然殘殺無算，威猛無比，而對於“洋兵”及“洋人”，則小心翼翼，必恭必敬，完全暴露了他那種甘爲帝國主義走狗的真面目。舉例來說，同治九年，天津發生了外國領事對官放槍，引起了民衆的憤怒，以致激發暴動，將外國人傷斃

多名之後，曾國藩辦理此案，一面向洋大人卑恭屈節以道歉，一面復調集重兵，濫捕民衆，至數百人之多，酷刑毆打，逼取供狀，甚至無口供者亦被斬決數十名，復將地方官吏撤差查辦，其賊民媚外，可謂千古第一國賊！而民衆之所以激起暴動，殺傷外人多名，直接是由於外國領事對官開槍，激動衆怒，間接是由外人在華，無惡不作，引起民衆甚深之反感，而曾國藩甘爲國賊，殘殺民衆以取媚外人，較之吳三桂之引滿入關，秦檜之私通金邦，其罪惡尤甚百倍！吳三桂秦檜被後世唾罵，而曾國賊反得朝野之崇敬，這是因爲當時整個的封建統治階級，已經投降於外來的異族，曾國藩不過是執行了這種遞降表的任務而已。

關於天津事件的起源，據曾國藩本人的奏報如下：

“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牽涉教堂，並有挖眼剖心，作爲藥材等語，遂致積疑生憤，激成大變。必須確查虛實，乃能分別是非曲直，昭示公道。國藩抵津以後，逐細研訊，教民迷拐人口一節，王三雖經供認授藥與武蘭珍，尙時供時翻，又其籍在天津，與武蘭珍原供在寧津者不符，亦無教堂主使之確據。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餘名，逐一訊供，均稱習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養，並無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則全係謠傳，毫無實據。臣國藩初入津郡，百姓攔輿遞稟，數百餘人，親加推問，挖眼剖心，有何實



據？無一能指實者。詢之天津城外，亦無一遺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惟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稱教堂拐騙丁口，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稱教堂誘污婦女，厥後各處案雖議結，總未將檄文揭帖之虛實，剖辨明白，此次詳查挖眼剖心一條，竟無確據，外間紛紛，言有眼盈繯，亦無其事，蓋殺孩壞尸，採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尚不肯爲；英法各國，乃著名大邦，豈肯爲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是事。天主教本係勸人爲善，聖祖仁皇帝時，久經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慘，豈能容於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設，其初意亦與育嬰堂養濟院略同，專以收卹窮民爲主，每年銀兩甚鉅，彼以仁慈爲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至津民之所以積疑生憤者，則亦有故。蓋見外國之堂，終年扃閉，過於祕密，莫能窺測底裏；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係從他處募工修者，臣等親履被燒堂址，細加查一，其爲地窖，不過隔去潮溼，皮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盡目覩，但聞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閉其中，又不經本地匠人之手，其致疑一也；中國人民，有至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復出，即如前任江西進賢縣知縣魏度珍之女賀魏氏，帶女入堂治病，久而不還，其父至堂婉勸回家，堅不肯歸，因謂其有藥迷喪

本心，其致疑二也；仁慈堂收養無依子女，雖乞丐窮民，及疾病將死者，亦皆收入，彼教又有施洗之說，施洗者其人已死，而教主以水沃其額，而封其目，謂可升天堂也，百姓見其收及將死之人，聞其親洗新尸之眼，已堪詫異，又由他處車船致送來津者，動輒數十百人，皆但見其入，而不見其出，不明何故，其致疑三也；堂中院落既多，或念經，或讀書，或傭工，或醫病，分類而處，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後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樓教堂，往往經年不一相見，其致疑四也；加以本年四五月間，有拐匪用藥迷人之事，適於是時堂中死人過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兩尸三尸，共一棺者，五月初六日，河東叢塚，有為狗所發者，一棺二尸，天津鎮中營游擊左寶貴等，曾經目視死人皆由內先腐，此獨由外先腐，胸腹皆爛，腸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其致疑五也。平日熟聞各處檄文揭帖之言，信為確據，而又積此五疑於中，各懷恚恨，迨至拐匪牽涉教堂，叢塚洞見胸腹，而衆怒已不可遏。迨至府縣赴堂查訊，王三豐領事對官放鎗，而衆怒尤不可遏，是以萬口譁噪，同時並舉，猝成巨變。其浮囂固屬可惡，而其積疑則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既查明根原，惟有仰懇 皇上明降諭旨，速飭各省，俾知從前檄文揭帖所稱教民挖眼剖心戕害民之說，多屬虛誣，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



之惑，並請將津人致疑之端，宣示一二。天津風氣剛勁，人多好義，其僅止隨聲附和者，尚不失為義憤所激，自當一切置之不問，其行兇首要各犯，及乘機搶奪之徒，自當捕擊嚴懲，以儆將來。在中國戕官斃命，尚當按名擬抵，况傷害外國多命，幾開邊衅，刁風尤不可長。惟當時非有倡首之人，預為糾集，正兇本無主名，津郡人心，至今未靖，向來有曰混星子者，結黨成羣，亂好樂禍，必須佐以兵力，乃足以資彈壓。頃將保定銘軍三千人，調紮靜海，此軍係記名臬司丁壽昌統帶，該員現署天津道缺，一俟民氣稍定，即以緝兇事件委之。該署道督同府縣，辦理當可勝任。至武關珍犯供，既已牽涉教堂，經崇厚飭令地方官赴堂查驗，實為解釋衆疑起見，近日江南亦有教堂迷拐之謠，亦即如此辦理。其後豐大業等之死，教堂公館之焚，變起倉猝，非復人力所能禁止，惟地方釀成如此巨案，究係官府不能化導於平時，不能預防於先事，現已將道府縣三員，均行撤任，聽候查辦，由臣國藩揀員署理。同日另片具奏，其殺斃人口，現經確查姓名實數，惟仁慈堂尚有女尸五具，未經尋獲，其餘均妥為棺殮，交英國領事官李蔚海收存。俄國三人，已由該國領事官孔氣驗明掩埋，謹單列清單，恭呈御覽。法國公使羅淑亞，業經到津，議及賠修教堂事宜，臣等擬即派員經理，餘俟議有端緒，續行陳奏。其

誤斃俄國之人命，誤毀英美兩國之講堂，亦俟議結，另行具奏，所有查明大概情形，謹具摺先行主奏。……”（查明津案大概情形摺，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在曾國藩這奏摺中，可以看出外國教堂平時無惡不作，以致引起民衆憤恨，及至府縣赴堂查看，王三豐領事竟敢對官開槍，其兇惡如此，自然要引起民衆反感而激發暴動，但是國賊曾國藩却反頌揚此種萬惡之帝國主義侵略者爲“英法各國爲著名大邦，豈肯如此……”其替帝國主義辯護，如此熱忱！復代帝國主義鳴不平，如奏中“天主教本係勸人爲善……彼以仁慈爲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據曾國藩看來，洋人之不平，是應該的，所以領事官對中國官府開槍，也是應該的，該死的祇是中國民衆！“其行兇首要名犯，及乘機奪之徒，自當捕拏嚴辦。”“在中國戕官斃命，尙當按名擬抵，况傷害外國多命，幾開邊釁，刁風尤不可長，”所以曾國藩要以殘殺太平天國民衆的本領，來殘殺天津的反帝國主義民衆了，在曾國藩看來，這是“雪洋人之冤”洋人是冤枉的，中國人除了像曾國藩自己一類屠夫國賊之外，都應該殺！殺！殺！好在這正是曾屠夫的拿手好戲！

自從該案發生以後，曾國藩爲獻媚外國起見，即調重兵入境，濫捕羣衆，并將府縣官吏撤任查辦，其對於帝國主義恭順之狀，可謂至也極矣！但是帝國主義並不以此爲滿足，得寸進尺，向



媚外賣國之曾國藩作種種苛酷要求，以致一時空氣甚爲緊張；但曾國藩處處退讓，對於帝國主義之委曲求全，可謂極盡其媚外之能事，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奏摺，即可見一斑。茲抄錄該奏摺中之一段如下：

“……臣查此次天津之案，事端宏大，未能輕易消弭；中國目前之力，斷難遽啓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臣等於五月二十九日覆奏摺內，曾聲明立意不與開衅；匝月以來，朝廷加意柔遠，中外臣民，亦已共見共聞。臣等現辦情形，仍屬堅持初議，而羅曾肆意要挾，卒未稍就範圍。諭旨所示洋人詭譎性成，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求，將來何所底止，是於弭衅，而仍不免啓衅，確中事理，洞悉敵情，臣等且佩且悚！目下操縱之權，主之自彼，誠非有求必應，所能潛弭禍機。此後彼所要求，苟在我稍可曲徇，仍當量予轉圜；苟在我萬難允從，亦必據理駁斥。惟洋人遇事，專論強弱，不論是非，兵力愈多，挾制愈甚。……臣更有請者：時事雖極艱難，謀畫必須斷決，伏見道光庚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極以來，外國盛強如故，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此已見之成效。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憤激，致成大變，初非臣僚有意挑衅，倘即從此動兵，則今年即能倖勝，明年彼必

復來；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勢難盡備。朝廷昭示大信，不開兵端，此實天下生民之福。雖李鴻章兵力稍強，然以外國之窮年累世，專講戰事者，尚屬不逮。以後仍當堅持一心，曲全鄰好，惟萬不得已而設備，乃取以善全和局，兵端決不可自我而開，以爲保民之道，時時設備，以爲立國之本，二者不可偏廢。……”

對於帝國主義雖然是卑恭屈節，委曲求全，然而對於開罪洋大人的羣衆是不能饒恕的，曾國藩於八月二十三日的奏摺中，對肇事羣衆的處置，有所說明：

“……竊臣等疊奉諭旨，飭將津郡五月二十三日案內滋事兇犯，迅速辦結；近又接奉八月二十日寄諭，飭將未獲各犯，勒限嚴拏，現獲之犯，認真研鞫，不得稍涉寬縱，致令兇徒漏網，轉滋洋人口實等因。欽此：臣等自承辦此案，久經督飭文武，設法購拏，悉心研鞫，自七月下旬設局發審，嚴立限期，晝夜追求，直至中秋節前，僅得應正法者七八人，應治罪者二十餘人。臣以辦理日久，人犯無多，深負委任，更恐洋人不肯輸服，轉致枝節橫生。日來激厲各員，不得稍存寬縱，務令多緝正兇，以示持平，而全大局。惟此案事起倉猝，本無預先剝集之正兇；而洋人多已傷亡，又無當堂質對之苦主。各屍初入水火，旋就掩埋，並未驗傷填格，絕無形迹，可爲物色



兇手之資；用是漏網之犯，難於掩捕，已獲之犯，不肯認供。天津無賴之徒，有稱爲混星子者，向以能熬刑自詡，此次輒以爲出於義憤，雖酷刑而不畏，而鄰右亦不敢出而質證，恐爲輿論所譏彈，又慮仇家之報復。欲求罪當情真，定案萬難迅速，欲以無辜充數，則問心既有所不忍，而亦不足服洋人之心，棘手甚多，愈辦愈窘。反復籌思，若拘守常例，實屬窒礙難行，有不能不變通辦理者：常例羣毆斃命，以最後下手，傷重者當其重罪。此案則衆忿齊發，聚如雲屯，去如鳥散，事後追究，斷不能辨其孰後孰先，孰致命孰不致命，但求確係下手正兇，不復究其毆傷何處，此變通辦理之一端也。常例斷獄決囚，必以本犯畫供爲定，其本犯供詞狡展，則有衆證確鑿，卽同獄成之例；此案則各犯恃無屍親，堅不吐實，旁人又不肯輕易指質，衆證亦殊難得。臣等議定本犯無供，但得旁證二人三人指實，取其切結，亦卽據以定案，此又變通辦理之一端也。計訊定供證確實者十一人，無供而有確證者四人，共計可以正法者十五名；擬辦軍流者四人，擬辦徒罪者十七人，共計可科輕罪者二十一名。除卽日將各犯恭摺咨送總理衙門暨刑部外，謹先繕具清單，恭呈御覽。其情節較重，訊有端倪，供證均未確實者，尙有十六名，擬歸於第二批辦理。情節較重，在逃未獲者，尙有十一名，一併開單，先

呈御覽，以釋宸廑。將來第二批奏結，或再辦首從各犯數名，或與洋人訂定抵償實數，中國如數辦到，請旨敕下總理衙門核定，行知臣等，以便遵循。此次定擬各犯，若遂速行處決，將來拏辦愈難，應與洋人商定，統俟續奏二批後，併案辦理。……”

在民衆方面，是因爲“出於義憤”，所以“雖酷刑而不畏”，但國賊曾國藩却將沒有供認的嫌疑犯，即拿來正法，據彼處置第一批中，計有應正法者十五名，應辦軍流者四人，辦徒罪者十七人，其餘二批三批還不在內。

沒有供詞，沒有證據，而曾國藩爲取媚外國之故，竟“變通辦理”，拿來正法，其草菅人命，殺同胞以獻媚，真不愧是千古第一國賊！其實即使是有供詞有證據，也不應該處於死刑，因爲他們是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暴行所激起的，帝國主義本身應該負這個責任。但曾國藩既甘心爲虎作倀，於是將沒有憑據的嫌疑者，施以酷刑，以逼取其供詞，民衆因爲“出於義憤，雖酷刑而不畏”，祇得“變通辦理”，將沒有證據，沒有口供的人，拿來屠殺以謝洋人。曾國藩固然是猪狗不食的東西，而曾國藩所代表的整個的封建統治階級，當然也全都是一樣的貨色！

口頭上仁義道德，人倫名教，而實際上對於被壓迫民衆作最殘忍的屠殺與最嚴酷的壓迫，而對於外來的異族的侵略，則處處



讓退，卑恭屈節以求全，這是曾國藩的姿態，也就是整個封建統治階級的縮影！

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的曾國藩，其所以是屠殺民衆的劊子手與媚外賣國的漢奸，其意義就在乎此！





## 第七章

### 由軍用工業到官辦工業的發展

曾國藩等於剿平太平天國及捻民運動之後，鑒於外“夷”之頑強，知非學新，不足以自強。故雖以最頑固的曾國藩，也要命他兒子紀鴻學習外國文字，復派留學生至外國，在國內設造船廠等，而左宗棠張之洞尤其是李鴻章輩，對於這一方面的努力，尤多表現。計自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至一八九一年（即興中會成立前一年），曾左張李輩所辦的“新政”，其主要者有如下列：

1. 一八六三年設外國書語學館於上海；

2. 一八六五年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
3. 一八六六年奏設輪船製造局於福建；
4. 一八七〇年設機器製造局於天津，
5. 一八七二年挑選學生赴美國肄業；
6. 同年請開煤鐵礦；
7. 同年設輪船招商局；
8. 一八七五年籌辦鐵甲兵船；
9. 同年請設洋學局於各省，分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礮法、化學、電學諸門，擇通曉時務大員主之，並於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
10. 一八七六年派武弁赴德國學習水陸軍械技術，又派福建船政學生出洋學習；
11. 一八七八年左宗棠設織呢總局於甘肅蘭州；
12. 一八八〇年購鐵甲兵船；
13. 同年設水師學堂於天津；
14. 同年設南北洋電報局；
15. 同年請修鐵路；
16. 一八八一年辦開平礦務商局；
17. 同年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
18. 一八八二年築旅順軍港船塢；



19. 同年李鴻章在上海辦織布局；
20. 一八八五年設武備學堂於天津；
21. 一八八六年張之洞發起在廣東創立縲絲局；
22. 一八八七年開辦漠河金礦；
23. 同年張之洞奏請在廣東設立機鑄制錢局及銀元局；
24. 同年李鴻章於天津設機器局，購機鑄制錢，定名天津局；又於保定設廠；
25. 一八八八年成立北洋海軍；
26. 同年貴州省鎮遠府高谷縣設立官商合辦之製鐵局；
27. 一八八九年張之洞在廣東設織布局及製鐵廠，向英國購熔礦爐二具；
28. 一八九〇年上海設立官商合辦之上海紡織新局；
29. 同年唐山至塘沽間鐵路築成；
30. 同年張之洞將前年廣東所購之織布機及熔礦爐，移到武漢，設漢陽鐵政局；
31. 同年在漢陽設立槍砲廠；
32. 一八九一年上海道台唐松岩於上海設立官民合辦之紡織局。

以上各項，以李鴻章主辦者為最多，曾國藩的資格年齡都比李鴻章老，他在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即已去世，在他逝世以

後，一切事業以李鴻章爲中心；李鴻章與曾國藩雖然差不多是同時代出場的人，但在曾國藩逝世以後，李鴻章還活了二十九年（李鴻章是一九〇一年逝世的）。在這二十九年中，一切的形勢當然又和從前不同，主要的是資本主義的侵略深入了一步，而落後的封建的小農經濟的崩潰，也更加愈著。所以在曾國藩時代，他祇看到槍礮武備之不如外人，而他所兢兢業業的，也不過是造兵船，購洋砲而已。李鴻章就不同，他在曾國藩逝世後的二十九年中，所受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壓迫，比曾國藩時代更甚百倍；而國內經濟變動所給他的影響，自然更不是曾國藩在世時所能看到的，所以他要在辦兵工廠製造局以外，來辦實業了。在時代的意義上，曾國藩與李鴻章，有了顯著不同的地方：曾國藩雖然也目擊西歐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然而他還是一個純粹代表守舊的封建勢力的人物。他所想學西方的，不是西方的文物制度，而是他們的長槍大砲。曾國藩雖然覺得中國的武器不及“夷人”，然而他總以爲中國的文化制度——以數千年來聖經賢傳爲中心的文化制度，遠勝夷人。雖然在他的晚年，畏夷人如畏虎，但這是他怕夷人的礮火，決不是怕夷人的經濟文化。李鴻章就和他不同。在曾國藩逝世後還生存二十九的李鴻章，他所看到的世界的新的變故，當然是比曾國藩更多得多，他不僅是知道了西洋槍礮武器遠勝中國，而且知道西洋的文物制度確優於中國，所以除了



造洋礮買洋槍以外，也要開始開工廠辦鐵路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張之洞這句名語，代表了當時統治階級進步分子的全部思想。

然而嚴格說來，李鴻章的事業，因爲時代的演進，雖然比曾國藩稍爲進步，但他究竟還是和曾國藩一個立場的，換言之，他也和曾國藩一樣，是封建統治的忠臣，是帝國主義暴力屈服下的順奴。雖然他也主張辦點實業，但他的主要的着眼點，還是在於軍事方面，例如一八七二年的奏摺中，云有：

“……臣竊維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載，亙古所未通，無不叩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慨與立約而通商，……合地球東南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西人專恃其槍砲輪船之利，故能橫行於中國，中國向用之器械，不敵彼等，是以受制於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驅逐出境，固虛妄之論；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無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學，而昧於數千年來一大變局；狃於目前苟安，而遂忘二三十年來之何以創鉅而痛深，幾千百年之何以安內而攘外，此停止製造輪船之議所由來也。臣愚以爲國家諸費皆可省，惟養兵設防練習槍砲製造兵輪之費，萬不可省。求省費則必屏除一切，國無與立，終不得

強矣。……”

他以為“國家諸費皆可省，惟養兵設防練習槍砲製造兵輪之費，萬不可省”。

當然的，在封建貴族中，李鴻章不能不說是一位進步的人物，雖然他對於資本主義文明不能有本質的認識，但他也知道古方已經不能拯救中國時下的病症，如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的奏摺中，有云：

“……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見，以求實際而已。何以言之？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之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膺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惟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械事之精，工力百倍，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外患之乘，幻變如此，而猶欲以成法制之，譬如醫者療病，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庚申以後，夷勢駸駸內向，薄海冠帶之倫，莫不發慷慨，爭言驅逐；局外的訾議，既不悉局中之艱難，及詢以自強何術，則茫然靡所依據。臣於洋務涉歷既久，見聞較廣，於彼長短相形之處，知之較悉；而環顧當世餉力人才，實有未逮。又多拘於成法，牽於衆議，雖欲振奮而末由。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蓋不



變通，則戰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當時封建貴族中，最大多數是不曾有絲毫新的覺悟的，他們還以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優越的民族，中國古代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至寶，而極力反對摹倣夷人行爲，一種自尊自大之心，足以令人失笑，試舉一例：

“……近世時務之士，必欲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此則鄙見斷斷不能苟同者。……昨讀世兄歌辭（時皮鹿門之子作醒世歌）有‘若把地球來參詳，中國並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渾圓物，誰居中央誰四旁。’等句，敢以管見所及，一明其是非。……地球圓物，不能指一地以為中，但合東西南北考之，南北極不相通，則論中外，當視東西矣。亞洲居地球之東南，中國適居東南之中，無中外獨無東西乎。四時之序先春夏，五行之位首東南，此中西人士所共明，非中國以人為外也。五色黃屬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為黃種，是天地開闢之初，隱與中人以中位。西人笑中國自大，何不以此理曉之。若以國之強弱大小定中外夷夏之局，則春秋時周德衰矣，何以存天王之名？魯之弱小遠於吳楚，何以孔子曰我魯？此理易明，無煩剖辨。堯舜禹湯文武之教，周公成之，孔子大之。三代而下，異教之為聖教漸滅者不可殫述。即以文字論，佛法盛於六朝，而其梵夾之經典，反藉中文而後傳；遼金元人

懋陵宋室，可謂至極，今三國之書不存一字；此第聖人糟粕中之糟粕而已，潛移默運，掃蕩異教於不覺，何論旁行詰屈之書乎。……”(葉德輝與皮鹿門書)。

拿李鴻章來與這種落伍思想比起來當然李鴻章是進步得多了。但是像葉德輝這樣落伍的人，在當時是佔最大多數，幾乎整個的封建貴族，全是這些怪物，所以李鴻章辦“新政”，也是經過了千辛萬苦，再舉一例，可見一斑：

“……西洋政教規模，弟雖未至其地；當心諮訪，考察幾二十年，亦略聞梗概。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議起，鴻章即瀝陳煤鐵鑛必須開採，電線鐵路，必應仿設，各海口必添洋學格致書館，以造就人才。其時文相（即當時軍機大臣文祥）目笑存之。廷臣會議皆不置可否，王孝鳳于舫連獨痛詆之。曾記是年冬底赴京叩謁梓宮，謁晤恭邸，極陳鐵路利益，……邸意亦以為然，謂無人敢主持。復請乘間為兩宮言之，渠謂兩宮亦不能決此大計，從此遂絕口不談矣。……鄙意鐵路須由開煤鐵鑛作起；興此大役，而鐵尚須購自海外，絕難告成。目下雞籠煤鑛，已有成效，武穴池州均甫開局，魏溫雲亦在寶慶衡州等處試採煤鐵。但官紳禁用洋法機器，終不得放手為之。凡此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如捕風。而文人學士，動以崇尚異端，光怪陸離見責，中國人



心，真有萬不可解者矣。……”(李鴻章答郭嵩燾書)

李鴻章雖然比這些人進步，但他因為畏外人過甚，所以成了與曾國藩一樣的國賊，這是因為李鴻章的時代，帝國主義的侵略比曾國藩時代更進了一步，而封建統治的沒落，也更深入了一步，所以李鴻章畏外人的心理，也比曾國藩更進了一步，尤其是對於朝鮮問題，他的畏縮妥協，是不能不負最大責任的，關於這，李鴻章在當時(中日戰後)亦頗受輿論的攻擊，而張謇於一八九四年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學士李鴻章疏中，對於李鴻章的攻擊，雖參雜有許多因感情作用而過分惡意的批評，但大部分的罪狀，李鴻章是確應負其責的，這疏很重要，原文如下：

“伏惟直隸總督李鴻章，自任北洋大臣以來，凡遇外洋侵侮中國之事，無一不堅持和議，天下之人，以是集其詬病，以為李鴻章主和誤國，而竊其前後心跡觀之，則二十年來敗壞和局者，李鴻章一人而已。台灣之事，越南之事，其既往者，姑置不論，請就今日日人構釁朝鮮之事，為我皇上陳之：李鴻章之敗壞和局也，有先事，有臨時，有事外，有事中。方光緒八年春間，李鴻章命丁汝昌馬建忠前往朝鮮，與英美各國立約，許朝鮮為自主之國，約載仍認明朝鮮係中國屬國一語。朝鮮與東三省唇齒相依，奉中朝政朔，立王與妃，中朝冊之，於理於勢，可半主而不得自主也。聽其自主，既失之矣，

而於日人物中，則並此一語無之。以爲李鴻章有心，則是賣國；以爲無心，此何等事，而率略至此？推李鴻章之意，不過年老耽逸，視朝鮮如禁樹，委諸各國之喙，冀其斷斷相技，而我得袖手偷安於旦夕，而於朝鮮關係中國之利害，不暇計也。我有自腐之機，敵乃有可乘之隙，是我列祖列宗所經營而保護之朝鮮，不待日人亡之，而亡於李鴻章之心久矣。盟血未乾，日乘朝亂，故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以六營東援，亂定後，再三以朝鮮政敵民窮，兵單地要，函請李鴻章及早爲之修政練兵，興利脩患，李鴻章怪其多事，痛斥其非。既而吳長慶疏請入朝自陳，卒亦不果。及十年春，吳長慶以三營移防金州，遂因李鴻章積忤之故，憤悲致死，而朝鮮又有日人之亂，若非吳長慶尙有三營駐守撐拄其間，則今日之事，早見於十年以前。而李鴻章則又於十一年將駐韓三營，全數撤回，并罷吳長慶所定教練韓兵之事。日之所欲，鴻章與之；日之所忌，鴻章去之。如縱驕子，不至於敗不已；如飼餓狼，不至於飽而猛不已。豈日必得朝鮮之志，長日輕量中國之心，謂非李鴻章，誰執其咎？此爲壞之於先事。自來中外論兵，戰和相濟，西洋各國，惟無一日不存必戰之心，故無一人敢敗已和之局。李鴻章兼任軍務外務，三十餘年，豈不知之，徒以暮氣太深，鈍於機要，上孤君父，下蹙生靈。論者不察，或歸



咎於李鴻章之善和，不知本年五月間，日釁已見，使李鴻章得袁世凱數十密電之後，援十一年第三條約，詰以派兵何不先行知照，則日謀可伐，不至於戰，而李鴻章以昏憤敗之。即得汪鳳藻電復之後，其時日兵尙不甚多，布置尙不甚密，使派葉志超聶士成率一二十營，如吳長慶時經入漢京，挾王歸我，易客爲主，徐待理論，亦尙不礙於和，而李鴻章以輕忽敗之。朝鮮弊政，本應中國早爲酌改，日旣以是爲詞，我何妨令袁與議，折日專惠韓民之計，收我撫字屬國之權，因勢成務，有何不可？李鴻章則始終執其決棄朝鮮之意，一聞此說，避之若浼，謝之惟恐不堅，而貽日人以華旣不顧勢難中已之口實，卒釀兵端，此爲李鴻章以庸劣而敗和局。日兵大集，牙軍待援，大同江距平壤不及二百里，距漢京四百餘里，衛馬之軍，自應由大同江入，進駐平壤，合豐左兩軍，以期迅速分援守，而李鴻章故令迂道九連城，多行七八百里，棄牙軍於不顧，致被日人攻城，并命一戰，不復可支，日兵益張，乃無就範之勢，此爲李鴻章以闇忍而敗和局。凡此者皆壞於臨事。衛汝貴之統帥，以賄得之，平時尅扣兵糧，補其所乏，軍中騰怨，津人皆知。衛汝貴行時，李鴻章亦有以若所爲，將爲下殺之語，而衛軍行不兩日，已逃去三四百人，及至平壤，衛汝貴縱兵淫掠，左寶貴馬玉英電請盛宣懷轉稟設法，以免誤事，

不應李鴻章絕無知覺，且衛葉，淮軍也，左豐，奉軍也，馬，豫軍也，平日各不相關，臨事豈可相統。宋慶資深望重，又自請當前敵，畀以節制調度之權，實爲允當，而李鴻章阻之，自任統帥，隔海遙度。平壤東有陽德，南有茶山，西有黃州，北有安州，在在有險可扼，可進又可退，乃一月之久，聚一萬八千人於一城，坐待日人四面圍攻。衛汝貴拒請兵之韓官，有中堂只令駐守之說；拒調戰之葉志超，有只奉中堂命令之說，而糧台不設，偵探不靈；不救牙軍，而牙軍之輜重棄；不護操江，而操江之餉械亡，不知李鴻章所爲節制調度者安在？平壤一潰，瞠目無策，而日人且有得隴望蜀之心，非復鼠竊狗偷之計。此李鴻章以貪私專忌悖謬張皇而敗於事中矣。言官參張盛輩之移賣槍礮，不問也；參馬張輩之移濟日糧，不問也；移運開平煤，不問也；日奸口供之涉其左右，不問也；丁汝昌之託名游戈，實則避醫，詭稱凡朝鮮口岸，有無數水雷，而鹿島戰後，我船且有避泊大同江口者，其蒙蔽不問也，反之爲保奏。衛汝貴一軍八九千人，聞敵先逃，大半降日，累我敢戰之他軍，餉敵欲求之利器，其失律不問也，反爲之請獎。林國祥漢納根之奮勇不顧也，而爲逃死無所之丁汝昌盛叙創傷；鄧世昌及兩洋將之忠烈不問也，而以並非淮人之方伯謙孫顯寅江自康聊申軍法。甚至抗違朝旨，排抵言官，瞞軍報之



實情，截京官之私訊。計無一而不工，氣無一而不壯，而言及軍事，則僅任能守天津；言及軍械，則轉而委過戶部。試問以四朝之元老，籌三省之海防，統勝兵精卒五十營，設機廠學堂六七處，歷時二十年之久，用財數千萬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爲大言，脅制朝野，曾無一端立於可戰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無痛心！此又徇縱欺罔，驕蹇點猾，兼而有之。見於事外而壞及事中矣。李鴻章既自負善和，必且幸中國之敗，以實其所言之中；必且冀中國之敗，而仍須由其主和，以遂其所挾之尊。卽京朝官之尾附李鴻章者，亦必以李鴻章爲老成謀國，展轉相師，而李鴻章之非特敗戰，并且敗和，無一人焉以發其覆，恐兵事一定，校論功罪，恩怨起於朝局，邪說禍及將來，此則迫切憂危而不得不爲辨奸之論者也。……”（“張季子九錄”卷一政聞篇）

李鴻章的昏憤誤事，確有如上所述者，但也不能專責李鴻章個人，這是整個封建貴族階級腐敗昏憤的縮影。他們的唯一本事，祇有壓迫民衆，剝削民衆，屠殺民衆，至於對於外來的侵略，祇有無條件的屈服，曾國藩如此，李鴻章如此，而痛詆李鴻章的張謇，其所崇拜的袁世凱，亦何嘗不是如此？張謇在彈劾李鴻章的時候，固然說得有聲有色，其實即使他自己上了台，也還不是一樣的祇有卑恭屈節以事帝國主義？這不是個人的勇敢與懦弱，精

幹與昏憤的問題，而是整個沒落階級的必有現象。

但是這裏有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從曾國藩到李鴻章的過程，從國內的經濟意義上說，已經由軍用工業發展到官辦工業的階段。

如前所述，在種種條件阻礙之下，中國內部不能發生產業革命。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在中國開始萌芽，是受外來侵略者的影響，而在主要部分，還是外來侵略者的直接播種。

中國統治階級的進步分子，眼看在軍備方面不效法西洋，勢不能圖存，於是開始洋槍洋砲的製造，而各地的兵工廠製造局亦相繼設立。自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八二年，這二十年間是中國軍用工業開始萌芽發展的時期。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在中國開始萌芽的時期。

軍用工業的發展，必然要引起其他重工業部分，如煤鐵工業的產生。事實使李鴻章張之洞等知道，如果不開發鋼鐵工業，則兵工廠就無法開辦。如果不開採煤礦，則鋼鐵工業也不能開採。所以為應付發展軍用工業的需要起見，煤礦與鐵礦，相繼開採，這當然不是舊式的人工採掘所能了事的，於是重工業方面的生產方法的革命，在這種外來侵略的影響之下，很迅速地展開。

這和西歐重工業方面的生產方法的革命程序是不同的。西歐煤鐵工業部門的發展是應輕工業——特別是紡織工業的生產



擴大的需要。在英國紡織工業中，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已經完成了生產方法的改良，但是那時煤鐵的生產還很落後。因為紡織工業方面的機器的發明，使煤和鐵的需要激急地增加起來，這種實際的需要，使煤鐵礦業方面，開始了生產方法的革命。在以前，煤和鐵是為為一般人所鄙棄的東西；到一七五〇年以後，煤才開始被採用為燃料，製鐵業也漸次旺盛起來；不過那時還沒有新式的焙礦爐，而是設置大風箱，以水力馬力去運動而送風，這是一種很笨拙的方法。到了一七六〇年，斯米頓(Smeaton)發明了衝風爐(Blasthurnace)，在這衝風爐中，設置了送風筒，比較以前的風箱是方便得多了，不過動力還是不能不利用水力。一七六九年，牛康門(Newcomen)的機關裏，利用了瓦特(James Watt)蒸汽機的初步改良，使焙礦爐增加了許多方便。到一七九〇年，瓦特蒸汽機關才被採用於製鐵工業，從此製鐵工業的發展，乃有一日千里之勢。在一七九〇年以後，關於精煉、碾鐵及其他方面還有許多新的發明。一八二八年，納爾遜發明熱風法(Hot Blast)以代冷風法(Cold Blast)；這個發明可以節省煤的消耗。一八五五年，拍塞麥(Bessemer)更有新的發明，能夠把熔解了的鐵，直接從礦爐裏變成鋼鐵。一八六四年，西門司和馬丁(Piemous and Martin)發明了開爐法；一八七五年，托馬斯和季爾克立斯(Thomas and Gilchrist)發明了基性法(Basic Process)。由以上這些發明，

使近世的煤和鋼鐵的生產，才有了可驚的增加。而這些關於開發煤鐵工業上的發明，都是輕工業發達所引起的需要。但是中國完全不同。中國煤鐵業的開採，固然是運用西歐已經發明的方法，而牠的開發的動機，是應軍用工業的需要，不是應輕工業的需要；換言之，西歐煤鐵工業的開發，是適應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中國煤鐵工業的開發，是適應封建統治階級保獲牠的殘餘統治的需要。

煤鐵工業的開發，必然引起交通上的改革的需要，因為煤鐵由礦山運到工廠（軍用工廠），沒有新式交通機關如輪船火車等，是很不方便的，所以為適應這一需要，於是有輪船招商局與北方鐵路的初步設施（最初的鐵路，是由唐山到天津，完全是為便利運煤而設的，也就是為便利軍用工業而設的）。這樣，在適應封建統治者的需要之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主要部門，在中國已經開始活動了。而李鴻章張之洞輩，在這方面就盡了他的“新政”的建設作用，當然這建設還是微弱的。

這是一方面的原因。在另一方面，西歐資本主義的侵略，直接引起了中國生產方法的革命，首先是交通機關的革命。從歐洲運商品到中國來推銷，在通商口岸登陸以後，還必須推廣到內地去。在那時，都市的繁榮程度是很低微的，先進國家要在中國推銷商品，單靠幾個口岸是不行的。然而要到內地去推銷商品，交



通的不方便，實在給了商品侵略者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為中國的廣大市場，是在內地而不是在幾個口岸。先進國家要發展對中國的商品侵略，首先要改善中國的交通工具——封建統治者爲要運輸煤鐵與調遣軍隊，固然需要開發交通；而西方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爲要發展在中國的商品侵略，尤其有開發中國交通的必要。於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含有侵略意義的援助之下，與李鴻章等在中國交通工具改革方面盡了一點作用，而這些侵略國家也就因借款或其他條約關係，獲得了中國鐵路上的一部分管理權與建築權及航業上的種種特權。

本來遠在一八六三年，上海英美僑商即聯絡請中國政府建築上海蘇州間的鐵路，但中國政府拒絕了這個請求。因爲在這時候，滿清政府對於軍用工業的開辦，剛才開始，還沒有鐵路運輸的迫切需要，尤其是上海與蘇州間的交通，對於軍用工業的開發是沒有絲毫意義的——蘇州既沒有出煤，又沒有出鐵；所以滿清政府對於外商的請求，毫不加以考慮而拒絕了。但是在洋商方面，爲推廣商品起見，鐵路的建築，實在是極端必要的，所以雖然由上海到蘇州的鐵路建築計劃，遭了中國政府的拒絕，但並不中止建築鐵路的進行。一八六五年，上海英商又向中國當局請求建築上海吳淞間的鐵路，並成立吳淞道路公司，進行收買土地及各種計劃。一八六七年，英商怡和洋行也加入該公司，積極進行，不

遺餘力，終於一八六九年成功，開始營業。但當時風氣頑固，排外激烈，人民對於外人敷設鐵路，異常憤慨；後來又發生了火車輾斃行人事件，民氣激昂，遂由中國政府命其中止營業，並向英使交涉，由中國政府以二十八萬兩規銀贖回，將鐵路上所有之一切鋼軌器具，拆毀無遺，送至台灣，投諸海中。當時中國政府方面，連號稱進步份子的李鴻章，對此也主張順從民意，將鐵路拆毀，其頑固如此。

但是後來，為適應軍用工業的需要，終於一八八〇年，唐山天津間有鐵路的敷設。一八八七年，滿清政府有督促開辦鐵路的上諭。同年，改開平公司為中國鐵路公司，募集外資百萬兩，由匯豐銀行一手辦理，這是中國鐵路開始建築，就借外債。

一八九五年，中俄兩國間訂立中俄加西尾條約，由中國承認俄國所建築之西伯利亞鐵路，可以直接通過黑龍江一帶，即現在的中東鐵路。這樣，不僅中國鐵路的主權落在外人手中，而且帝國主義可以直接在中國領土內建築自己的鐵路了。

法國帝國主義也和舊俄帝國主義一樣，很需要在越南附近的中國境內建設鐵路。中法戰後，中法新約中，有法帝國主義欲在中國發展鐵路之一種規定，其大意為：“如中國修築鐵路時，當請法人興築。”一八九五年之中法協約中，更明白規定：“安南之鐵路，如經中法協商，可接續於中國境內。”一八九六年，法國之



印度支那總督杜麥爾 (Doumer)，與中國當道訂立承辦龍州南寧間，及安南雲南間的兩綫契約。

英帝國主義因為借款關係，而獲得京奉鐵路的管理權與建築權，但是不以此為滿足，後來又由英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辦下列五條鐵路：

1. 天津鎮江綫
2. 山西河南綫
3. 九龍廣東綫
4. 浦口信陽綫
5. 上海杭州綫

此外，滬甯綫已經中國允諾。

英國一方面提出要求，一方面調集艦隊，向中國沿海集中，以作後盾，且由英國政府訓令駐華公使，有“此項要求，如被拒絕，即認對英含有敵意，可取自由行動。”云云。在這種帝國主義砲艦政策的威脅之下，中國自然不得不全部承認。

美國也因為借款關係，在中國鐵路方面，獲得相當的權利。惟日本在中國鐵路方面獲得權利，是在一九〇〇年以後的事。

茲將一九〇〇年以前，英法美三國在中國鐵道方面所獲得的權利，列表如下：

英 國

鐵道名	哩數 (英)	地點	利權種類	獲得年
廣九英國部	21	廣東	承辦權	1860
津浦鐵路	450	豫直皖蘇	敷設權	1893
京奉鐵路	572	直隸奉天	借款權(借款繼續中之) 管理經營權	1898
		法 國		
滇越鐵路	282	雲南	承辦權	1898
龍州鐵路	55	廣西	敷設權及中法合辦權	1906
東安鐵路	60	廣東	敷設權	1899
		美 國		
京漢鐵路		直隸鄂	借款	1896
津浦鐵路		直隸蘇皖	借款	1897
粵漢鐵路		湘鄂粵	借款	1898

在封建統治階級一方面，為興辦軍用工業而開發煤鐵；為運輸煤鐵而開發交通。在帝國主義一方面，為要在中國發展商品推銷，所以要開發中國交通；為開發交通，因而需要鐵與煤，所以要開發中國的煤鐵礦業。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統治，在不同的出發點之下，開始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初步建設。在中國一方面，李鴻章就是完成這一初步建設的代表人物。

軍用工業的開發，引起煤鐵重工業與交通的開發，這一方面使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更得擴大發展，另一方面，引起中國輕工



業部門部的萌芽，於是左宗棠辦織呢廠，張之洞辦縲絲廠，李鴻章張謇辦紗廠織布廠等。但是這些輕工業，都是在官辦——至少是官督商辦的形式。由軍用工業發展到官辦工業，不能不說是進展了一個階段，但是在這些腐敗官僚主辦的工廠，其內容之糟糕是不待說的，雖然在這個時候，帝國主義還沒有接在中國境內開設工廠，但外來的商品已經充斥市場，這些腐敗的官僚工廠，要想與先進的資本主義工業競爭，這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官辦工業之必然失敗，是不待解釋的了。





## 第八章

### 第三階級的出現及其最初的政治要求

太平天國運動經過了十餘年的鬥爭，因為中國那時還沒有具備實現第三階級革命的條件，終於被封建統治階級勾結帝國主義共同鎮壓之下失敗了。太平天國運動是近代中國民族運動的萌芽，牠雖然是失敗了，但對於啓發國人的民族思想，給了一個很大的影響，所以在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以後，民族運動的種子並沒有消滅，而是由新的形式發展起來，一八九二年興中會的成立，就是這種發展形式的表現。

物質的生產方法是決定人類之意識形態的基件條本。因此，一切社會之意識形態的表現，不過是這個社會的物質的生產方法的反映。中國是經濟落後的國家，中國產業不能如歐美先進國家那樣暢利的發展——中國產業是在異常艱難的條件之下萌芽起來，他的發展遇到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封建殘餘的束縛，一直到現在，還不能完成產業革命的任務。這個事實反映到第三階級之意識形態上，由一種非常之曲側的善變的奇特的政治主張表現出來，如果拿歐美先進國家的第三階級的意識形態來和中國的落後的第三階級的意識形態比較起來，我們可以看出兩個完全不同的乃至完全矛盾的模型。只有在了解“物質的生產方法決定人類的意識形態”的前提之下，才能了解這種不同的變態的真實意義。同樣，也只有了解這個基本原則之下，才能認識謎一般的中國社會的真相。

商業資本在中國已有長期的歷史的發展，這是一個事實，但是因為商業資本本身不是代表一種生產方法，牠只是永久在流通中——商品交換的媒介中活動，所以牠不能改變原來的生產方法；牠只能在舊的生產方法的範疇中活動，因而與當時的封建剝削發生某種利害的關聯，使商業資本與土地資本混合生長起來，所以不能形成一種新的獨立的階級意識。

中國第三階級之最初出現，是在南洋羣島的和美洲的華僑。



華僑資產階級與中國內地的商業資本家顯然有本質上的不同；他們不是做一種簡單的庸俗的商品交換的媒介的任務，他們本身就是新式機械工業的主人——樹膠工場的或製糖工場的主人；在東印度羣島，還有一小部分是錫礦的主人。他們跟在英國的美國的或荷蘭的帝國主義的尾巴後面，無情地掠奪落後民族的土人。所以他們的資本的積累的成績，也遠非國內商業資本家所能望其鼻背。但是這種特殊的第三階級——華僑資產階級——並不能完成中國經濟革命的任務，其原因：

第一：他們的基礎不在國內而是國外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這是其他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而不是他們自己的殖民地。他們不過像一夥大強盜中間的小強盜一樣，在大強盜對於一門富戶的恣意掠奪之下，分得一點小小的賊贓，所以他們的本身的基礎是異常薄弱。他們只能對一部分，即是在大強盜恣意掠奪後所剩下來的一小部分殖民地奴隸和本國的無產僑民身上掠奪剩餘勞動以維持其階級的存在。他們這種薄弱的基礎不能引國內市場的變革，因為他們的生產事業幾乎成了與國內市場毫無關係；他們只能使一部分當地的落後民族的奴隸及本國的無產僑民的生活更沉淪到飢餓線之下，而不能促成國內舊生產方法的解體。

第二：他們雖然積累了一點資本，雖然這個數目遠在國內商業資本家所積累的數目之上，可是也還是很微少。他們在所在地

還要遇到帝國主義進步工業的壓迫，他們全力來與這些大強盜競爭還來不及，所以不能以多大的力量來發展國內市場。

第三：在牠們有相當發展的時候，帝國主義已經侵入了中國，他們的力量決不能打擊已經侵入國內市場的帝國主義勢力。

第四：國內的殘酷的封建剝削，使他們不能在國內發展其產業。

但是牠們雖然不能完成中國產業革命的任務，可是他們在國外的相當的發展，必然引起他們注意國內的政治，就是說，必然引起他們的革命的要求。因為：

第一：他們遠在國外，眼看着歐美國家的僑民都得着他們的光輝的祖國的保護，而他們這些華僑資產階級自身不僅得不到一點祖國的保護，反而受祖國的種種壓迫，例如他們從海外匯款回來，在家裏置了一點產業（土地或其他投資），往往要受到滿清政府的重重剝削，

第二：他們在海外受到殖民地政府的種種虐待，而這不爭氣的祖國不能作一點援助。

第三：他們在海外受了帝國主義先進工業的壓迫，使他們的產業不能有暢利的發展，所以他們企圖回到本國來發展他們的事業，但是腐敗的滿清政府不僅不予以提倡援助，反而要重捐苛稅剝削他們，



這些原因引起了他們的革命的要求。他們的革命要求，成了誘發中國初期民族運動的主要動力。一八九二年的興中會之成立(註)，就是初期民族運動開展之最具體的表現。

註：關於興中會成立的年分，傳說不一，此處的一八九二年分，是根據鄒魯所編的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編第一章所記：“紀元前二十年(壬辰)，總理創立興中會於澳門。”(上引書第三頁)

中國的初期民族運動之萌芽，自然不僅僅是適應華僑資產階級的要求，而還包含有其他的許多原因，例如：

第一，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中國農業經濟的崩潰。

帝國主義對中國之明目張胆的施行經濟的掠奪，是在一八四〇年中英鴉片戰爭以後。中英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所受的經濟上的損失很大。自鴉片戰爭後到一八九二年興中會成立，這期間中國所受經濟上的損失，主要的有：

1. 賠款的損失：帝國主義用暴力來征服中國以後，強迫中國承認許多無理的要求，而強迫中國付出鉅額的賠款，就是這些無理要求中之一種，興中會成立前，中國所付出的鉅額賠款，主要的有：

中英鴉片之役	21,000,000元
英法聯軍之役	16,000,000元

中俄伊犁之役 9,000,000盧布

中日台灣之役 500,000兩

滿清政府在鴉片戰爭沒有發生以前，本來已經很窮，經過了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之役的幾次戰爭以後，財政已瀕於破產，要付出鉅額的賠款，自然不能不取諸於人民。這種強度的榨取，增加了農村破產的速度。

2. 對外貿易的損失：帝國主義以商品輸入中國，掠奪中國的財富，這是促進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最大的原因。

在一八九二年以前，商品的輸入，入超的數目，已年有增加，如下表：

年代	進口淨數	出口總數	入超實數
1865	61,844,158	60,054,634	1,789,524
1866	74,563,674	56,161,807	18,401,867
1867	69,329,741	57,895,713	14,434,028
1868	71,123,212	69,114,733	1,455,529
1869	74,923,203	67,143,988	6,969,296
1870	69,290,722	62,682,121	8,398,403
1871	70,103,077	66,853,161	3,249,916
1877	73,233,896	67,445,022	5,788,874
1878	70,801,027	67,172,179	3,631,848



---

第八章 第三階級的出現及其最初的政治要求 171

---

1879	82,227,424	72,281,262	9,946,162
1880	79,293,452	77,883,587	1,409,865
1881	91,910,877	71,452,974	20,457,903
1882	77,715,228	67,336,846	10,378,382
1883	73,567,702	70,197,693	3,370,009
1884	72,760,758	67,147,680	5,613,078
1885	88,200,018	65,005,711	23,194,307
1886	87,479,323	77,206,568	10,272,759
1887	102,263,669	85,860,208	16,403,466
1888	124,783,892	92,402,067	32,381,826
1889	110,884,355	96,947,832	13,936,523
1890	127,093,481	87,144,480	39,949,001
1891	134,003,863	100,940,849	33,063,014
1892	135,101,198	102,585,525	32,515,673

以上單位海關兩

洋貨支配了中國市場，這個事實使中國農業手工業經濟開始破產。成千成萬的農民手工業者失去了土地和失去謀生技能，成爲無家無業的遊民，因而引起了社會的不安和騷亂。

第二：這時期新式工業也開始出現，軍用工業與煤鐵工業已經開始萌芽發展。雖然這些工業大都是官辦的，或官督商辦的，

但是這種新式工業的出現，究竟使舊生產方法的崩潰，更加了一種促進的作用。

第三：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太平天國運動雖然失敗了，但農村破產的危機日益嚴重，統治階級不能解救這些危機，於是不安的騷動就普遍地發展起來。

但初期民族運動的出現及其開展的最主要的動力，還是前述華僑第三階級的革命要求，因為如果單是農業經濟破產，則只能引起一種原始的暴動（例如太平天國運動）；而當時國內雖有軍用工業及煤鐵工業的萌芽，可是其能力微薄，還不足掀起一個革命運動。初期民族運動之以廣東及海外為中心點，這不是偶然的事。在海外的言論行動比較可以自由，這誠然是初期民族運動集中海外的一個原因，但我們決不能否認在海外活動不僅可以得到自由，而且是華僑第三階級的大本營。華僑第三階級大部分是隸籍廣東，而廣東又是一個與西洋資本主義接觸最早的地方，所以廣東就成了初期民族運動的策源地。

初期民族運動是由上述三個原因：（一）華僑第三階級的革命要求；（二）國內農業經濟的破產；（三）國內新興企業的出現；而產生而展開的。而這個運動的最初的政治要求，主要的是：

（一）富國強兵，與列強並駕齊驅；

（二）要求政府革新自強，恢復中國五千年來歷史上的光榮。



興中會的宣言，把這兩個政治要求很具體的表現出來。興中會宣言的原文如下：

“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齒於列強；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奮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綱維破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然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矣！方今強隣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多，蠶食鯨吞，已見效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聲絕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庶我子，孫孫，或免奴於他族；用特集志士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仰諸同志，盡自勉旃。”

宣言後所附的綱領第二項“本旨宜明也”及第三項“志宜定也”兩條內，則明白的說明了興中會的宗旨。這兩條的原文如下：

“(二)……本會之設，專爲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中國今日，政治日非，綱維日壞，強隣輕侮百姓，其原因皆由衆心不一，只圖目前之私，不顧長久大局；不思中國一旦分裂，則子子孫孫，世

爲奴隸，身家性命且不保。急莫急於此，私莫私於此，而舉國憤憤，無人悟之，無人挽之，此禍豈能倖免？倘不及早維持，乘時發奮，則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冠裳禮義之族，從此淪亡，由茲泯滅，是誰之咎？識時賢者，能無責乎？故特聯絡四方志士，切實講求富國強兵之學，化民成俗之經；力爲推廣，曉諭愚蒙，使舉國之人，皆能通曉；聯智慧爲一心，合遐邇爲一德；羣策羣力，投大遺艱，則中國雖危，無難挽救，所謂民爲邦本，本固邦甯也。

“(三)……本會擬辦之事，務須利國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才；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等，皆惟力是視，逐舉漸行，以期上匡國家，以臻隆治，下維黎庶，以絕苛殘。必使吾中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爲滿志。倘有藉端舞弊，結黨行私，或界互分，彼此歧視，皆非本會志向，宜痛絕之，以昭大公，而杜流弊。”

在這宣言和綱領中，我們可以看出下列幾個特點：

第一：對滿清政府僅僅自反面表示不滿，而沒有公然表示顛覆滿清政府的主張。當時不敢明目張胆，以避專制政府的壓迫，這固然是使宣言減少部分的鮮明表示的原因，但專制政府的壓迫，並不能使他們在社會上露布的重要文件中，完全隱瞞自己的



政治主張，這就是說，在宣言中沒有公然表示顛覆滿清政府的主張，並不是因滿清政府的政治壓迫，有此主張而不敢公然表示，乃是當時他們在主觀上根本沒有顛覆滿清政府的決心。初期民族運動中的革命家，一方面固然極不滿意於滿清政府的政治設施，另一方面却以滿腔的熱忱希望滿清政府能力圖自強，恢復“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的光榮，而“發奮爲雄，無敵於天下。”

第二：因爲如此，所以在這裏我們看不到充分發達的民權思想——孫逸仙氏的民權主義思想在這個時還沒有完成。

第三：不反帝國主義，而且希望自己也能與各強國（帝國主義）“並駕齊驅”。

第四：忽視人民生活狀況的改善，雖然綱領第三條中有“本會擬辦之事，務須利國益民者”，但這利國益民的四個字一向成了統治階級欺騙民衆的口頭禪，興中會不過未能免俗而已。孫逸仙氏之民生主義的思想，在這個時候還沒有形成。

總之，在初期民族運動中，從他們的指導機關的宣言和綱領中，我們可以看出僅僅是一種“力圖自強”的運動而已。

但是這種自強運動自有其歷史上的革命意義，否認這種運動之歷史的意義，無疑是莫大的錯誤。

這種自強運動的出發點，在宣言中寫得很明白，是由於“上

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齒於列強，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所以“有心人不禁大聲絕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由這樣一個觀點出發，他的目的，必然是恢復“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之歷史的光榮，而“發奮爲雄，無敵於天下”。

這所謂，“有心人”不待說是這個運動的中堅分子。但是我們必須認識這所謂“有心人”決不是一個抽象的形容詞，而有由於某種物質條件所決定的某種階級的意義。上既“因循苟且”，下又“蒙昧無知”，這有心人當然既不是上，又不是下的上下之間的中等階級（即第三階級）。所以這有心人三個字，是有嚴重的歷史意義，而是我們必須認識的。

初期民族運動中的中堅分子，是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和華僑第三階級。他們的出身是社會的中等階級，既不是在朝的貴族，又不是最下層的貧民。在一方面，自從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日甚一日地進展起來，他們的家庭環境也隨着農村經濟的崩潰，一天比一天惡劣起來，這種日常生活的壓迫，使他們要求新的政治上的出路。在另一方面，他們在海外，或在國內積累了一點資本，但是封建貴族的統治加以他們的壓迫與剝削，不僅使他們無從發展，而且日益趨向崩潰。同時，封建貴族統治的腐敗，引起了他們窺取政權之最初的企圖。但是因爲他們大部分是出身於所



謂“冠裳禮義之家”，所以一方面雖然因為環境的壓迫，對於目前的政治表示不滿，而要求新的出路；而另一方面，還是依戀着舊日的書香大家的風味。既然依戀着舊日的光輝，自然還希望能夠恢復這些光輝，因此就沒有澈底的根本推翻現制度的決心。在這樣一種矛盾心理之下，自然會生出許多幻想，例如希望滿清政府能夠自動的維新改良，恢復國家數千年來的歷史光榮，而使這班破落戶子弟，也得光復舊日的門楣，在政治上有相當的地位，再利用政治地位來發展產業，則這種目的已經完全達到。孫逸仙氏於一八九四年上北洋大臣李鴻章書，就是代表初期民族運動中的全部要求。這封長信對於我們研究中國近代史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文獻。在這封信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出這位民族革命領袖的初期的政治思想，而且可以由此看出中國初期民族革命運動的根本要求。因此我們把這封冗長的信抄錄下來，這對於全書的組織，是非常重要的。原信如下：

“宮太傅爵中堂鈞座：敬稟者：竊文籍隸廣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嘗遊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輿地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竅奧。當今風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

欲以管見所知，指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採，獨以人微言輕，未敢遽達；比見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駸駸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富國強兵之遠略，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又有輶車四出，則外國之一舉一動，亦無不週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逃聽默呼，聞風鼓舞而已，夫復何所指陳？然而猶有所言者，正欲乘可爲之時，以竭其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也。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學而後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後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教養之也，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惜日久廢弛，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秦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遍布國中，人無貴賤，皆奮於學。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



設有專師，津津啓導，雖理至幽微，事至奧妙，皆能有法以曉喻之，有器以窺測之。其所學由淺而深，自簡及繁，故人之靈明日廓，智慧日積也。負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蓋賢才之生，或千百里而有一，或千萬人而有一，若非隨人而施教之，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以至於湮沒而不彰，秦西人才之衆多者，有此‘教養之道’也。且人才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於世之心，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爲己任。此其人必能發奮爲雄，卓異自立，無待乎勉勗也。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猶興也。至中焉者，端賴乎鼓勵以方，故秦西之士，雖一才一術之微，而國家必寵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奮，士不虛生。逮至學成名立之餘，出而用世，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學報以進其益，萃全國學者之能，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陳出新，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闡天地無窮之妙理，則士處其間，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又學者倘能窮一新理，創一新器，必邀國家之上賞，則其國之士，豈有不專心致志者哉？此秦西各種學問所以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幾於奪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勵之方’也。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則雖智者無以稱其職，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人，必

致野有遺賢，朝多倖進。秦西治國之規，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務取所長，而久其職，故爲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學院，爲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若其他，文學淵博者爲士師，農學熟悉者爲農長，工學練達者爲監工，商情講習者爲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總之，凡學堂課此一業，則國家有此一官。幼而學者，卽壯之所行，其學而優者則能仕。且恪守一途，有陞遷而無更調，夫久任則閱歷深，習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養廉，永其俸祿，則無瞻顧之心，而能專一其志，此秦西之官無苟且，吏盡勤勞者，有此‘任使得法’也。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鬱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矣。則國強不足謀也。乘國鈞者，盍於此留意哉！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夫地利者，生利之命脈，自后稷教民稼穡，我中國之農政，古有專官，乃後世之爲民牧者，以爲三代以上，民間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能養民者爲善政。三代以下，民間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再擾之，便爲善政，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以日就廢弛也。農民祇知恆守古法，不思變通，墾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勞多而獲少，民食日艱。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農田者，今



轉而爲農田之害矣，如北之黃河，固無論矣；卽如廣東之東西北三江，於古未嘗有患，今則爲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此由於無專責之農官以理之，農民雖患之而無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不得不付之於茫茫之定數而已。年中失時傷稼，通國計之，其數不知幾千億兆；此其耗於水者，固如此其多矣。其他荒地之不闢，山澤之不治，每年遺利又不知凡幾，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難乎？泰西國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於無遺地利，無失農時，故特設專官，經略其事。凡有利於農田者，無不興；有害於農田者，無不除；如印度之恆河，美國之密士，其昔汎濫之患，亦不亞於黃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補天功也。爲國家者，可不‘急設農官’以勸其民哉？水患平矣，水利興矣，荒土闢矣，而尤不能謂之地無遺利，而生民養民之事備也。蓋人民則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廣也。倘不日求進步，日出新法，則荒土既墾之後，人民之溢於地者，不將又有饑饉之患乎？是在急興農學，講求樹蓄，速其長植，倍其繁衍，以彌此憾也。夫天生人爲萬物之靈，故備萬物爲之用，而萬物固無窮也，在人之靈能取之用之而已。夫人不能以土養，而土可生五穀百果以養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長六畜以爲人食。夫土也草也，固

取不盡而用不竭者也，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別土質之美劣而已。倘若明其理法，則能反礮土爲沃壤，化瘠土爲良田，此農家之地學化學也。別種類之生機，分結實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質，明六畜之生理，則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權，此農家之植物學動物學也。日光能助農物之生長，電力能速農物之成熟，此又農家之格物學也。蠹蝕宜防，疫癘宜避，此又農家之醫學也。農學既明，則能使同等之田，產數倍之物，是無異將一畝之田，變爲數畝之用，即無異將一國之地，廣爲數國之大也。如此，則民雖增數倍，可無饑饉之憂矣。此‘農政學堂’所亟宜設也。農官既設，農學既興，則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非有靈器，無以速其事，此農器宜講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以牛馬，乃近世製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馬之用，以其費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則一器能作數百牛馬之功；起水，則一器能灌千頃之稻；收穫，則一器能當數百人之刈。他如鑿井澆河，非機無以濟其事，墾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機器之於農，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創器之家，日竭靈思，孜孜不已。則異日農器之精，當又有過於此時者矣，我中國宜購其器而仿製之。故‘農政有官’則百姓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人力省。此三者，我國所當仿效以收其地利也。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



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泰西之儒，以格致爲生民根本之務，舍此則無以興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窮理致用爲事。如化學精，凡動植礦質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廣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爲用。火油也，昔日棄置如遺，今爲日用之需要，每年入口爲洋貨之一大宗。煤液也，昔日視爲無用，今可煉爲藥品，煉爲顏料。又煮沙以作玻璃，化土以爲礬精，煉石以爲田料，諸如此類，不勝縷書。此皆從化學之理，而得收物之用，年中不知裕幾許財源。我國倘能推而仿之，亦致富之一大經也。格致之學明，則電風水火，皆爲我用。以風動輪而代人工，以水沖機而省煤力，壓力相吸而升水，電氣相感而生光，此猶其小焉者也。至於水火作汽，以運舟車，雖萬馬所不能及，風潮所不能當。電氣傳郵，頃刻萬里，此其用爲何如哉？然而物之用，更有不止於此者，在人能窮求其理；理愈明而用愈廣。如電，無形無質，似物非物，其氣附於萬物之中，運乎六合之內，其爲用較萬物爲最廣而又最靈，可以作燭，可以傳郵，可以運機，可以毓物，可以開礦。願作燭傳郵，而大行於宇內，而運機之用，近始知之，將來必棄其煤機而用電力也。毓物開礦之功，尙未大明，將來亦必有智者究其理，則生五穀，長萬物，取五金，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然而取電必資乎力，而發力必藉乎煤，近又有人想出

新法，用瀑布以水力生電，以器蓄之，以待不時之用，可供隨地之需，此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由此而推，物用愈衆，則人力愈省，將來必至人祇用心，不事勞人力而全役物力矣，此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也。機器巧，則百藝興，製作盛，上而軍國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所不成之物，如五金之礦，有機器以開，則碎堅石如齏粉；透深井以吸泉，得以開天地之寶藏矣。織造有機，則千萬人所作之工，半日可就。至縲麻絲，織絨呢，則化無用爲有用矣。機器之大用，不能遍舉，我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具，倘能推廣機器之用，則開礦治河，易收成效，紡紗織布，有以裕民。不然，則大地之寶藏，全國之材物，多有廢棄於無用者，每年之耗不知凡幾，如是而國安得不貧，而民安得不瘠哉？謀富國者，可不求機器之用歟？物理講矣，機器精矣，若不節惜物力，亦無以固國本而裕民生也。故秦西之民，鮮作無益；我中國之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賽會之舉，化帛燒紙之資，全國計之，每年常在數千萬；此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無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數較鴉片爲尤甚，亦爲國者，所當並禁也。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產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熱電也，各國之所共，在窮理之淺深，以爲取用之多少；地



產者如五金百穀，各國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則係於器機靈笨與人力之勤惰。故‘窮理日精’則物用呈；‘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是亦開源節流之一大端也。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夫百貨者，成之農工，而運於商旅，以此地之贏餘，濟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亞於生物成物也。故秦西各國，體恤商情，祇抽海口之稅，祇設入國之關，貨之爲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稅；貨之爲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輕其斂。入口抽稅之外，則全國運行，無所阻滯，無再納之征，無再過之卡。此其百貨暢流，商賈雲集，財源日裕，國勢日強也。中國則不然，過省有關，越境有卡，海口完納，又有補抽，處處征斂，節節阻滯，是奚異遍地風波，滿天荊棘，商賈爲之裹足，負販從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貨暢流也，豈不難乎？夫販運者，亦百姓生財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今日關卡之濫征，吏胥之多弊，商賈之怨毒，誠不能以此終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於國計民生，初無所裨；謀富強者，宜急爲留意於斯，則天下幸甚。夫商賈逐什一之利，別父母，離鄉井，多爲饑寒所驅，經商異地，情至苦，事至艱也。若國家不爲體恤，不爲保護，則小者無以覓蠅頭微利，大者無以展鴻業遠圖。故秦

西之民，出外經商，國家必設兵船領事爲之護衛，而商亦自設保商銀行互與倚恃。國政與商政並興，兵餉以商財爲表裏，故英之能傾印度，扼南洋，奪非洲，并澳土者，商力爲之也。蓋兵無餉則不行，餉非商則不集，西人之虎視寰區，憑凌中夏者，亦商爲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國富強之所關也，我中國自與西人互市以來，利權皆爲所奪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 我不能保商，而反剝損遏抑之也。商不見保，則貨物不流，貨物不流，則財源不聚。是雖地大物博，無益也，以其天生之材爲廢材，人成之物爲廢物，則更何貴於多也。數百年前，美洲之地，猶今日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貧，曷貴有商焉爲之經營，爲之轉運也。商之能轉運者，國家爲之維持保護也，謀富強者，可不急於‘保商’哉？夫商務之能興，又全恃舟車之利便。故西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戶庭，萬國九洲，儼同閭閻。開窮荒之絕島，以立商廛；求上國之名都，以爲租界。集殊方之貨實，聚列國之商氓，此通商之埠，所以貿易繁興，財貨山積者，有輪船爲之運載也。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 有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爲尤溥，以無波濤之險，無礁石之虞。數十年來，泰西各國，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遇一方困乏，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饑饉之患。故凡有鐵路之



邦，則全國四通八達，流行無滯；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路爲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我國家亦恍然於輪船鐵路之益矣，故沿海則設招商之輪船，於陸則興官商之鐵路。但輪船祇行於沿海大江，雖足與西人頡頏而收我利權，然不多設於枝河內港，亦不能暢我貨流，便我商運也。鐵路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區，則無以收一時之利，而爲後日推廣之圖，必也設於繁富之區，如粵港蘇滬浦津通等處，路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勵富戶，則繼之以推廣者，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爲力。試觀南洋英屬諸埠，其築路之資，大半爲華僑集股，利之所在，人共趨之。華僑何厚於英屬而薄於宗邦，是在謀國者，有以乘勢而利導之而已，此招商鐵路之扼要也。故無關卡之阻難，則商賈類出於其市；有保商善法，則殷富亦樂於買遷；多輪船鐵路之載運，則貨物之盤費輕；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貨流既暢，則財源自足矣。籌富國者當以商務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斂爲工，捐納爲計，吾未見其能富也。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舉；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財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願我中國仿效西法，於今

已三十年；育人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開煤金之礦，立紡織製造之局；興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鐵路，已先後輝映矣。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並行之也。間嘗統籌全局，竊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蓋謂此也。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仿效西法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爲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爲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羣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竊嘗聞之，昔我中堂經營乎海軍鐵路也，嘗唇爲之焦，舌爲之敝，苦心勞慮數十餘年，然後始成北洋之一軍，津關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勳名功業，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衆，行之尚此其艱，其他可知矣，中國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則雖堯舜復生，禹皋佐治，無能爲也，更何期其效於二十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傑之所以扼腕。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學而匿跡於醫術者，殆爲此也。然而天道循環，無往不復，人事否泰，窮



極則通，猛劑遽投，膏肓漸愈，逮乎法釐告平之後，士大夫多喜談洋務矣。而拘迂自固之輩，亦頗欲馳域外之觀，此風氣之變革，亦強弱之轉機。近年以來，一切新政次第施行，雖四大之綱不能齊舉，然而爲之以漸，其發軔於斯乎，此文今日之所以望風而興起也。竊維我中堂自興而後，經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材爲急務，建學堂招俊秀，聘西師而督課之，費巨款而不惜，遇一藝之成，一技之巧，則獎勵倍加，如獲異寶，誠以治國經邦，人才爲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嘗以無緣沾雨露之濡，叨桃李之實，深用爲憾！顧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於今，未嘗離學，雖未能爲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時譽，然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推中堂育才愛士之心，揆國家時勢當務之急，如文者，亦當在陶冶而收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鷲下，而敢求知於左右者，蓋有概乎大局，蒿目時艱，而不敢以巖穴自居也。所謂乘可爲之時，以竭愚夫之千慮，用之仰贊高深，非欲徒撰空言，以瀆清聽，自附於干謁者流，蓋欲躬行而實踐之，必求澤沛乎萬民也。竊維今日之急務，固無逾於此四大端，然而條目工夫，不能造次，舉措施布，各有緩急，雖首在陶冶人才，而舉國並興學

校，非十年無以致其功。時勢之危急，恐不能少須。何也，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壅塞，下則游手而嬉，嗷嗷之衆，何以安此。明之闖賊，近之髮匪，皆乘饑饉之餘，因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出，爲毒天下。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祲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不足胡以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興，尤爲今日之急務也。且農爲我中國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親耕之典，以勸萬民，今欲振興農務，亦不過廣我故規，參行新法而已。民習於所知，雖有更革，必無傾駭，成效一見，爭相樂從，雖舉國遍行，爲力尙易，爲時亦速也。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如此，則踵行他政，必無撓格之虞，其益固不止一端也。竊以我國家，自欲行西法以來，惟農政一事，未聞仿效，派往外洋肄業學生，亦未聞有入農政學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見有一農學之師，此亦籌富強之一憾事也。文遊學之餘，兼涉樹藝，泰西農學之書，間嘗觀覽，於考地質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每與鄉間老農，談論耕植，嘗教之選種之理，糞溉之法，多有成效。文鄉居香山之東，負山瀕海，地多砂磧，土質礪劣，不宜於耕，



故鄉之人，多游賈於四方，通商之後，頗稱富饒。近年以美洲逐客，檳島禁工，各口茶商，又多虧折，鄉間景況，大遜曩時；覓食農民，尤爲不易。文思所以廣其農利，欲去禾而樹桑，遂爲考核地質，知其頗不宜於種桑，而甚宜於波畢。近以憤於英人禁烟之議難成，遂勸農栽鴉片，舊歲於農隙試之，其漿果與印度公土無異，每畝可獲利數十金，現已羣相仿效，家家試栽，今冬農隙，所種必廣；此無礙於農田，而有補於漏卮，亦一時權宜之計也。他日盛行，必能盡奪印烟之利，蓋其氣味較公土爲尤佳，遠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產數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爭相購吸，以決其能奪印烟之利也必矣。印烟之利既奪，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國既禁，我可不栽，此時而申禁吸之令，則百年大患可崇朝而滅矣。勸種罌粟，實禁鴉片之權輿也。由栽烟之事觀之，則知農民之見利必趨，羣相仿效，到處皆然，是則農政之興，甚易措手。其法先設農師學堂一所，選好學博物之士課之。三年有成，然後派往各省，分設學堂以課農家聰穎子弟。又每省設立農藝博覽會一所，與學堂相表裏，廣集各方之物產，時與老農，互相考證；此辦法之綱領也。至其詳細節目，當另著他編，條分縷晰，可以坐言而起行，所謂非欲徒託空言者，此也。文之先人躬耕數代，文於樹藝牧畜諸端，耳濡目染，洞悉奧窔，泰西

理法，亦頗有心得；至各國土地之所宜，種類之佳劣，非遍歷其境，未易週知；文今年擬有法國之行，從遊其國之蠶學名家，考究蠶桑新法，醫治蠶病，並擬順道往游環球各邦，觀其農事。如中堂有意以興農政，則文於回華後，可再行游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察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詳明利益，盡仿西法，招民開墾，集商舉辦，此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所謂欲躬行實踐，必求澤沛乎民人者，此也。惟深望於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鉅險阻，猶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成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生民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之難，又有行之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用敢不辭冒昧，侃侃而談，為生民請命，伏祈採擇施行，天下幸甚。（下略）”

孫逸仙氏是很能了解這一點的：“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砲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所以他希望李鴻章輔助滿清政府，力行此四事，則“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利，則財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治，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



但是陳腐的封建貴族，在這個時候，無論如何不能容納這改良要求。第三階級在和平的要求失敗以後，於是轉而積極的反對滿清政府，這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展開了一個新的階段的標誌。

興中會的宣言雖然指出了“列強環列，虎視鷹瞵”的危險，可是並沒有反對帝國主義的政綱，不僅沒有反對帝國主義的政綱，而且因為自己也極希望做到“與列強並駕齊驅”，所以對於“國富兵強”的各國，充滿了羨慕與崇拜的傾向。由這種傾向出發，必然要幻想能夠在他們的幫助之下，顛覆滿清的統治，造成與列強“平分天下”的局面。既然有了這一種幻想，則對於羣衆的反帝國主義的原始暴動，自然也會像一般士大夫一樣，斥爲“排外”，斥爲“野蠻”。在當時這班革命家看來，中國之所以受列強侵略，完全於中國自己不爭氣，所以只能恨自己，而不能恨外人；反之，外人的“文明”“進步”，是可以效法的，如果要排斥外人，那就是排斥文明。一九〇〇年義和團運動失敗後，興中會分子給香港總督請求援助的信，把這種矛盾心理充分的表現出來：

“竊某等十數年來，早慮滿清政府庸懦失敗，既害本國，延及友邦；倘仍安厥如常，保守小節，禍恐靡既，用是不憚勞悴，先事預籌，力謀政變，以杜後患，不期果有今日之禍（著者按係指義和團之役）。當此北方肇事，大局已搖，各省地方，勢將靡爛，受其害者，不特華人也；天下安危，匹夫有責，

先知先覺，義豈容辭。某等觀此時艱，亟思挽救，竊恐勢力微弱，奏效爲難；政府冥頑，轉圜不易；疆臣重吏，觀望依違；定亂蘇民，究將誰屬？深知貴國素敦友誼，保中爲心；且商務教堂，遍於內地，故某等不嫌越分，呈請助力，以襄厥成；願借殊勳，改造中國，則內無反側，外固邦交，受其利者，又不特華人而已也。一害一利，相去如斯，望貴國其慎裁之。否則恐各省華人，望治心切，過爲失望，勢將自謀，禍變之來，殆難逆料。此固非某等所願，亦非貴國所願也。時不可失，合則有成。如謂滿清政府雖失政於先，或可補救於後，則請將其平素之積弊，及現在之凶頑，略爲陳之：朝廷要務，決於滿臣，素政弄權，惟以貴選，是謂任私人。文武兩途，專以賄進，能員循吏，轉在下僚，是謂屈俊傑。失勢則媚，得勢則驕，面從心違，交鄰慣技，是謂尚詐術。較量強弱，恩可爲仇，是爲瀆邦交。外和內狠，匿怨計嫌，釀禍伏機，屢思報復，是謂嫉外人。上下交征，縱情濫耗，民膏民血，發剝應需，是謂虐民庶。鍛鍊黨罪，殺戮忠臣，杜絕新機，閉塞言路，是謂仇志士。嚴刑取供，獄多瘦死，寧枉毋縱，多殺示威，是謂尚殘刑。釀禍奸臣，裹以忠義，是謂誨民變。東亂既起，不卽剿平，又借元凶，命爲前導，是謂挑邊釁。教異理同，傳道何罪？唆聳民庶，屠戮逞心，是謂仇教士。通商有約，保護宜週，乃種禍根，蕩其物業，



是謂害洋商。陸隣遣使，國體攸關，如待強敵，是謂戕使命。書未絕交，使猶滯境，圍困使署，囚禁外臣，是謂背公法。平匪全交，乃爲至理，竟因忠諫，慘殺無辜，是謂戮忠臣。啓釁貪功，覬覦大位，不加誅伐，反授兵權，是謂用債師。裂土瓜分，羣雄耽視，暗受調護，漠不知恩，是謂忘大德。民教失歡，原易排解，偏爲挑唆，遂起禍端，是謂修小怨。凡此皆滿清政府之的確罪狀，若不反正，爲禍何極？我南人求治之忱，良爲此矣。某等深知今日中外安危之所關，滿漢存亡之所繫，是用力除利弊，曲慰同人。南省亂萌，藉知稍緩；事宜借力，謀戒輕心，上國遠圖，或蒙取錄。茲擬平治章程六則呈覽，懇貴國轉商同志之國，極力贊成，除去禍根，肅照新治；事無偏益，利溥大同。惟事機緊急，時刻可慮，望早賜覆，以定人心，不勝翹企待命之至！”

所謂平治章程六則是：

(一)遷都於適中之地；

(二)於都內立一中央政府，以總其成；於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資分理；

(三)公權利於天下；

(四)增文武官俸；

(五)平其政刑；

(六)變科舉爲專門之學。

以上六條中除第三條外，無關主要，原文不另錄；第三條所謂“公權利於天下”，是表示興中會的對外政綱，極爲重要，原文如下：

“如關稅等類，如有增改，必先與列國妥議而行；又如鐵路礦產船政工商各業，均分沾利權。教士教堂旅店一律保護。”

興中會的對外態度，在這裏表現得非常明白。

在初期民族運動中，對外政策之所以如此軟弱，決不是所謂由於“第三階級之天然的妥協性”，而是由當時的實際條件所決定。因爲當時中國產業剛才開始萌芽，不僅還沒有發展到與帝國主義的工業組織衝突，而且如前所述，中國工業之最初出現，是在帝國主義經濟的協助之下，無論在軍用工業，煤鐵工業，交通工業，乃至最初出現的輕工業，都是如此。當時中等階級只看到滿清封建貴族的壓迫，還沒有看見帝國主義是自己的致命的敵人，因此而產出這種軟弱的外交政策。

在這所謂平治章程六則之中，沒有一字提到改善民衆的生活。同樣，在興中會的實際行動中，也沒有下層羣衆。這並不是表示第三階級不要羣衆，而是當時第三階級本身的基礎過於薄弱，還不能組織羣衆，只能從事於軍事暴動與單純的政治活動而已。



在興中會時代，除了上面引據的興中會的宣言與簡單綱領以外，並沒有具體的政綱，而興中會行動，又陷於人自爲戰的狀態之中。其中主張最具體最明確的，要算鄒容所著的“革命軍”，這本小冊子所羅列的主張，大綱如下：

1. 中國爲中國人之中國，我同胞皆須自認爲自己的漢種，中國人之中國；
2. 不許異種人沾染我中國絲毫權利；
3. 所服從滿洲人之義務，一律消滅；
4. 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
5. 驅逐住居中國之滿洲人，或殺之以報仇；
6. 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萬世，不復有專制之君主；
7. 對敵干預我中國革命獨立之外國及本國人；
8. 建立中央政府爲全國辦事之總機關；
9. 區分省分，於各省中，投票公舉一總議員，由各省總議員中，投票公舉一人，爲暫行大總統，爲全國之代表人，又舉一人爲副總統，各府州縣，又舉議員若干；
10. 全國無論男女，皆爲國民；
11. 全國男子，有國民軍之義務；
12. 人人當有效忠於此新建國家之義務；

13. 人人有承擔國稅之義務；
14. 凡為國人，男女一律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
15. 各人不可奪之權利，皆為天授；
16. 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屬天賦之權利；
17. 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論，思想，出版等事；
18. 各人權利，必需保護，須經人民公評，建設政府，而各假以權，專掌人民權利之事；
19. 無論何時，政府所有干犯人民權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滿清舊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樂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樂之後，經衆公議，整頓權利，更立新政府，亦為人民應有之權利；
20. 若建立政府之後，稍有不洽衆望，則羣起革命；朝更夕改，如弈棋之不定，固非新國家之道，天下事，不能無弊，要能以平和為貴，使其弊不致大害人民，則與顛覆昔日之政府，而求伸其權利，毋甯和平之為愈。然政府之中，日持其弊端暴政相繼做行，舉一國人民，悉措置專制政體之下，則人民起而顛覆之，另立新政府，以求遂其保全權利之心，豈非人民至大之權利，且為人民自重之義務哉？我中國人之忍受困苦，已至是而極矣；今既革命獨立，而猶為專制政府所苦，則萬萬不得甘心者



矣！此所以不得不變昔日之政體也；

21. 定名中華共和國(清爲一朝之名號,支那爲外人呼我之詞);
22. 中華共和國,爲自由獨立之國;
23. 自由獨立之國中,所有宣戰、議和、訂盟、通商,及獨立國一切應爲之事,俱有十分權利,與各大國平等;
24. 立憲法悉照美國憲法,參照中國性質而定;
25. 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國之自治法律;
26. 凡關全體個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設官分職國家上之事,悉照美國辦理,皇天后土,實共鑒之!

鄒容的“革命軍”的大綱,比興中會的綱領具體而進步,興中會至此,已發展到一個較高的階段,不久就轉入同盟會時代了。

這大綱中除了狹義的民族情感的作用,如主張誅殺滿洲人等之外,顯然已具有醒覺的第三階級的意識了。





## 第九章

### 康有爲與戊戌政變

在當時，政治上及思想上發生重大影響的，除了孫逸仙領導的興中會運動外，就是康有爲一派的維新運動。孫逸仙與康有爲，是十九世紀末葉中國新政治運動的兩個柱石。在當時，孫康的思想，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也有許多近似的地方。康有爲的年齡，比孫逸仙長了十一歲，（康有爲是一八五五年生的，孫逸仙是一八六六年生的），但在政治上開始活動，孫反比康爲較早，孫逸仙在一八八五年，即有決志傾覆滿清（孫逸仙在孫文學說第八章

內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 康有爲於一八九五年，始以公車上書請變法。孫逸仙在一八九二年，即創立興中會，而康有爲領導的戊戌政變，是一八九八年。但一般的說，孫與康，當然是同時代的人。

康有爲與孫逸仙，思想上有許多不同的地方，這是由他們的不同的物質環境所決定的。雖然他們都是廣東濱海的人(康南海人，孫香山人)，但他們的出身完全不同。孫逸仙的出身是：

“……家貧，故中山在髫齡即助理耕作，聞鄉人談洪楊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任。年十三，曾入其叔所設之私塾，旋於是年隨長兄德彰赴檀香山。時檀島有華僑約四萬人。德彰在檀島所屬之茂宜島營牧蓄業甚久，後有牛至千數百頭，中山隨兄居檀，因入該地教會學校，凡三年，繼又入聖路易學校。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由檀島回國，尋入廣州博濟醫學校，在校得交鄭士良，鄭固三點會員也。次年轉學於香港阿賴斯醫院，又得交陳少白尤少純楊鶴齡陸皓東，听夕談革命，港澳間親友，至評中山與陳尤楊爲四大寇……”

(轉錄“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一章)

但是康有爲的出身就與孫逸仙不同，他是：

“……其先代爲粵名族，世以理學傳家，曾祖式鵬，講學於鄉，稱醇儒。祖父贊修爲連州教諭，專以程朱之學，提倡後



進，粵之士林，咸宗仰焉。從祖國器，當咸同間從左軍，以功至廣西巡撫，……父達初早世，母勞氏，生子二人，長卽有爲，次廣仁。有爲旣早孤，幼受教於祖父……七歲能屬文，有神童之目；成童之時，便有志於聖賢之學，鄉里俗子笑之，戲號之曰‘聖人爲’蓋以其開口輒曰聖人聖人也。……年十八，始遊朱九江之門授學焉。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粵中大儒也；其學根於宋明，而以經世致用爲主，研究中國史學，歷史政治沿革，最有心得……從之遊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學政學之基礎，皆得諸九江；九江卒，乃屏居獨學於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旣出西樵，乃遊京師。其時西學初入中國，舉國學者，莫或過問，先生僻處鄉邑，亦未獲從事也；及道經香港上海，見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屬地如此，本國之進步更可知，因思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爲之本原，乃悉購江南製造局所譯各書盡讀之。彼時所譯者，皆初級普通學，及工藝兵法醫學之書，否則耶穌經典論疏耳，於政治哲學，毫無所及，而先生……別有會悟，能舉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於其學力中別開一境界……”（梁啓超著康有爲傳）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孫康兩人出身的不同：

孫逸仙的家庭背景，是一個貧農，孫逸仙就是在這西力資

本主義侵入，農村經濟開始崩潰的狀態中生長起來，而他本人又以特殊的關係，漂流到海外，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教育，於是造成了這位中國最早的第三階級革命家；而反抗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封建剝削，也就成了這位革命家的主要任務；這種反抗，以反滿清（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上層建築）表現出來。但是康有為的家庭背景，完全是與孫逸仙不同，他是“先代爲粵中名候”而且“世以理學傳家”祖父曾爲教練官，而且博得士林宗仰；從祖官至巡撫，完是一個腐儒官僚家庭，所以有爲在幼年時代“便有志於聖賢之學”。在這種一個家庭環境中生長起來，其要成爲反革命的聖賢之徒，這是一點也不足怪的。孫逸仙之所以爲孫逸仙，康有爲之所以爲康有爲，就是如此！

然而在當時乃至在後來，孫逸仙與康有爲的思想，雖然有衝突的地方，但也有不少近似的地方。以孫逸仙而言，他的思想的主要基礎，是第三階級的（這點在上章已有簡單論及，以後還要詳論），然而因爲中國產業落後的原故，事實上不能產生健全的第三階級的理論，所以在孫逸仙的思想中，包含有極複雜的成份（此點以後詳論），尤其是對於中國固有的倫理道德，並不澈底反對，而且有些地方是非常留戀這些東西的，他對於“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的光榮是不能忘情的，就這一點上說，他與康有爲的思想是沒有根本的衝突。在另一方



面，康有爲雖然出身於這樣一個腐儒官僚的家庭，死抱着聖人的牌位，但他對於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並不是決絕的反對，而且有許多地方，他對於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是部分接受了，他的維新變法的綱領，就有許多接受資本主義的成分；而孫逸仙則完全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所以在這一點上，孫逸仙與康有爲的思想也沒有根本的衝突。孫逸仙與康有爲的思想不同的地位，可以列成如下的公式：

孫逸仙：以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爲主，同時並不完全摒棄舊有的封建文化。

康有爲：以舊有的封建文化爲主，相當地採用了西方資本主義文化。

康有爲早年的著作，有兩部值得注意的，一部是“新學僞經考”，一部是“孔子改制考”。

康有爲在此地的所謂新學，是指新莽之學，因當時清儒法許鄭，自號漢學，康氏以爲此爲新代之學，非漢代之學，故改名新學；所謂僞經，謂周禮逸禮左傳及詩之毛傳，凡西漢末劉歆所力爭立博士者。新學僞經考的要點，梁超啓列舉如下：

- 一、西漢經學，無所謂古文者，凡古文皆劉歆所僞作；
- 二、秦焚書，並未厄及六經，漢十四博士所傳，皆孔門足本，並無殘缺。

三、孔子時所用字，即秦漢間篆書，即以文論，亦絕無今古之目；

四、劉歆欲彌縫其作偽之迹，故校中秘書時，於一切古書，多所亂；

五、劉歆所以作偽之故，因欲佐莽篡漢，先謀湮亂孔子之微言大義。

康氏的主張是否正確，是另一問題，而這部書在當時的確發生了極大的影響，據梁啟超所指出：第一，清學正統派的立腳點，根本動搖；第二，一切古書，皆須從新檢查估價，所以在當時思想界，康氏的這部著作，不啻是靜水中投下一塊巨塊，引起了極大的波動。

但是這部書出版不到一年，就為滿清政府所禁止。至於孔子改制考的內容，及給以當時思想界的影響，比這部新學偽經考更為重要。孔子改制考的內容：“……定春秋為孔子改制創作之書，謂文字不過其符號，如電報之密碼，如樂譜之音符，非口授不能明。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經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刪述者，誤也。孔子蓋自立一宗旨而憑之以進退古人，去取古籍。孔子改制，恆託於古；堯舜者，孔子所托也。其人有無不可知，即有亦至尋常，經典中堯舜之盛德大業，皆孔子理想上所構成也。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諸子，罔不改制，罔不託古；老子之託黃帝，墨子之託



大禹，許行之托神農是也。”（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三節）

至於孔子改制考在當時思想界所發生的影響，梁啓超列舉如下：

- 一、教人讀古書，不當求諸章句訓詁名物制度之末，當求其義理；所謂義理者，又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創法立制之精意。於是漢學宋學，皆所吐棄，爲學界別開新殖民地；
- 二、語孔子之所以爲大，在於建設新學派（創教），鼓舞人創作精神；
- 三、僞經考既以諸經中一大部分爲劉歆所僞造，改制考復以真經之全部分爲孔子所託古之作，則數千年來共認爲神聖不可侵犯之經典，根本發生疑問，引起學者懷疑批評的態度；
- 四、雖極力推搗孔子，然既謂孔子之創學派，與諸子之創學派，同一動機，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則已夷孔子於諸子之列。所謂“別黑白定一尊”之觀念，全然解放，導人以比較的研究。

以上這兩部書，對於當時的思想界，當然有很大的影響，不啻是擲下了一枚炸彈。然而康氏雖然大胆言前人之所不敢言，而他自己的思想，並不能掙脫舊制度的桎梏，而形成一個新的體

系。他在一方面，極端的標新立異，而另一方面，又不能自成體系，所以他始終還攢在封建意識中，不能有新的創作——梁啓超稱他爲“真可謂豪傑之士”的新的創作；就是那部“大同書”，然而大同書對於思想的貢獻究有多少價值？

康氏的著作，除了上述的新學僞經考與孔子改制考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大同書”（未公佈僅在不忍雜誌上發表一小部分）。前兩部是康氏整理舊學的著作，而大同書則康氏自己的創作。康氏以爲春秋中的“三世”，“升平世”是“小康”，“太平世”是“大同”。他引禮運上的話：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謂大同。”

以爲這是孔子理想的社會制度，而春秋的所謂太平世，亦卽此。他以此爲根據，再加了自己的創見，作爲“大同書”一書。據梁啓超所述，大同書中的理想社會的原則如下：

- 一、無國家，全世界置一總政府，分若干區域，
- 二、總政府及區政府皆由民選；
- 三、無家族，男女同棲，不得逾一年，屆期須易人；



- 四、婦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兒童出胎者入育嬰院；
- 五、兒童按年入蒙養院，及各級學校；
- 六、成年後由政府指派分任農工等生產事業；
- 七、病則入養病院，老則入養老院；
- 八、胎教、育嬰、蒙養、養老諸院，爲各區域最高之設備，入者得最高之享樂；
- 九、成年男女，例須以若干年服從於此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 十、設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勞作所入自由享用；
- 十一、警惰爲最嚴之刑罰；
- 十二、學術上有新發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別勞績者，得殊獎；
- 十三、死則火葬，火葬場比鄰爲肥料工廠。

康有爲理想中的大同社會，就是如此，這完全是一種在現經濟條件下決不能實現的烏托邦，而這種烏托邦的原理，和十九世紀初期西歐的空想的社會主義相似，尤其是和法國的傅立葉(Fourier)的理想有點相同。傅立葉的理想社會，是一種叫做“法郎球”的共產團體。這一種法郎球是由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組成爲原則的，其中又分爲部，部又分爲組，由旨趣相同的人，七人至

九人集合起來，成爲一組；又由旨趣相同的組集合起來，成爲部；由許多部集合起來，才組成一個法郎球。在這個法郎球中，包含貫徹農工業一切方面分担許多事情的許多部份。屬於這個法郎球的人，住在法郎斯梯爾這一個大建築中營共同生活。各家庭雖然住在各別的房子裏，但是像煮飯及其他事情，都是共同經營的；以法郎斯梯爾這個大房子爲中心，有一定面積的正方形的土地，歸其管理，經營農業及工業等事，所有這個法郎球團員的生活，必需品的供給，都有保證。不過從全體產物中，除去應該分配一切團員必需品之後，剩餘下來的，就分配於勞動，資本，技能三者。其分配的比例，勞動得十二分之五，資本得十二分之四，技能得十二分之三。在這個新社會中，軍隊，警察，法官，這些都是沒有的。不過爲管理一般的事務，設幾個職員。一切都是共和制，法郎球的首領，是全體選舉的，三個或四個法郎球聯合起來，又選舉全體的領袖，如此逐漸擴張，造成全世界法郎球的聯盟。這個聯盟的首領，就是世界的最高官吏，駐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就以這個都會爲世界的首府。

在這種法郎球裏面，團員間是互相扶助友愛，現代文明社會的鬥爭，妒忌，猜疑，殘害，在這種法郎球裏面是完全沒有的。在這種共產團體裏面，各種措施，必須遵守自由引力的原則，工作應當依科學的方法去處理，第一當使他有引人入勝的力量，要達



這種目的，作工當隨各團員的嗜好和才能，當使職業時常交換，各人對於他們所歡喜工作，一定用心竭力去做，自然能夠得與非常圓滿的成績。至於一切不愉快的工作，都用機器去做。在這種共產團體裏面，個人得私有資本，特別的技能尤爲大家所獎勵，因爲這種技能可以使全體得其利用。產物的分配，由上述的比例，勞動力所得的，比資本爲多，而且工作最苦，最重要的，所得的報酬也愈多，因此誰都有成爲資本家的機會。不用說，在這種共產團體裏面，資本家壓迫勞動者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至於這種共產制度中的婦女的地位，更是優越，戀愛自然是完全自由的，而且所有的婦女都被担保享有經濟上的獨立。

以上是傅立葉的理想社會，與康有爲的理想社會，有大同小異的地方，但原理上可以說是一樣的。此外如聖西門，湯文等的烏託邦，也和康氏的烏託邦相似。

康氏的“大同書”的著成，是在聖西門，傅立葉，湯文等空想社會主義出現以後——聖西門是一七六〇年生，一八二五年死，傅立葉是一七七二年生，一八三七年死，湯文是一七七一年生，一八五八年死，而康有爲則生於一八五五年，比上述這些空想社會主義家差不多遲了一個世紀；在康有爲誕生的時候，聖西門與傅立葉早已物化，而湯文亦於康氏誕生後三年即死，所以康氏著大同書的時候，西方的空想社會主義早已成爲歷史的陳迹。

但康氏在著大同書以前，有否知道聖西門傅立葉禍文這一班人及其思想，是一個問題——據他的弟子梁啓超說，是不知道的，梁氏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裏說“有爲著此書（按指大同書）時，固一無依傍，一無勦襲，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與今世所謂世界主義社會主義者多合符契，而陳義之高且過之，嗚呼，真可謂豪傑之士也已！”康氏雖比聖西門等差不多遲一世紀，但以中國文化之落後，那時西洋文化，尤絕少輸入，所以康氏在那時不知有聖西門等，或係事實，但這也是不足重要。在中國歷史上，懷抱這種空想的人，不知凡幾，更不能以此即可稱康氏爲“豪傑之士”。

康氏的理想社會，雖與聖西門等西歐空想社會主義者相似，但他們的出發點是不同的。西歐空想社會主義的發生，與康氏空想的發生，其根源完全不同。空想的社會主義，以法國和英國爲大本營。法國發生這種空想的社會主義，是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後。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之一種空前的記載，大革命的影響，使當時國內人士發生了一種極端的樂觀主義。但是革命的結果，一方面固然帶來了光明，另一方面却帶來了許多大罪惡與不滿人意的現象——資本主義的好處，物質文明的發達，生產的急激的發展，這是人所共見的，但資本主義的缺點，如有產者對於無產者的壓迫，無產者的痛苦，這些漸漸也爲人所注意了。但當時一般極端的樂觀主義的觀察，以爲人類的進步，總容



易達到美滿的理想之境；空想的社會主義，就是在這樣極端的樂觀主義的影響之中產生出來。他們既然相信人類的進步，能夠達到美滿的理想之境，所以他們只是一味描寫他們的理想的天堂，至於怎樣才能實現這種理想，那就完全缺乏科學的根據。因為他們對於社會進化的定律，是茫無所知；他們祇憑着一種感情的作用，來描寫他們的主觀的希望。例如法國初期社會主義者加伯（Cabet），他在一八三九年公佈的那本“伊卡利旅航記”中，敘述這伊卡利極樂國的狀況，描寫得很詳細，試舉其中一例如下：

“在這地方，一切人們，都是一樣的服裝——雖然爲適應男女老幼的必要，不得已而也設有差別——能夠由各人的嗜好而選擇的，祇有服料的顏色。男子從十八歲起到六十五歲止，女子十七歲起至五十歲止，都有從事勞動的義務。一天的勞動時間，夏天是七點鐘，冬天是五點鐘；女子的勞動時間，每天不過四點鐘。到了午後一點鐘，一切勞動都要中止。討厭的不愉快的工作，一切都用機器去做。人們所做的工作，都是有趣味的愉快勞動。因此，貨物的生產，也就爲之增多。把這些貨物，平均分配給社會上一般人——雖然爲適應男女老幼的必要，也設有些差別。在這個社會裏，沒有叫作貧困這個東西，也沒有叫做犯罪這個東西。”

這本書中的伊卡利，就是共產主義平等主義的理想鄉。但是

這書裏的伊卡利，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據作者的假設，他是在倫敦遇着一個叫做威廉却利斯多的人，這個人就是旅行過伊卡利這可驚的地方的人。但是實際上，不用說，這個所謂伊卡利的地方和所謂威廉却利斯多這個人，都是他腦子裏幻想出來的。這不僅加伯如此，聖西門與傅立葉，又何嘗不是如此？前面引述的傅立葉的理想的法郎球，就是和加伯的伊卡利是一樣的東西。

在英國，這種空想的社會主義的發生，是十八世紀產業革命所造出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工人階級及一般人民的生活異常低下，自然尤其是工人階級。在十八世紀末葉與十九世紀初期，人民的窮困，成了當時英國最嚴重的問題；救濟人民的窮困，成了一般慈善家最心焦的事。英國空想的社會主義——湯文就是一個最著名的代表——就這樣以慈善觀念為出發點而發生了。不用說，以慈善觀念為出發點的社會主義，自然脫不了空想的領域。

但是康有為的空想主義的發生，又與法英兩國不同；雖然康氏著作大同書時，已是十九世紀末葉，西歐資本主義已有極高度的發展，而中國經濟却還是十分落後，在西歐資本主義侵略之下，農村經濟開始破產，而工業又不能發達，民生的顛沛疾苦，較十九世紀初期英國人民為更甚。康氏的空想，也是這種民生疾苦所激發出來的。康氏是一個很有野心的人，他很想創一種標新立



異的學說，於是民生的疾苦所給他的影響，造成了他的理想的大同社會。但他的理想社會與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想社會，有一個根本不同之點。在西方，雖然資本主義制度帶來了貧富懸隔的禍害，但大規模機械生產，又是為一般人所讚美的，所以在法英兩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想中，總是以機械生產為根本，企圖以機械去代替一切討厭的不愉快的工作，企圖以機械去增加生產，減少人工。可是在當時（康氏著書時）的中國，資本主義制度祇帶來了禍害而沒有帶來好處，機械生產的意義，在康氏是不了解的，所以在康氏的理想社會中，機械生產是沒有的。但必須利用機械生產，產量才能增加，人工才能減少，人類福利才能增加，理想社會才能成立，這是西歐空想社會主義者必須以機械生產為出發點的原因。康氏生長在落後的中國，既不了解機械生產的偉大意義，因而他的理想社會中沒有機械，但是沒有機械，生產就不能增加，人工時間就不能減少，則理想的樂園如何能夠實現呢？於是康氏就不能不着重於其他方面，就是廢除家庭關係，以此來減少各人的負擔，以此來增加各人的生產。但正因為如此，他的理想，比聖西門，傅立葉，加伯，滑文輩的理想更為勉強了。

雖然一方面民生的疾苦所給康氏的影響，產生他的大同社會的理想，但是他並不把他的理想公開出來，更不如聖西門傳

立葉滿文輩之力求其理想之實現了。這，一方面是暴露了在資本主義經濟下，封建的破落戶之沒有出息，另一方面，反映了落後的中國經濟，更沒有實現這種理想的可能。據梁啟超說：“有為雖著此書，然秘不示人，亦從不以此義教學者，謂方今為‘據亂’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清代學術概論）康有為這種矛盾畏縮的態度，正是反映了日趨沒落的封建餘孽之不能有所為。

康氏的所謂小康，就是在現狀之下，加以改良，於是有“公車上書”（一八九五年）的運動出現。

康氏雖曾著大同書，發表其空想主義的意見，但他終究是一個受封建之毒極深的人，所以是始終一個謹守君臣之義的統治階級的馴犬，所以他作文說話，動輒“君臣之義已定，天澤之分難越”，“食毛踐土，誰非臣子？”，處處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涵濡煦育數百年之恩。”他一方面對於現狀表示不滿，而另一方面又沒有革命的勇氣，這是因為他一方面覺得中國政治不及外國，而另一方面，他的出身——他的經濟背景限定他的意識，祇能在極底限度的改良主義範圍內，有所發展，“公車上書”的意義，就是如此！所謂戊戌維新變法，實際上當然沒有根本變了什麼，據李劍農“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中所述，戊戌的所謂新政，其重要亦不過如左列各項而已：



- 1, 命自下科始, 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 向用四書文者, 改試策論;
- 2, 賞舉人梁啓超六品銜, 辦理譯書局事務;
- 3, 定鄉會試隨場去取之, 法並推行於生童歲科考, 又停止朝考;
- 4, 命刪改各衙門則例;
- 5, 命於京師設立農工商總局;
- 6, 下裁汰冗官令: 命裁撤詹事府, 通政司, 光祿寺, 鴻臚寺, 太僕寺, 大理寺衙門, 湖北廣東雲南三巡撫, 并東河總督缺, 其各省不辦運務之糧道, 向無鹽場之鹽道, 亦均裁撤; 其餘京外應裁文武各缺, 命大學士六部各省將軍督撫分別詳議以聞。

康有爲的維新變法, 原是維持封建統治的殘餘的一種忠誠的獻謀, 然而正趨沒落的代表封建地主的專制政府, 牠的運命已到了無可挽回的程度, 所以雖然康有爲竭盡其智謀, 也再不能挽救了, 於是所謂變法維新, 立刻就失敗了, 康有爲梁啓超輩, 且被通緝而不得不逃亡海外, 譚嗣同康廣仁(有爲之弟)等所謂六君子, 不能不殉難焉。這就是有名的戊戌政變。

關於康有爲, 實在可以不再多論, 而梁啓超在思想界的重要, 則遠在康有爲之上, 關於他, 以後還要專章詳論。現在再就戊

戊政變殉難六君子(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弟,譚嗣同,康廣仁)中最重要之一人——譚嗣同加以敘述。



## 第十章

### 譚嗣同——急進的第三階級思想家的解剖

譚嗣同雖然犧牲於康有為領導的戊戌政變中，但他的思想，與康有為根本不同。在鴉片戰爭以後，一九〇〇年以前，譚嗣同實在是中國思想界最可注意的一人，他的思想的勇敢、精銳、澈透，不僅遠過於康有為，而且遠過於梁啟超孫逸仙。如果他的生命能夠延長二三十年（他死的時候僅三十三歲），則他在文化上的貢獻，在思想上的地位，將遠過於梁啟超。梁啟超稱他為“晚清思想界的彗星”，實非過譽。他的學生最主要的著作，就是“仁學”。

梁啟超批評仁學，曾有如下一段：

“仁學之作，欲將科學哲學宗教，冶爲一爐，而更使適於人生之用，真可謂極大胆極遼遠之一種計劃。此計畫，吾不敢謂終無成立之望，然以現在全世界學術進步之大勢觀之，則似爲期尚早；況在嗣同當時之中國耶？嗣同幼治算學，頗深造，亦嘗盡讀所謂‘格致’類之譯書，將當時所能有之科學智識，盡量應用；又治佛教之‘唯識宗’‘華嚴宗’，用以爲思想之基礎，而通之以科學；又用今文學家‘太平’‘大同’之義，以爲世法之極軌，而通之於佛教。嗣同之書，蓋取資於此三部分，而組織之以立己之意見，其駁雜幼稚之論甚多，固無庸諱，其盡脫思想之束縛，戛戛獨造，則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清代學術概論）

譚嗣同在仁學自叙中說：

“吾將哀號流涕，強聒不舍，以速其衝決網羅；衝決利祿之網羅，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衝決全球羣學羣教之網羅，衝決君主之網羅，衝決倫常之網羅，衝決天之網羅，……然既可衝決，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衝決。……”

譚嗣同之所謂衝決網羅，其一種大無畏的精神，一種銳利澈透的思想，實不能不引起人深切的欽敬！他不僅要衝決利祿的網羅，衝決俗學羣學羣教的網羅，而且要衝決君主的網羅，要衝決



倫常的網羅，衝決天之網羅，在十九世紀末葉之中國，而有此種勇敢邁進的思想，實不能不令人驚異！康有為僅守君臣之義，康有為要祀天配孔，而譚嗣同則無不處處與之相反，康有為所認為天經地義，要謹守奉行的，而譚嗣同則徧以為是應該衝決的網羅。譚氏思想較康氏為進步，這是非常顯然的。

譚嗣同的思想，在當時實在是一個最急進的革命家，他反對一切尊古守舊的觀念，在仁學中，曾說：

“古而可好，則何必為今之人哉？”

這雖然是很勉強的說法，但一種排斥尊古觀念的精神，是很值得稱頌的。他又說：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

這種勇敢邁進的態度，躍然紙上。

譚氏的思想，實在是澈底的第三階級的。站在一個急進的第三階級革命家的見地，過去的一切，都是應該排斥的，一切的名教道德，倫常大理，都是封建統治者御用的精神工具，而這些統治者，都是“大盜”，被統治者利用的學者，都是鄉愿，“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真可謂千古至論！在這方面，譚嗣同的急進的思想，和後來的陳獨秀有點相似，而遠過於梁啟超孫逸仙諸人，與康有為更是完全不同了。

所謂名教，是封建統治者在精神上奴隸羣衆的工具，急進的第三階級思想家的譚嗣同，當然要澈底的反對名教了，他在仁學中說：

“俗學陋行，動言名教，……以名爲教，則其教已爲實之實而決非實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三綱五常之慘禍酷毒由此矣！……如曰仁，則其名也；君父以責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於箝制之術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節一切分別等裏之名。……忠孝旣爲臣子之專名，則終不能以此反之，雖或他有所據，意欲詰訴，而終不敵忠孝之名爲名教之所尚。……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並錮其心使不敢涉想……。”

在聖賢之徒的意識中，君臣，父子……等倫常關係，是天經地義的，所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死，不得不死”。而譚嗣同則反轉來，以爲“君父以責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這在聖賢之徒如曾國藩之流看來，真是極人論名教之奇變，非大加撻伐不可了。

在仁學中，譚嗣同還發表了許多近乎怪僻的意見，例如他以爲：

“天地間無所謂惡，惡者名耳，非實也。”

“俗儒以天理爲善，人欲爲惡，不知無人欲，安得有天



理？”

他更進一步的說：

“惡莫大於淫殺，……男女媾精名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名之不改，習謂爲惡。向使生民之始，卽相習以淫爲朝聘宴餉之鉅典，行諸朝廟，行諸都市，行諸稠人廣衆，如中國之長揖拜跪，西國之抱腰接吻，則孰知爲惡者。戕害生命名殺，此殺名也。然殺爲惡，則凡殺皆當爲惡；人不當殺，則凡虎狼牛馬鴨豚，又何當殺者？何以不並名惡也？或曰：人與人同類耳，然則虎狼於人不同類也，虎狼殺人，則名虎狼爲惡，人殺虎狼，何以不名人爲惡也？……”

這一段的後節關於殺的一段，立論有點牽強，但這正如梁啓超所說“然其懷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氣，正可察見。”至於關淫惡一段，尤其是千古至論！

譚嗣同的政治思想，發表於仁學中者，爲一種徹底的民主主義，這正是表示他的第三階級思想家的本質。

譚氏既爲一急進的第三階級思想家，對於滿清政府，自然是痛施攻擊：

“天下爲君主私產，不始今日，……然而有知遼金元清之罪，浮於前此君主者乎？其土則穢壤也，其人則羶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其俗則彘俗也；逞其兇殘淫殺，攫取中原子女

玉帛……總以爲未壓，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其心思，挫其氣節……方命曰：此食毛踐土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

在這裏對於滿清政府的攻擊，帶着狹義的民族的情感，其措辭幾與太平天國的“奉天討胡檄”相同，這是充分地表現了進步分子對於滿清政府的憤恨。

譚嗣同的思想的品結，是世界大同的幻想，所謂“世界主義”也就成了“仁學”的結晶，例如：

“春秋大一統之義，天地間不當有國也……”

“不惟發願救本國，並彼極盛之西國與夫含生之類一切皆度之。……不可自言爲某國人，當平視萬國，皆其國，皆其民。”

在急進的第三階級思想中，帶有極模糊的廣義社會主義的幻想，這是中國第三階級思想家的特色，不僅譚嗣同如此，孫逸仙亦然。這倒不是表示落後的中國第三階級的革命家，其思想較西歐第三階級思想家更爲急進，而是落後的中國經濟關係所決定，詳言之，可分兩點：

(一)不誘發廣大的羣衆起來推翻封建統治，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國急進的第三階級革命家的思想，往往帶有模糊的社會主義的意味，而急進的階



三階級的革命集團，其經濟政綱亦往往含有社會主義的意味（實際是上一種積極的資本主義，民生主義即其顯例，詳後），因為非此不足肅清封建勢力，所以這種模糊的社會主義思想的真實意義，就是積極的建設資本主義。

(二)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萌芽的時候，西歐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充分地暴露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弱點；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階級的對立，已到了尖銳化的程度，無產者不僅已經團結起來，而且已經到了與有產者短兵相接，奪取政權的企圖——德國的一八四八年革命，法國的一八七一年革命（巴里公社），就是顯例。落後的中國第三階級思想家，一方面羨慕先進國家資本主義生產的繁榮，另一方面又鑒於階級鬥爭的痛苦，因此，他們下意識地一方面希望資本主義的繁榮發展，另一方面希望階級鬥爭不出現於中國。由資本主義的和平發展到世界大同。當然的，這是一種不能實現的幻想。





## 第十一章

### 義和團運動之歷史的意義

在興中會成立後的第八年——一九〇〇年，北方發生了反帝國主義的原始暴動——義和團運動。

自從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一天比一天更嚴重起來。跟着同一的比例，農村經濟破產的危機，也一天天嚴重起來，羣衆原始的排外運動——義和團運動，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情形下爆發起來。

自鴉片戰爭以後，至義和團運動爆發，這六十年間，帝國主

義的侵略，可以概述如下。

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最初是輸出商品，繼之於輸出资本；不僅在中國進行商品侵略，而且進一步的直接在中國境內經營鐵道，輪船，礦山，工廠，銀行等。

當然首先要說到商品的侵略。帝國主義以大量的商品的運到中國市場來傾銷，破壞了中國自足自給的農業小手工業經濟。洋貨充斥的結果，必然是金錢外溢。雖然中國原料也有一部分出口，但原料出口的價值，遠遜於進口貨的價值。而且原料的出口，引起了某幾種部門的農業的衰頹。

鴉片戰爭以後的對外貿易的入超，在前面曾引過一二例，現在將一九〇〇年以前的對外貿易的入超，列表如下：

歷年對外貿易入超表(單位海關兩)

年代	洋貨進口	入超實數
1865	61,844,158	1,789,524
1866	74,563,674	18,401,867
1867	69,329,741	14,434,028
1868	71,123,212	1,455,529
1869	74,923,201	6,969,296
1870	69,290,722	8,398,403
1871	70,103,077	3,249,916



1877	73,233,896	5,788,874
1878	70,804,027	3,631,848
1879	82,227,424	9,946,162
1880	79,293,452	1,409,855
1881	91,910,877	20,457,903
1882	77,715,228	10,378,382
1883	73,567,702	3,370,009
1884	72,760,758	5,613,073
1885	88,200,018	23,194,307
1886	87,479,323	10,272,759
1887	102,263,669	16,403,826
1888	124,783,892	32,381,826
1889	110,884,355	13,936,527
1890	127,093,481	39,949,001
1861	134,603,863	33,056,014
1892	135,101,199	32,517,673
1893	152,362,819	34,720,508
1894	162,110,236	33,998,989
1895	171,696,715	28,403,504
1896	202,589,994	71,508,573

1897	202,826,625	39,327,267
1898	209,579,334	50,542,285
1899	264,748,546	68,963,624
1900	211,070,422	52,073,670

這每年鉅額的入超，對於中國經濟當然是一個極大打擊。以上三十一年之間，入超的總數為六九二、五四九、〇三七海關兩。中國天然富源雖多，而已經開發的極少，所以國富的總數本來極少，在三十一年的對外貿易中，就損失將近七萬萬兩。在這樣鉅大的損失，中國經濟又焉得不即破產？

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經濟侵略，不僅推銷商品與掠奪原料而已，而且因為不平等條約的保障，可以在中國領土內自由開設工廠和建築鐵路等。

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的結果，中國的積弱，更充分的暴露出來，於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也更露骨地進行。帝國主義從中國掠奪原料，運回本國去製成商品，再運來中國市場銷售，在這過程中，雖然也以獲得很大的利潤，但究不如直接在中國領土內開設工廠，更為方便。而且中國勞動力代價的低廉，尤為西方資本家所艷羨，所以帝國主義者不僅要在中國銷售商貨掠奪原料，而且要更進一步的在中國領土內開設工廠，進行更直接的掠奪了。

一八九六年中日馬關條約規定：



“日本人民得在中國從事於各種製造業，輸出各種機械。”

本來在馬關條約以前，帝國主義已有在中國領土內開設工廠，不過馬關條約訂立以後，帝國主義更得了一層法律上的保障，從此中國領土內的外國工廠，也就一天天多起來了。

一九〇〇年義和團運動暴發以前，帝國主義在中國設立的工廠，單是紗廠一項，在上海一埠開設的，已有如下各廠：

名	稱	國別	開辦年	資	本	額
怡和紡織公司		英	1895	5,400,000	兩	
東方紗廠		英	1896	3,000,000	兩	
上海紡織株式會社第一廠	日		1895	6,000,000	兩	
上海紡織株式會社第二廠	日		1896	同		上
公大紗廠		日	1896	10,000,000	日元	
日華紡織株式會社		日	1896	11,000,000	日元	

尚有各埠及其他各種工業，未列入。

外人在中國境內直接開設工廠，使中國新起的幼稚工業，立刻遭遇了重大的壓迫。例如紗廠業的情形即其顯例，在馬關條約以前，中國已有若干自辦的紗廠。但是馬關條約的結果，外人在中國境內開設紗廠，於是本國紗廠乃完全被其壓倒，誠如井村重雄在他所著的“支那之紡織業及其出品”中所說：

“中日戰爭以前，中國境內之紡織業，全爲華人投資經營之事業；但自馬關條約締結後，外人挾其雄厚之資本，優秀之技術，來華經營紗廠矣。中國幼稚之紡織業，不能與之抗衡，況政府毫無保護餘力，此所以在諸新式工業中最有希望之紡織業，大有江河日下之勢。”

“光緒十六年至二十五年間，華商經營紡織工廠，遭迭創業之艱難，但外人之紗廠，則以富有辦理之經驗，在此需要廣大之中國，因得順利經營。”

可見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開設工廠，對於中國經濟發展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煤鐵礦業是近代工業的基礎。中國有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以上的煤的儲量與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以上的鐵的儲量，這當然是帝國主義所不肯放棄侵略的。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各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煤鐵礦業的侵略，已經略具規模，英國捷足先登地拿到了開灤煤礦，復由福公司取得了山西河南四川的一切煤鐵礦的開採權。德國於一八九八年藉口曹州德教士被殺事件，攫得了膠濟鐵路及膠州外，復攫取沿膠濟路三十里內的一切礦業的開採權；一八九九年，德商瑞記洋行攫得了山東的五礦，俄帝國攫得了滿洲一部分煤鐵礦及金礦開採權。法國取得了雲南全省及廣西一部分的各種礦物開採權。美國與



日本，亦急急想攫取中國的一部分礦權。除此以外，尚有名為中外合辦而實為外商所操縱者，主要的如下：

名稱	國籍	事業種類	資本額	開辦年
福公司	中英法	山西煤鐵礦	10,000,000兩	1897
福公司	中英法	河南煤礦	見上	1897
宣城煤礦公司	中日	安徽煤礦	5,000,000元	1897
福公司	中英法	四川鐵礦	10,000,000兩	1893
會同公司	中英	四川煤鐵礦	10,000,000兩	1898
隆興公司	中法	雲南各種礦物	50,000,000兩	1900

在金融事業方面，帝國主義也積極侵入。銀行事業是近代經濟的核心，帝國主義要操縱中國經濟，自然首先要從銀行入手。

一九〇〇年以前，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設立的銀行，其主要者如下：

名稱	國籍	總行及在華分行	資本總額	在華創立年
東洋銀行	英	總行倫敦分行香港		1846
麥加利銀行	英	總行倫敦分行中國各大都會	英金3,000,000鎊	1857
匯豐銀行	英	總行香港分行中國各大都會	港洋50,000,000元	1864
有利銀行	英	總行倫敦分行上海香港	英金3,000,000鎊	1895
正金銀行	日	總行橫濱分行中國各大都會	日金100,000,000元	1896
道勝銀行	俄		法幣2,000,000法郎	1895

東方匯理銀行	法	總行巴里分行 中國各大都會		1898
德華銀行	德	總行柏林分行上海	銀4,500,000兩	1897
花旗銀行	美	總行紐約分行上海各處		
華比銀行	比	總行不律塞魯分行上海各處		
荷蘭銀行	荷	總行荷京分行上海	荷幣80,000,000盾	
安達銀行	荷	總行荷京分行上海	荷幣60,000,000盾	
大通銀行	美	總行紐約分行上海	美金2,000,000元	
大英銀行	英	總行倫敦分行 中國各大都會	英金5,000,000鎊	
華義銀行	意	總行羅馬分行上海	美金1,000,000元	

這些銀行在中國，除了經營普通業務以外，復投資於中國之鐵路航業礦山及各種實業，占有偉大的勢力。不僅如此，而且還投資於政治借款，以債權人的資格，取得中國之各種政治經濟特權。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單是匯豐銀行一家，對中國政府所投下的政治借款，其數頗可驚人。下表各項借款，匯豐銀行都是主要的債權人：

年份	借款數目
1874	英金 600,000鎊
1877	英金 1,600,000鎊
1877	銀 1,949,000兩
1881	銀 4,380,000元



1885	英金 1,500,000鎊
1885	英金 750,000鎊
1896	英金 760,000鎊
1894	銀 10,000,000兩
1895	英金 3,000,000鎊
1896	英金 16,000,000鎊
1897	英金 16,000,000鎊

一九〇〇年以前，帝國主義對於中國鐵路方面的侵略，已在前面敘述過；英，美，法，德，俄各國，均在中國建築了牠的鐵路的勢力範圍。

總之，由於甲午中日戰爭的結果，帝國主義的侵略，有突飛猛進的趨勢。所以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掠奪，已經樹立了很強固的基礎。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既有更進一步的發展，陪着而來的不可避免的現象，就是農村經濟的崩潰，也就更嚴重的表現出來。加以中日戰爭中，北方飽受蹂躪，而戰敗的結果，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兩的鉅額的賠款，又不能不直接間接，取諸於民，故人民乃愈不堪負擔。由生活的逼迫而起的變亂，實際上已無法避免，再加以外國傳教士在各地的橫行，貪官污吏，洋奴國賊之媚外欺民（曾國藩即是一例），土豪劣紳利用官廳怕洋人的心理，與教堂勾結起來，魚肉鄉民，使一般人憤無

處洩，於是自然而必然地爆發了一個殺洋人燒教堂的原始的排外暴動。

義和團運動是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以致農村經濟破產所激起的原始的排外運動。以落後的經濟去反抗進步的資本主義經濟，其失敗是必然的。資本主義先進國家有的是精銳的軍艦大砲，這決不是落後民族的中世紀武器所能抵禦的，原始暴動中的羣衆，拿什麼武器去對抗帝國主義呢？當然不能不訴諸神權——藉符咒神怪來與先進國家的科學的軍備來決鬥，這也是原始暴動中的必然現象。這在有知識的人們看來，是非常之可憐的蠢笨的辦法，所以有知識的人們均要咒咀義和團，斥諸爲拳匪，咒之爲亂民，甚至連當時進步的興中會份子，也是同樣的加以指斥——興中會致香港總督信上，主張“平匪全交”，即平定“拳匪”以全邦交——但正因爲如此，一方面，反映出義和團運動是一個偉大的下被層壓迫羣衆的革命運動，這一羣被壓迫者對於帝國主義抱着決絕仇視的態度；而另一方面，表現了中國第三階級在民族運動中開始就帶着異常濃厚的妥協性。興中會爲對義和團運動，表面上是指義和團爲盲目的排外，而實質上，是基於中國第三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妥協的心理。興中會與義和團，是代表當時兩個不同的社會勢力：興中會是代表一部分新興第三階級（主要的是華僑）及一部分小地主商業資本家；義和團是代表破產



的農民手工業者及一切下層羣衆。

興中會的目的，是富國強兵，與列強並駕齊驅；所以牠的最初的政策，還是希望滿清政府能夠自動的維新改良，孫逸仙上李鴻章書，就是此種希望的具體表現。後來看到這種希望已經斷絕，乃轉而以推翻滿清政府爲目標，因爲他們知道滿清政府的存在，是維新改良的障礙。但是用什麼力量去推翻滿清政府呢？羣衆的力量，是他們所輕視的，他們有了幾千年的歷史上的經驗，要打江山奪天下，第一就要依靠武力。所以興中會的運動，是以全副精力來注重軍事方面。帝國主義的壓迫，在他們自然也是感覺到的——他們是深切地感覺到“堂堂華國，不齒於列強；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的恥辱。自然，如果能夠像秦始皇吞併六國那樣“掃除羣雄，無敵於天下”這固然是千古快事。然而他們也知道這目的一時決不容易達到，退一步想，就希望能夠“與列強並駕齊驅”。但是即使要做到這退一步的辦法，也必須先推翻滿清政府。在這一過程中，帝國主義不僅可以不必仇視，而且還希望帝國主義能夠幫助自己來推翻滿清政府。從興中會到同盟會，一直到一九二四年，這個集團一貫的對於帝國主義存着這種妥協的幻想。

民族第三階級在最初出現於政治舞台的時候，就懷着這種妥協的幻想，其原因是在這個時候，民族第三階級是剛才出世，

其本身感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遠不如感受滿清政府壓迫之深。而且因為他們一部分本身就是買辦階級，在許多方面，與帝國主義的經濟利益相結托，所以更沒有反抗帝國主義的決心。在某幾方面，帝國主義之極度發達的物質文明，正是初出娘胎的民族第三階級所豔羨的，所以很希望帝國主義能夠幫助自己，使自己也能夠做到這樣地步。

興中會對帝國主義的態度是如此，而義和團的性質，則完全相反。義和團的成分，是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及一切勞苦的羣衆，他們沒有受過資本主義文明的洗禮，甚至中國數千年來的聖賢名教所給他們的毒，也並不甚深，所以他們不能像興中會那樣“文明”，那樣講邦交理義；也不像興中會那樣希望富國強兵。他們祇有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就是要求生存，他們現在受了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結果，破產失業——至少也就將瀕於破產失業，生活一天天惡劣起來，簡直到了不能生存的程度，這種不能生存的威脅，終於燃燒了他們反抗的火焰。他們不懂文明，自然祇有野蠻。義和團之所以成爲“野蠻”的“拳匪”，就是如此。但也正是在這種地方，使我們認識了義和團運動才是真正偉大的反帝國主義的羣衆暴動。

也許有人要發生這樣的懷疑：以爲義和團運動既是下層平民的反帝暴動，爲什麼牠是在“扶清滅洋”的旗幟之下展開起來？



難道破產失業的下層羣衆，他們的利益會與滿清政府聯繫起來？而且在分析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已經指出封建勢力開始就投降帝國主義，而成爲鎮壓國內一切維新運動的工具，爲什麼現在滿清政府又可能和農民手工業者一切勞苦羣衆聯繫起來？這似乎是很矛盾的，而事實上，一點也不矛盾。

義和團雖然豎起“扶清滅洋”的大旗，但事實上，義和團並不是完全和滿清政府一致的，滿清政府的重臣，如李鴻章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等，均反對義和團，不過僅僅西太后欲利用之“滅洋”以洩私憤而已。在義和團一方面，他們爲了要“滅洋”，所以才標榜“扶清”，不是爲了“扶清”，才去“滅洋”。所以嚴格的說起來，義和團與滿清政府並沒有在實質上聯繫起來，“扶清滅洋”的口號，並沒有減少義和團運動的歷史意義。

在另一方面，西太后等利用義和團來“滅洋”，也不是偶然的。自從鴉片戰爭以來，滿清政府的確已經屈服於帝國主義砲艦政策之下，而成爲帝國主義公共玩弄的傀儡，然而有一部分頑固的官僚，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未嘗不痛心疾首，徒以反抗無力，今見義和團以神道勢力相號召，於是頗思利用之以“滅洋”。這是表現中國封建勢力之一部分對於帝國主義壓迫之最後的掙扎。

義和團運動之反帝國主義的作用，固已不用再說。這一偉大

的民衆排外運動，同時對於統治地方的豪紳地主等一切封建勢力，給了一個很大的打擊。他們不僅是殺洋人燒教堂，而且對於平時借教堂勢力以欺凌鄉民的地主豪紳，目爲二毛子而殺之不赦。在有產階級的智識份子看來，這當然是更“野蠻”的舉動，然而義和團之革命意義，也就正在這些地方。

義和團運動雖然很慘酷的失敗了，但是義和團運動使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展開了一個新的局勢：興中會發展到同盟會，反對滿清的民族運動之蓬蓬勃勃的發展，辛亥革命的出現，直接間接，受義和團的影響很深。



## 第十二章

### 成熟的第三階級思想的出現

#### ——梁啓超的貢獻

中國初期的第三階級思想家，主要者有四人：孫逸仙，梁啓超，鄒容，譚嗣同。鄒譚早死，在思想上事業上有重大之貢獻者，唯梁啓超孫逸仙而已。梁孫兩氏，在思想上與事業上，其成就又各有不同。孫逸仙是一個實踐的革命家，所以他的事業上的成就，多於思想，而為梁啓超所不及；梁啓超是一個好學的思想家，雖然他同時也很熱中於政治活動，但他的思想上的成就，遠勝於他的事業，這方面，又為孫逸仙所不及。總之，孫梁兩氏，各有所

長，都是近代史上的偉大的人物（在或種意義上說起來，孫逸仙當然比梁啓超爲更有價值）。

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以後，直至戊戌政變，這五十餘年間，思想界很混亂，沒有誰可以稱得上是思想界的權威。但自從戊戌政變以後，直至五四運動，這二十年間，梁啓超成了中國思想界的權威。雖然在這二十年間，他的事業遠不及孫逸仙之轟轟烈烈，然而他在思想上的成就，實在孫氏之上。梁啓超自從戊戌政變以後，直至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前，他始終站在中國思想的最高地位；這一最高地位，直至五四運動發生，才被陳獨秀奪去。

在這二十年間——特別是自從壬寅（一九〇二年）辦新民叢報起，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這十年間，是梁啓超的黃金時代。在這十年間，梁啓超成了全國青年及進步份子崇拜的偶像。他的最主要的著作“新民說”，成了新時代的聖經；他的“中國魂”，成了每個進步份子與青年必讀的經典。在這十年間，沒有一個智識份子的思想上不受梁啓超的影響，沒有一個進步青年不拜倒在梁啓超的說教之下。我們可以說，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祇有梁啓超與陳獨秀兩個人。陳獨秀是繼梁啓超之後而起的，就時代的意義上說，陳獨秀當然比梁啓超更進了一步——但實際上，陳獨秀也是第三階級的思想家，他與梁啓超的根本立場——即是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擁護，是相同的（關於這點，以後詳說）。但是梁



啓超在思想上掌握霸權的時間，較陳獨秀爲長（陳獨秀在一九二七年以後，即失了作用，他的思想稱霸時間，不過十年）在或種意義上說，所傳播的影響，也是較陳獨秀爲大。梁啓超真可謂是近代中國思想界的天之驕子！

梁啓超的思想，雖然在以後屢經蛻化，然而他是成熟的第三階級思想的代表，這點是無可否認的。可以包括他的全部思想的，當然是他的最主要的著作“新民說”了。

“新民說”是第三階級思想在中國最成熟的最具體的表現。在這個時候（梁啓超的“新民說”發表於一九〇二年），孫逸仙還沒有具體思想著作發表（他的三民主義講演，是五四運動以後才發表的）。鄭容的著作，又失之過簡；譚嗣同的“仁學”又失之過雜。祇有梁啓超的“新民說”，才是成熟的第三階級思想的具體表現。

梁啓超雖然是康有爲的弟子，雖然同是戊戌政變中的中心人物，但梁啓超的思想，與康有爲迥然不同，尤其戊戌政變以後，康與梁是決不能再併在一起說的。

現在我們來將梁啓超的新民說，作一簡短的介紹與批判。梁啓超的新民說，雖與孫逸仙的三民主義，同樣在中國思想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價值，但這兩種重要的著作——新民說與三民主義，在形式上是完全不同的。新民說在數量上雖然很簡短，但牠是一

篇有嚴密的組織，有一貫的理論體系，是一篇學術的著作。但孫逸仙是實踐的政治家，他不能像梁啟超那樣以大部分時間來從事著作，所以三民主義不是一本學術的著作，是一本沒有充分時間的而且還沒有完的講演（但這對於孫逸仙思想上的價值是沒有損害的）。

新民說的綱目如下：

- 第一節 叙論
- 第二節 論新民為今日第一急務
- 第三節 釋新民主義
- 第四節 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其取法之所宜
- 第五節 論公德
- 第六節 論國家思想
- 第七節 論進取冒險
- 第八節 論權利思想
- 第九節 論自由
- 第十節 論自治
- 第十一節 論進步
- 第十二節 論自尊
- 第十三節 論公羣



## 第十四節 論毅力

## 第十五節 論私德

梁啓超在新民說中，開始就說：

“……國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生長久，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新民說第一節）

在這裏說得很明白：新民之說，是欲求國之“安富尊榮”，這出發點和興中會的富國強兵是完全一致的。梁啓超十分明瞭，必須厲行新民之說，而後國家可以達到安富尊榮的目的。要實現新民之說，就要極力仿效已經達到安富尊榮的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的一切文明制度。梁啓超以十二分的熱忱來讚美和羨慕這些先進國家的文明制度，而這種文明制度的第一個特點，就是民治精神：

“……試與一游英美德法之都，觀其人民之自治何如，其人民與政府之關係何如？觀之一省，其治法儼然一國也；觀之一市一村，其治法儼然一國也。乃至觀之一人，其自治之法，亦儼然治一國也。譬諸鹽有鹹性，積鹽爲陵，其鹹

愈醜；然剖分此如陵之鹽爲若干石，石爲若干斗，斗爲若干升，升爲若干顆，顆爲若干阿屯，無一不鹹，然後大鹹乃成。搏沙按粉而欲以求鹹，雖隆之高於秦岱，猶無當也。故英美各國之民，常不待賢君相而足以致治；其元首，則舜堯之垂裳可也，成王之委裘亦可也；其官吏則曹參之醉酒可也，成瑨之坐嘯亦可也。何也？以其有民也。故君相常倚賴國民，國民不倚賴君相。……”(第二節)

梁啓超以爲新民係當務之急，而其立論之根柢有二：一爲關於內治，一爲關於外交；關於內治的根本見解，就是鼓吹民治精神。他在上面盛讚英美法德的民治精神以後，就接着說：

“試以一家譬一國，苟一家之中，子婦弟兄，各有本業，各有技能，忠信篤敬，勤勞進取，家未有不凜然興者。不然者，各委棄其責任，而一望諸敬長，家長而不賢，固閣室爲餓殍；藉令賢也，而能蔭庇我者幾何？卽能蔭庇矣，而爲人子弟，累其父兄，使終歲勤勤，日夕憂勞，微特於心不安，其毋乃終爲家之索耶？今之動輒責政府望賢君相者，抑何不怨，抑何不智？英人有常言曰：‘That's Your Mistake, I could not help you’其意言君誤矣，吾不能助君也。此雖利己主義之鄙言，而實鞭策人自治自助之警句也。故吾雖日望有賢君相，吾尤恐卽有賢君相，亦愛我而莫能助也。何也？責望於賢君相



者深，則自責望者必淺，而此責人不責己，望人不望己之惡習，即中國所以不能維新之大原。我責人，人亦責我；我望人，人亦望我；是四萬萬人遂互消於相責相望之中，而國將誰與立也？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則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自新之謂也，新民之謂也。”（同上）

簡括一句，新民說的關於內治部分，就是鼓勵民治精神，而此所謂民治精神，正是資本主義政治的特徵。

關於外交部分：

“所謂關於外交者何也？自十六世紀以來（約四百年前——括弧內係梁氏原註，下同）歐洲所以發達，世界所以進步，皆由民族主義(Nationalism)所磅礴衝激而成，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禦他族是也。此主義既極，馴至十九世紀之末（近二三十年），乃更進而為民族帝國主義(National Imperialism)。民族帝國主義者何？其國民之實力，充於內而不得不溢於外，於是汲汲焉求擴張權力於他地，以我為尾閭，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務，或以工業，或以教會，而用一政策以指揮調護之是也。近者如俄國之經略西伯利亞之土耳其，德國之經略小亞細亞阿非利

加，英國之用兵於波亞，美國之縣夏威夷古巴攘菲律賓，皆此新主義之潮流迫之不得不然也。而今也於東方大陸，有最大之國，最狹之壤，最腐敗之政府，最散弱之國民，彼族一旦窺破內情，於是移其所謂民族帝國主義者，如羣蟻之附羶，如萬矢之向的，雜然而集注於此一隅，彼俄人之於滿洲，德人之於山東，英人之於揚子江流域，法人之於兩廣，日人之於福建，亦皆此新主義之潮流迫之不得不然也。夫所謂民族帝國主義者，與古代之帝國主義迥異。昔者有若亞歷山大，有若查理曼，有若成吉思汗，有若拿破崙，皆嘗抱雄圖，務遠略，欲蹂躪大地，吞併弱亡。雖然，彼則由於一人之雄心，此則由於民族之凝聚力；彼則為權威之所役，此則為時勢之所趨。故彼之侵略，不過一時，所謂暴風疾雨，不崇朝而息矣；此之進取，則在久遠，日擴而日大，日入而日深。吾中國不幸而適當此盤渦之中心點，其將何以待之？曰彼為一二人之功名心而來者，吾可以恃一二英雄以相敵；彼以民族不得已之勢而來者，非合吾族全體之能力，必無從抵制也。彼以一時之氣焰驟進者，吾可以鼓一時之血勇以相防；彼以久遠之政策漸進者，非立百年宏毅之遠慮，必無從倖存也。不見乎瓶水乎？水僅半器，他水即從而入之，苟內力能自充塞本器，而無一隙之可乘，他水未有能入者也，故今日欲抵當列強之



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而欲實行民族主義於中國，舍新民末由。”(同上)

梁氏在此處之所謂民族主義，實際就是資本主義；所謂民族帝國主義，實際上就是資本帝國主義；梁氏之所謂人以民族主義侵我，我以民族主義抗之，這就是很露骨的說，人以資本主義侵我，我以資本主義抗之。而欲實現資本主義，“舍新民末由”，這又是露骨的表示新民說就是資本主義說。梁—新民說的根源，即基乎此！

在這樣一個出發點之下，梁氏在新民說中，對於資本主義之新道德觀念，多所闡發，而於封建的舊道德觀念，則力加抨擊，第五節論公德，尤為顯明。

“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羣之所以為羣，國家之所以為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羣之動物也(此西儒亞里士多德之言)，人而不羣，禽獸奚擇？而非徒空言高論曰羣之羣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貫注而聯絡之，然後羣之實乃舉，若此者，謂之公德。”(第五節)

所謂公德，原是資本主義道德之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標準。統治階級就是在公德的美名之下，掠奪被統治階級，騙被統治階級來為他們服役。所以梁氏對於所謂公德一說，解着特為詳

細。

“道德之本體，一而已；但其發表於外，則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則者，謂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無私德則不能立，合無量數卑污虛偽殘忍愚懦之人，無以為國也。無公德則不能團，雖有無量數束身自好廉謹良愿之人，仍無以為國也。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不謂早；雖然，偏於私德，而公德殆闕。如試觀論語孟子諸書，吾國民之本鐸，而道德所自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如皋陶謨之九德，洪範之三德，論語所謂溫良恭儉讓，所謂克己復禮，所謂忠信篤敬，所謂寡尤寡悔，所謂剛毅木訥，所謂知命知言；大學所謂知止慎獨，戒欺平慊；中庸所謂好學力行知恥，所謂戒慎恐懼，所謂致曲；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所謂反身強恕。凡此之類，關於私德者，發揮幾無餘蘊，於養成私人（私人者對於公人而言謂一個人不與他人交涉也）之資格，庶乎備矣。雖然，僅有私人之資格，遂足為完全之人格乎？是固不能。今試以中國舊倫理，與泰西新倫理比較，舊倫理之分類，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新倫理之分類，曰家族倫理，曰社會（即人羣）倫理，曰國家倫理。舊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私人之事也（一私人之獨善其身，



固屬於私德之範圍，即一私人與他私人交涉之道德，仍屬於私德之範圍也；此可以法律上公法私法範圍以證明之）；新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團體之事也（以新倫理之分類歸納舊倫理，則關於家族倫理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關係社會倫理者一：朋友也；關於國家倫理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倫，決不足以盡社會倫理；君臣一倫，尤不足以盡國家倫理。何也？凡人對於社會之義務，決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絕迹不與人交者，仍於社會上有不可不盡之責任。至國家者，尤非君臣所能專有。若僅言君臣之義，則使以禮事以忠，全屬兩個私人感恩効力之事耳，於大禮無關也；將所謂逸民不事王侯者，豈不在此倫理範圍之外乎？夫人必備此三倫理之義務，然後人格乃成。若中國之五倫，則唯於家族倫理稍為完整，至社會倫理與國家倫理不備滋此，缺多憾之，必當補者也。皆由重私德輕公德所生之結果也）。夫一私人之所以自處，與一私人之對於他私人，其間必貴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雖然，此道德之一部份，而非其全體也。全體者，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私德公德，本並行不悖者也，然提倡之者既有所偏，其末流遂至於相妨，若微生畝譏孔子以為佞，公孫丑疑孟子以好辨，此外道淺學之徒，其不知公德，不待言矣；而大聖遠哲，亦往往不免。吾今固不欲摭拾古人片

言隻語有爲而發者，摘之以相詬病，要之吾中國數千年來，束身寡過主義，實爲德育之中心點，範圍既日縮日小，其間有言論行事，出此範圍外，欲本羣本國之公利公益，有所盡力者，彼曲士賤儒，動輒援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等偏義之以非笑之，擠排之，謬種流傳，習非勝是，而國民益不復知公德爲何物。今夫人之生息於一羣也，安享其本羣之權利，卽有常盡於其本羣之義務，苟不爾者，則直爲羣之蠹而已。彼持束身寡過主義者，以爲吾雖無益於羣，亦無害於羣，庸知無益之卽爲害乎？何則？羣有以益我，而我無以益羣，是我逋羣之負而不償也。夫一私人與他私人交，而逋其所應償之負，於私德必爲罪矣，謂其害之將及於他人也。而逋羣負者，乃反得冒善人之名何也？使一羣之人，皆相率而逋焉，彼一羣之血本，能有幾何？而此無窮之債客，日夜蠶蝕之而瓜分之，有消耗，無增補，何可長也？然則其羣必爲逋負者所拽倒，與私人受累者同一結果，此勢理之所必然矣。今吾中國所以日就衰落者，豈有他哉，束身寡過之善人太多，享權利而不盡義務，人人視其所負於羣者如無有焉；人雖多，曾不能爲羣之利，而反爲羣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同上）

我引證了這麼沉長的一段，這是很重要的。如前所述，所謂公德，是資本主義道德之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標準；而在封建社



會，祇有私德而沒有公德——因為在封建社會，是封建諸侯個人的統治，被統治者在者只要忠於他個人，就是完人君子，如果要講公德，在許多地方，就會與統治者的利益發生衝突。所以在封建時代，祇要束身寡過，就是完人。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切的社會關係，比封建的時代更廣泛更複雜得多，束身寡過主義，已不能在這一時代立足，而統治階級為要激發廣大羣衆來擁護這一統治，於是就以公德來作為新的道德標準，使被統治者在公德的美名之下，來參加生產，來參加擁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工作。梁啓超既是第三階級的思想家，自然他要大聲疾呼的提倡公德了。而封建時代的束身寡過主義，又是公德的障礙，所以梁啓超對於過去一切以束身寡過主義為出發點的舊道德標準，要加以抨擊了，他很勇敢的說：

“……道德之外形，則隨其羣之進步以為比例差。羣之文野不同，則其所以利益者不同，而其所以為道德者，亦是不同。德也者，非一成而不變者也（吾此言頗駭俗，但所言者，德之條理，非德之本原也。其本原固宜萬古而無變者也，讀者幸弗誤會。本原惟何？亦曰利羣而已。），非數千年前之古人所能立一定格式，以範圍天下後世者也（私德之條目變遷較少，公德之條目，變遷太多。）。然則吾輩生於此羣，生於此羣之今日，宜縱觀宇內之大勢，靜察吾族之所宜，而發明

一種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羣善吾羣進吾羣之道，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者，遂以自畫而不敢進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而新民出焉矣（今世士大夫談維新者，諸事皆可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此因學界之奴性未去，愛羣愛國愛真理之心未誠也。蓋以爲道德者，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自原始以來，不增不減，先昔聖賢，盡揭其奧以詒後人，安有所謂新焉舊焉者。殊不知道德之爲物，由於天然者半，由於人事者亦半。有發達，有進步，一循天演之大例，前哲不生於今日，安能制定悉合今日之道德？使孔孟復起，其不能不有所損益也亦明矣。今日正常爲過渡時代，青黃不接，前哲深微之義，或湮沒而未彰，而流俗相傳，簡單之道德，勢不足以範圍今後之人心，且將有厭其陳腐而一切吐棄之者，吐棄陳腐，猶可言也，若並道德而吐棄，則橫流之禍，曷其有極，今此禍已見端矣，老師宿儒，或憂之劬劬焉，欲持宋元之餘論，以遏其流，豈知優勝劣敗，固無可逃，捧杯土以塞孟津，沃杯水以救薪火，雖竭吾才，豈有當焉。苟不及今急急斟酌古今中外發明之一種新道德者而提倡之，吾恐今後智育愈勝，則德愈衰，泰西物質文明，盡輸入中國，而四萬萬人且相率而爲禽獸也。嗚呼！道德革命之論，吾知不爲舉國之所詬病，願吾特恨吾才之不逮耳。若夫與一世之流俗人挑戰決鬥，吾所



不辭，世有以熱誠之心，愛羣愛國愛真理者乎？吾願爲之執鞭以研究此問題也……”（同上）

梁啓超對於所謂道德革命，鼓吹甚力，新民說之全副精神，即在鼓吹此種資本主義的新道德，首先糾正過去‘忠’字之誤用。在“論國家思想”（第六節）一節中說：

“……中國相傳天經地義，曰忠曰孝尚矣。雖然，言忠國則其義完，言忠君則其義偏。何也？忠孝二德，人格最要之件也，二者缺一，時曰非人。使忠而僅以施諸君也，則天下之爲君主者，豈不絕其盡忠之路，生而抱不具人格之缺憾耶？則如今日美法等國之民，無君可忠者，豈不永見摒於此德之外，而不復得列於人類耶？顧吾見夫爲君主者，與爲民主國之國民者，其應盡之忠德，更有甚焉者也。人非父母無自生，非國家無自存，孝於親，忠於國，皆報恩之大義，而非爲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冒也，而吾中國人以忠之一字，爲主僕交涉之專名，何其傾也（君主當忠，更甚於民，何也？民之忠也，僅在報國之一義務耳；君之忠也，又兼有不負付託之義務，安在其忠德之可以已耶？夫孝者，子所對於父母之責任也，然爲人父者，何嘗可以缺孝德？父不可不孝，而君顧可以不忠乎？僅言忠君者，吾見其不能自完其說也。）。”（第六節）

此種論調，在今日視之，固已陳腐不堪，而在三十年前，數千

年專制淫威之下，忠君思想爲天經地義，而梁氏能倡此議，其一種勇敢邁進之氣概，殊足欽佩！

一個階級在新出現於歷史舞台的時候，總是極有朝氣，極爲奮勇，富有冒險進取的精神，因爲非如此，不足以推翻舊有之統治階級而取以代之。在當時（梁啓超發表新民說的時候），雖然先進國家的第三階級已走向沒落的道路，而在中國，新出現的第三階級，還是上山的而不是下山的，是新生的而不是死亡的，所以這種朝氣，當然也是應該有的，梁啓超在那時，那種進取冒險的勇氣，卽是證明這個階級的前進的傾向，梁氏在“論進取冒險”（第七節）一節裏說：

“危乎微哉，吾中國人無進取冒險之性質，自昔已然，而今且每况愈下也。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曰知自守墨，知雄守雌，曰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此老氏之闢言，不待論矣，而所稱誦法孔子者，又往往遺其大體，摭其偏言，取其‘獵’主義，而棄‘狂’主義；取其‘勿’主義，而棄其‘爲’主義（勿主義者，懲忿窒欲之學也，如非禮勿視四句等義是；爲主義者，開物成務之學也，如天下有道，莫不與易等義是。）；取其‘坤’主義，而棄其‘乾’主義（地道妻道臣道，此坤主義也；自強不息者，此乾主義也。）；取其‘命’主義，而棄其‘力’主義（列子有力命篇，論語稱子罕言命，又稱



子不語力，其實力命兩者，皆孔子所常言，知命之訓，力行之教，昭昭然矣。);其所稱道者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也；曰無多言，多言多患；無多事，多事多敗也；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也；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也；夫此諸義，亦何嘗非孔門所傳述，然言非一端，義各有當，孔子曷嘗以此義盡律天下哉？而末俗承流，取便利己。遂蒙老馬以孔皮，易尼部以聃莒，於是進取冒險之精神，蕩滅以盡，試觀一部十七史之列傳，求所謂如哥倫布立溫斯倫者有諸乎？曰無有也；求所謂如馬丁路得林肯者有諸乎？曰無有也；求所謂如克林威爾華盛頓者有諸乎？曰無有也。藉有一二，則將爲一世之所戮辱而非笑者也，不曰好大喜功，則曰忘身及親也。積之數千年，浸之億萬輩，而弱者復陽芟之而陰鋤之，務使一國之人，鬼脈陰陰，病質奄奄，女性纖纖，暮色沈沈；一國之大，有女德而無男德，有病者而無健者，有暮氣而無朝氣，甚者乃至有鬼道而無人道，恫哉恫哉！吾不知國之何以立也？君夢如何，我憂孔多，撫弦慷慨，爲少年進步之歌曰：

Never look behind, boys,

When you're on the way;

Time enough for that boys,

On some future day.

Though the way be long boys,

Face it with a will;

Never stop to lo k behind,

When climbing up a hil.

First be sure you're right, boys,

Then with coorage stro g;

Strap your pack upon your back,

And tsamp tramp along.

When youre near the top, boys,

Of the rugged way;

Do not think your work is done,

I ut climb climb away.

Success is at the top boys,

Waiting there until;

Patient plodding plucky boyr,



Have mounted up the hill,

權利思想，是第三階級意識中心之一，梁氏對於這點，也極爲重視，“論權利思想”（第八節）一節，對於權利思想，本第三階級的立場，發揮盡致，如下列各段：

“……大抵人生之有權利思想，天賦之良知良能也，而其或強或弱，或隱伏或漸亡，至不齊者何也？則常緣其國家之歷史，政治之浸潤以爲差，孟子牛山之喻，先我言之矣。非無萌蘖，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歷觀東西古今亡國之史乘，其始非無一二抵抗暴制以求自由者，一鋤之，再鋤之，三四鋤之，漸衰頹，漸銷鑠，久之而猛烈沈醜之權利思想，愈制而愈馴，愈冲而愈淡，乃至回復之絕望，而受羈受軌，以爲固然，積之數十年數百年，每况愈下，而常至漸亡。此固由其人民能力之薄弱，而政府之罪，又烏可逭也。夫此等政府，豈嘗有一人焉，能嗣續其命脈，以存於今日者；卽有一二，亦不過風燭殘年，旦夕待死而已。政府以此道殺人，毋乃適爲自殺之利刃，政府之自由，已作之而已受了，其又奚尤？顧所最痛者，其禍乃延及於國家全體而不能救也。國民者，一私人之所結集也；國權者，一私人權利所團成也，故欲求國民之思想之感覺之行爲，舍其分子之各私人之思想，感覺行爲而終不可得見，其民強者謂之強國，其民弱者

謂之弱國，其民富者謂之富國，其民貧者謂之貧國，其民有權者謂之有權國，其民無恥者謂之無恥國。夫至以無恥國三字成一名詞，而猶欲其國之立於天地，有是理耶？有是理耶？其能受閹宦差役之焚索一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國之割一省而亦安之者也；其能此奴顏婢膝，昏暮乞憐於權貴之門者，必其能懸順民之旂，箠食壺漿以迎他族之師者也。譬之器然，其完固者，無論何物，不大滲也；苟有穴焉，有罅焉，我能滲之，他人亦能滲之。夫安知乎虐政所從入之門，乃外寇所從入之門也。挑隣婦而利其從我，及爲我婦，則欲其爲我嘗人，安可得也。平昔之待其民也，鞭之撻之，敲之削之，戮之辱之，積千數百年霸者之餘威，以震蕩摧鋤之，天下廉恥既殄既爛既夷，一旦敵國之鱣鱓厲集於海疆，寇仇之貔貅追臨於城下，而後欲藉人民之力以捍衛，是而網維。是何異不胎而求子，蒸沙而求飯也。嗟夫嗟夫，前事之覆者不知幾何矣，而獨不解丁茲陽九者，曾一自審焉否也？

“重爲言曰：國家譬猶樹也，權利思想，猶樹根也，其根既撥，雖復幹植崔嵬，華葉蓊鬱，而必歸於槁亡，遇疾風橫雨，則摧落更速焉。卽不爾，而旱暵之所暴炙，其萎黃彫敝，亦須時耳。國民無權利思想者，以之當外患，則槁木遇風雨之類也，卽外患不來，亦遇旱暵之類。吾見夫全地球千五百



兆生靈中，除印度非洲南洋之黑蠻外，其權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國人若者也；孟子有言，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若取羅馬法之理，而以論理解釋之，則豈惟近焉而已。一國之大，而僅有四萬萬禽獸居焉，天下之可恥，孰過是也。我同胞其恥之乎？為政治家者，以勿摧壓權利思想為第一義；為教育家者，以養成權利思想為第一義；為私人者，無論士焉農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自堅持權利思想為第一義。國民不能得權利於政府也，則爭之；政府見國民之爭權利也，則讓之。欲使吾國之國權與國權平等，必先使吾中國人人固有權皆平等，必先使吾國民在我國所享之權利，與他國民在彼國所享之權利相平等，若是者，國庶有瘳，若是者國庶有瘳。”

“自由，自由，不自由毋寧死”，這是第三階級最得意的標語；這種資本主義的自由，當然也就是梁啟超的中心思想之一。梁啟超把近世的自由，分作六端：

“……(一)四民平等問題：凡一國之中，無論何人，不許有特權(與別之權利與齊民異者)，是平民對於貴族所爭得之自由也；(二)參政權問題：凡生息於一國中者，苟及歲而即有公民之資格，可以參與一國政事，是國民全體對於政府所爭得之自由也；(三)屬地自治問題：凡人民自殖於他土者，得任意自建政府，與其在本國時所享之權利相等，是殖

民地對於母國所爭得之自由也；(四)信仰問題：人民欲信何教，悉由自擇，政府不得以國教束縛干涉之，是教徒對於教會所爭得之自由也；(五)民族建國問題：一國之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許他國及他族握其主權，並不許干涉其毫末之內治，侵奪其尺寸之土地，是本國人對於外國所爭得之自由也；(六)工羣問題(日本謂之勞動問題或社會問題)：凡勞力者自食其力，地主與資本家不得以奴隸蓄之，是貧民對於素封所爭得之自由也。……”(第九節論自由)

以上這六項自由，是資本主義下的自由，也是梁啟超所熱望實現的自由。但是這些自由，僅僅是有利於第三階級，對於第三階級以外的人是沒有絲毫價值的，例如第一項關於四民平等的問題，在第三階級革命以前，深受貴族僧侶等特權階級的壓迫，不能與特權階級平等，所以第三階級才要革命。第三階級廢除了形式上的等級，實現了形式上的平等——在形式上，第四階級與第三階級是平等的，但事實上，第三階級因為有錢，不僅過着窮極奢侈的生活，而且掌握了國家的統治權，第四階級生活於飢寒交迫之中，與第三階級實有天淵之別。關於第二項參政問題：第三階級推翻貴族的專制，實現了表面上的所謂平等的民主政治，但事實上，民主政治成了第三階級專政的代名詞，因為近代民主政治的代議制度，是以財產為標準以管理政權的制度，所以第三階



級之掌握政權是不待解釋的，第四階級在飢寒交迫的情形之下，謀生尚且不遑，更何能參與政權？所以事實上，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第三階級就是最高的統治者，所謂平等與民主，都是從前用來與貴族鬥爭，現在用來欺騙被壓迫者的鬼話。至於第三第五各項，即關於所謂屬地自治，民族建國等等，都是是第三階級的偏見，因為也祇有第三階級，才能過問國家及民族問題，第四階級對於這些問題，根本是被除外的，在第四階級本身，謀生之不遑，也決不來管些事情。至於第四項所謂信仰的自由，更是騙鬼！一切宗教都是統治階級麻醉被統治階級的鴉片煙，當然的，統治階級唯恐被統治階級不信仰宗教，當然要給他們極大的信教自由；然而除了這些鴉片煙宗教以外，人民是否有真正的信仰自由？當然是沒有的；凡對於統治階級不利的思想，都在被嚴禁之列，關於這點，也是不待解釋的。至於第六項所謂貧民對於地主資本家所爭得的自由，更是滑稽！誠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奴隸制度在名義上是被廢除了，人類在形式上是平等了。但是實質上呢？一無所有的第四階級，除了出賣其勞動力於第三階級，為第三階級的實質上的奴隸以外，是不能生存的，不錯，第三階級給了第四階級以自由，那就是飢餓的自由，滾蛋的自由！第三階級很慷慨的對第四階級說：“很好，你就在我工廠裏做工吧，但你是自由的，我沒有剝削你的自由，你不願在這裏做工嗎？很好，你滾你的

蛋，我決不強迫你做！”在這情形之下，第四階級是得了自由，但除了飢餓與滾蛋以外，還有什麼？這些所謂自由，所謂平等，所謂博愛，不是很明顯的騙人的鬼話嗎？但第三階級需要這些——在以前，第三階級需要這些口號來激發羣衆去推翻貴族特權階級，以圖自己取得統治者的地位；在現在，第三階級要以這些口號去欺騙被統治的廣大羣衆，以維持其統治地位。因為如此，梁啓超也是熱烈地需要這些所謂“自由”的，所以他得意忘形地說：

“……凡此諸端，皆泰西四百年來改革進步之大端，而其所欲者，亦十之八九矣。噫嘻！是遵何道哉？皆“不自由毋寧死”之一語聳動之，鼓舞之，出諸壤而升諸霄，生其死而肉其骨也。於戲璀璨哉自由之花！於戲莊嚴哉自由之神！”（同上）

當然，這些騙人的鬼話，在現在看來，是沒有絲毫的價值的，然而在當時無疑是代表進步的思想，對於封建的舊思想是一種有力的襲擊。梁氏更進而申論弗爲心中之奴隸，其類有四：一勿爲古人之奴隸；二勿爲世界之奴隸；三勿爲境遇之奴隸；四勿爲情慾之奴隸。這固然是些第三階級的濫調，然而在當時，無疑是一種極進步的有革命意義的見解，尤其是關於第一種，所謂勿爲古人之奴隸，梁氏曾作如下的說明：

“……古聖賢也，古豪傑也，皆嘗有大功偉於一羣，我人



愛而敬之宜也。雖然，古人自古人，我自我，彼古人之所以能爲聖賢爲豪傑者，豈不以其能自有乎哉？使不爾，則有先聖而後無聖，有一傑而無再傑矣。譬諸孔子，誦法堯舜，我輩誦法孔子，曾亦思孔子所以能爲孔子，彼蓋有立於堯舜之外者也。使孔子而爲堯舜之奴隸，則百世後，必無復有孔子者存也。聞者駭吾言乎？盍思乎世運者進而愈上，人智者游而愈瑩，雖有大哲，亦不過說法以匡一時之弊，規當世之利，而決不足以範圍千百萬年以後之人也。秦西之有景教也，其在中古，曷嘗不爲一世文明之中心點，逮夫末流，束縛馳驟，不勝其敝矣，非有路得，倍根，笛卡兒，康德，達而文，彌勒，赫胥黎諸賢，起而附益之，匡救之，夫彼中安得有今日也。中國不然，於古人之言論行事，非惟辨難之辭，不敢出於口，抑且懷疑之念，亦不敢萌於心。夫心固我有也，聽一言，受一義，而曰我思之，我思之，若者我信之，若者我疑之，夫豈有刑戮之在其後也；然而舉世之人，莫敢出此。吾無以譬之，譬之義和團。義和團法師之披髮仗劍，踽步念念有詞也，聽者苟一用其思索焉，則其中必有可疑者存，而信之者竟徧數省，其必有所懼焉而不敢涉他想者矣；否則有所假焉，自欺欺人，以逞其狐威者矣，要之爲奴隸於義和團者一也，吾爲此譬，非敢以古人比義和團也，要之四書六經之義理，其非一一可以

適於今日之用，則雖臨我以刀鋸鼎鑊，吾猶敢斷言而不憚也。而世之委身以嫁古人，爲之荐枕而奉箕帚者，吾不知其與彼義和團之信徒，果何擇也。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思我窮；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其於古人也，吾時而師之，時而友之，時而敵之，無容心焉？以公理爲衡而已，自由何如也。”(同上)

在這裏，梁啓超的懷疑精神，也就是表現了新興的上山的第三階級的進取冒險精神。

在“論自治”(第十節)一節中，他說：

“……今吾中國四萬萬人，皆無法律之人也。羣四萬萬無法律之人，而能立國，吾未之前聞。然則豈待與西人相遇於硝雲彈雨之中，而後知其勝敗之數也。”

“……西人言政者，謂莫要於國內小國。國內小國者，一省一府，一州一縣，一鄉一市，一公司，一學校，莫不儼然具有一國之形。省府州縣鄉市公司學校者，不過國家之縮圖，而國家者，不過省府州縣鄉市公司學校之放大影片也。故於其小焉者能自治，則其大焉者舉而措之矣；不然者，則不得不仰治於人。仰治於人，則人之撫我也聽之，人之虐我也亦聽之；同族之豪強者據而專也聽之，異族之橫暴者維而奪也亦聽之。如是，則人之所以爲人之具，其塗地矣。抑彼西人之



所以得此者何也，曰有制裁，有秩序，有法律，以爲自治之精神也。真能自治者，他人欲干涉焉而不可得；不能自治者，他人欲無干涉焉而亦不可得也，此其事固有不容絲毫假借者。我國人仰治於人，數千年來，幾以此爲天賦之義務，而莫敢萌他想，曾亦思本身之樂利，豈旁觀者所能代謀，而當今之時局，又豈散漫者可以收拾也。”

在這些地方，都表現了第三階級上山的態度。

中國之無進步，是很顯然的。梁氏深知這一點，他在“論進步”（一名論中國羣治不進之原因）一節中說：

“泰西某說部，載有西人初航中國者，聞羅盤針之術之傳自中國也，又聞中國二千年前卽有之也，默付此物入泰西，不過數世紀，而改良如彼其屢，效用如彼其廣，則夫母國數千年之所增長，更當何若。登岸後，不遑他事，先入市購一具，乃問其所謂最新式者，則與歷史讀本中所載，十二世紀時阿刺伯人傳來之羅盤圖，無累黍之異，乃廢然而返云。此雖諷刺之寓言，實則描寫中國羣治濡滯之狀，談言微中矣。吾昔讀黃公度日本國志好之，以爲據此可以盡知東瀛新國之情狀矣；入都見日使矢野龍谿，偶論及之，龍谿曰：是無異據明史以言今日中國之時局也。余佛然，叩其說。龍谿曰：黃書成於明治十四年，我國自維新以來，每十年間之進步，雖

前此百年不如也，然則二十年前之書，非明史之類而何。吾當時猶疑其言，東游以來，證以所見良信。斯密亞丹原富，稱元代時，有意大利人瑪可波羅游支那，歸而著書述其國情，以較今人游記殆無少異。吾以為豈惟瑪氏之作，即史記漢書，二千年舊籍，其所記載，與今日相去能幾何哉。夫同在東亞之地，同為黃族之民，而何以一進一不進霄壤若此。”（第十一節）

如何而能進步？梁氏很勇敢地指出其不可逃避之公例，即破壞：

“夫天然之障，非人力所能為也，而世界風潮之所簸蕩所衝激，已能使吾國一變其數千年來之舊狀 進步乎？進步乎？當在今日矣！雖然，所變者，外界也，非內界也；內界不變，雖曰烘動之，鞭策之於外，其進無由。天下事無無果之因，亦無無因之果，我輩積數千之惡因，以受惡果於今日，有志世道者，其勿遽責後此之果，而先改良今日之因而已。新民子曰：吾不欲復作門面語，吾請以古今萬國求進步者，獨一無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正告我國民，其例維何，曰破壞而已！不祥哉破壞之事也，不仁哉破壞之言也，古今萬國之仁人志士，苟非有所萬不得已，豈其好為倣詭涼薄，憤世嫉俗，快一時之意氣，以事此事，而言此言哉。蓋當夫破壞之運之



相迫也，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破壞既終不可避，早一日則受一日之福，遲一日則重一日之害，早破壞者，其所破壞可以較少，而所保全者自多；遲破壞者，其所破壞不得不益甚，而所保全者彌寡，用人力以破壞者，爲有意識之破壞，則隨破壞隨建設，一度破壞，而可永絕第二次破壞之根，故將來之樂利，可以償目前之苦痛而有餘；聽自然而破壞者，爲無意識之破壞，則有破壞無建設，一度破壞之不已而至於再，再度不已而至於三，如是者可以歷數百年千年而國與民交受其病，至於魚爛而自亡。嗚呼！痛矣哉破壞！嗚呼！難矣哉不破壞！”（同上）

但是必須有破壞，才能有進步，梁氏以爲英法德美日本各國，能有今日之進步者，皆由破壞而來，所以他在結論中，要大聲疾呼的說：

“嗚呼！快意者破壞！嗚呼！仁矣哉破壞！”

梁氏在此詳述中國非經破壞不足以求進步之理，這當然是正確的進步的觀點，但梁啓超正和其他的第三階級一樣，犯了一個很嚴重而也是很自然的錯誤，就是在熱情地讚美資本主義制度之餘，祇看到了這制度的優點，而看不見他的缺點，而且把他看做是“與天地同長久”的永恆不變的制度，所以他說：

“……故擾亂之種子不除，則蟬聯往復之破壞終不可得

免，而此諸國者（其華按：係指英法德美各國），實以人力之一度大破壞，取此種子芟蕪崇之，絕其根本，而勿使能殖也。故夫諸國者，自今以往，苟其有金革流血之事，則亦惟以國權之故，構兵於域外，容或有之耳；若夫國內相閱，糜爛鼎沸之慘劇，吾敢決其永絕，而與天地同長久也。……”（同上）

如上所述，則梁氏對於這些國家內必不可避免地發生第四階級的革命。糜爛鼎沸這一事實，是完全忽視。這正如布哈林所說，第三階級都是戴着馬眼罩的，他們祇看到自己的鼻尖，看不到自己鼻尖以外的任何事物，梁啟超當然是不能例外的。

對於舊統治階級的不滿與攻擊，表現出一種蓬蓬勃勃的朝氣的，這是每一個新起階級必有的現象，梁啟超所代表的第三階級，在當時是新起的上山的，所以在梁氏的初期著作中，充滿了生氣，例如他論自尊（第十二節）一節，言前人所不敢言，所不能言者：

“悲哉！吾中國人無自尊性質也。簪纓何物，以一鈎金塞其帽頂，則脚靴手版，磕頭請安，戢戢然矣。阿堵何物，以一貫銅晃其腰纏，則色肆指動，圍繞奔走，喁喁然矣。夫沐冠而喜者，戲猴之態也；投骨而嚙者，畜犬之情也。人之所以爲人者，其資格安在耶？顧乃自儕於猴犬，而恬不爲怪也。故夫自尊與不自尊，實天民奴隸之絕大關頭也。



“且吾見夫今世所謂識時俊傑者矣，天下之危急，彼非無所聞也；國民之義務，彼非無所知也，顧口中有萬言之沸騰，肩上無半銖之負荷。叩其故，則曰天下大矣，賢智多矣，某自顧何人，其敢語於此？推彼輩之意，以爲一國四百兆人，其三百九十九兆九億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其德慧術知，無一不優於我，其聰明才力，無一不強於我，我之一人，豈足輕重云耳。率斯道也以往，其必四百兆人，人人皆除出自己，而以國事望諸其餘之三百九十九兆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統計而互消之，則是四百兆人，卒至實無一人也。夫一二人之自賊自暴自棄，而不自尊，宜若與天下大局無與焉矣，然窮其弊，乃至若此。不啻惟是，爲國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資格，則斷未有能自尊其一國之資格焉者也，一國不自尊，而國未有能立焉者也。吾聞英國人自尊之言曰：太陽曾無不照我英國國旂之時（英人屬地偏於五大洲，此地日方沒，彼地日已出，故曰太陽常照英國旂也。）；曰：無論何地，凡我英人，有一個足跣踏於其土者，則與土必爲吾英之勢力範圍也。吾聞俄國人自尊之言曰：俄羅斯者，東羅馬之相續人也（相續者繼襲之義）；曰：我俄人必成先帝彼得之志，爲東方之主人翁也。吾聞法國人自尊之言曰：法蘭西者，歐洲文明之中心點也，全世界進步之原動力者。吾聞德國人自尊

之言曰：自由主義者，日耳曼森林中之產物也，日耳曼人者，條頓民族之子，歐洲中原之主帥也。吾聞美國人自尊之言曰：舊世界者，腐敗陳積之世界也，其有清新和淑之氣者，惟我新世界（舊世界指東半球，新世界指西半球）；今日之天下，由政治界之爭競，而移於生計界之爭競，他日戰勝於生計界者，舍我美人莫屬也。吾聞日本人自尊之言曰：日本者，東方之英國也，萬世一系，天下無雙也，亞洲之先進國也，東西兩文明之總匯流也。其餘各國，苟其能保一國之名譽於世界上者，則皆莫不各有所以自尊之具，苟不爾者，則其國必萎縮而無以自存也，其遠焉者，吾不能徧舉，請徵諸其近者：吾嘗見印度人，輒曰：英國之政治，高美完滿，盛德巍巍，勝於吾印往昔遠甚。乃至英人之一顰一笑一飲一啄，皆視為加己數十等也。吾嘗見朝鮮人輒曰：吾韓今日更無可望，惟望日本及世界文明各大國，扶而掖之也。淺見者，徒見夫英俄德法美日之強盛也如彼，而以為其所以敢於自尊者有由；徒見夫印度朝鮮之積弱也如此，而以為其所以自貶者，出於不得已。此誤果為因，誤因為果之言也。而烏知夫自尊者，即彼六國致強之原，而自貶者，此乃二國取滅之道也。嗚呼！吾觀於此，而不能不重為中國恫矣！時昔尚有一二侈然自大之客氣，乃挫敗不數度，至今日而消磨盡矣；聞他人之議瓜分我



也，則噉然以啼；聞他人之議保全我也，則嘖然以笑。君相官吏，伺外國人之顏色，先意承志，如孝子之事父母；士農工商，仰外國人之鼻息，趨承奔走，如遊妓之媚情人。政府之意曰：中國不足恃矣，吾但求結納一大邦爲奧援，爲附庸下邑之陪臣，以保富貴終餘年焉。民間之意曰：中國無可爲矣，吾但求託庇一強國之宇下，爲食毛踐土之蟻民，以逃喪亂長子孫焉。卽號稱有志之士者，亦曰今日之中國，非可以自力自救，庶幾有仁義和親之國，恤我憐我扶助我乎？嗟乎恫哉！我國家今日之資格，其如斯而已乎？我國家將來之前途，竟如斯而已乎？嗟乎恫哉！曠昔侈然自大之客氣，自居上國者，而藐人爲夷狄，先覺之士，竊竊然憂之，以爲排外之謬想，不徒傷外交，而更阻文明輸入之途云耳，夫孰知數十年來，得延一線之殘喘者，尙賴有此若明若昧，無規則無識意之排外自尊思想以維持之，并此而斲傷焉，而立國之具，乃其絕矣。夫孰知夫以真守舊誤國，而國尙有可爲；以僞維新誤國，而乃無可救也。孟子曰：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誰謂爲之而至於此！”（第十二篇）

當時的舊統治階級，已爲帝國主義所屈服，誠如梁氏文中所謂，但若干年後，第三階級何嘗亦非如此？不過在梁啓超著新民說的時候。第三階級剛才出現，才有此等朝氣耳。

新民說的內容，概如上述，總括一句，這是表現了新舊的第三階級一種蓬蓬勃勃的前進的朝氣。梁啓超之所以成爲近代中國文化史上的功臣，成爲一般智識青年崇拜的偶像，並不單是在乎他的天才，而是他所代表的階級的一種新興的朝氣。但是這種向前的朝氣，期間是極短的。梁氏發表這些前進的文章。大部分的時間是在一九〇二——〇四年之間，在一九〇四年以後，梁氏的著作，已無此種朝氣，這就是列寧所謂階級的風氣。在最初，這階級是上山的，而不是下山的，但是第三階級在中國根本就不能發展，所以梁啓超最初雖發表了極有朝氣的文章，但是立刻就輟了下去。他在新民叢報時代所攻擊舊統治的，後來自己也犯了這種錯誤，這都是“階級的風氣”！但無論如何，梁啓超在新民叢報的努力，已經爲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一個不可消磨的偉迹，雖然他隨着階級的轉變，很快的墮落下去，但是他在思想界的影響，一直繼續到五四運動之前，陳獨秀起來以後，才代替了他們的思想權威的地位。



## 第十三章

### 民族運動的展開——同盟會的成立

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運動，是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的農村經濟破產所引起的原始的反帝國主義的暴動，雖然客觀的條件決定了牠的失敗的運命，然而當每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失敗以後，必然地有第二個運動隨之而來，所以在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後，同盟會運動即繼之而起。

由於一九〇〇年義和團運動所引起的帝國主義聯合進攻中國——庚子八國聯軍之役——的結果，是帝國主義列強與滿清

政府締結了辛丑和約，使中國方面受了如下的鉅大的損失：

- (一)由中國賠款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兩，按年加四厘利息，以三十九年清還，並以中國關稅為本利償清之財源；
- (二)劃定北京使館界，不准中國人居住；各國得於使館界內，駐兵保護；
- (三)大沽砲台及北京至沿海濱各砲台，一律撤毀，不准重建；
- (四)中國政府承認各國佔領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昌黎，灤州，秦皇島，山海關等處，以保護北京至海濱之交通。

和約中還有一些次要的款項，但最重要的是上列各項，這不僅要使中國賠償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兩的鉅款，而且實際上，置中國首都北京於帝國主義武力共管之下。這種鉅大的損失，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發生了如下的兩種重大影響：

在政治方面，自從八國聯軍之役以後，中國政府之無能與腐敗，已為國內外所共見，而中國之國際地位，更因此而一落千丈——本來中國的國際地位，自從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之役以後，已開始江河日下，及至甲午中日戰爭失敗，中國之國際地位，下降至最低下弱小之國，及至庚子八國聯軍之役以後，則中國事實



上已完全失去了獨立國家的資格，而成爲帝國主義列強之公共殖民地；在列國人士的心目中，中國不僅是一個弱小無用的國家，而且是一個野蠻未開化的國家。

在經濟方面，這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兩的鉅額賠款的支出，當然都是剝削民間而來，而且是用最黑暗的剝削手段——這次賠款的來源，是由於下列各省所加各種苛捐雜稅：

湖北	加鹽稅	加印紙稅	加鴉片煙稅			派捐
廣東			加鴉片稅	加厘金	房捐	
四川		加印紙稅	加鴉片稅	肉稅	房捐	增地稅
浙江	絲落地稅			酒稅	房捐	增地稅
江蘇			加鴉片稅		房捐	增地稅
安徽			加鴉片稅	酒稅	房捐	增地稅
江西			加鴉片稅			增地稅
福建	紙稅		加鴉片稅	審果稅	房捐	增地稅
山東			加鴉片稅	酒煙稅		
河南	鹽稅					增地稅
廣西			加鴉片稅	賭博稅		增地稅
湖南	加鹽稅	加印紙稅	加鴉片稅	煙酒糖稅		派捐

尚有種種上列捐稅以外的剝削，都是取諸於民的。本來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六十年來（自鴉片戰爭至八國聯軍之役，計六十

年)，中國農村經濟已經崩潰，再經此重大剝削，農村經濟乃益加速破產。

以上這政治經濟兩方面的影響，都是誘發革命的最有利的條件：因為政治上的影響，使滿清政府的昏庸無能，充分地暴露出來，引起民衆反對滿清政府的情感；而國際地位之每况愈下，亦是激發人民的民族思想；至於經濟方面的影響，當然是更其重大，這種農村破產的嚴重的趨勢，自然而必然地引起各地不安的騷動，而這種騷動，就是革命的信號，革命運動在這樣社會經濟之極度的貧乏與社會秩序之極度的混亂的條件之下，才能展開起來。

就是這樣，在義和團運動失敗不久，同盟會就宣告成立了（一九〇五年）。

一九〇五年革命同盟會的成立，對於中國革命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而同盟會正是緊接着義和團運動而產生的，這並不是偶然的事，同盟會的領袖孫逸仙紀述一九〇〇年義和團運動後革命之新形勢的展開，有如下一段：

“經此次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咀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爲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



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日多爲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國勢危急，有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時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而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爲風氣，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故予此次漫遊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櫫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次會於比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惟甘肅尙無留學生到日本，故闕之也。此爲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因當時尙多諱言革命二字，故祇

以同盟會見稱。”(建國方略中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

同盟會的政治主張，比興中會更進步得多，只要看了同盟會成立後以軍政府名義所發表的宣言，就可知道一二。宣言原文如下：

“天運歲次年月日中華國民軍都督奉軍政府命，以軍政府之宗旨及條理，佈告國民。今者國民軍起立軍政府，滌二百六十年之膾腥，復四千年之祖國，謀四萬萬人之福祉，此不獨軍政府責無旁貸，凡我國民，皆引為己責者也。維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以貽後人，今漢人倡率義師，殄除胡虜，此為上繼先人遺烈，大義所在，凡我漢人，當無不曉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祇以驅除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在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常變更，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為其機關而已。自今以往，國民之責任，即軍政府之責任；軍政府之功，即國民之功。軍政府與國民同心戮力，以盡責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大經，暨將來治國之大本，佈告天下：



- 一 驅除韃虜 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爲邊患，後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迫我漢人，爲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我漢人爲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滿洲政府窮凶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其滿洲漢軍人等，如悔悟來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殺無赦；漢人有爲滿奴作漢奸者，亦如之。
- 二 恢復中華 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民族的國家，敢有爲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爲者，天下共擊之。
- 三 建立民國 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立民國政府，凡我國民皆平等，皆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爲者，天下共擊之。
- 四 平均地權 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爲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與衆棄之。

“右四綱，其處分之序，則分三期：第一期爲軍法之治。義師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脫滿洲之羈絆，臨敵者立同仇敵愾，內輯族人，外禦寇仇，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軍隊爲人民戮力破敵，人民供軍隊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寧。既破敵者，及未破敵之地方行政，軍政府總攝之，以次掃除積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壓制，官吏之貪婪，差役之勒索，刑罰之殘酷，抽捐之橫暴，辮髮之屈辱——與滿洲勢力同時斬絕；風俗之害——如奴婢之畜養，纏足之殘忍，鴉片之流毒，風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每一縣以三年爲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軍法，布約法。第二期爲約法之治。每縣既解軍法之後，軍政府以地方自治權歸之其地方人民；地方議會議員，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選舉。凡軍政府於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及人民對於政府之元利義務，悉規定於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皆循守之；有違法者，負其責任。以天下定後六年爲限，始解約法布憲法。第三期爲憲法之治。全國行約法六年後，制定憲法；軍政府解兵權行政權；國民公舉大總統；及公舉議員，以組織國會。一國之政事，依憲法中之行之。此三期：第一期爲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代；第二期爲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總攬國事之時代；第三期爲政府解除權柄，憲法上國家



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俾我國民循序以進，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中華民國之根本，胥於是乎在焉。

“以上爲綱有四，其序有三，軍政府爲國戮力，矢信矢忠，終始不渝；尤深信我國民必須踴厲堅忍，共成大業。漢族神靈，久耀於四海，比遭邦家多難，困苦百折，今際光復時代，祈人人各發揚其精神。我漢人同爲軒轅之子孫，國人相視皆伯叔兄弟諸姑姊妹，一切平等，無有貴賤之差，貧富之別，休戚與共，患難相救，同心同德，以衛國保種自任，戰士不愛其命，閭閻不措其力，卽革命可成，令政可立，願我四萬萬人共勉之！”

我們拿這篇宣言來和興中會的宣言比較一下，可以看出同盟會的政治主張較之興中會的政治主張，進步了許多。興中會僅僅是要求富國強兵的自強運動，而同盟會則已公然宣言：“前代爲英雄革命，今日爲國民革命”；而這種國民革命運動則包含有下列幾個特點，爲興中會所沒有的，卽是：

第一，同盟會注重民權思想。宣言中特別指出“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民國政府，凡爲國民，皆平等而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第三階級的民主革命精神，在這裏表現得非常清楚。同盟會的中央機關報民報所刊行的民報六大主義中，更詳細地解釋民主政體的必要（詳後）。

第二，注重人民生活。如前所述，興中會的宣言中，對於人民生活是一字不提，其忽視人民生活是很顯然的。但是同盟會却就不同。實際需要已經使孫逸仙完成其三民主義的全部理論，而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在同盟會的政治主張中，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同盟會的急進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權，就是以民生主義的理論為其基礎。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面還要專章詳論。

這兩點是非常重要的，這都是第三階級之最迫切的要求；這些要求不見諸於興中會的宣言而見諸同盟會的宣言，就是表現第三階級的意識形態，跟着其階級勢力的發展，已經進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這一種發展，決不是所謂“天然的”，或者是領袖個人智識的進步，而是進步的物質條件所決定的。這我們可以不必舉統計字數來說明，誰都會知道，在同盟會時代，中國的新式工業至少比興中會時代是略有進步了。這種新式工業的發展，雖然是非常緩慢，但他總還是在發展；這種發展引起其階級意識跟着發展。

但這裏的所謂發展，當然是很有限制的，決不是說新式工業的發展，已經到了或種的高度。這個時候工業的發展，還沒有到與帝國主義工業發生直接利益上的強度的衝突，換句話說，這個時候國內新式工業的長成，還是沒有妨礙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所以還沒有受到帝國主義雄厚資本的工業組織的致命的壓迫。



因爲如此，同盟會和興中會一樣，並沒有鮮明的反帝國主義的表示，甚至處處表示對帝國主義妥協。

民報是同盟會的中央機關報，所以民報的所謂六大主義，實際上就是同盟會的六大主義。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不可不錄出以供研究。民報六大主義的原文如下：

“(一)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此造端之事業也，以吾多數優美之民族，箝制於少數惡劣民族之下，彼不爲我同化而強我同化於彼，以言其理則不順，以言其勢則不久，是故排滿者，爲獨立計，爲救亡計也。以滿人創澳之深，故兩皆稱界，必不能平，而論者以爲我可與之同化，引夫氏羌鮮卑入主中夏，而旋折入同化於我者爲比。其不等倫，姑置不論。然問氏羌鮮卑之同化於澳，爲當其僭王猾夏之日而許之乎？抑俟我澳族復振，被我摧夷，散伏在下之日而後許之乎？故以滿政府不傾，而遂許其同化者，以狐媚爲虎俚，無恥之尤者也。吾人之民族思想，不與政治思想蒙混，然所以痛心疾首而不可以終日安者，則以不能居於被征服者之地位也。故一旦能光復舊物，居於征服者之地位，則不必使其醜類靡有子遺，而後快我民族之心志也。滿人恃其政權，乃以少數惡劣之民族，而制多數，故一度傾覆其政府，則彼必無以自存。其爲元胡之窮敗，遜走其巢穴，未可知也；其如前氏羌鮮卑

等爲我摧夷，而同化於我，未可知也。然非如是，則漢人永爲被征服者，不能獨立，而縛輓於淺演之民族，與外隣之深演民族戰，必至偕亡，則無貳也。故曰於理不順，於勢不久也。所謂惡劣之政府，謂以惡劣之民族，而篡據我政府。其爲惡也，根源於種性，無可剷除，無可增飾，且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云然，故雖有僞改革，而惡劣如故，卽亟亟然襲用歐美之憲章或法，而惡劣亦如故。章太炎比之醋母之無投，得其例耳。然僅曰傾覆此政府而已足者，則尤有說：滿洲以蠻武入居中國，然其能力實不足以亡我，何者？國家之存亡，一視其機關組織之存滅，而一國家踏一國家者，必其固有之機關組織，完備優美，足以含孕其勝家，而勝家之被征服也，乃悉摧喪退聽，如無官品，無機動物之徒存焉。故嚴復氏論歐洲之羅馬，俄國，亞洲之埃及，印度，謂如封豕長蛇，吞食鹿豕，入其腹中，鹿豕機關，盡成齋粉，徐徐轉變，化合新體。又曰：新勝之家，爲極強立之官品，其無機消散者，獨見勝之羣，見滅之國，其舉胡元而不及滿清者，固爲有所隱諱。然如其學說之分類，亦足見滿族無亡中國之能力，蓋論滿族入寇之初，則無異於元，而其種智，抑更劣下。故其固有之機關組織，既不足以勝我，乃僅得篡據，爲構成機關之分子，張皇百計以求自固，而久乃并忘其習慣，失其故居，視嚴氏所



云爲極強立之官品，使勝家變合爲新體者，斷乎其不能。故今日滿人與氏羌鮮卑之猾亂中夏，特有久暫之殊，而其情實無以過。質而言之，則皆據有我政府，而非滅亡我國家也。我國民一旦奮起，則較有明之驅蒙古爲尤易，直日本一倒幕之舉而已也。

“(二)建設共和政體 有破壞而無建設，曰無意識之破壞，此盡人所知也。然所謂建設者，決不可以後時，故先有建設之豫備而後動。抑吾人之所以異於政府黨也，吾人信今日支那國民之程度，不可以無政府，惟舊日之爲異族政府所有者，固當傾覆之，而數千年君主專制之政府，亦必同時改造，而後可以保種而競存，夫君主專制政體之不宜於今世，無待辨者，而覘國者且問其政體之尙含有專制性質與否，以爲其文明程度之高下，然則二十世紀苟創新政體者，必思滌除專制，惟恐不盡。中國前此屢起革命，而卒無大良果，則以政體之不能改造，故有明之勝元，不滿三百年，而漢族復衰，異族之政府去矣，而代之者雖爲同種人，而專制如舊，則必非國民心理之所欲也。普通政治之論，反乎君主專制者，爲共和；故共和政體，廣義有三：曰貴族政體，曰民權政體，曰民權立憲政體。蓋民權立憲之政，非獨不同於貴族，抑與民權專制者，亦大有別也。今之僉人動言我民族歷史無有民權

之習慣，以是而摧傷愛國志士之氣。嗚呼！是非惟不知政治學也，又不足與言歷史。夫各國立憲之難，未有難於以平民而戰勝君主貴族之兩階級者也。故美洲獨立惟有平民，其立憲乃獨易，而民權亦最伸。吾國之貴族階級，自秦漢而來，久已絕滅，此誠政治史上一大特色（其元胡、滿清，以異種爲制，行貴族階級者不足算）。今惟撲滿，而一切之階級無不平（美國猶有經濟的階級，而中國亦無之）。其立憲也，視之各國，有其易耳，無難焉也。且吾人聞最新法學者之言，謂立憲之先，必有開明專制時代。所謂開明專制時代，其君以植民權爲目的，而用民權爲手段，訓練其民，使有立憲國民之資格者，如拿破崙之法是也。以言中國，則漢唐盛時，亦爲開明專制時代（此說日本法學博士筧彥克）。準是以言，則中國之爲開明專制已久，雖中經異族之亂，而根株不盡斲喪，今日徵以歷史，而斷言我民族不可以爲共和立憲，不知何據？嗟乎！此輩卽薄志弱行，亦惟緘口待盡可耳，何取爲邪說以誣毀我先民也。斯塞賓爾以生物之幹局已成，難與改組者，比國家成制改革之難，惟吾人之意亦然，故必革命而後可言立憲。而一度革命，更不可不求至良至公之政體，而留革命之遺憾。故言專制，則無論其爲君權專制，民權專制，皆無道不平之政體也。而言立憲，則君主立憲，其治人者，與治



於人者，等差釐然，各殊其愛情，亦從而生階級。民權立憲，則并此無之，而壹是平等。惟我漢族民族思想，與民權思想發達充滿，故能排滿，能立國；而既已能排滿立國，則探乎一般社會之心理，必無有舍至平等之制不用，而猶留治人者與治於人者之階級也。若慮夫革命之際，兵權與民權相抵觸，而無以定之，則孫逸仙先生之言約法精矣。

“(三)土地國有 近世文明國家所病者，非政治的階級，而經濟的階級也。於是而發生社會主義，其學說雖繁，而皆以平經濟的階級為主。言其大別，則分共產主義，與集產主義。而土地國有，又集產主義之一部也。世界惟民權立憲國，可行集產主義，蓋其統治權在國家，其國家總攬機關，為人民代表之議會，則社會心理反映於上，而國家以之為國民謀其幸福，無所不平，非稍有政治階級者所能比也。然一切集產主義，按以今茲吾國程度，猶有未能行者，惟土地國有，則三代井田之制，已見其規模。所以吾擇昔所固有者行之於改革政治之時代，必所不難。原夫土地國有之論，以又對私有者而起，以言其理由，則土地為生產要素，而非人為造成，同於日光空氣，本不當有私有者。至由種種原因而生地主制度，其始猶或有以勞動儲蓄得之為資本，以供生產之用者，其繼則封殖日盛，地利為所專有。資本勞動者，皆不能不依

賴之，而所得爲所先取焉。蓋勞動者每困於資本家，而資本家之所以能困勞動者，又以勞動者不能有土地故。且土地價值，因時代而異，社會文明，則其進率益大，此進率者，非地主毫末之功，而獨坐收其利，是又不啻騙社會之人，而悉爲之僕也。至論其流弊，則可使地主有絕對之強權於社會，可使爲吸收并吞之原因，可使農民廢業，可使食艱而規給於外，可使全國困窮，而資本富厚悉歸於地主。例如愛耳蘭自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二年間，方饑饉大起，而前後二十餘萬農民，被遺逐於地主；又蘇格蘭之大地主，有計其收入之利，而變耕地爲牧場獵場者，於英國屢起國有問題，然已積重難返。今中國土地，以通商港岸衡之，則其值有閱十年而不止十倍其舊者。革命以後，文明驟進，則內地之趨勢，亦復可知，倘復行私有專制，則經濟階級，將繼政治階級代興，而及其始爲之備，則害未見而易圖也。吾人用國有主義，其爲施行政策不一，然其目的，則使人民不得有土地所有權，惟得有其他權。（如地土權，永小作權，地役權等）。且是諸權必得國家許可，無私備，亦無永貸。如是，則地主強權，將絕迹於支那大陸。國家之課於土地上者，必經國會之承認，亦必無私有營利之弊，以重徵而病農。地利既厚，而非躬耕，無緣得授諸國，則民日趨業，而無曠土。地主夙昔坐而分利，今亦與



國民比，而轉爲生利之企業。此於一國經濟，已著莫大之良果。而以吾國已爲民主立憲政體之故，則地利所入雖豐，仍以爲民政種種設施之用，其爲益愈大。蓋專制政府之富，民之賊也，而民主立憲國家之富，猶共產也。夫均地之政，至相等耳，文明各國，其社會志士，竭誠捐己，以聚謀於下，其政府亦時時利用其政策，然或在立憲而未忘專制之國，則國家之利不盡利民，甚有假之而陰絕社會革命之根株，以保其階級之制度者，其政治上勢力既不爲助矣，而社會上勢力，抑未易變，則持之數十年，而成効絕鮮。若中國者，僅一撲滅異族政府之勢，而國中一切階級，無復存在，社會主義，乃順於國民心理，而又擇其易者以從事，其成功非獨所期，殆可預必也。

“(四) 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 平和爲人類之福，猶一國之安甯秩序。是故擾世界之平和者，爲人道之賊。而今日文明諸邦，其所持以通國際之情誼，謀一國之利益者，皆曰維持平和也。今世不知夫革命家之真相者，概推定以爲含破壞爆裂之性質而遠之，夫革命家因其所遭值，橫逆激憤而莫收者，亦有之矣；然其初志，固未有不以求平和爲目的者也。若夫吾黨之革命，則所謂破壞爆裂者，不過對於區區之一滿洲政府。然至彼政權盡機，而退就彼征服者之地位，則吾漢

族且將無仇於其醜類，而況與我爲隣，平等爲國者耶。且吾人之傾覆惡劣政府，直接爲中國國民之幸福，間接爲世界之平和也。何者？今各國鷹麟鴟視，競逐於世界之舞臺，相憚莫敢後，相顧莫敢先者，何爲也？曰：爲均勢問題也。均勢問題，不在弱小之邦，而在強國，若英，法，俄，德，美，日本，皆其倚著之重點也。然尙有中國以其位置資格，決然不當後於六強而萎靡不振，幾徒供他人鼎俎之資。此遠東問題，所以極促世界之注目，而終以均勢之難，而不解決也。日俄之戰爭，其劇烈殆前古無有，直接於本國之利害，猝末易見，而以謂爲均勢問題而起，則兩國人民當公認之。其幸今日復底於平和，兩國國民乃得以稍稍息肩，然經年之苦鬪所損，不爲不多，其後此之不更生衝突與否，尤不可知耳。然而各國則仍不知求解決遠東問題之根本，則所謂真正之平和，不能遇也。欲求真正平和，當始於中國爲獨立強國之日。中國爲獨立強國，則遠東問題解決，均勢問題亦解決也。夫惟大陸無垠，不能自守，而後導衆強以侵入，而是國之政府，又爲縱橫捭闔之術，陰有所親，而坐致其衝突，以致爭戰。日俄之外交破裂，清政府之外交實使然，且自詡能顛倒人國也。今日各國所要求至切要者，不過開放通商之事，而軼此範圍，至爲衝突戰爭之原因，宜不足以相償，則爲深遠計慮，苟能得真正



之平和，必其所不貪矣。然是固非可望於一國之讓步者，而又難於衆強之同意。此英日同盟，所以深致躊躇也。且豈英日而已哉，各國有志平和者，莫不以保全支那領土爲言。然使中國自強，無待他人之保佐，其難易必有能辨之者，而各國獨無覩於此，則由其未知中國民族之歷史，與吾國今日坐斃之大原因也。夫以惡劣政府專制於上，而一大民族壓伏於下，舍其防家賊之政策外無他事焉。而是大民族者，固斷斷其不能同化以忠事之也，則政府與國民爲公敵。夫政府與民爲公敵，而能振其國力者，未之聞也。是故滿洲去，則中國強；中國強，則遠東問題解決；遠東問題解決，則世界真正之平和可覩，而滿洲今日實爲之梗也。故曰吾人所以傾覆政府者，直接爲國民幸福，間接爲世界平和也。若既革命之後，建新政府以與列強交，則孫逸仙先生亦言之曰支那人爲最平和，最勤勉，最守法律之民族，非慄悍好侵掠之民族也。其征伐戰爭，亦只自衛，使外人果能始終去其機械之心，則吾敢謂世界民族未有能及支那人之平和者也，更由經濟上觀之，支那建設文明政府，其利益不僅在本邦，時旁及各國云云，其言可深味也。見所著支那問題真解，其言支那革命，關係世界平和，最爲透闢，此文實本其意，日本大隈伯謂中國政府儉安，惟企革命之不起，利用列國之衝突及其嫉妬心，而

無信義，故英日同盟，實行均勢主義。然戰國派之外交，常召內部之變動，支那問題真解亦云。滿洲政府所爲，足擾世界平均之局，然大隈欲以日本威壓爲解決，支那問題真解以革命爲解決，則一由不知支那之歷史，一精熟之也。民報第一冊時評，有所未盡，特誌於此。）吾於是更有爲吾黨申明之者，曰革命家之破壞，非不得已也。其目的物，至單純者也。苟有觸而輒發，非特衷情褊激，亦徒擾人國之平和，無所取也。以爲利用民氣，則尤不可試也。我不能教國民以真正之獨立，而教以無理之排外，是無異使習爲無意識之破壞也。而以是期大目的之達，不亦遠乎？今使人一度爲無理之排外，而外人且從而疑我，然我之敵方持兩端，不遽示其惡意於國際上，或且媚之，人忘遠慮，姑喜其目前之尚可近也，則彼合而我携矣。拘方之士，未觀其通，輒曰革命者，召外患而爲瓜分之由，爲不可爲。此其理論實謬，然所慮亦未始無據也。吾人平居所以訓誡國民者，卽當使知革命排滿，所以求獨立，非決心於破壞。至於排外，爲鎖國時代之思想，今無所用。革命之後，吾中國與日本歐美之交際，乃始益密；卽革命之際，亦不可有妨害外國人之舉動，是不惟政策之宜，人道當如是也。嗚呼！吾黨其當守此主義勿替也。

“(五)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此猶前條之意



義而特揭之者，以中日兩國國際問題，猶未解決也。日本所籌以對待中國者，其全體之意思，不可具曉，而以吾人所知，則有二派：其一曰侵掠主義；二曰吸收主義。第一派主之者無幾人，其政策亦過於武斷，且貽外交之憎忌，無勢力也。故二派中，以吸收派為占優勢。然曰吸收，則顯非平等相交之道，以支那四百兆之大民族，其間豈無自覺者。視此主義之不誠，必以其不願下人者，而深懷猜忌，如是兩國國民，將不可合，蓋凡兩國交際，智取術取，不可長也。中國人士對待日本者，亦向分排日親日兩派，排日非大勢所宜，我之不能排日，猶日之不能排我。而親日者徒企人之我保，而無實力以盾其後，亦非吾人所取也。吾人所謂兩國國民的結合，則為兩方之交誼，為中國者，講求實力，以保其對等之資格，使交際間，自無所屈辱。而日本交當泯厥雄心，推誠相與，蓋非如我國親日者之言，而日本吸收派之論，亦無所用之耳。於此有當注意者，則中國國民非滿洲也，如大隈之論，滿洲政府既不可信，而日本亦不樂為以狐媚手段為目前之外交。然則舍政府而給國民，又豈獨日本為有利耶？至有謂日本文明，曠昔悉取諸中國，故今日以得諸歐美之文明為報酬，此則客觀之問題，不待吾人之研究矣。

“(六)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革新之事業 由上言之，

則我中國將來革新之事可知矣，其對於世界各國之利害，亦可知矣。如大隈之論滿政府之無信義，豈獨日本不能與親，即世界各國，亦鮮能與親者，徒以其篡據中國政府之上，乃不得不虛與之委蛇已耳。有新政府代之以興，以一大民族爲一強國，親仁善隣，以與各國交際，其孰不樂就之。然當革命軍初起，其成功未著，而能各國贊成其事者，又在革命者之舉動，能合於國際法與其勢力之如何。考之歷史，革命團體，離其母國獨立，戰爭相持，在友邦先承認之者，由母國視之，非所好也，而先認之之國，則不以是而却顧，尊人道，表公理，明實益也。如美之獨立，英國猶繼續戰爭，而法先承認之，先例之最大者也。亦有未承認爲國家，而先認爲交戰團體者，認其與本國有戰爭之能力，比於國際上之交戰，而承認之國，宣告中立於兩者間，如一七七九年前，法未認美爲獨立國，而各國之認爲交戰團體。日本維新前，幕府與朝廷抗，外國亦視爲交戰團體，宣告中立。我漢族奮起革滿政府之命，以光復故物，視他團體之脫離母國者，尤合於人道公理，而義旗所指，爲有規律之戰爭，而不悖於今日所謂戰時法規慣例者，則始而認爲交戰團體，繼而爲獨立國，其理勢有必然自至者。或曰：希臘之獨立，英助之，意大利之獨立，法助之，皆前世紀之事也，中國之形勢利便，非意希之比，列強挾



野心而或爲我助，其事已可畏，或且藉以而干涉之口實，而召變瓜分，斯時非革命者負其責任乎？應之曰：吾人所謂贊成者，非必求臂助於外人也，不爲吾阻力，依於國際法之行動，而宣告中立，則吾人之受賜已多矣。夫不謀自力之發舒，而企仰他人之扞衛，未有幸者，是不當問彼強者之野心如何也。若夫慮爲列國干涉瓜分之漸，則爲是說者，其殆已忘庚子之役也。彼強國已大有藉手之時機，而不實行瓜分之策，則首以均勢問題爲難解決，而其次亦以中國民族之大，未可猝言兼併也。故各國苟可以瓜分中國者，不必其有所藉口，况其爲藉口者，不必遇革命軍之起也耶。或又曰：凡言要求，必於實力，革命軍之對於各國，疑其託空言也。則應之曰：吾人革命以維持革命平和爲義務，此主義者，列強所不能反對也；革新事業已成，隣之我附，固在意計之內，即當始事，而於外人物業無擾，則彼列強者，無難使之守局外中立。蓋干涉爲均勢之不利，既如彘言，則中立爲所最利，以如是而後可使革命軍，負損害賠償之責也。故非贊成中國革命之事業，則無以保世界之平和，猶其間接利益。由後言之，而有交戰團體承認，則直接而先享中立國之權利，凡此皆以事實爲後盾，故在我之要求，不得謂徒有空言也。或又曰：中國方今爲各國之債務者，其關稅鐵路等，多供債務之担保，一旦革

命軍起，則債務者幾同破產，各國債款，將何從出，故各國務求滿政府得以支持現狀，而未敢遽贊成革新事業也。則應之曰：苟如是言，則各國之過慮也。於國際法舊政府雖傾覆，而其外交所訂之條約，則當承認於新政府，而不失其效力。新政府當繼續其債務，及一切之義務。蓋外交上條約，非舊政府之私，以國家之名義爲之也，其債務亦國家負之，故新政府不能弛此負擔者也。吾人革命軍起，必恪守國際法而行，滿政府已逐，則新立政府必承認其條約，即分割數省而宣告獨立，於各國之債權，亦斷許其無損失也。要之吾人所企望者，當於內外之情勢，皆至易達，且至安全者也。

“以上六主義，得分之爲二：曰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曰建設共和政體，曰土地國有，所以對內也；曰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曰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曰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所以對外也。而又得合爲一大主義，則革命也。”

這裏所謂六大主義，前列三項都是對內的，第一是對於滿清政府表示了決絕的敵視的態度，發表了許多激發民族情感的議論，這可說是孫逸仙的民族主義的綱領。第二是關於建立共和政體的，發表了不成熟的民權思想的議論，表現了孫逸仙的民權主義的一個雛形。第三是土地國有的急進的經濟綱領，也就是孫逸



仙的民生主義的理想。

以上這三部分，是可以代表整個的孫逸仙的三民主義。孫逸仙的三民主義，對於近代中國政治經濟有極大的關係，關於這點，以後還有專章詳論，此處可以不說。

至於其後三項，都是偏重於對外的政策；這些對外政策，正是表現了幼稚的中國第三階級的不合理的空想。這些對外政策當然沒有絲毫反對帝國主義的意味。在所謂“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的標題之下，講了一大篇與虎謀皮的空話之後，其結論是：

“至於排外，為鎖國時代之思想，今無所用。革命之後，吾中國與日本歐美之交際，乃始益密；即革命之際，亦不可有妨害外國人之舉動。是不惟政策之宜，人道當如是也。嗚呼！吾黨當守此主義勿替也。”

在“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革新之事業”一條下，不僅希望列國贊成，而且附以最忠實的態度承認列強既得權利：

“或又曰：中國方今為各國之債務者，其關稅鐵路等，多供債務之担保，一旦革命軍起，則債務者幾同破產，各國債款，特何從出？故各國務求滿政府得以支持現狀，而未敢遽贊成革新事業也。則應之曰：洵如是言，則各國之過慮也。於國際法，舊政府雖傾覆，而其外交所訂之條約，則當承認於新政府，而不失其效力，新政府當繼續其債務，及一切之義

務。蓋外交上條約，非舊政府之私，以國家之名義爲之也；其債務亦國家負之，故新政府不能弛此負擔者也。吾人革命軍起，必恪守國際法而行；滿政府已逐，則新立政府必承認其條約，即分割數省而宣告獨立，於各國之債務，亦斷許其無損失也。”

軍政府更正式發表對外宣言，一再申述革命軍保護帝國主義在華既得權利的誠意，宣言如下：

“中華國民軍奉命驅除異族專制政府，建立民國，同時對於友邦各國，益敦睦誼，以維持世界之和平，增進人民之福祉，所有國民軍對外之行動，宣言如下：

- (一)所有中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
- (二)償賠分債，照舊担認，仍由各省洋關如數攤還；
- (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
- (四)保護外國居留軍政府占領區域內人民財產；
- (五)所有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各國權利，及與各國所借國債，其事件成立此於宣言之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
- (六)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國民軍政府者概以敵視；
- (七)外人如有接濟清政府，以可爲戰爭用物品者，一概搜獲沒收。



以上七條中的前四條，不僅完全承認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掠奪，承認全部不平等條約，而且對於這些掠奪與這些不平等條約，極力承認加以保護。





## 第十四章

### 第三階級意識形態的曲線發展

在中國，最初以完備的第三階級意識形態出現於社會的，是梁啓超的著作，特別是他的新民說，關於這，在前面已經說明。

梁啓超的影響，雖然幾乎一直延長到五四運動，但事實上，因為中國工業之脆弱與不易發展，使第三階級不能建立其完固的意識形態，梁啓超思想之每況愈下，即其反映。雖然梁啓超在思想上的影響，要比孫逸仙大得多，但是孫逸仙的思想，更能充分地表現出中國資本主義之曲線發展的特殊形態。梁啓超的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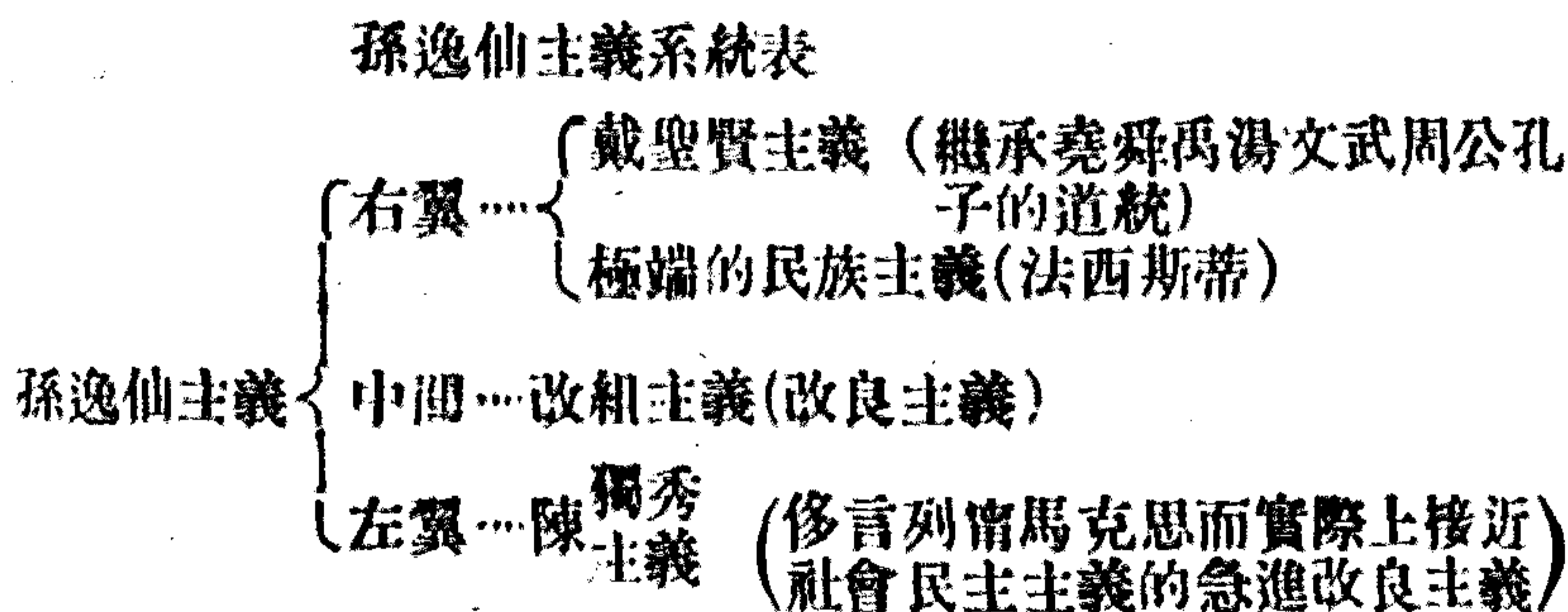
年的思想——特別是著新民說的時候，他的思想是統一的，有一個完整的體系——就是完整的第三階級的思想體系，但因為中國工業幼稚與不易發展，於是反映到梁啟超的思想，如江河之日下。梁啟超的晚年，其思想之落伍與墮落，完全反映了中國第三階級的幻滅的運命——在梁氏的思想中，蓬蓬勃勃的充滿了朝氣的時代，是非常之短的。但是孫逸仙的思想發展，與梁啟超完全不同。梁氏的早年思想，是統一的完整的，但孫逸仙的思想始終是非常混雜的，這當然不是說，孫氏在思想上的價值不及梁氏，而是複雜的中國經濟狀況——特別是工業資本之異常曲側的多變的發展，決定了第三階級思想家的各種不同的臉譜。孫氏的思想，雖不及梁氏早年思想的統一完整，但正因為如此，孫氏的思想，尤其明白地反映了中國那種複雜的經濟形態與工業資本之曲側多變的發展的內容。

孫逸仙的思想，始終是偉大而混雜。孫逸仙的全部思想，包括在他的三民主義之中，雖然孫氏關於三民主義並沒有深奧的理論著作，而祇遺給了我們一本沒有完全講完的講演——就是市上流行的“三民主義”。但是毫無疑義的，這部三民主義講演，完全可以代表孫氏的全部思想。三民主義的內容，非常之複雜，非常之廣泛，從堯舜文武周公孔子起，到盧騷亞里斯多德亞丹斯密——一直到馬克思列寧蒲魯東克魯泡特金止，無所不有，無所



不包。這種百寶箱萬寶袋式的三民主義，就是中國工業資本曲側多變的發展的反映，也就是第三階級矛盾張皇的寫真。但無論牠怎樣多變，怎樣複雜，無論他談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又談到列甯馬克思，談到盧騷亞丹斯密，又談到蒲魯東巴枯甯，但總沒有躋出第三階級的圈子，這是可以斷言的。

孫逸仙主義（即三民主義）的內容，始終是極其複雜，但就其主要的分派，可以列成如下的公式：



從這個公式的表面看來，似乎是很矛盾的，因為無論如何，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與馬克思列寧之間，是找不出聯繫來的，所以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與馬克思列甯並寫起來，似乎是不妥當的。然而實際上，我可以負責的說，上列這一公式是絕對地正確的。關於這，在下面還要加以詳細的解釋，現在先要加以說明的，就是無論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道統的戴聖賢主義，或侈談馬克思列寧的陳獨秀主義，他們都是孫逸仙主義的忠實信徒，他們都沒有躋出第三階級的圈子——有人以為改

粗主義是孫逸仙主義的左派，而陳獨秀主義是不應列入孫逸仙主義範圍內的。我必須指出這樣的見解是不正確的，陳獨秀主義之爲孫逸仙主義的左翼，後面尚有專章作理論的說明，此處可以不說，但我們可以說國共合作時代，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就是國民黨的左翼，除除了共產黨（當然指國共合作時的共產黨），國民黨是根本沒有左派的。這，我們當然有對於孫逸仙主義作一個整個解剖的必要，尤其關於他的民生主義。

本來，孫逸仙主義分成三個部分——民族，民權，民生。有人以爲民族主義在孫逸仙主義中占最重要的部分，也有人以爲民權主義是孫逸仙主義的中心，但最多數的人，則認爲民生主義是三民主義的中心——周佛海著三民主義本體論，認三民主義本體爲民生主義，這就民族民權民生三部分的輕重分別而論，這是正確的見解。毫無疑義的，民生主義是孫逸仙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讓我們先來研究民生主義吧。

有人說，孫逸仙的全部思想，特別是他的民生主義，完全是社會主義的；這不過是表現了這種說法的人的愚昧無知而已。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即國共合作的時代，有一些幼稚的共產黨員，他們企圖把孫逸仙的民生主義，解釋成爲一種“社會主義”甚或是“共產主義”，這實在是一種非常之可恥的妄圖！

孫逸仙的全部思想，特別是他的民生主義，澈頭澈腦是反社



會主義反共產主義的。在孫逸仙一生的言論、著作、行動中，我們絕對找不出絲毫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氣味。

我自己對於孫逸仙的三民主義，缺乏深刻的研究，自然不敢多所妄論，但是這不一定要對於三民主義有深刻研究的人，才能懂得，我想只要對於社會科學有相當常識的人，就可以理解。孫逸仙的全部思想，特別是他的民生主義，不僅沒有絲毫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氣味，而且在他的言論著作中，特別是他的民生主義演講中，充滿了反馬克思主義反共產主義的論調。雖然我們覺得很失望，代表孫逸仙全部思想之最重要的著作的三民主義，出現於世界上的僅僅是一部尙未完畢的講演，但在這一部未完畢的三民主義講演中，我們已經窺見孫逸仙思想的精髓了。

整部的民生主義的講演，完全是反駁馬克思主義的。但是在這裏我們必須認識清楚，孫逸仙反駁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土豪劣紳那樣一味杜造一點東西來謾罵，而是有他自己的理論的體系；而他的曲線的階級背景，就是決定他的理論體系之最實際的條件。必須了解了他的階級立場，才能懂得三民主義的真正意義。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成爲科學的社會主義，就在乎他的唯物的歷史觀。孫逸仙在作民生主義的講演的時候，一開始就反對這唯物的歷史觀，而代以所謂民生史觀：

馬克思以物質爲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 社會問題才是

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為重心，那才是合理。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就是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民生主義第一講）

所謂民生究竟是什麼呢？孫逸仙自己對於民生兩個字下了這樣一個定義：

“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便是。”（同上）

可見所謂民生問題就是一個人民之物質生活的問題。然而人民的物質生活，怎才能夠發展，怎樣才能夠使社會進化，才能夠推動歷史的前進呢？孫逸仙的答覆，就是階級調和，反對階級鬥爭。他說：

“馬克思定要有階級戰爭，社會才有進化；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這是以階級戰爭為因，社會進化為果。……社會上因為常常發生新制度，所以常常有進化。至於這種社會進化，是由於甚麼原因呢？社會上何以要起這種變化呢？如果照馬克思的學說來判斷，自然不能不說是由於階級戰爭。社會上之所以要起階級戰爭的原故，自然不能不說是資本家壓制工人。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總是相衝突，不能調和，所以要起戰爭。社會因為有這種戰爭，所以才有進化。



但是照歐美近幾十年來社會上進化的事實看，最好的是分配之社會化，銷滅商人的壟斷，多徵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增加國家的財富；更用這種財富，來把運輸和交通收歸公有，以及改良工人的教育，衛生，和工廠的設備，來增加社會上的生產力。因為社會上的生產很大，一切生產都是很豐富，資本家固然是發大財，工人可以多得工錢。像這樣看來，資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產力，工人有了大生產力，便為資本家多生產。在資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生產，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錢。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不是相衝突。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調和，就是為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同上）

孫逸仙的社會思想，在這段講演中充分的全部的表現出來。也的理想中最良好的社會制度，就是工人努力替資本家增加生

產，如此則資本家固然可以發大財，工人也可以多得工資(?)，而社會才有進化。這不僅是孫逸仙的理想的社會制度，一切第三階級的思想家都是如此的，不過由孫逸仙露骨地說了出來。

馬克思學說中最主要的部分，是他的經濟學；而剩餘價值論又是馬克思經濟學中的最主要部分。孫逸仙是很了解這一點的，所以他以全力來攻擊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

“再照馬克思階級戰爭的學說，他說資本家的盈餘價值，都是從工人的勞動中剝奪來的；把一切生產的功勞，完全歸之於工人的勞動，而忽略社會上其他各種有用分子的勞動。譬如中國最新的工業，是上海，南通州，和天津，漢口各處所辦的紗廠布廠；那些紗廠布廠，當歐戰期內，紡紗織布是很賺錢的，各廠每年所積的盈餘價值，少的有幾十萬，多的有幾百萬，試問這樣多的盈餘價值，是屬於何人的功勞呢？是不是僅僅由於紗廠布廠內紡紗織布的那些工人的勞動呢？就紡紗織布而論，我們便要想布和紗的原料，由此我們便要推及於棉花。因為要研究棉花的來源，我們便要推到種種農業問題。要詳細講到棉花的農業問題，便不能不推及到研究好棉花種子，和怎麼種植棉花的那些農學家。當未下棉種之初，便不能不用各種工具和機器去耕耘土地，及下棉種之後，又不能不用肥料去培養結棉花的枝幹。我們一想



到那些機械和肥料，便不能不歸功到那些器械和肥料的製造家和發明家。棉花收成之後，再要運到工廠內來紡紗織布。布和紗製成之後，再運到各處市場去賣，自然要想到那些運輸輪船和火車，要研究到輪船火車之何以能夠運動，首先便要歸功那些蒸汽和電氣的發明家。要研究到構造輪船火車是些甚麼材料，自然不能不歸功於金屬的採礦家製造家和木料的種植家。就是布和紗製成之後，社會上除了工人之外，假若其餘各界的人民，都不穿那種布用那種紗，布和紗當然不能暢銷；布和紗沒有大銷路，紗廠布廠的資本家，怎麼可以多賺錢？可以多取盈餘價值？就這種情形說，試問那些紗廠布廠的資本家，所取得的盈餘價值，究竟是屬於誰的呢？試問紗廠布廠的工人，怎麼能夠說專以他們的勞動，便可以生出那些布和紗的剩餘價值呢？不徒是紗布工業盈餘價值的情形是這樣，就是各種工業盈餘價值的情形都是一樣。因此可見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專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力的分子，無論是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在消費方面，都有多少貢獻。這種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在社會上要占大多數，如果專講工人，就是在工業極發達的美國，工人的數目，也不過是二千多萬，祇全美國人口五分之一。至於其他工業不發達的

國家，像我們做工的人數，更是很少。像這樣講，就是在一個工業極發達的國家，全國的經濟利益不相調和，發生衝突，要起戰爭，也不是一箇工人階級和一箇資本階級的戰爭，是全體社會大多數有能力的分子和一箇資本階級的戰爭。這些社會上大多數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因為都要求生存，免去經濟上的戰爭，所以才用公家來分配貨物，多徵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來發達全國的運輸和交通事業，以及改良工人的生活 and 工廠的工作，做種種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的事業。歐美各國，從這種經濟利益相調和的事業發達以後，社會便極有進步，大多數便享幸福。”(同上)

在這裏，孫逸仙並沒有在學理上批駁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說，馬克思經濟學說是結晶在他的資本論，他的資本論是用了他一生的精力和幾十年的光陰才成功的，所以組織非常嚴密，研究非常精到，要在學理上批評他原是很不容易的，尤其不是三十分鐘內的一篇講演所能了事。孫逸仙是一位實踐的政治家，他的畢生的精力，不是用在學理上，而是用在戰場上。好在我們在這裏並不需要高深學理的探討，只是追求這種反對馬克思學說之思想的根源。

“階級調和則社會進化”，在這樣一個原則之下，自然要反對階級鬥爭 要反對階級鬥爭，自然要否認工人的勞動之社會的價



值。上海有一個紗廠資本家曾對工人說：如果我不拿錢來辦工廠，不要說布和紗不會做出來，你們還要餓飯！這和孫逸仙以爲如果布和紗沒有人買，工人的勞動有什麼用呢？這是一樣的道理。第三階級的思想家時常這樣教訓工人：你們算得什麼？沒有資本家，沒有發明家（資本家的助手），你們能做出什麼來？你們不過是依賴資本，依賴機械而活動的分子，你們是最沒有用的東西！快點給我加力做工，我發財，你才有飯吃，社會才能繁榮。是你依靠着我，不是我依靠着你！但孫逸仙究竟是一個比較進步的，所以他並不完全抹煞工人相當有一點用處，所以他不主張資本家應該嚴厲壓迫工人，而是大家應該合作；合作是大家的利益——資本家發大財，工人多得工資，這是孫逸仙所認定的社會進化的基本原則。

資本家是頂討厭階級鬥爭的，因爲階級鬥爭必然要妨礙到資本家的階級利益，資本家所統治的社會，自然要以反對階級鬥爭爲其最主要的神聖任務了。

孫逸仙更舉了下面的事實來證明階級調和的利益(?)，及馬克思學說的錯誤：

“大家知道美國有一個福特汽車廠，那個廠極大，汽車出品極多，在世界各國都是很銷行的。該廠每年所賺的錢，有過萬萬。至於那個廠內製造和營業的情形是怎麼樣呢？不

管是製造廠，或者是辦事房，所有一切機器陳設，都是很完備，都是很精緻，很適合於工人的衛生。工人在廠內做事，最勞動的工作，最久不過是八小時，至於工錢，雖極不關重要的工夫，每日工錢都有美金五元，合中國錢便有十元；稍為重要的職員，每日所得的薪水，更不止此數。廠內除了給工人薪水以外，還設得有種種遊戲場，供工人的娛樂；有醫藥衛生室調治工人的疾病；開設得有學校，教育新到的工人和工人的子弟；並代全廠的工人保人壽險，工人死亡之後，遺族可以得保險費，又可以得撫卹金。說到這個工廠所製出來的汽車的價格，這是大家買過汽車的人，都是很知道的。凡是普通汽車，要值五千元的，福特汽車最多不過是值一千五百元。這種汽車，價值雖然很便宜，機器還是很堅固，最好的是能夠走山路，雖使用極久，還不致於壞。因為這個汽車廠有這樣的價廉物美，所以風行全球。因為這種汽車銷路極廣，所以這個廠便發大財。我們用這箇發財汽車廠所持的工業經濟原理，來和馬克思盈餘價值的理論比較，至少有三個條件，恰恰是相反：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延長工人作工的時間，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縮短工人作工的時間；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減少工人的工錢，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錢；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抬高出品



的價格，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減低出品的價格。像這些相反的道理，從前馬克思都不明白，所以他從前的主張，便大錯特錯。”(同上)

在這裏，孫逸仙一方面指出了馬克思學說的錯誤，另一方面表示出美國的福特汽車廠，就是他最高的理想社會組織。

總之，在上述這些講演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孫逸仙的三民主義，不僅不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而且是反馬克思主義反共產主義的代表當時中國先進階級的要求的新學說。

孫逸仙自己在民生主義的講演中一開始就說：

“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民生主義第一講)

這是什麼原因呢？

這是決不能作為孫逸仙的全部思想，就是社會主義的思想的說明。因為孫逸仙在此處所指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大同主義這些名詞，是指民生主義之極終目的。但這是其極終目的，是一種不能實現的幻想。

這固然不能作為孫逸仙全部思想是社會主義的思想的說明，但却指示了孫逸仙與先進國家第三階級思想家的不同之處。先進國家這些第三階級思想家，把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看做是一個恆久性的制度，私有財產制度將歷萬千年而不破，而孫逸仙

則指出共產主義大同主義之不可避免的前途，所以在他的民生主義的理論體系中，披上了一件淡紅色的外衣。

這一個區別，有人是這樣解釋的：中國在數千年以前就有共產主義大同主義的思想，孔子就是這種思想的一個最著名的代表，所以這是中國固有的國寶，是外國人所沒有的。這樣的解釋顯然是錯誤的。這個區別——就是孫逸仙的理論體系之所以披上了一件淡紅色的外衣的歷史根源，就在於先進國家的第三階級思想家，是生長於資本主義極發達的國家，他們的本身利益又祈禱着這種制度之永恆的存在，所以他們不願也不信有一個危險的前途存在，即是共產主義大同主義將不可避免地到來。可是孫逸仙的處境就完全不同，孫逸仙是生長於經濟落後的中國，他雖然羨慕着福特的理想社會，可是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是資本主義行將崩潰的時代（他的民生主義講演是在一九二四年八月開始的），所以他一方面追慕着行將完結而自己沒有嘗到的甜美的異味，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第四階級的革命，將使共產主義大同主義之必不可倖免的悲劇的到來。這種矛盾的境遇造成了矛盾的意識形態。

我們再來看他的民生主義的兩個主要原則：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究竟是社會主義，還是非社會主義的？

本來這是毫無問題，尤其是在我們詳細舉出了民生主義理



論的基本原則之後，更可以絕無疑義的證明平均地權也好，節制資本也好，都是沒有絲毫社會主義的氣味。但是這必須對於社會經濟有相當的研究，對於階級要求有理解的人，才能明白，所以現在仍舊不免有許多曲解，以為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是社會主義的性質，因此我們對這點還有詳加解釋的必要。

平均地權是什麼一回事呢？孫逸仙自己作了如下的解釋：

“我們的頭一箇辦法，是解決土地問題。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各國不同，而且各國有很多繁難的地方，現在我們所用的辦法，是很簡單很容易的，這個辦法，就是平均地權。……講到了這個問題，地主固然要生一種害怕的心理，但是照我們國民黨的辦法，現在的地主還是很可以安心的。這種辦法是甚麼呢？就是政府照地價收稅和照地價收買。究竟地價是照甚麼樣定法呢？依我的主張，地價應該由地主自己去定，比方廣州長堤的地價，有值十萬元一畝的，有值一萬元一畝的，都是由地主自己報告到政府。至於各國土地的稅法，大概都是值百抽一，地價值一百元的，抽稅一元；值十萬元的，便抽一千元；這是各國通行的地價稅。我們現在所定的辦法，也是照這種稅率來抽稅。地價都是由地主報到政府，政府照他所報的地價來抽稅；許多人以為地價由地主任意報告，他們以多報少，政府豈不是要喫虧麼？譬如地主把

十萬元的地皮，到政府只報告一萬元；照十萬元的代價，政府應該抽稅一千元，照地主所報一萬元的地價來抽稅，政府祇抽得一百元，在抽稅機關方面，自然要喫虧九百元，但是政府如果定了兩種條例，一方面照價抽稅，一方面又可以照價收買，那麼地主把十萬元的地皮，只報一萬元，他騙了政府九百元的稅，自然是占便宜，如果政府照一萬元的價錢去收買那塊地皮，他便要失去九萬元的地價，這就是大大的吃虧了。所以照我的辦法，地主如果以多報少，他一定怕政府照價收買，吃地價的虧；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政府要照價抽稅，喫重稅的虧。在利害兩方面互相比較，他一定不情願多報，也不情願少報，要定一箇折中的價值，把實在的市價報告到政府，地主既是報折中的市價，那麼政府和地主自然是兩不喫虧。”

不待說，這種所謂平均地權的方法，實際上無異等於周文王劃地爲牢的辦法，可是現在已經不是周文王的時代了。

平均地權的最重要的原則是土地國有。於是一班近視眼怪叫起來了：“土地國有，這不是共產了嗎？”

前面已經說過，孫逸仙的全部思想，尤其是他的民生主義，沒有絲毫社會主義的氣味，所以現在我們不是要來研究他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權，土地國有）是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因為我們已



經知道絕對不是的，現在我們要問，這種急進的土地政綱，是有什麼經濟的意義？

烏梁諾夫於一九一二年在新火星上發展的“中國的德謨克拉西與民權主義”的論文中，特別注意於孫逸仙的土地政綱，首先，他指出孫逸仙思想之歷史的根源：

“我們根據孫逸仙的文章（按烏梁諾夫在這篇論文中，開始就這樣說：‘我們在不律爾的社會主義的報紙國民上看到中國臨時政府大總統孫逸仙的論文；這篇論文在我們俄國人看來，是特別有興味的著作。’此處所指的文章，當然就是這篇論文，但不知道這是一篇什麼論文。——其華註），觀察孫逸仙理想之‘社會的意義’在什麼地方。他這理想是深受了世界資本主義文明潮流的數萬萬人民的革命運動而產生的。”

“孫逸仙論文的字裏行間，皆浸潤了一種勇進的真誠的德謨克拉西主義。民族革命的缺點，他是完全了解的。……他的主張是整個的德謨克拉西主義與共和國的要求，關於羣衆狀況及羣衆鬥爭問題，完全熱烈同情於被壓迫的勞動羣衆，極相信羣衆的力量。”

“這偉大民族底真正偉大理想，不僅在垂憐舊的奴隸狀況，也不僅是想像平等與自由，而是能奮鬥與抵抗中國數世

紀的壓迫者。”

烏梁諾夫在敘述了孫逸仙理想之“社會的意義”的歷史根源以後，又指出這落後的中國第三階級的代言人與先進的西方第三階級代言人的不同之點：

“我們對於在野蠻的沉寂的亞洲這個中國臨時大總統（按即指孫逸仙），不禁引起歐美先進文明的各國大總統相比擬，那末這些國家的大總統，一律是腐朽的資產階級的代理人與傀儡，從頭至尾，都是血腥污染着的，這血可不是土耳其，波斯君主，或中國皇帝的血，而是在號稱進化文明之下爲罷工而被槍殺的工人的血。

“那些國家的總統——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早已把他們的少年思想與理論置之腦後，像妓女一般的賣淫到底，終身整個的賣給財主（擁百萬或萬萬的資本家）與資本化的封建地主了。

“至於亞洲新共和國的臨時總統，則是革命的德謨克拉西主義者，他的心充滿了公理心與英勇心，這是階級的風氣；這階級是登山的，而不是下山的——這階級不恐怖於將來，反之極信仰於將來，毫不恐懼而自願犧牲努力去奮鬥。這階級對於舊制度，是非常痛恨……”

烏梁諾夫在比較之下，指出了東方落後國家這種進步的革



命意識的社會意義：

“這是怎麼講呢？這難道表示物質文明發達的西方腐敗了，而神祕的宗教盛行的東方反射放光明了嗎？並非如此，恰恰與此相反；這是表示東方已經走上了西方的道路，新起的數萬萬人民，從此亦轉向西方已創造的思想而奮鬥了。腐朽的是西方資產階級，而牠的面前已經產生了牠的葬埋者——無產階級；現在亞洲還有足稱為真實勇進的德謨克拉西的資產階級，如十八世紀末法國偉大的革命宣傳者和行動者一樣。”

烏梁諾夫在這裏很明白指出了“東方已開始走上了西方的道路”，這點對於我們認識那時中國革命之階級的性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示。他在指出了這種革命之階級性質以後，就說到這種急進的土地政綱之社會的意義：

“但是中國民權派這種勇進的德謨克拉西思想，一方面帶着社會主義的幻想，抱着中國可以超過資本主義階段的希望，他方面又有急進的農村改良政綱。因此這兩種政治思想成為民權派之特色的表現，這就是說，與德謨克拉西主義者有所不同的地方。

“那麼這種思想的發生及其意義是如何呢？——中國德謨克拉西如沒有廣大羣衆革命精神的興起，是不能推翻舊

制度，而爭得創立共和國的。這種興起，必然對於勞動羣衆狀況表示極熱烈的同情，對於壓迫與剝削者引起劇烈的痛恨。懷抱這種精神的中國先進者，以及所有的中國人，於是同時受了歐美解放思想的影響，因為歐美現時已經是要從資本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時候，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的時期，所以中國德謨克拉西主義者自然對於社會主義表示同情，於是就產生了主觀的社會主義。”

這種主觀的社會主義的急進的土地政綱：

“實際上是改變一切基礎之一的政綱，只是改變不動產的私有財產，祇是僅取消封建壓迫的政綱。”

這種急進的土地政綱的矛盾點，就在：

“這種理論，要從純粹理論的缺點上來觀察，就等於小資產階級的反動的社會主義者的理論。因為他完全是主觀地以為中國可以‘超過’資本主義，並認為中國因為落後關係，反易於完成社會革命等等。可是同時孫逸仙自己毫不自覺的，極自然的把他自己的空想的民族派理論，又掃除得乾乾淨淨；實際生活使他又承認：‘中國處於工業極猛烈（即資本主義）發展的前夜。’及‘中國商業（即資本主義）將有極大的發展，經過五十年後，將有許多的上海出現，’即無數富裕的資本家和窮困貧苦的無產階級的中心點出現。”



而這種矛盾的社會意義，則是因爲：

“……用辯證法來看中國社會關係，中國德謨克拉西對西方的社會主義表示極真摯的同情，因此造出一種近於空想的理論；但是根據這種超資本主義的理論，却又實行了純粹資本主義的，而且是最積極的資本主義的土地政綱。

“至於所謂經濟革命究竟是怎裏的呢？在孫逸仙論文的前段，說得非常模糊，捉摸不住。

“經濟革命就是移地租（地貨）於國家，也就是本亨利喬治的精神，用某種統一稅的方法，實行土地國有。孫逸仙所擬的關於真正的‘經濟革命’的內容，除此而外，別無所有。

“因爲農村與上海土地價格的區別，同時地租高低也有不同，於是就把土地‘超越的價格’作爲‘人民的財產’，就是說——土地私有——交於國家，換句話說，卽土地國有。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改良有可能嗎？不僅可能，並且是最純粹的最高尚的思想完成資本主義。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和資本論第三卷，關於這點，曾有詳細的證明——尤其是與羅德伯爾都斯的筆戰，在剩餘價值這本書上，說得更爲明顯。

“土地國有的結果，就是使絕對地代（地租）有消滅的可

能，而僅保留一種等差的地代而已。按照馬克思學說，土地國有是最積極的消滅封建制度土地關係的壟斷，使土地的流通買賣為自由，使土地更適於市場；歷史上所有的諷刺往往如此：民權主義派標榜與資本主義奮鬥的名義，但是在土地問題方面，却採用了助長資本主義更迅速的發展的農業政綱。”

但是我們要問：民權主義派為什麼要“標榜與資本主義奮鬥的名義？”就是要問：“在亞洲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有什麼經濟上的不要，能引起這最先進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土地政綱呢？”烏梁諾夫在這樣的設問之下，答道：

“他的必要，便是破壞封建制度的一切現象與形式。”

因為前面已經說過“中國德謨克拉西如果沒有廣大羣衆革命精神的興起，是不能推翻舊制度”的。要使廣大羣衆革命精神的興起，就需要一種急進的土地政綱，來徹底的破壞封建制度的一切現象與形式。所以烏梁諾夫特別指出：

“中國較歐美與日本更為落後，則其感受分裂與民族崩潰的危險亦更大。只有革命羣衆的英勇精神能在政治上創造共和國，在農村方面用土地國有方法保障資本主義過程更迅速的進行，才能挽救這個危險，使中國復活。”

至於民生主義中的節制資本的辦法，在民生主義講演中，及



孫逸仙的其他言論著作，都沒有詳細的解釋，但我們可以知道這也和平均地權一樣，主觀上有一點社會主義的意味，而實際上是積極發展資本主義的一種政綱。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中，對於民生主義中節制資本的解釋，是：

“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業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節制資本之要旨也。”

可見節制資本的理論，在主觀上多少帶有一點用顯微鏡可以看出來的小布爾喬亞的社會主義的痕跡，但實際上，不過是用積極方法，集中產業經營於握得政權的第三階級之手，藉國家的援助，積極的發展資本主義，這種意識在民生主義講演中充分的表現出來。孫逸仙首先否認中國有階級對峙的存在：

“我們解決社會問題，一定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在中國的這種事實是什麼呢？就是大家所受的貧窮痛苦。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祇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的頂大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其他的窮人都可以說是大貧。中國的大資本

家，在世界上既然是不過一箇貧人，可說中國人通通是貧，並沒是大富，只有大貧與小貧的分別，我們要把這個分別，弄到大家平均，都沒有大貧。”（民生主義第二講）

中國是不是沒有貧富的懸隔呢？當然不是的。中國資本主義不發達是事實，但以爲中國就沒有貧富的懸隔，那簡直是笑話！然而孫逸仙何以要這樣說呢？這是很容易明白的，一切的第三階級思想家，都不願意有階級鬥爭，因而否認社會之階級的對立，孫逸仙當然是不能例外的，所以他進一步的否認中國有貧富懸隔的事實，因而根本否認了中國有階級對峙的現象——孫逸仙很聰明，他不否認資本主義先進國家有階級對立現象，但他堅決的肯定這些現象在中國是不存在的；中國不僅沒有階級對立的現象，而且沒有貧富的區分。

但孫逸仙在有些地方，他是了解解資本主義制度的缺陷，所以他惴惴於共產主義或難倖免的臨到，因而他“特創”了他的民生主義，想去消滅共產主義的危險，他說：

“共產這種制度，在原人時代，已經是實行了，究竟到什麼時代，才打破呢？依我的觀察，是在金錢發生之後，大家有了金錢，便可以自由買賣，不必以貨易貨，由交易變成買賣。到這個時候，共產制度便漸漸銷滅了。由於有了金錢，可以自由買賣，便逐漸生出大商家。當時工業還沒有發達，商人



便是資本家；後來工業發達，靠機器來生產，有機器的人，便成爲資本家，所以從前資本家是有金錢，現在的資本家是有機器，由此可見古代以貨易貨，所謂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時候，還沒有金錢，一切交換，都不是買賣制度，彼此有無相通，還是共產時代。後來有了貨幣，金錢發生，便以金錢易貨，便生出買賣制度，當時有金錢的商人，便成爲資本家。到近世發明了機器，一切貨物，都靠機器等生產，有機器的人，更駕乎有金錢的人之上。所以由於金錢發生，便打破了共產，由於機器發明，便打破了商家，現在資本家有了機器，靠工人來生產，掠奪工人的血汗，生出貧富極相懸殊的兩個階級。這兩個階級，常常相衝突，便發生階級戰爭，一般悲天憫人的道德家，不忍見工人的痛苦，要想方法來解除這種戰爭。減少工人的痛苦，是用甚麼方法呢？就是想把古代的共產制度恢復起來。因爲從前人類頂快活的時代，是最初脫離禽獸時代所成的共產社會。當時人類的競爭，祇有和天鬥，或者和獸鬥，後來工業發達，機器創出，成人與人鬥。從前人類戰勝了天同獸之後，不只有金錢發生，近來又有機器創出。那些極聰明的人，把世界物質，都壟斷起來，圖個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隸，於是變成人與人爭極猛烈的時代。這種鬥爭，要到甚麼時候才可以解決呢？必要再回

復到一種新共產時代，才可以解決。所謂人與人爭，究竟是爭什麼呢？就是爭麵包，爭飯盤；到了共產時代，大家都有麵包和飯吃，便不至於爭，便可以免去人與人爭，所以共產主義就是最高的理想，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我們國民黨所提倡的民生主義，不但是最高的理想，並且是社會的原動力，是一切歷史活動的重心。民生主義能夠實行，社會問題才可以解決；社會問題能夠解決，人類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甚麼分別，要分別還是在方法。”（民生主義第二講）

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雖然孫逸仙在一段講演裏充滿了錯誤——例如他“爲共產主義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倡導出來的；現在共產主義運動，是要恢復古代原始共產制度等等——但是表現了中國第三階級一個玄妙的幻想，就是想以一種不可捉摸的空計劃，來消滅階級鬥爭。這在前面已經說過，在孫逸仙的時代，已經是資本主義崩潰的時代。孫氏一方面極力要使中國走上西方的道路——資本主義道路——另一方面又目擊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行將崩潰的危機，共產主義制度之將不可避免地到來（在孫氏作此講演時俄國的社會革命已經成功）的悲運，孫逸仙是深切地感覺到的。用什麼方法，去避免這可怖的共產主義的到來



呢？孫逸仙很聰明很偉大，他發明了他內高度的改良主義——民生主義——來消滅共產主義。他將這種高度的改良主義，從染缸把黃色染成粉紅色，說這是共產主義的實行。於是，那些腦筋簡單，眼光短視的人，就以爲孫逸仙的最高理想，是共產主義的實現。而實際上却相反，孫逸仙的最高理想，不是實現共產主義，而是消滅共產主義，這在孫逸仙的整個理論體系中，是很明白可以看出的。

總之，孫逸仙的全部思想，決不是社會主義的，却相反，是一種積極發展資本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的學說。至於這種思想之所以由非常之曲側的形態表現出來，這是中國特殊的經濟條件所決定的。

現在我們再來看孫逸仙的民族主義，是一個什麼東西？

孫逸仙的思想的本質，是第三階級的，民族主義既是孫逸仙思想的一部分，當然沒有躡出第三階級的圈子。中國特殊的經濟形態，造成孫逸仙的特殊的思想形態，民族主義就是特殊形態中的一部分。讀過孫逸仙民族主義的講演的人，可知牠的內容不免是貧乏、混亂，但是我們也可以在這裏把握一點東西，就是與中國的特殊的經濟形態相適應的第三階級民族思想的本質。

落後國家的第三階級，在或種情形之下，即在企圖本身的發

展而感覺到帝國主義壓迫的時候，他們是可以參加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而且在或種情形之下，他們可以利用民族情感，煽動勞動階級共同起來作反帝運動。然而第三階級與帝國主義之間，決不是根本對立的，不過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內部矛盾，落後國家第三階級反帝國主義，是爲了帝國主義妨碍了牠的勢力的發展，但牠決不是要根本推翻資本帝國主義的制度，却相反，牠正是希望自己能夠踏着這條道路前進，照帝國主義的模型來創造自己。這種反帝的民族運動，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而絕非反資本主義的。牠們在或種情形之下，領導國內的勞動階級，在民族感情的煽動之下，進行反帝運動，但是當遇到了帝國主義強大的壓迫的時候，牠們就會立刻屈服，立刻出賣牠的戰鬥同盟，尤其是勞動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超過了第三階級駕馭能力的時候，他們立刻就會對帝國主義妥協而對勞動階級反戈相向。一切的落後國家第三階級的民族運動，都逃不出這樣一種情形之外，中國當然也不能例外，孫逸仙的民族思想的內容，當然也是如此。

第一：孫逸仙很明白地表示了他的民族主義目的要學到日本的和歐洲的樣子，這樣子是什麼呢？帝國主義！看吧，孫逸仙露骨地說：

“我們東方有個島國，可以說是東方的英國，這個國家



就是日本。日本國是一個民族造成的，他們的民族，叫做大和民族，自開國到現在，沒有受過外力的吞併，雖然以元朝蒙古的強盛，還沒有征服過他。他們現在的人口，除了高麗臺灣以外，是五千六百萬，百年以前人口的確數，很難稽攷，但以近來人口增加率的比例計算，當係增加三倍，故百年以前的日本人口，約計在二千萬上下。這種大和民族的精神，至今還沒有喪失，所以乘歐化東漸，在歐風美雨中，利用科學新法，發展國家，維新五十年，便成現在亞洲最強盛的國家，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歐美人不敢輕視。我們中國的人口，比那一國都要多，至今被人輕視的原故，就是一則有民族主義，一則無民族主義。日本未維新之前，國勢也是衰弱，所有的領土，不過四川一省大，所有的人口，不及四川一省多，也受過外國壓制的恥辱，因為他們有民族主義的精神，所以便能發奮為雄，當中經過不及五十年，便使衰微的國家，變為強盛的國家，我們要中國強盛，日本便是一個好範模。”（民族主義第一講）

但日本也是學歐洲而來的，所以孫逸仙的希望，也不能不要進一步：

“……亞洲今日因為有了強盛的日本，故世界上的自種人，不但是不敢輕視日本人，並不敢輕視亞洲人；所以日本

強盛之後，不但是大和民族可以享頭等民族的尊榮，就是其他亞洲人，也可以抬高國際的地位。從前歐洲人能夠做的事，我們不能夠做，現在日本能夠學歐洲，便知我們能夠學日本；我們可以學到像日本，也可知將來可以學到像歐洲。”

(同上)

在這裏，民族主義的開宗明義第一章，孫逸仙自己已經說得很清楚，不待我們再來解釋了。

第二：是民族中心說。在孫逸仙看來，一切當以民族主義作中心，什麼社會主義，什麼階級利益階級鬥爭，在民族主義之前，都應該被揚棄的。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第三階級的民族思想，又帶有法西斯蒂的意味。這也是不足奇的，中國不比歐美，甚至不及日本，在這資本主義的世界，中國是很落後的，中國第三階級要從世界壓迫的環境中奮鬥出來，非有一個法西斯蒂的民族精神不可，雖然因為中國經濟過於落後，第三階級過於幼稚，以致這種運動不能發展，然而在孫逸仙的整個的思想體系中，充滿了這種法西斯蒂的精神，特別是在他的民權主義中（詳後）。他在民族主義講演中，很肯定地說：

“我們鑒於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國，想中國民族永遠存在，必須提倡民族主義。”（第一講）

在民族中心的原則之下，當然要排斥一切與民族中心不能



相容的思想，特別是要排斥階級鬥爭與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在民生主義講演中，孫逸仙對於階級鬥爭說力斥其非，尤其是否認中國階級的對峙（據孫逸仙說，中國祇有大貧小貧之分而已，）雖然在民生主義中，他也曾侈談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然而字裏行間，總不能掩飾他的反社會主義的真面目。在民族主義講演中，則露骨地反對國際主義。在民族主義第三第四講中，充滿了“指鹿罵馬”的對於國際主義的攻擊，節錄幾段如下：

“……這個思想是有智識的學者提倡出來的，這是什麼思想呢？是反對民族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說民族主義是狹隘的，不是寬大的，簡直的說，是世界主義。現在的英國和以前的俄國德國，以及中國現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都贊成這種主義，反對民族主義。我常聽見許多新青年說，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不合現在世界的新潮流，現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義是世界主義。究竟世界主義是好不好呢？如果這個主義是好的，為什麼中國一經亡國，民族主義就要消滅呢？世界主義，就是中國二千多年以前所講的天下主義。我們現在研究這個主義，他到底是好不好呢？理論上講，不能說是不好，從前中國智識階級的人，因為有了世界主義思想，所以滿清入關，全國就亡，康熙就是講世界主義的人……世界上的國家，擊帝國主義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牠的特殊地

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提倡世界主義，要全世界都服從，中國從前也想做全世界的主人翁，總想站在萬國之上，故主張世界主義……”(第三講)

“……近來講新文化的學生也提倡世界主義，以為民族主義不合世界潮流。這個論調，如果是發自英國美國，或發自我們的祖宗，那是很適當的，但是發自現在的中國人，這就不適當了。……”(第三講)

“……強盛的國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經雄佔全球，無論甚麼國家或甚麼民族的利益，都被他們壟斷，他們想永遠維持這種壟斷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復興，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義，謂民族主義的範圍太狹隘，其實他們主張的世界主義，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與變相的侵略主義……”(第四講)

“我們今日要把中國失去了的民族主義恢復起來，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這才算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天職，列強因為恐怕我們有了這種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種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張世界主義來煽惑我們，說世界的文明進步，人類的眼光要遠大，民族主義過於狹隘，太不適宜，所以應該提倡世界主義。近日中國的新青年，主張新文化，反對民族主義，就是被這種道理所誘惑，但是這種道理，



不是受屈民族所應講的，我們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上講世界主義……我們知道世界主義是從什麼地方發生出來的呢？是從民族主義發生出來的。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也就不能發達……”(第四講)

在這裏，孫逸仙講了一大篇反對世界主義的大道理，我們得先指出他的指鹿爲馬的玄虛。孫逸仙在這裏所指的中國新青年的新文化運動，是指五四運動以後。五四運動以後一般進步青年的思想，的確是傾向着國際主義一方面，但這決不是孫逸仙所指的帝國主義麻醉落後民族的侵略主義的世界主義，而是由俄國十月革命影響而來的國際社會主義。孫逸仙把馬克思烏梁諾夫的眼，寫在威爾遜勞合喬治的名下，這種玄虛是一望可知的，因爲要在進步青年的面前，消滅馬克思烏梁諾夫的影響，這是很困難的事，把威爾遜勞合喬治這種帝國主義的臣僕來抵擋一下，問題就容易解決了。所以孫逸仙反對的世界主義，他的表面理由是威爾遜勞合喬治的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而實際上，是馬克思烏梁諾夫的國際社會主義。對於帝國主義與國際社會主義這兩種對立的東西，孫逸仙顯然有不同的態度，對於前者，孫逸仙祇是在現階段取反對態度，他認爲他的民族主義是要發展到帝國主義。

即他所謂的世界主義)的階段的,這,他是明明白白的說出了的。他以為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帝國主義)的初步必經階段,這也是對的。這兩種東西——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原是在一個體系之內,決不是兩個對立的制度。但是民族主義與國際社會主義,這是代表兩個完全對立的制度。孫逸仙在這裏所解釋的,以為世界主義是帝國主義的一種侵略主義,但事實上,我們知道他所反對的中國新青年的世界主義是國際社會主義。中國特殊的經濟條件,產生了這位第三階級革命家的曲線的思想體系,這種思想上的曲線美,必須對於中國經濟有深刻認識的人,纔能理解。

第三:是對於舊道德的尊重。孫逸仙雖然一方面侈談馬克思烏梁諾夫主義,但他對於中國的封建舊道德,是十分留戀,十分尊重的;保存舊道德,就是他的民族主義的中心思想之一。

“中國從前能夠達到強盛的地位,不是一個原因做成的,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於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亞洲古時最強盛的民強,莫過於元朝的蒙古人,蒙古人在東邊征服了中國,在西邊征服了歐洲;中國歷代最強盛的時候,國力都不能夠過裏海的西岸,祇能夠到裏海之東。故中國最強盛的時候,國力都不能達到



歐洲。元朝的時候，全歐洲幾被蒙古人吞併，比起中國強盛的時候，還要強盛多。但是元朝的地位，沒有維持很久，從前中國各代的國力，雖然比不上元朝，但是國家的地位，各代都能夠長久，推究其中的原因，就是元朝的道德，不及中國其餘各代的道德那樣高尚。從前中國民族的道德，因為比外國民族的道德高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國到外來的蒙古人，後來蒙古人還是被中國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國到外來的滿洲人，後來滿洲人也是被中國同化。因為我們中國的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還能夠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夠存在，並且有力量能夠同化外來的民族。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民族主義第六講）

中國的舊道德究竟是什麼呢？孫逸仙列舉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他對於這些舊道德作了詳細的說明：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講解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

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爲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現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爲到了民國，便可以不講忠字，以爲從前講忠字，是對於君的，所謂忠君，現在民國沒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這種理論，實在是誤解的。因爲在國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有國呢？我們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於國呢？我們到現在說忠於君，固然是不可以，說忠於民，是可不可呢？忠於事又是可不可呢？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所以古人講忠字，推到極點便是一死。古時所講的忠，是忠於皇帝；現在沒有皇帝，便不講忠字，以爲甚麼事都可以做出來，那便是大錯。現在人人都說到了民國，甚麼道德都破壞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國，要爲四萬萬人去效忠。爲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爲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爲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



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古時在政治一方面所講愛的道理，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於甚麼事，都是用愛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對於仁愛，他竟是怎麼樣實行，便可以知道。中外交通之後，一般人便以中國所講的仁愛，不及外國人，因為外國人在中國設立學校，開辦醫院，來教育中國人，救濟中國人，都是為實行仁愛的。照這樣實行一方面講起來，仁愛的好道德，中國現在似乎遠不如外國。中國所以不如的原故，不過是中國人對於仁愛沒有外國人那樣實行，但是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我們要學外國，祇要學他們這樣實行，把仁愛恢復起來，再去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的精神。

“講到信義，中國古時對於隣國和對於朋友，都是守信的。依我看來，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在甚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商業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國人交易，沒有甚麼契約，祇要彼此口頭一句話，便有很大的信用。比方外國人和中國人訂一批貨，彼此不必立合同，祇要記入賬簿，便算了事。但是中國人和外

國人訂一批貨，彼此便要立很詳細的合同，如果在沒有律師和沒有外交官的地方，外國人也有學中國人一樣祇記入帳簿便算了事的，不過這種例子很少，普通都是要立合同。逢着沒有立合同的時候，彼此定了貨到交貨的時候，如果貨物的價格太賤，還去買那一批貨，自然要虧本，譬如定貨的時候，那批貨價，訂明是一萬元，在交貨的時候，祇值五千元，若是收受那批貨，便要損失五千元。推到當初訂貨的時候，沒有合同，中國人本來把定的貨，可以辭卻不要，但是中國人爲履行信用起見，甯可自己損失五千元，不情願辭去那批貨。所以外國在中國內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贊美中國人，說中國人講一句話，比外國人立了合同的，還要守信用得多。但是外國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和日本人訂貨，縱然立了合同，日本人也常不履行。譬如定貨的時候，那批貨訂明一萬元，在交貨的時候，價格跌到五千元，就是原來有合同，日本人也不要那批貨，去履行合同。所以外國人常常和日本人打官司，在東亞住過很久的外國人，和中國人與日本人都做過了生意的，都贊美中國人，不贊美日本人。至於講到義字，中國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比方從前的高麗，名義上是中國的藩屬，實在是一個獨立國家，就是在二十年以前，高麗還是獨立，到了近一二十年，高麗才



失去自由。從前有一天，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談論世界問題，當時適歐戰正劇，日本方參加協商國去打德國，那位日本朋友說，他本不贊成日本去打德國，主張日本要守中立，或者參加德國來打協商國，但說因為日本和英國是同盟的，訂過了國際條約的，日本因為要講信義，履行國際條約，故不得不犧牲國家的權利，去參加協商國，和英國共同去打德國。我就問那位日本人說，日本和中國不是立過了馬關條約嗎？該條約中最要之條件不是要求高麗獨立嗎？為甚麼日本對於英國，能夠犧牲國家權利去履行條約；對於中國，就不講信義，不履行馬關條約呢？對於高麗獨立，是日本所發起所要求，且以兵力脅迫而成的，今竟食言而肥，何信義之有呢？簡直的說，日本對於英國，主張履行條約；對於中國，便不主張履行條約。因為英國是很強的，中國是很弱的。日本加入歐戰，是怕強權，不是講信義罷。中國強了幾千年而高麗猶在，日本強了不過二十年，便把高麗滅了。由此便可見日本信義不如中國，中國所講的信義，比外國要進步得多。

“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和民族，止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近年因為經過許多大戰，殘殺太大，才主張免去戰爭，開了好幾次和平會議，像從前的海牙會

議 歐戰之後的華賽爾會議 金那瓦會議，華盛頓會議，最近的洛桑會議，但是這些會議，各國人共同去講和平，是因為怕戰爭，出於勉強而然的，不是出於一般國民的天性。中國人幾千年來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 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第六講)

孫逸仙在這裏，對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統下的封建的舊道德，唱了一大篇讚美詩，這有什麼意義呢？這就是表示落後的中國第三階級，因為經濟條件的限制(資本主義不能暢利發展)，以致不能充分發揮其個人主義，而戀戀於這些殘廢的封建遺產。這裏有一個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孫逸仙既揚棄了社會主義的思想，而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孫逸仙作此講演時在一九二四年)，已經是資本主義向下崩潰的時代，資本主義文化表現在道德方面的，已有許多為人唾棄，這使這位中國第三階級革命家不能不翻出一點祖宗所遺下的老古董作工具。在這些地方，都是表現了生長於沒落期的落後的中國第三階級的徬徨動搖矛盾張皇的



神態！

現在讓我們來解剖孫逸仙的民權主義。

不知道內容的人，以為民權主義當然是一種民主主義，孫逸仙自己，也是以民主主義自稱的，然而究其實際，孫逸仙的民權主義，完全是反民主主義而含有法西斯蒂的意義，就下列幾點中可以證明：

(一)對於自由之嚴格的限制；

(二)否定天賦人權平等之說，認為人類生成就不平等；“先知先覺”的人應該領導一切；

(三)發明所謂“權能分開”，實際是否認大眾有過問政治之權。

以上這三個含有法西斯蒂意義的反民主的特點，是充分地表露在孫逸仙民權主義的講演中，現在就他自己所說的來加以觀察。

關於第一點，孫逸仙是用了極大的努力，說明中國人不僅不需要自由，而且正是犯了太過自由的弊病，所以孫逸仙的“民權主義”，不是要給中國人民以自由，而是限制中國人民的自由。

“……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一方面說中國人不懂自由，一方面又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兩種批評，實在是互相矛盾。中國人既是一片散沙，本是很有充分自由的。如果成一

片散沙，是不好的事，我們趁早就要參加水和土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土敏土，彼此結合，來成石頭，變成很堅固的團體。到了那個時候，散沙便不能夠活動，便沒有自由。所以中國人現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國人的本質，中國的自由，老早就很充分了。不過中國人原來沒有自由這個名詞，所以沒有這個思想。但是中國沒有這個思想，和政治有甚麼關係呢？到底中國人有沒有自由呢？我們拿一片散沙的事實來研究，便知道中國人有很多的自由；因為自由太多，故大家便不注意去理會……”（民權主義第二講）

“……外國人不識中國歷史，不知道中國人民自古以來，都有很充分的自由，這自是難怪，至於中國的學生，而竟忘卻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這個先民的自由歌，却是大可怪的事！由這個自由歌看起來，便知中國自古以來，雖無自由之名，而確有自由之實，且極其充分，不必再去求了。”（同上）

孫逸仙博士引據經典，“證明”中國人民“太過於自由”（？），這真不愧是“先知先覺”的偉大的天才的奇妙的發現！中國人民既然過於自由，致生弊病，當然現在應該限制自由，以救其弊。於是乎，孫逸仙的法西斯蒂的民權理論，就在這裏殿下了一塊基石，全部的法西斯蒂的民權理論，就在這基石上展開起來。



我們要問：爲什麼中國人民太過於自由呢？孫逸仙作了如下的答覆：

“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破壞之後，專制淫威，不能達到普通人民。由秦以後，歷代皇帝專制的目的，第一是要保守他們自己的皇位，永遠家天下，使他們子子孫孫，可以萬世安享，所以對於人民的行動，於皇帝有危險的，便用很大的力量去懲治，故中國一個人造反，便連到要誅九族。這種嚴重的刑罰，去禁止人民造反，其中用意，就是專制皇帝要永遠保守皇位。反過來說，如果人民不侵犯皇帝，無論他們是做甚麼事，皇帝便不理會。所以中國自秦以後，歷代的皇帝都祇顧皇位，並不理民事，說到人民的幸福，更理不到。現在民國有十三年，因爲政體混亂，還沒有功夫去建設，人民和國家的關係，還沒有理會。我們回想到民國以前，清朝皇帝的專制，是怎麼樣呢？十三年以前，人民和清朝皇帝有甚麼關係呢？在清朝時代，每一省之中，上有督撫，中有府道，下有州縣佐雜，所以人民和皇帝的關係很小，人民對於皇帝祇有一個關係，就是納糧，除了納糧之外，便和政府沒有別的關係。因爲這個原故，中國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人民不管誰來做皇帝，祇要納糧，便算盡了人民的責任；政府要人民納糧，便不去理會他們別的事，其餘聽人民自生自

滅。由此可見中國人民直接並沒有受過很大的專制痛苦……”(同上)

孫逸仙一則曰“專制淫威不能達到普通人民”，再則曰“中國人民直接並沒受過很大的專制痛苦”，所以他就以為中國人民並不缺乏自由，反而過於自由。但是事實上，孫逸仙所說的，並不是事實，中國的專制剝削，所給予人民的痛苦，決不亞於歐洲封建時代封建諸侯所給予人民的痛苦。如若果如孫氏所說，則中國不會發生革命，尤其是孫逸仙領導的反滿清的革命沒有意義。事實上，正因為有了這種殘酷的專制剝削，人民忍受不了，所以纔發生革命。然而孫逸仙之所以要如此說法，不過是要建立他的法西斯蒂民權理論的基礎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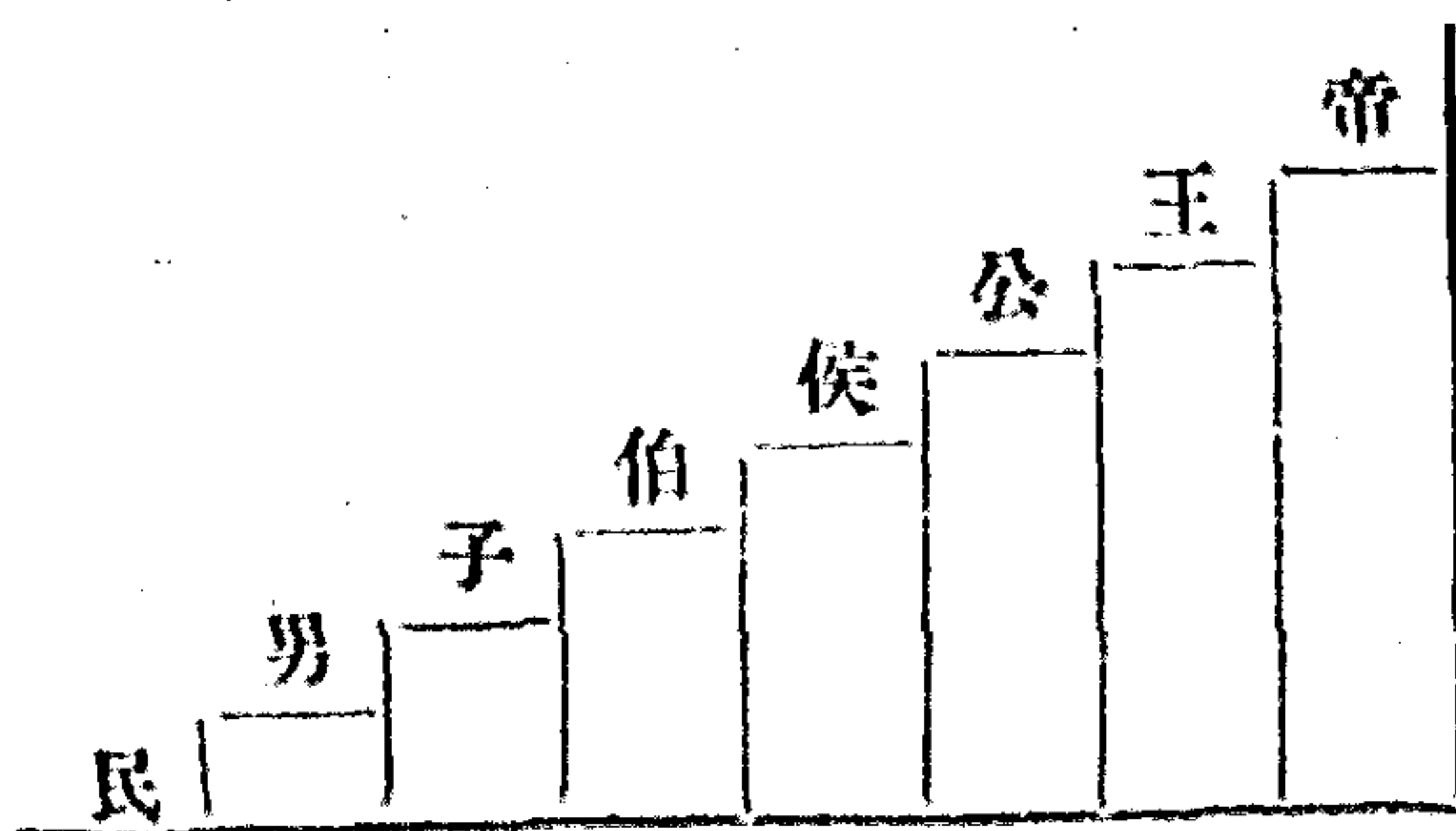
第二點，孫逸仙堅決地否定了人類天賦平等權利之說，他以為無論如何。人類就天生成是不平等的：

“……甚麼叫做平等，平等是從那裏來的呢？歐美的革命學說，都講平等是天賦到人類的，譬如美國在革命時候的獨立宣言，法國在革命時候的人權宣言，都是大書特書，說到平等自由是天賦到人類的特權，人類不能侵奪的，天生人類，究竟是否賦有平等的特權呢？請先把這個問題拏來研究清楚，從前在第一講中，推到民權的來源，自人類初生幾百萬年以前，推到近來民權萌芽時代，從沒有見過天賦有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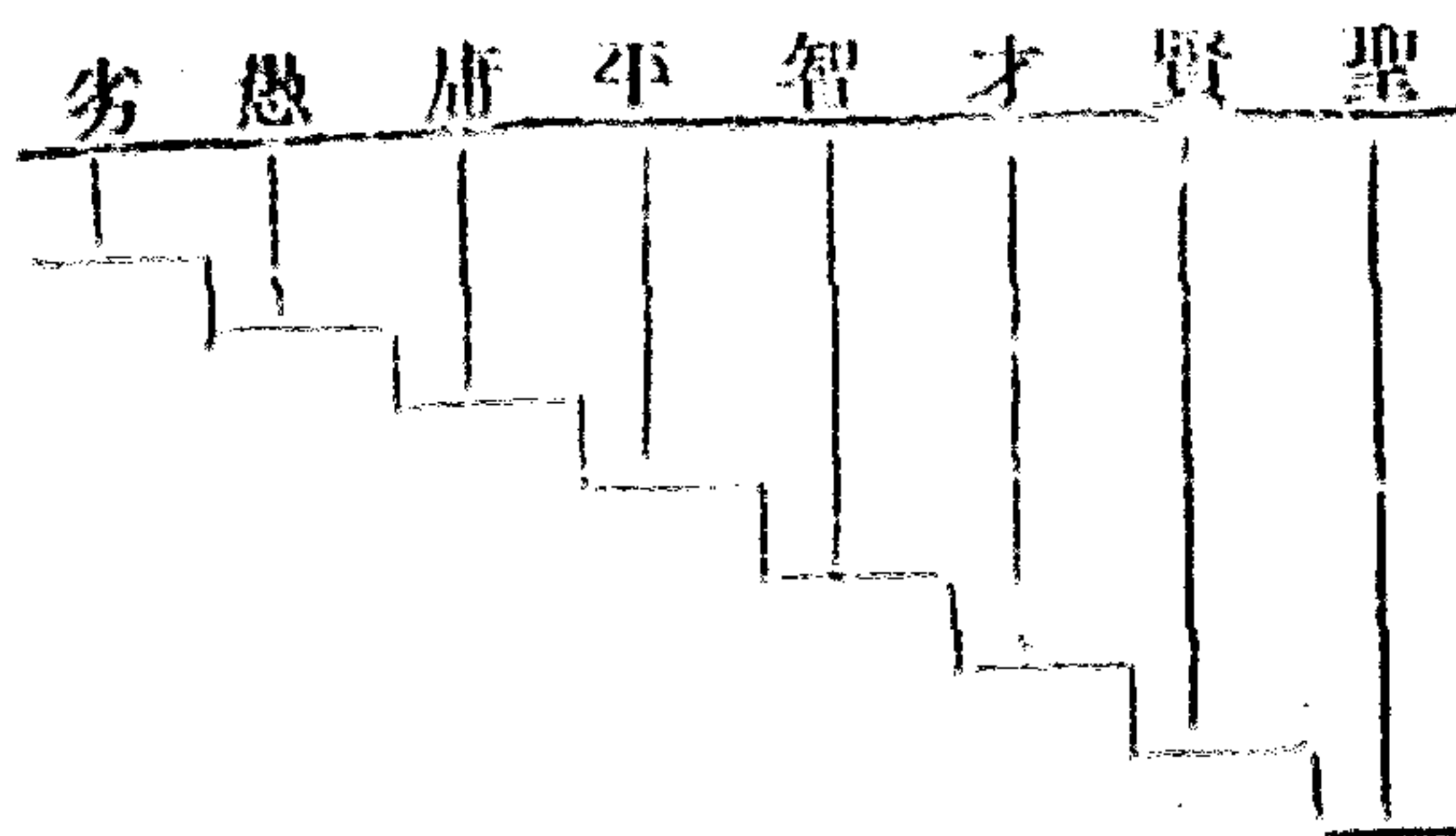


的道理，譬如用天生萬物來講，除了水面以外，沒有一物是平的，就是擊平地來講，也沒有一處是真平的……，因此可見天地間所生的東西，總沒有相同的。既然都不相同，自然不能夠是平等。自然既沒有平等，人類又怎樣有平等呢？天生人類，本來也是不平等的……”（民權主義第三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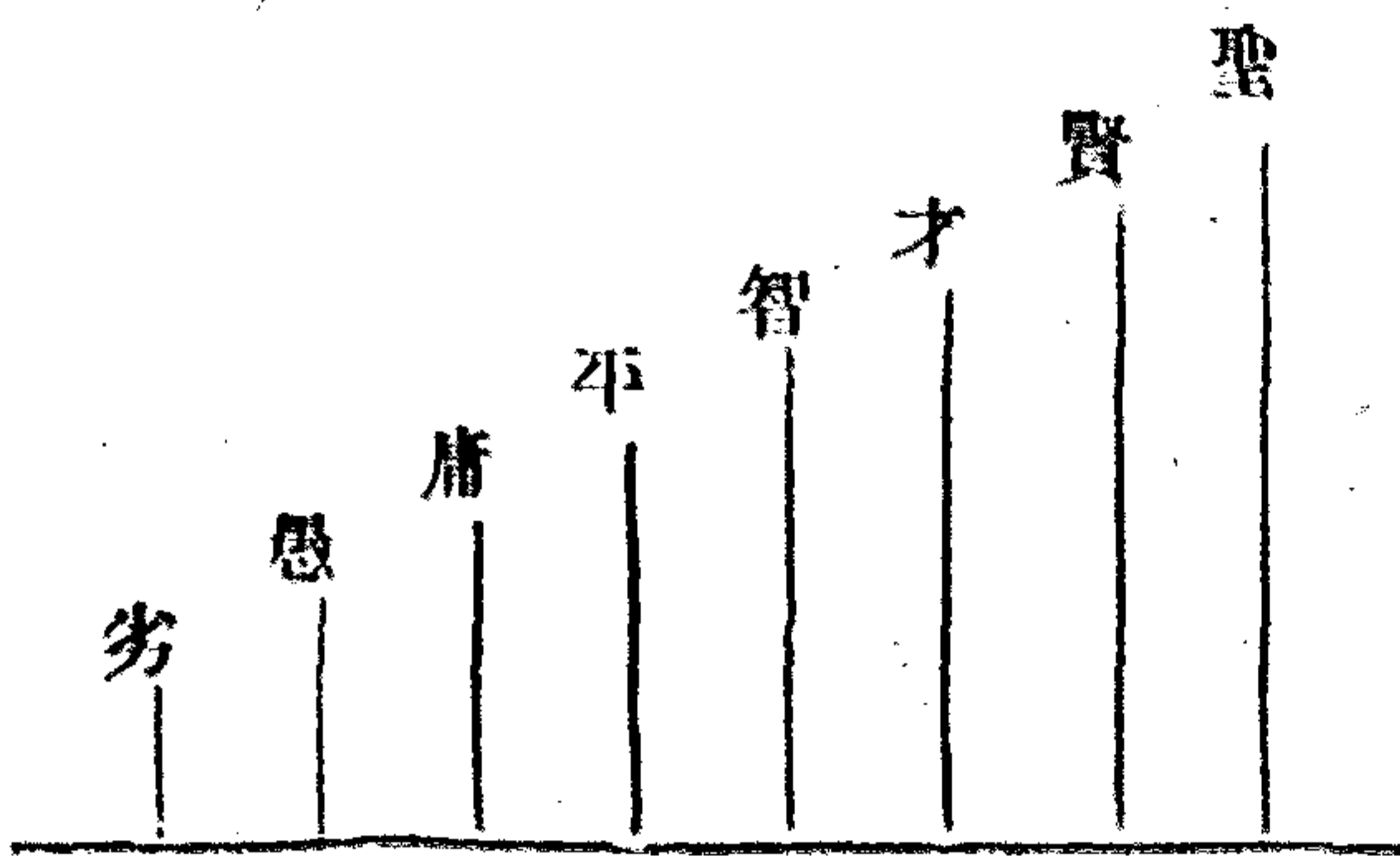
人類是怎樣不平等呢？孫逸仙曾畫了幾個圖。他以為在專制社會，人類的不平等，有如下圖：



到了共和時代，表面是沒有帝王公侯伯子男民等的分類，表面是平等了，但據他的意見，這是假平等，因為他的平頭點雖然是平等的，而牠的立腳點還是灣曲綫的，如下圖：



據孫逸仙的意見，這樣的假平等是要不得的，他的民權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要造成如下圖的立腳點的平等：



孫逸仙以爲人類既是天生不平等的，現在祇有退一步的做到“人爲的平等”：

“……請諸君細看第一圖，……因爲有這種人爲的不平等，在特殊階級的人，過於暴虐無道，被壓迫的人民，無地自容，所以發生革命的風潮，來打不平。革命的始意，本是在打破人爲的不平等，到了平等以後，便可了事。但是占了帝王地位的人，每每假造天意，做他們的保障，說他們所佔的特殊地位，是天所授與的，人民反對他們，便是逆天。無知識的民衆，不曉得研究這些話，是不是合道理，祇是盲從附和，爲君主去爭權利，來反對有知識的人民，去講自由平等。因此贊成革命的學者，便不得不創天賦人權的平等自由這一說，以打破君主的專制。學者創造這一說，原來就是想打破人爲



的不平等的，但是天下的事情，的確是行易知難，當時歐洲的民衆，都相傳帝王是天生的，都是受了天賦之特權的，多數無知識的人，總是去擁戴他們，所以少數有知識的學者，無論用甚麼力量和方法，總是推不倒他們，到了後來，相信天生人類都是平等自由的，爭平等自由，是人人應該有的事，然後歐洲的帝王，便一個一個不推自倒了。不過專制帝王推倒以後，民衆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這一說，便日日去做工夫，想達到人人的平等。殊不知這種事是不可能的，到了近來，科學昌明，人類大覺悟了，才知道沒有天賦平等的道理。假若照民衆相信是那一說去做，縱從不顧真理，勉強做成功，也是一種假平等，像第二圖一樣。必定要把位置高的壓迫下去，成了平頭的平等，至於立腳點，還是灣曲綫，還是不能平等，這種平等，不是真平等，是假平等。說到社會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點的地位平等，後來各人根據天賦的聰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為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結果，當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當然不能有平等。像這樣講來，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如果不管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就是以後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所以我們講民權平等，又要世界有進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

地位平等，因為平等是人為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故革命以後，必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點都是平等，好像第三圖的底綫，一律是平等，那才是真平等，那才是自然之真理。”（民權主義第三講）

這一大篇，無非是說明人類天生的不平等。

區別人類的等級，不從經濟條件上去區分，而從人類的知識上去區別，這是第三階級否認階級對峙的特點。他們爲了本身的利益，不願意提示與第四階級的對峙的真相，他們否認這種經濟上劃分階級的意義，而以爲人類的的不平等，由於天賦的知識上的不同。這就是說，聖賢是天賦的聖賢，愚劣是天賦的愚劣，不幸而生爲愚劣，則應該無條件的聽聖賢者的驅使，否則就無異是“逆天”。這種說法，即等於說君主的生殺特權是由天賦的一樣。

我們承認人類知識是不平等的，但是這不平等決不是天生的，而是經濟條件造成的。受了充分的教育，自然就有充分的智識；但是在這資本主義社會，祇有有產階級才享有受充分教育的特權，無產階級謀生之不遑，自然更沒有受充分教育的機會；既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自然不能有充分的知識，自然祇能爲愚爲劣，而聖人賢人，也祇有受充分教育的有產階級才有可能做到。所以認爲聖賢是天賦的，這無異承認有產階級的經濟特權是天賦的。孫逸仙既認爲愚劣者應該無條件受聖賢者的支配，這就是



認為無產者應該無條件的受有產者的支配。這是孫逸仙的民權理論的中心，也是一切佔有經濟特權的第三階級的共同說法。

孫逸仙更進一步的說：

“我們對於人類的分別，是何所根據呢？就是根據於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照我的分別，應該有三種人：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這種人有絕頂的聰明，凡見一件事，便能夠想出許多道理，聽一句話，便能夠做出許多事業，有了這種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覺。由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預先想出了許多辦法，做了許多事業，世界才有進步，人類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覺的人，是世界上的創造者，是人類中的發明家。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比第一種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夠創造發明，只能夠跟着摹倣，第一種人已經做出來了的事，他便可以學到。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雖有人指教道，他也不能知，祇能去行。……”（民權主義第五講）

這種說法，依然是根據聖賢愚劣等分別而來，不過聖賢愚劣有八等，而此處祇有三等；但這三等分法，是更合乎邏輯。孫逸仙雖然不肯也不能從經濟上指出這三種人的階級意義，然而我們很明白，孫逸仙所說的三種人，從經濟上分析起來，先知先覺在經濟術語上說起來，就是第三階級——就是孫逸仙所代表的階

級——後知後覺就是小有產階級，不知不覺就是第四階級。

據孫逸仙說來，先知先覺的人，是天賦的聖賢，是世界文明的創造者，是人間的上帝，後知後覺者應該跟着他走，不知不覺者當然更應該絕對的奉之如神明。人類的文明，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如果不知不覺者不服從先知先覺的指導，那簡直是逆天，是造反，那還了得！

“……就是世界上的大事，也都是全靠着那三種人來做成的，但是其大部分的人，都是實行家，都是不知不覺，次少數的人，便是後知後覺，最少數的人，才是先知先覺。世界上如果沒有先知先覺，便沒有發起人，如果沒有後知後覺，便沒有贊成人，如果沒有不知不覺，便沒有實行的人。世界的事業，先要發起人，然後又要許多贊成人，再然後又要許多實行者，才能夠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進步，都是靠這三種人……”(同上)

在這裏，孫逸仙又發揮了他的階級調和的理論。就是說，社會的進化，是要靠這三種人合作——更露骨點說：不知不覺和後知後覺的人，應該絕對服從先知先覺的人指導，因為先知先覺者是世界文明的創造者，是人間的上帝，他們是天賦有統馭萬民的特權的！

在這樣一個出發點之下，自然再不能有所謂平等，有所謂民



主，有所謂民權了；如有，那是逆天，那是爲孫逸仙的法西斯蒂的民權思論所不容的！

關於第二點，孫逸仙自詡爲他“新發明”的“權能分開”說，實際上是上述第二點理論的擴充。

“……我們革命，主張實行民權，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到了了一個解決的方法。我的解決方法，是世界上學理中的第一次的發明。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根本辦法……這是甚麼辦法呢？就是權與能要分別的道理。這個權與能要分別的道理，從前歐美的學者沒有發明過。究竟甚麼是叫做權與能的分別呢？要講清這個分別，便要把我從前對於人類分別的新發明再拿來說一說。”（同上）

這個所謂“對於人類分別的新發明”，就是發明人類天生不平等的有三種人，即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在這裏，孫逸仙發揮了他的“諸葛亮主義”：

“……譬如諸葛亮是很有才學的，很能幹的，他所輔的主，先是劉備，後是阿斗。阿斗是很庸愚的，沒有一點能幹，因爲這個原因，所以劉備臨死的時候，便向諸葛亮說：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而代之。劉備死了以後，諸葛亮的道德還是很好的，阿斗雖然沒有用，諸葛亮依然是忠心輔佐，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由這樣看來，在君權時代，君主雖然沒

有能幹，但是很有權力，像三國的阿斗和諸葛亮，便可以明白：諸葛亮是有能沒有權的，阿斗是有權沒有能的。阿斗雖然沒有能，但是把甚麼政事都付託到諸葛亮去做，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夠成立很好的政府，並且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吳魏鼎足而立。用諸葛亮和阿斗兩個人比較，我們便知道權和能的分別。專制時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業，雖然沒有能幹，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沒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權。現在成立共和政體，以民為主，大家看四萬萬人是那一類的人呢？這四萬萬當然不能都是先知先覺的人，多數人也不是後知後覺的人，大多數都是不知不覺的人。現在民權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這四萬萬人都是很有權的。很有權力，能夠管理政治的人，就是這四萬萬人。大家想想現在的四萬萬人，就政權一方面說，是像甚麼人呢？照我看起來，這四萬萬人都是像阿斗。中國現在有四萬萬阿斗，人人都是很有權的。阿斗本是無能的，但是諸葛亮有能，所以劉備死了以後，西蜀還能夠治理。……當時阿斗知道無能，把國家全權，付託諸葛亮，要諸葛亮替他去治理，所以諸葛亮上出師表，便獻議到阿斗，把宮中府中的事，要分開清楚，宮中的事，阿斗可以去做，府中的事，阿斗自己不能去做。府中的事是甚麼事呢？就是政府的事。諸葛亮把宮中府



中的事分開，就是把權和能分開。所以我們治理國家，權和能一定要分開……”(同上)

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現在四萬萬人民都是阿斗，不配過問政治，應該把大權交給諸葛亮一人，一切都由諸葛亮去支配，阿斗不必過問——阿斗如果要過問，政治就弄不好，國家就不能強盛。這種“諸葛亮主義”，就是孫逸仙新發明“權與能分開”的理論基礎。但是這諸葛亮主義的本質是什麼呢？完完全全是法西斯蒂的獨裁理論，決不是什麼民主民權理論！

總之，孫逸仙的思想，偉大而複雜，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封建舊道德起，直到馬克斯列甯的共產主義，蒲魯東巴枯甯的無政府主義，莫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無所不有。爲什麼中國第三階級革命家的思想，是如此奇特而多角呢？如前所述，這是中國的特殊的經濟條件所決定的。前面本已解剖很詳細，現在再簡單的來做一個總結：

第一：因爲中國產業不能充分發達，封建勢力依然是經濟構中的主要成分，所以第三階級的思想還不能完全從封建意識中解放出來，這是孫逸仙主義中所以有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道德的成分（其後形成戴聖賢主義）。

第二：中國產業的落後，固已不必解釋；但現在的整個的時代已經是資本主義沒落的時代，所以第三階級的急進思想家不

能不感受社會主義的影響。尤其是中國第三階級不能激發廣大羣衆，就不能肅清封建殘餘；不能肅清封建殘餘，產業不能充分發展，所以第三階級必須採用急進的“似乎”近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綱，這是孫逸仙主義中有社會主義的影子（其實是瞧不見的影子），也是後來形成陳獨秀主義的原因。

第三：中國第三階級一方面是處於資本主義沒落的時代，一方面又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內受革命勢力的威脅；在這種夾攻的形勢之下，必然地會傾向到法西斯蒂。

這就是孫逸仙主義的內容及其經濟意義！



## 第十五章

### 一九一一年革命底意義

一九一一年革命——辛亥革命。無疑地在中國革命史上占着極重要的一頁。雖然辛亥革命並沒有完成其任務，但牠的歷史意義，依然是不能否認的。

現在，我們先來分析一九一一年革命發生之社會的背景。

第一，我們須先來觀察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的情形：

在義和團運動以前——即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國際帝國主義對華經濟侵略的情形，已詳述如前，即使假定帝國主義的侵

略，至一九〇〇年即行停止，這樣已經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何況一九〇〇年以後，帝國主義的侵略，不僅沒有停止，而且便加猛烈。

一九〇〇年以後的帝國主義對華經濟侵略情形，除一九〇一年辛丑和約中之賠款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兩不算外，其重要者約如下：

第一是商品的掠奪：這種掠奪表現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鉅額的入超上。從一九〇一到一九一一年這一年中，中國的對外貿易數，及其入超額如下：

年度	進口淨數	出口總數	入超實數
1901	268,302,918	169,650,757	98,646,161
1902	315,363,965	214,181,584	101,183,211
1903	326,739,223	214,352,467	112,385,666
1904	344,060,603	233,486,683	104,578,925
1905	447,100,791	227,888,197	219,212,544
1906	410,370,082	236,456,739	173,813,342
1907	416,401,369	264,380,697	152,020,671
1908	394,505,478	278,660,403	117,845,075
1909	418,158,067	338,992,814	79,165,253
1910	462,964,894	380,833,328	82,131,566



1911 472,503,943 278,838,166 94,165,777

(以上單位海關兩)

其次是外國直接在中國領土內經營工業的發達。這種工業中首先是礦業。自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一年這十一年中，帝國主義完全奪取了中國的重要礦山，有如下表：

礦質	地	點	佔據者	礦權者	佔有年
煤	奉天撫順縣	千台山	日本	南滿鐵路會社	1908
煤	奉天遼陽縣	烟台	日本	南滿鐵路會社	1908
煤	吉林	寬子城	日本	南滿鐵路會社	
鐵	南滿路沿綫	鞍山站	日本	南滿鐵路會社	鞍山鐵所
金	外蒙	圖車兩盟	俄國	俄人阿羅德	1903
褐煤	滿洲	黑札關諾爾	俄國	中東鐵路公司	1902
煤及煤油	山西		英國	福公司	1902

至於名爲中外合辦，而實際爲外人所操縱之礦山，這十一年中開辦者有如下各處：

礦質	地	點	性質	礦權者	資本額	開辦期
煤	直隸	臨城等縣	中比	臨城礦務局	3,000,000 佛郎	1905
煤	直隸	井徑縣	中德	井徑礦務局	中德各 200,000元	1906
煤	奉天	本溪縣	中日	本溪湖煤礦公司	中日各 1,000,000元	1910
鐵	奉天	本溪湖庵兒溝	中日	本溪湖煤礦公司	5,000,000元	1910

金	熱河津平平泉 縣等屬	中英	中遠金礦公司	中英各 400,000兩	1911
煤	直隸開平灤州	中英	開灤礦務局	中英各 2,000,000鎊	1876年開 辦1910年 加入英股
鐵煤 油煤	四川	中英	江北中煤公司	17,000,000 元	1906
煤	直隸	中英	開頭溝煤礦局	1,000,000 元	1905
煤	四川	中法	和成公司		1910
各種	福建	中法	大東公司	7,500,000 元	1901
鐵	貴州	中法	大羅公司	2,000,000 元	1906

其次是紗廠及其他工業。這十一年中，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領土內所開設的紗廠及其他重要工廠如下：

名	稱	業別	國籍	地點	開辦年
公益紗廠		紗	英	上海	1907年
喜和第三廠		紗	日	上海	1911年
內外株式會社第九廠		紗	日	上海	1906年
小野田水泥會社		水泥	日	泡子崖	1907年
三林烟公司		烟	日	奉天	1906年
滿洲製粉會社		粉	日	鐵嶺	1908年
東亞烟草株式會社		烟	日	營口	1906年
和豐麵粉公司		粉	日	漢口	1905年
永勝公司		麵	法	哈爾濱	1904年



英美煙公司	烟	英	各地	1902年
大英紙煙公司	烟	英	各地	1902年
其他				

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使農村經濟崩潰的危機日趨嚴重，社會愈形不安；這是一九一一年革命的第一個原因。

在另一方面，新興的第三階級漸漸抬起頭來，造成了一九一一年革命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階級漸漸的抬起頭來，這個事實可以從兩方面來說明：第一是海外華僑勢力的發展，特別是在南洋羣島及美洲一帶的華僑的產業的發展；第二是國內的新興企業也一天天多起來。關於第一個事實，可惜我在這裏不能舉出統計字數來加以說明，至於第二個事實，現將這十一年（一九〇一——一九一一年）中主要的新興企業列表如下：

### 1 礦業

名稱或礦質	地 點	創立年	資 本 額
山東中興煤礦公司	山東	1905	800,000兩
漢冶萍公司	湖北江西	1908	20,000,000元
揚子機器公司	漢口	1907	
錫務公司	雲南	1908	
華昌公司	湖南	1909	1,500,000元

江合公司	重慶	1909	200,000元
梧州練廠	梧州	1906	200,000元
六合溝公司	河南	1907	
山西保晉公司	山西	1903	3,000,000元
煤礦	熱河承德	1904	
煤礦	吉林盤石縣	1903	300,000元
煤礦	湖北竹山	1905	
鉛鋅	湖南桂陽	1904	137,000兩
鉛鋅	湖南長河	1909	170,000兩
錫礦	湖南新化邵陽	1905	327,900兩
錫礦	廣東西江	1910	200,000元
煤油	陝西長延	1906	290,000兩

(以上中外合辦者不在內)

## 2 銀行

名稱	資本總額	成立年	地點
交通銀行	庫平銀10,000,000兩	1908	各地
浙江興業銀行	洋2,500,000元	1903	各地
四明商業銀行	規銀1,500,000兩	1908	各地
廣東銀行	英金1,200,000鎊	1903	各地

(註)資本百萬元以下及各省立銀行未列入



3 紡織業

名	稱	地點	資 本	開辦年
振華紡織公司		上海	800,000兩	1907
申新紡織第二廠		上海	1,000,000元	1907
大生第二廠		崇明	1,200,000元	1907
振新紡織公司		無錫	1,000,000兩	1906
太倉紗廠		太倉		1906
利用紡織公司		江陰	720,000元	1905
廣益紗廠		河南	1,500,000元	1909
和豐紡織公司第一廠		寧波	900,000元	1907
和豐紡織公司第二廠		寧波	600,000元	1907
其他				

4 製粉工業及其他

名	稱	地 點	資 本 額	成立年
東興火磨		傅家甸	50,000盧布	1911
裕順火磨		吉林	50,000元	1910
永遠火磨		阿什河	50,000元	1908
廣記火磨		黑龍江	400,000元	1907
裕順利火磨		寧古塔	50,000元	1907
長甯火磨公司		寧古塔	40,000元	1908

裕順火磨	甯古塔	12,000元	1905
立大麵粉公司	上海	200,000元	1906
立成麵粉公司	上海	50,000元	
中大麵粉公司	上海	200,000元	1907
裕豐麵粉公司	上海	200,000元	1905
大豐麵粉公司	清江浦	200,000元	1906
裕隆麵粉公司	漢口		1909
漢豐麵粉公司	漢口		1906
海豐麵粉公司	海州		1905
華祥製糖公司		450,000元	1910
廣致種植公司	漳州	40,000元	1910
致商茶廠	漢口	1,000,000兩	1907
致合茶廠	福州	250,000元	1910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香港及各地		1906
僑興煙草公司	海南島	10,000,000元	1908
其他			

國內的新興企業既然漸漸抬起頭來，也就是第三階級漸漸抬起頭來，第三階級的優勢的另一方面，就是封建統治的衰弱。

自然，一九一一年革命不是突然發生的，牠有牠歷史的根源。



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引起了鄉村經濟的破產。成羣的農民離開了土地而失業流亡，於是社會的不安一天天嚴重起來，農村的暴動很普遍地發展起來；這種農村暴動之普遍發展無疑是有嚴重的革命意義：這種農村暴動之普遍的發展，必然要成功一個總的政治暴動——一九一一年革命就是這些暴動的總匯。我們不必去計算太平天國義和團這些偉大的農民暴動，單就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一一年這十年間，農村的暴動大大小小無慮有數百起。這些暴動終於造成了一九一一年的革命。

一九一一年革命之所以不同於太平天國，不同於義和團，就是因為一九一一年革命受了第三階級的很大的影響。

第三階級要完成他的歷史任務，必須對封建制度作戰，徹底的掃除社會上之封建勢力，這毫無疑義的是必要的工作。如上所述，這種急進的土地政綱，其任務就是無情地破壞封建制度，掃除封建殘餘。

但是我們要問：中國第三階級有沒有完成這種歷史任務呢？我們的答覆，就是“沒有！”

急進的第三階級革命家，他們企圖努力掃除封建勢力的，但是因為中國第三階級的本身力量過於薄弱，而封建勢力又得到帝國主義的扶植，所以始終沒有完成這個任務。

在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第三階級的革命運動集中其目標

於代表封建貴族的滿清政府，這種反滿清政府的鬥爭，自然就是反封建勢力的鬥爭；但是滿清政府不過是代表封建勢力的一個上層建築，如果毀壞了這個上層建築而沒有澈底破壞牠的真實基礎，則這種封建的上層建築，可以用別一個形態表現出來，所以反滿清政府的勝利，不能完全代表反封建勢力的勝利。一九一一年以前的革命運動，僅僅集中目標於這種代表封建勢力的上層建築，而沒有動搖牠的真實基礎——牠的真實的基礎建築，是落後的農村中的封建剝削關係；要破壞這種封建的剝削關係，必須誘發廣大的農民羣衆來參加革命，根本改造封建的土地關係（實行土地革命）。可是一九一一年以前，革命運動只集中於單純的政治活動與軍事暴動，孫逸仙的土地政綱並沒有引起深刻的乃至些微的影響。所以一九一一年革命雖然推倒了封建貴族的滿清政府，可是並沒有動搖牠的下層的真實基礎，所以封建政治的上層建築，在滿洲政府倒台以後，由一種別的形態（袁世凱的軍閥政府）起而代之。

一九一一年革命決不能算爲民主主義的決定的勝利；恰恰相反：在一九一一年革命中，我們顯然可以看出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已經實行對封建勢力妥協，乃至投降，下面的事實可以證明：

第一，如果我們要在歷史上追訴當時所謂推翻滿清政府的



事實，已經有點滑稽。實在說來，滿清政府並不是完全由革命的民主勢力去推翻；固然，我們決不否認革命的民主勢力的威脅，是滿清政府倒台的一個主要原因，而袁世凱的投機操縱，實在也是滿清政府下台的有力原因之一。袁世凱利用那未曾破壞的封建勢力的下層基礎作為他的根基，實行與革命民主勢力作暫時的妥協，當時南北妥協的第一個條件，就是所謂皇室優待條件。代表革命民主勢力的臨時政府，竟提出了如下的條件：

(甲)優待皇室條件：

1. 清帝退位之後，其尊號仍存不廢，以待外國君主之禮待之；
2. 暫居宮禁，日後退居頤和園；
3. 優待清帝歲俸，年支若干，由新政府主交國會議決，惟不得少於三百萬兩之數；
4. 所有陵寢宗廟，得永遠奉祀，並得民國妥為保護；
5. 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及奉安經費，仍照實用數目支出。

(乙)優待滿蒙回藏人條件：

1. 與漢人平等；
2. 保護其應有之私產；
3. 先籌八旗生計，於未籌足以前，原有口糧，暫存其舊；
4. 從前營業之限制，居住之限制，一律蠲除；

### 5. 所有王公世爵，概仍其舊。

這兩個條件中，前一個優待皇室條件，固然完全表現與封建勢力妥協的傾向，即後一個條件，也顯然是表示對封建勢力讓步。因為滿蒙回藏人與漢人平等，固然是應該，但是要保護他們由非法剝削得來的私產，還要給他們原有的口糧，這已經是極其滑稽；更滑稽的是第五條“所有五公世爵，概存其舊”。至於前一個條件中“清帝退位之後，其尊號仍存不廢……”等等，更是異常荒唐！與臨時大總統宣言中所謂“盡掃專制之流毒”的本旨完全相反。這種滑稽的條件，居然由堂堂的國會正式通過，而且“列於正式公文，由中華民國政府，照會各國駐北京公使。”茲將參議院決定之滿蒙回藏及清室待遇條件原文抄錄於后：

#### 第一清單

##### 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件：

1. 與漢人平等；
2. 保護其原有之私產；
3. 王公世爵，概存其舊；
4. 王公中有生活過艱者，民國得設法代籌生計；
5. 先籌八旗生計，於未籌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餉，仍舊支放；
6. 從前營業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縣聽其自由入



籍；

7. 滿蒙回藏原有之宗教，聽其自由信仰。

以上條件，列於正式公文，由中華民國政府，照會各國駐北京公使。

### 第二清單

(甲 關於清帝遜位後優待之條件

今因清帝贊成共和國體，中華民國於清帝遜位後，優待條件如左：

第一款 清帝遜位之後，其尊號仍存不廢，以待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第二款 清帝遜位之後，其歲用四百萬元，由中華民國給付。

第三款 清帝遜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復居頤和園，侍衛照常留用。

第四款 清帝遜位之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保護。

第五款 清德宗崇陵，未定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均由中華民國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得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招闖人。

第七款 清帝遜位之後，其原有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第八款 原有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其額數俸餉，仍如其舊。

(乙)關於清皇族待遇之條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舊；

二，清皇族對於中華民國國家之公權，及其私權，與國民同等；

三，清皇族私產，一律保護；

四，清皇族免兵役之義務。

以上條件，列於正式公文，由中華民國政府，照會各國駐北京公使，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民主主義對於封建勢力是如何讓步的了。

第二，或許有人以為上述的優待條件，不過是條文上的讓步，不能作為民主主義派對封建勢力的妥協。殊不知這種條文上的讓步，就是對封建勢力妥協之最明確的表示。不僅妥協，而且完全失敗，袁世凱之取得政權，就是一個明證。袁世凱表面上雖然贊成共和，可是實際上處處打擊民主主義派，而造成第二個滿清政府。



第三，在農村方面，孫逸仙的急進的土他政綱，不僅沒有絲毫實現的意義，而且農村的封建剝削，在革命後更其加緊。

如果我們翻開第三階級運動的全部歷史來看，則五四運動不能不說是第三階級歷史上最可紀念的一個運動。也只在五四運動中，第三階級稍稍的給了封建勢力一點打擊；但是這種打擊決不是對於封建勢力的致命打擊（此點詳後）。

第三階級在五四運動以前，始終沒有反對帝國主義，在興中會時代，及同盟會初成立的時候，固然不用說，即在一九一一年革命時，也沒有絲毫反對帝國主義的表示，在臨時大總統的就職宣言中，反而一再申述其對列強表示親善的誠意，如宣言中所云

“若夫革命主義，爲吾儕所倡言，萬國所同喻，前次屢起屢蹶，外人無不鑒其用心；八月以來，義旗颯發，諸友邦對之，抱平和之望，持中立之態，而報紙及輿論，尤每表其同情，鄰誼之篤，良足深謝！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滿清時代的辱國之舉措，及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義，與我友邦益親睦……對外方針，實在於是。”

與帝國主義講親善，講平和主義，真是與虎謀皮！而宣言中所謂列強對革命“尤每表其同情”，更不是事實。臨時政府成立以後，各帝國主義國家並不立刻予以承認，及至袁世凱政府成立以

後，帝國主義對於袁政府才真是“深表其同情”。這是很容易明白的，因為袁世凱政府是代表封建勢力而與革命為敵。帝國主義對於袁政府的幫助，尤其是對於袁政府反對革命黨的一切設施，更是盡力幫助，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鎊的善後大借款，明明白白是袁政府借來用以對付革命黨，所以帝國主義不顧中國民衆的反對，以鉅額金錢資助袁世凱，當時借款的情形如下：

“大借款原於清末，及元年九月十六日，財政總長周學熙，曾列借款辦法，及要求條件，報告參議院。當時參議院以報告事件無會議之必要，至十二月二十七日，趙秉鈞周學熙攜繕就借款情形說帖，及提記六國借款合同要義，并附錄特別條件草稿，出席報告。參議院當時祇將特別條件五款大體，舉手表決；并於第五款中汪榮高提議，本款能刪最好，否則作為附款，萬辦不到即照原案，盡純示政府以交涉範圍而已。此案報告參議院後，以巴爾幹和議將決裂，銀根緊張，遂公布謝絕。無何，借議續開，美總統鑑於條件之苛，不利於中國，毅然仗義宣言，美資本團脫離六國銀行團。美國雖為仗義之舉，其餘各國銀行，毫不易其苛酷之條件，而袁世凱斯時，以宋案暴露，謀制本黨，更急不暇待，於四月二十六日夜半，大借款在匯豐銀行，由趙秉鈞陸徵祥周學熙與匯豐，東方匯理，德華，橫濱正金，道勝五國銀行團簽字，名曰中國政



府善後借款，計：

債額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金鎊

實收額 八五

利息 五厘

担保品 鹽稅收入及海關盈餘

特別條件 銀行團派人爲鹽務總稽核所會辦及各分所  
協理

“是時國會已經開會，參議院已選出正副議長，特衆議院因袁世凱利用金錢，搗亂選舉議長，以故未能開議，袁乃於此時突然違法簽字借款，參議院已選出之正議長張繼，副議長王正廷 先一日聞之，往謁袁世凱，袁拒見，乃遺以書；翌日，袁答云：國家需款孔亟，不能再事遷延，今擬派秘書而陳委曲云。又知本晚爲簽字期，二議長又忠告銀行團主任，謂政府違法借款，必引起反對，又不省；是夜，有議員代表，在匯豐銀行門口候至翌晨，乃趙等至二十七日早兩點三十分簽字，事畢由後門潛去。此案張王以議長資格通電後，各省本因宋案憤激於袁，加以此次違法借款，全國益譁然。此次借款，明係欲以對付本黨……”（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

可見帝國主義是不顧中國民衆的反對，以鉅額金錢資助袁

世凱，固然在一方面是要以此取得苛刻的條件，藉以把持中國主要稅收機關，而另一方面，即其主要用意，是在利用袁世凱政府來對付革命黨。在這些地方，我們顯明地看出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國內的封建剝削聯繫起來。



## 第十六章

### 五四運動——第三階級的第一次活躍

五四運動是中國民族運動史中最有光輝的一頁，其意義實不亞一九一一年革命。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前，除了原始暴動（例如義和團運動）以外，在事實上，並沒有發生過羣衆自覺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這種運動實際上是從五四運動開始。在五四運動以前，中國的民族運動，除了原始暴動以外，都是一種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的活動，而且這種活動中，並沒有鮮明的目標，例如一九一一年革命，

對帝國主義，對封建勢力，都表現異常的妥協。無疑的，真正的國民革命運動，是開始於五四運動；所以五四運動的重要，實在是我們所不應該忽視的。

在一九一一年革命中，第三階級的力量異常薄弱；但在一九一一年，第三階級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有了相當的發展。自然，我這裏之所謂發展，如果與先進的歐美資產階級的發展比較起來，是非常可憐的；但是無論如何，與一九一一年比較起來，又不能與否認其是有相當的發展。

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九年，第三階級之相當的發展的原因，在不明真相的人看起來，以為是一九一一年革命，推翻了滿清專制政府的結果，而事實並不如此。

如前所述，一九一一年革命是失敗了，專制的皇帝政府雖然推翻了，可是繼之而起的，無一不是封建專制的政府——雖然表面上他們帶着民主共和的招牌——專制政治的存在，固然妨礙工商業的發展，而軍閥政府宰割之下，加於不斷的軍閥戰爭，殘酷的雜捐重稅的剝削，其對於工商業發展的妨礙，甚至比滿清專制政府更甚。

第三階級之得到相當的發展，實際上是一九一四——一八年歐洲大戰的結果。因為中國產業之所以不能發展，主要的是由於下面的兩個原因：（一）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二）封建政治的



剝削。尤其是第一個更爲重要。因爲單就對外貿易來說，每年的輸出，都是農產品原料，而輸入的都是製造品(洋貨)，每年入超之數，總是數萬萬兩，至少數千萬兩。就這鉅額的入超看來，可知洋貨在中國市場是占如何的優勢。洋貨既然在中國市場上占了優勢，中國的國貨自然要受排擠而不能發展。再就國內各等工業情形來看，首先最重要的是交通；但是鐵路，航業，差不多都是在帝國主義操縱之下。其次如礦山金融事業，也無不如此。甚至輕工業如紡織工業等，也是這樣。此外，種種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主要的是海關自主權的喪失。所以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中國產業是沒有發展的可能。

一九一四——一八年歐洲大戰發生以後，國際帝國主義因忙於戰爭，除了日本帝國主義外，其餘都無暇來顧及對殖民地落後國家的侵略，所以中國人偷着這個機會，相當的發展了一點產業。

歐洲大戰中中國產業的發展，在下面而各種統計中可以看出。

首先來看對外貿易。下面的表顯示了在歐洲大戰期中入超的減少：

年分	進口淨數	出口總數	入超實數
1912	473,097,031	370,520,403	102,576,627

1913	570,362,557	403,305,546	166,837,011
1914	569,241,382	356,226,619	212,014,555
1915	454,475,719	418,861,164	35,614,555
1916	556,406,995	481,797,866	34,609,629
1917	549,518,774	462,931,630	86,587,144
1918	554,893,082	485,883,031	69,010,051
1919	646,997,681	630,809,411	16,188,669
1920	762,250,230	541,631,300	220,618,269
1921	906,122,439	601,225,637	304,866,903

在大戰中，中國工業最發達的，是紡織業及麵粉業，茲將大戰中國新開的主要的紡織工廠列表如左（一九一九年止）

(甲) 紡織工廠

名	稱	地點	創立年	資本額
申新紡織第一廠、第二廠		上海	1916	3,000,000元
申新紡織第五廠		上海	1916	1,000,000元
鴻裕紡織第一廠、第二廠		上海	1916	3,000,000兩
溥益紡織廠司		上海	1918	1,000,000兩
厚生紡織第一廠、第二廠		上海	1918	2,000,000兩
久安紡織公司		南通		800,000元
勸業紗廠		無錫	1916	200,000元



第十六章 五四運動——第三階級的第一次活躍 379

廣勤紡織公司	無錫	1917	1,000,000元
魯豐公司第一廠	山東臨清	1915	3,000,000元
魯豐第二廠	濟南	1915	2,200,000元
湖南第一紗廠	長沙	1916	600,000元
大生第二廠	海門	1917	2,400,000兩
寶成第一廠	上海	1919	不詳
德大紗廠	上海	1918	不詳
豫豐紗廠	鄭州	1919	2,000,000元
裕紗廠紡織公司	天津	1918	7,200,000元
新集紗廠	北京		150,000元
漢口第一紗廠	漢口	1919	4,200,000元
華新紡織公司津廠	天津	1918	2,700,000元
成興紗廠	河南武步縣	1919	200,000元
裕中第一紗廠	蕪湖	1919	1,000,000元
久興紡織公司	九江		1,000,000兩

(乙)麵粉工業

名	稱	地點	創立年	資 本 額
裕昌源火磨		長春	1914	300,000元
福星麵粉第二廠		上海	1914	1,200,000元
永封麵粉公司		開封	1914	400,000元

華豐麵粉公司	上海	1914	500,000元
九豐麵粉公司	無錫	1915	500,000兩
泰隆麵粉公司	無錫	1914	200,000元
勝泰麵粉公司	蕪水	1914	
天民麵粉公司	北京	1918	200,000元
民豐麵粉公司	天津		1,000,000元
壽星麵粉公司	天津	1916	資本不詳按該公司係中日合辦
福星麵粉公司	天津	1918	600,000元
義昌泰	哈爾濱	1918	100,000元
廣信火磨	哈爾濱	1919	
廣大火磨	哈爾濱	1919	
厚康火磨	哈爾濱	1919	700,000盧布
東興火磨	傅家甸	1918	500,000盧布
安裕火磨	傅家甸	1918	300,000盧布
廣裕火磨	傅家甸	1918	150,000盧布
亞洲興業公司	長春	1918	300,000元
恆茂火磨	吉林	1916	300,000元
湖南麵公司	長沙	1916	200,000元
福新麵粉公司	漢口	1918	550,000元
貽成麵粉公司	鎮江	1915	200,000元



第十六章 五四運動 —— 第三階級的第一次活躍 381

泰來麵粉公司	秦洲	1916	120,000元
大豐益麵粉公司	淮陰	1919	100,000兩
九豐第一廠	無錫	1919	200,000元
元豐麵粉公司	上海	1918	300,000元
長豐益記麵粉公司	上海	1915	100,000兩
信大麵粉公司	上海		500,000元
申大麵粉公司	上海		250,000元
中國麵粉公司	上海	1915	500,000元
中華第一麵粉廠	上海	1918	100,000元
中華麵粉廠	上海	1918	100,000兩
福新麵粉第六廠	上海	1918	200,000元
福新麵粉第二廠	上海	1914	1,200,000元
茂蘭福新麵粉公司	福州	1916	
山東濟麵粉公司	濟南	1917	100,000元
茂新第四麵粉廠	濟南	1917	200,000元
豐年麵粉公司	濟南	1915	1,000,000元
惠豐麵粉公司	濟南	1918	500,000元

至於這個時期新設的銀行，有如下表：

行	名	資 本 總 額	創年務
	浙江地方實業銀行	2,000,00 元	1915年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2,500,000元	1915年
鹽業銀行	5,000,000元	1915年
中孚銀行	2,000,000元	1916年
金城銀行	5,000,000元	1917年
新華儲蓄銀行	1,250,000元	1914年
大陸銀行	5,000,000元	1917年
東亞銀行	10,000,000元	1914年
中國實業銀行	20,000,000元	1919年
東陸銀行	2,000,000元	1919年

(附注)資本百萬元以下及各省立銀行不在內。

此外,如絲廠及其他工業,在此期內,新設者亦不少。

第三階級勢力之相當的發展,是造成五四運動的一個主要原因。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而其主要的目標,特別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直接原因固然是由於廿一條,及山東問題,而其實在的主要原因,是第三階級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

在大戰中,各帝國主義因民族戰爭,無暇東顧,所以對於中國的侵略,比較減輕些。但在同一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則不僅沒有減輕,反而加重;不僅是在政治上攫得很多的



利益。尤其是在經濟上的侵略，更形猛進。

在這個時期，中國對外貿易方面，入超雖然減少了，可是總還是入超。這個入超，大部分是由於日本對華貿易發展的緣故。

在大戰期中，中國的紡織業雖然有相當的發展，但日本在中國紡織工廠營業的發展，遠勝於中國工廠。

除了原來的工廠，獲利不算外，這個時期日本在中國新設的主要紗廠如下：

名	稱	地點	創立年	錠子數
上海紡紗公司第一廠		上海	1916	50,552
日華紡紗社會第三廠		浦東	1918	52,258
日華紡織社會第二廠		上海	1918	55,552
內外棉株式會社第五東廠		上海	1915	66,240
內外棉株式會社第五廠		上海	1915	
內外棉株式會社第七廠		上海	1919	20,768
內外棉株式會社第八廠		上海	1915	
內外棉株式會社第十二廠		上海	1919	20,800
內外棉株式會社第六廠		青島	1917	
富士紗廠		青島	1918	31,360

日本在中國的工廠的發展，自然要使中國工廠的發展受到壓迫。所以在歐洲戰期中，日本帝國主義就成了中國第三階級當

前的唯一的敵人；五四運動之所以以日本帝國主義爲主要目標，其真正的原因就在乎此。

五四運動在表面上雖然似乎只是一個新文化運動，但是這個運動在中國革命史上的意義，比一九一一年更爲偉大，因爲中國的革命運動，一直到五四運動，才脫離了羣衆的原始暴動和少數領袖分子的專一的軍事冒險與政治陰謀的領域，而開始成爲有意識的羣衆的革命運動。這個羣衆的革命運動，一方面以反對舊道德，舊禮教，及一切舊的文化制度，給了封建勢力一個絕大的打擊；另一方面，則以反對列強的侵略（特別是反對日本），開始中國的有組織的羣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第三階級是在這個時候，才站出來反對帝國主義。

爲什麼在初期民族運動中，在一九一一年革命中，第三階級不來反對帝國主義，反而要對帝國主義表示“視善”，而到了五四運動時，却來反對帝國主義呢？這當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客觀的條件所決定的。這些客觀條件中最主要條件之一，就是跟着中國產業的發展而使第三階級本身的力量漸漸強大起來。

如前所述，在歐洲大戰期間，中國產業得着千載一時的機會，得有空前的發展。產業的發展，自然使第三階級勢力強大起來。可是如前所述，在歐戰期中，雖然可稱爲中國企業的黃金時代，但嚴格說來，其發展也極有限，所以第三階級本身力量，也不



過是相當的強大，而不是強大到可以完全肅清封建殘餘，翻推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而是還不能戰勝封建殘餘，還不能戰勝帝國主義。很顯然的，五四運動中第三階級雖然比以前“勇敢”一點，但事實上牠並不是這個運動的真正的領袖，這個運動實際上是第三階級勢力所推動。第三階級在這個運動中，顯然只成了羣衆革命的尾巴，表示出充分的妥協性。

第三階級在這次運動中只有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態度比較積極，因為如前所述，在歐洲大戰中，歐美帝國主義忙於火併，無暇東顧，只有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反而更加積極，所以中國的第三階級做首先就感覺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以故五四運動的主要目標，就是反日。同時因為美國帝國主義正在企圖在中國插足，所以在策略打擊日本，攻擊日本的對華政策，美國資產階級的使徒威遜遜，標榜着正義人道與民族自決的旗幟，表示對華“親善”，所以使中國的第三階級在五四運動中，即在中國第三階級歷史上“最革命”的運動中，雖然表示反日而對美國帝國主義則表示“親善”，甚至第三階級在牠的革命運動的旗幟上寫着“美國是中國唯一的良友！”。

第三階級在五四運動中雖然不能站在領袖地位，雖然僅僅成了羣衆革命的尾巴，可是五四運動的性質，毫無疑義地是第三階級的運動——而且是第三階級最光輝的表演，所以跟着產業

的相當發展而使第三階級的力量相當增大，是爆發五四運動的第一個原因。

爆發五四運動的第二個原因，就是跟着產業的發展，第三階級力量的強大而使第四階級的力量同時強大起來。

本來，“第四階級跟着第三階級照同一的比例發達來。”（馬克思恩格斯一八四八年的宣言）；但是中國的特殊情形，使中國的第四階級力量的發展，遠過於第三階級。這原因是在歐美各國，他們國內只有本國第三階級所統轄的產業，所以第三階級有開設一千個大工場的能力，即第四階級有適應於一千個大工場的數量與質量；如果第三階級統治有三千個大工廠，則第四階級的力量，自然也要以同樣的比例，發展適應三千個大工場的數量與質量。可是在中國的情形就不如此。中國境內不只是本國第三階級所設的工廠，而且有許多外國資本家的工廠；本國第三階級所統轄的工廠內的工錢勞動者，不用說都是本國人；而外國資本家所統轄的工廠的勞動者，也是中國人；而且中國境內的外國工廠頗佔優勢，所以中國的第三階級與第四階級力量的比例，就失了平衡。在第四階級方面，不論是外國工廠或本國工廠，只要工廠開設愈多，則其本階級的力量發展愈快。這種發展顯然與第三階級失其比例的平衡，因為中國國內外國工廠愈多，第四階級的力量因愈發展（因為僱用勞動者愈多），而第三階級則反受壓



迫，因為外國工廠愈多，競爭愈烈，營業愈不能發展。在歐戰期內，一方面因為本國工業的發展，工廠愈多，僱用勞動者的數目日增，使第四階級在數量上與質量上同時增加（數量的增加必然影響質量的增加）；而另一方面，則因為國內日本工廠（特別是紗廠與麵粉廠）的增多，故第四階級在數量上質量上的增加更鉅，使其與第三階級的階級力量的比重上遠勝過之。

第四階級是最受壓迫的階級，故其革命的要求，較第三階級更為強烈；所以五四運動的爆發，第四階級實在是一個重要的動力。不僅如此，而且因為階級的力量勝過第三階級，所以在這運動中的作用，也勝過於第三階級，而能盡相當的領導作用。五四運動中上海青島等處工人的罷工運動，特別是海員工人，鐵路工人，上海電話工人，內外棉工人等堅持二三個月的罷工，是支持這個運動的柱石。

推動五四運動的第三個動力，就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世界意義，Stalin 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所寫的那篇“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的有名的論文中，說得很真切；這篇論文中曾這樣寫道：

“自從十月革命在俄羅斯中心及其邊境取得勝利以後，牠已不能再停留在舊俄羅斯的領域以內了。在帝國主義戰爭的空氣中，和一般下層民衆的不滿意情形之下，牠不能不

蔓延及於隣國；蘇維埃政權實行與帝國主義決裂，並將俄羅斯由強盜的戰爭中解放出來，公布秘密的條約，廢除侵略異國領土的政策，宣告各民族的自由，和承認芬蘭的獨立，宣布俄羅斯為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喚起全世界的羣衆，劇烈的與帝國主義鬥爭。這一切的行動，對於被壓迫的東方，和正在流血的西方，將有極嚴重的影響。

“實在說起來，十月革命在世界是空前的一個大革命。牠喚起了東方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的迷夢，而引起他們與帝國主義鬥爭。在波斯，中國，印度……”

“十月革命是世界第一個大革命，是援救西歐工人和兵士的模範，足以催逼他們從戰爭的與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走上真正解放的道路。奧國德國工人兵士的暴動，工人兵士蘇維埃的組織，奧國不平民族反對民族壓迫的革命鬥爭，這都足以證明。

“東方的，西方的解放鬥爭，尚未完全脫離資產階級民族的外膜，但是這不關緊要；最關緊要的，是現在與帝國主義的鬥爭已經開始了，應該怎樣繼續這個鬥爭，使之達到我們的最終的理想。

“外國的干涉，係國外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只是加重革命的危機，並呼引新的民族參加戰爭，擴大與帝國主義做



革命鬥爭的範圍。

“如此，十月革命將落後的東方民族和先進的西方民族都聯貫起來，總合在共同的營壘中與帝國主義鬥爭。

“於是民族問題乃從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而為各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謀解放的一個整個問題。”

最後，Stalin作了如下的結論：

“十月革命之偉大的世界意義，最重要的有下列三點：

“第一：十月革命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由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而為各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謀解放的一個整個的問題。

“第二：十月革命開闢了廣大的真正的解放的道路，足以輔助西方的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謀解放的事業，并呼引他們到共同的路線上做戰勝帝國主義的鬥爭。

“第三：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壓迫的東方之間的橋樑，從西方的無產階級經過俄羅斯革命，到東方的被壓迫民族，建築了一條新的革命的戰線，以反對全世界的帝國主義。

“現在東方的和西方的被壓迫的勞動羣衆對俄羅斯無

產階級所表示的不勝言喻的歡迎與同情，便足以證明。

“現在全世界兇猛的帝國主義者對蘇維埃俄羅斯的痛恨與瘋狂的攻擊，大部分亦足以據此來說明。”

我們抄錄這樣冗長的字句，決不是閒文。俄國革命對於中國革命的重要影響是不容忽視的。這不僅是對於五四運動之歷史意義的認識，而且是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都有重要的意義。

在五四運動前後，在北京天津方面就有一種工人學生的羣衆組織，宣言對蘇俄的革命勝利表示無可形容的喜悅，而這種羣衆組織後來成了領導五四運動的核心。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村經濟之繼續的崩潰。在前面，我們曾說到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的農村經濟崩潰的情形。在一九一一年以後，這種崩潰的情形是日益嚴重，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國內的封建剝削，就是使農村經濟崩潰嚴重化的動力。

雖說在歐洲大戰期中，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較為緩進，但決不是停止侵略，尤其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是更進了一步。

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從一九一一年革命至五四運動），這八年間對外貿易的入超如下：

年分	入超數(海關兩)
----	----------



---

第十六章 五四運動——第三階級的第一次活躍 391

---

1912	102,576,627
1913	166,837,011
1914	212,014,555
1915	35,614,555
1916	34,609,629
1917	86,587,144
1918	69,610,051
1919	16,188,269

尤其是國內的封建剝削，在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後，有更強度的發展。自袁世凱至段祺瑞以至直系軍閥，他們對於民衆級的剝削，比滿清政府更殘酷百倍。尤其是繼續不斷的內戰，使農村經濟破產的速度，有突飛的進展。這種嚴重的經濟危機，是促進革命的動力——也就是五四運動的第四個動力。

五四運動既是由於這種種條件決定的，所以第三階級在這個運動中之不能完成其領袖階級的任務，也就成了必然的現象。但是無論如何，五四運動的本質是第三階級的運動，而且是第三階級的第一次活躍。





## 第六七章

### 民族運動中的第四階級

自從歐洲大戰告終以後，一直到現在，世界資本主義的趨勢，可以分作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資本主義危險的時期；第二個時期是世界資本主義因為得到了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幫助，得到了暫時的部分的穩定；第三個時期是資本主義危機又復嚴重起來。我在這裏所說及的，是戰後的第一個時期，因為這一時期直接間接與中國革命有密切的關係。

所謂戰後的第一時期，在時間上是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

年。在這一個時期中，世界資本主義——特別是歐洲資本主義遇到了嚴重的危機，主要的事實，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高潮。

本來，當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消息傳出以來，帝國主義起初是驚駭失色，繼則開始向勝利的蘇聯無產階級進攻。當時國際帝國主義一致相信，這個“紅色的強盜”，一定可以在一個月內——至多是二個月內把它消滅。可是事實證明了國際帝國主義這個企圖是失敗了，勝利的蘇聯無產階級，牠的政權是一天天鞏固起來。

不僅蘇聯的“紅色的強盜”不能立刻消滅，而且這種“紅色的強盜”在歐洲到處發現。在德國，在意大利，在匈牙利，在奧地利，在其他國家，都發生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暴動。

所以在所謂戰後的第一時期，世界資本主義——特別是歐洲資本主義，是遇到了嚴重的危機。

這種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對於中國的民族運動，無疑的是有嚴重的意義。

首先是中國產業在這個時期中又得了相當的發展。單就紡織業和麵粉業來說，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這三年間，中國新創的紗廠和麵粉廠，其主要者有如下表：

#### (甲)紡織業

名	稱	地	點	創立年	資	本	額
---	---	---	---	-----	---	---	---



緯通紡織公司	上海	1921	1,200,000元
華新紗廠	山東即墨	1920	2,700,000元
慶祥紗廠	保定	1920	3,000,000元
統益紡織公司	上海	1920	1,500,000兩
恆大紗廠	浦東	1921	1,000,000元
華豐紡織公司	吳淞	1921	2,000,000兩
永安紡織公司	上海	1921	6,000,000兩
永安紡織第二廠	吳淞	1921	不詳
永豫紗廠	上海	1921	400,000兩
振新紡織公司	上海	1921	800,000兩
崇信紡織公司	上海	1921	1,000,000兩
大通紡織公司	崇明	1921	800,000兩
廣豐紡織公司	無錫	1921	1,000,000元
鴻章紡織公司	上海	1921	1,500,000兩
鴻茂紗廠	上海	1921	2,000,000元
廣新紡織廠	常州	1922	800,000兩
豫康紡織公司	無錫	1921	1,000,000元
中新紡織第三廠	無錫	1921	2,000,000元
常州紡織公司	常州	1922	不詳
大綸紡織公司	常州	1921	1,000,000元

華新紡織公司唐廠	唐山	1922	2,200,000元
恆源紡織公司	天津	1920	4,000,000元
北洋商業第一紗廠	天津	1921	2,000,000元
寶成第三紗廠	天津	1921	3,000,000元
大興紡織公司	石家莊	1922	2,100,000兩
裕華紡織公司	武昌	1922	1,600,000兩
震寰紡織公司	武昌	1920	1,200,000兩
中新紡織第四廠	漢口	1921	5,000,000兩
華新紡織公司	衛輝	1921	2,800,000元
華豐紡織公司青廠	青島	1920	2,700,000元
奉天紡織廠	奉天	1922	4,500,000元奉幣

## (乙)麵粉業

名 稱	地 點	創立年	資 本 額
大豐機器麵粉公司	天津	1920	1,000,000元
天興福磨麵粉廠	哈爾濱	1920	700,000盧布
震天火磨	傅家甸	1920	200,000盧布
雙和機火磨	長春	1920	500,000元
永業廣火磨	呼蘭	1920	170,000元
德昌火磨	黑龍江	1920	200,000元
振昌機器火磨	齊齊哈爾	1922	800,000元



德增火磨公司	齊齊哈爾	1922	150,000元
東興恆火磨	姑柳屯	1921	100,000盧布
氣豐益麵粉公司	黑河西崗	1921	180,000元
勝新麵粉公司	漢口	1921	300,000元
大同麵粉公司	南京	1922	500,000元
祥新麵粉公司	上海	1920	1,500,000元
興華製麵第一廠	上海	1922	2,000,000元
晉豐麵粉公司	太原	1921	1,000,000元
恆興麵粉公司	濟南	1921	400,000元
華慶麵粉公司	濟南	1921	500,000元
成豐麵粉公司	濟南	1921	1,000,000元
正利厚麵粉公司	濟南	1921	200,000元

除此以外，絲廠煙草等亦均有相當發展。

產業的發展，使第三階級與第四階級都在數量上與質量上增加了相當的力量，

在這三年（一九二〇——二二年）間日本在中國所開設的工廠，營業顯然非常發達。因為在這戰後第一時期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中，日本所受中影響比較的少。

這三年中，日本在中國領土內新創的紗廠，主要的有如左各家：

名	稱	地	點	創立年	錠	子	數
日華紡織會社	第四廠	上海		1921		55,562	
喜和紡織	第一廠	上海		1921		10,770	
內外棉	第十三廠	上海		1920		23,200	
內外棉	第十四廠	上海		1921		23,200	
內外棉	第十五廠	上海		1921		32,000	
同興紗廠	第一廠	上海		1921		41,600	
同興紗廠	第二廠	上海		1921		28,000	
公大紗廠		上海		1921		39,853	
大康紗廠		上海		1922		58,080	
豐田紗廠	第一廠	上海		1921			60,768
豐田紗廠	第二廠	上海		1921			
裕豐紗廠		上海		1921		45,600	
內外棉	第十廠	青島		1922			63,200
內外棉	第十一廠	青島		1922			
鐘淵紗廠		青島		1921		42,634	
日清紗廠		青島		1921		20,000	
長崎紗廠		青島		1921		20,000	
大康紗廠	第一廠	青島		1921			58,000
大康紗廠	第二廠	青島		1921			



內外棉金州分廠	金州	1921	24,000
---------	----	------	--------

外國工業的發展，自然也使中國第四階級在數量和質量方面都增加起來。所以歐洲大戰和大戰後的第一個時期中，在中國第四階級的發達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經過了歐洲大戰，經過了歐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時期，使中國第四階級漸漸由形成而長大起來，成為中國革命動運中的主要動力。

經過歐洲大戰，及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所以中國產業得了相當的發展；同時日本在華的工廠（主要的是紗廠），也很發展；這一個結果，使中國無產階級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了很快的數量。

先就數量來說，據一九二四年北京農商部的調查，全國產業工人數如下：

業	別	工	人	數
紗廠				280,000
絲廠				160,000
鑛山				540,000
海員				160,000
鐵路				120,000
運輸(碼頭)				300,000
五金				50,000

建築	200,000
電氣	80,000
交通(郵電)	90,000
市政	250,000
鹽業	250,000
煙草	40,000
糧食	60,000
印刷	50,000
其他製造業	120,000
總計	2,750,000

以上單新式工人而言，手工業工人不在內。

照上面的統計，在一九二四年，中國產業工人的數目，約共二百七十五萬人，每個工人的家族，以三口計算，則中國無產階級的人口，連家人共約一千一百萬人。照這個數目，在全國人口總數中，原是一個很少的少數——約占百分之二，五——但是因為無產階級痛苦相同，而且總是數千人甚至數萬人集合在一起，所以易於團結；因為其能夠團結一致，所以牠的力量，也就很大。這種力量，表現在牠的鬭爭上，比任何社會勢力，更為堅決勇敢。這種鬭爭的表現，主要的形式就是罷工。

除了一九三三年的有名的京漢鐵路二七罷工不計外，在一



九一九——二三年這四年中，重要的罷工有如左表：

罷工者	時間	要求條件	結果
上海內外棉	1919	抵制日本	工廠閉鎖失敗
上海日華紗廠	1919	反對給付工資方法	失敗
上海日華紗廠	1920	要求年終賞與	一部分成功
上海三新紗廠	1919	要求增加工資二分	失敗
上海美烟廠	1919	日工要求與夜工兼併	一部成功
上海上海絲廠	1919	要求增加工資二分	增加一分
上海開北絲廠	1922	取消罰金增加工資	失敗
上海日華絲廠	1922	增加工資二分	增加一成二分
上海日華絲廠 (第二次)	1922	粗工要求增薪	一年半後增加
上海英美煙廠	1922	增加月薪二至四成	勝利
上海南洋烟廠	1922	增日給及月給	勝利
上海洗衣工人	1921	增加工資	一部分成功
上海木器同盟	1922	增加工資	成功
上海建築工人	1922	增加工資	失敗
上海製繩工人	1922	增加工資	失敗
上海魚商	1922	銅元問題	
上海自來水工人	1922	增加工資	
上海染色工人	1922	增加工資	

上海碼頭苦力	1922	增加工資	
上海製繩工人 (第二次)	1922	增加工資	
上海海員	1922	增加工資至三成	勝利
上海繅絲女工	1922	增加工資五分減 工作為十小時	一部分勝利
上海人力車夫	1922	反對工部局	失敗
上海製箱工人	1922	增加工資	
上海金銀紐工	1922	增加工資二分四 分至四成	成功
上海印刷工人	1922	增加工資	一部分成功
吳淞大中華紗廠	1922	增加工資	一部分成功
南通油廠工人	1922	增加工資	失敗
蘇州織布工人	1922	增加工資	一部分成功
杭州染色工人	1923	響應上海罷工	一部分成功
杭州種烟草者	1922	增加工資	未詳
廣州印刷工人	1922	增加工資五成	增四成
廣州全市工人	1922	增加工資五成	增一成半至五成
香港船工	1922	增加工資五成	
無錫染色工人	1922	增加工資五成	
無錫船工	1922	增加工資一成七至三成	一部分成功
無錫手工工人	1922	增加工資一成七至三成	
香港旅館工人	1922	增加工資一成七至三成	



無錫裁縫工人	1922 增加工資一成七至三成	
揚州人力車夫	1922 增加工資一成七至三成	
汕頭錫箔工人	1923 增加工資一成七至三成	
汕頭排字工人	1922 增加工資一成七至三成	一部分成功
汕頭外人使役	1922 增加工資一成七至三成	
汕頭洋傘工人	1922 增加工資一成七至三成	
汕頭手工工人	1922 增加工資一成七至三成	
潮州各種工人	1922 增加工資一成七至三成	相當成功
漢口水電工人	1922 工資以大洋計算	失敗
漢口隆茂棉花廠	1922 增加工資	一部分成功
漢口英美烟廠	1922 增加工資	成功
漢口水電公司	1922 承認工會及增加工資等	失敗
漢口鍛冶工人	1922 承認工會及增加工資等	成功
漢口英美烟廠 (第二次)	1922 承認工會及增加工資等	成功
長沙手工工人	1922 承認工會及增加工資等	一部分成功
長沙鑛工山人	1922 承認工會及增加工資等	一部分成功
長沙理髮工人	1922 承認工會及增加工資等	一部分成功
長沙縫裁職工	1922 承認工會及增加工資等	一部分成功
長沙石工	1922 承認工會及增加工資等	一部分成功
唐山製造廠	1922 增加工資一成至三成	一部分成功

唐山啓新洋灰廠	1922		
唐山鑛工	1922	增加工資	
濟南魯豐紡織工人	1923	增加工資	成功
湖南水木工人	1923	改銅元爲銀幣	
湖南理髮工人	1923	增加工資	
湖南裁縫工人		增加工資及工資以銀爲本位	
湖南制烟工人	1923	增加工資	
南昌造紙工人	1923	採用大洋	銅板百枚增加四十枚
景德鎮陶工	1923	增加工資	一部分成功
水口鉛工	1922	增加工資一成至二成	成功
水口鉛工	1922	實行上項條件	失敗
開灤煤鑛工人	1922	增加工資一成至三成	一部分成功
萍鄉煤礦工人	1922	反對包工制 增加工資五成	一部分成功
大冶鐵礦工人	1923	增加工資	
京綏鐵路工人	1922	增加工資	一部分成功
津浦鐵路工人	1922	採用工洋	一部分成功
滬甯鐵路工人	1922	增加工資	
正太鐵路工人	1922	規定最高工資 休假不扣薪	成功
粵漢鐵路工人	1922	增加工資	成功
京漢鐵路工人	1923	增加工資	成功



京漢鐵路工人 1923 增加工資 失敗

上表所說的罷工，僅就其主要者而言，至於此外零星的罷工，更是多不勝述。茲再舉廣州及潮州二個地方的罷工次數來作例：

(一)一九二一年五月至一九二二年一月廣州罷工表

業別	罷工月日	解決月日	罷工日數	參加人數	結 果
舖屋頂 工人	1921年 5月22日	6月13日	34日	3,500	增二成
爆竹	5月24日	翌年2月10日	261日	850	增一成半
漆工	5月22日	9月6日	107日	520	增二成半
機械	5月26日	6月8日	12日	3,400	增三成
藥業	6月29日	10月10日	104日	3,050	失敗
茶業	8月12日	12月17日	127日	2,500	二成半
油業	8月7日	11月20日	111日	3,500	三成半
機織	8月10日	翌年2月		340	
茶居	8月12日	8月25日	13日	8,640	五成
建築	8月16日	8月25日	8日	9,400	四成
牛肉	8月19日	9月5日	17日	620	三成半
陶器	10月1日	12月8日	69日	340	失敗
裁縫	10月6日	10月8日	13日	2,300	四成
鞋工	9月20日	1922年2月		3,400	

鞋工	10月11日	11月8日	27日	2 200	四成
洋服	11月11日	即日		600	三成
軍服	11月24日	即日		1,630	五成
紙業	12月14日	解決		1,400	
打包	12月12日	解決		150	
鋸木	12月9日	12月18日	9日	1,407	五成
理髮	12月16日	即日		2,430	四六分配
種植	12月16日	12月25日	9日	3,400	四成
洗衣	1922年1月3日	即日		1,200	三成
酒業	1月7日	2月11日	36日	1,200	二成半
屠牛	1月13日	即日		210	二成
印刷	1月13日	1月18日	5日	1,500	三成
木箱	1月29日	即日		1,320	四成

## (二)一九二一年五月至九月間湖州罷工表

業別	罷工開始	罷工解決	參加人數	結果
石業	5月9日	5月17日	350	二成
油業	7月17日	即晚	128	一成半
染布	4月20日	7月25日	842	三成半
鞋業	8月28日	9月18日	1,300	一成一分
陶器工	9月6日	9月12日	240	二成半



陶器畫工	9月18日	10月13日	150	一成
縫工	9月11日	9月25日	200	二成七分
木業	8月5日	8月11日	240	二成一分
彫刻	8月23日	9月9日	200	五成
首飾	9月18日	9月22日	540	一成半
傘業	9月30日	10月12日	95	一成半
箱業	9月30日	10月1日	110	一成七分
銅錫	9月30日	10月1日	140	一成
泥工	9月30日	10月1日	300	一成
爆竹	8月3日	8月8日	45	四成
金紙	9月2日	9月5日	220	二成
銀箔	9月29日	即日	210	五成
鞋工	6月6日	6月18日	120	一成
染紙	8月29日	9月7日	115	二成半
鐵業	8月30日	10月1日	95	半成
竹業	8月30日	10月1日	145	二成
圖木	8月30日	10月1日	85	二成
包餅	7月10日	7月12日	175	二成

在上面的表中，雖然大部分的鬭爭的性質，是偏於經濟方面，但是經濟鬭爭的發展，必然走到政治鬭爭的路上。

含有政治鬥爭的意義的重要的罷工，就是一九二三年的有名的京漢路的二七罷工。

京漢鐵路是中國境內最重要的一條鐵路，京漢鐵路的工人，也是中國鐵路工人運動中最重要的角色。京漢鐵路的工人運動，實際上是開始於一九二〇年的下半年，而最初的表現，是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在長辛店（京漢路站之一）成立了一個勞動補習學校。這個學校經過了許多的挫折，又於是年下半年成立了一個工人俱樂部，這個工人俱樂部在京漢鐵路工人運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全路總工會籌備會在長辛店成立。這個籌備會是由長辛店的工人俱樂部發起的，當開會的時候，到十四站團體的代表，進行很順利。八月一日，復召集代表，在鄭州開第二次會議，當即決議，由長辛店開始發動，於八月二十四日，舉行全路總同盟罷工，要求增加工資。

這次的罷工雖然得到勝利，但因此招了統治階級——直系軍閥之忌，而有名的一九二三年的二七慘殺，其危機已隱伏於此。

直系軍閥吳佩孚，當時在表面上是一個比較開明的軍閥，其實是比較其他軍閥，更狡猾，更兇悍。他爲要欺騙民衆，也掛着‘保護勞工’的招牌，實際上無處不是壓迫勞工，摧殘勞工；在二七流血中，他的假面具完全揭破了。



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在鄭州開會，那時全路的組織已經很一致，於是決定章程，定於二月一日正式舉行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總工會定期成立的消息露布以後，直系軍閥即準備壓迫，由吳佩孚通令禁止開會。一月三十日，吳佩孚又電召總工會派代表赴洛陽面議，但等到代表到了洛陽，吳佩孚又當面重申禁令，使工會代表，不得要領而返。

起初各地鐵路工團，接到總工會成立的通告，無不欣然色喜，踴躍派代表參加。到三十一日止，到的代表已有一百數十人，代表三十餘個團體（京漢鐵路工人的團體）；此外北京武漢各地各公私法團，參加觀禮者也很多。

去洛陽見吳佩孚的代表，於三十一日晚上回到鄭州，當即向各地代表報告吳佩孚的態度，全體大憤，遂臨時決議無論吳佩孚如何壓迫，決於原來決定之二月一日，在鄭州普樂園劇場舉行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成立大會。

二月一日的清晨，鄭州全埠已經施行緊急戒嚴，“保護勞工”的吳佩孚，已經掀下了他的面幕，露出他的齷齪的本相，準備以殘酷的流血手段，實行他的屠殺勞工的政策了。赴會的各代表，已經受着軍警的嚴密的監視，甚至代表所包定的飯菜，也由軍警禁止開售，但各代表仍然不顧一切，挨着餓，冒着危險，很勇敢地參加開會。會場當場被軍警包圍，各代表遂大呼口號而散，總工

會亦即於是晚被封。

成立會既受壓迫，全體工人大憤，遂決議罷工以反抗，並提出下列的各項要求：

- 1、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漢局長趙繼賢和南段段長馮雲；要吳佩孚斬雲鶚（鄭州戒嚴司令）及豫省當局撤革查辦黃殿辰；
- 2、要求路局賠償開成立大會之損失六千元；
- 3、所有當日在鄭被軍警扣留之一切牌額禮物，要求鄭州地方長官軍隊，奏樂送還總工會鄭州會所；所有佔領鄭州分會之軍隊，立即撤退；鄭州分會，開單索償，並由鄭州地方長官，奏樂送還總工會；
- 4、要求每星期休息，並照發工資；
- 5、要求陰歷年假，放假一星期，亦照發工資。

罷工案決議後，各地遂相繼罷工，四日晨，鄭州江岸長辛店等，一致停工，一切行動，完全聽總工會命令，秩序極為嚴肅；罷工延長數日之久，至二月七日，大屠殺就發生了。

長辛店自從罷工開始以後，趙繼賢威迫單獨交涉，工人答以只知總工會命令，不知其他，拒絕單獨交涉，五日即有直系兵二營開到，當晚即四出捕人，工人聚守工會，遂被軍隊開槍，當場擊斃工人五名，重傷六十餘人，并有十餘人被捕送保定。



武漢罷工，至二月七日已四晝夜，湖北督軍蕭耀南，命參謀長張厚生，誘騙上工，工人堅決表示只知總工會命令，如無總工會命令，誓死決不上工。是日蕭耀南又約總工會全權代表，於五時半赴會所會談，代表等赴會，而槍聲大作，軍隊羣集，向工人開槍轟擊，是役共擊斃工人三十三人，殘傷二百餘人；被殘殺後又分頭逮捕，不僅工人被捕者甚多，即普通住家，亦遭殃及。

江岸分會，亦於七日被封，被捕百餘人，委員長林祥謙被殺。鄭州信陽駐馬店許昌等處，亦均有同樣慘案發生。總工會法律顧問施洋律師，因係共產黨員而被殺。

這就是有名的二七慘案的歷史。

京漢鐵路的罷工，雖然因為軍閥的壓迫而失敗，但其給以工人運動及民族革命運動的影響很大；第四階級的政治勢力，也由京漢罷工而表現了。

京漢鐵路的二七慘案的意義，就因為牠是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爆發的第一個信號。

第四階級在革命運動中，表現出牠是最勇敢，最堅決的分子。這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實際生活，決定他們只有這樣堅決的勇敢的奮鬥，才是出路。

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比其他各國的工人階級的生活，更低下，更不如；所以中國工人階級之努力參加革命，是牠的實際生

活所決定，而不是由於某個人或某團體的煽動。

下面的各種統計，可以看出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是如何痛苦。

首先，我們根據一九二四年的調查，將當時上海各業工資的平均率，列表如左：

業 別	常雇(供膳)	常雇(不供膳)	臨時(供膳)
建築工	0.34	0.70	0.50
石工	0.34	0.70	—
錫木工	—	0.60	—
漆工	0.60	0.80	—
苦力	0.20	0.40	—
機械職工	—	1.00	—
鍛冶工	—	1.00	—
排水夫	—	0.70	—
美術石工	—	1.00	—
妝飾工	—	3.00	—
造棚工	—	1.20	—
木工	—	0.80	—
石工	—	1.20	1.00
裁縫(洋服)	15.00	(月計)	1.00



同(華服)	10.00	(同)	—	0.70
電話接線	—		0.50	0.40
建築場廚司	—		0.50	
紡織工		普通	最高	
半細工(男)		0.35	— 0.55	
半細工(女)		0.30	— 0.55	
半細工(童)		0.25	— 0.40	
粗工(男)		0.35	— 0.40	
粗工(女)		0.30	— 0.40	
烟草工				
粗工(男)		0.30	— 0.40	
粗工(女)		0.35	— 0.75	
粗工(童)		0.25	— 0.30	
刺繡工				
粗工(女)		0.20	— 0.50	
粗工(女)				
製粉工				
細工		1.00	— 2.00	
同		25.00	— 50.00(1月)	
粗工			0.50	

全

15,00(1月)

(以上均以大洋計算)

此外，另據上海工部局中國工業委員在同年的調查，全國各業平均工資有如左表：

## (一)全國粗工每月工資表

業別	男最高	最低	平均	女最高	最低	平均
紗廠	12	6	9	10	6	7.5
鐵工及機械工	20	10	15	—	—	—
礦工	18	9	14	—	—	—
絲廠	12	6	8.5	10	5	7.5
其他工業	16	6	10.8	5	3	5.5

## (二)全國細工每月工資表

業別	男最高	最低	平均	女最高	最低	平均
紗廠	30	12	26	24	8	12
鐵工及機械工	50	20	25	—	—	—
礦工	40	16	22	—	—	—
絲廠	22	6	12	22	6	9
其他工業	30	9	15	20	7.5	12

以上單位元

在上面的工資數中，常常還要被扣薪罰薪等，所以普通實際



還收不到這個數目，至於工人的支出，據一九二三年調查，上海

工人每月最低限度有下面的出款：

上海粗工每月至低限度生活費

類 別	獨 身 者		三 人 家 庭	
	元	百分率	元	百分率
食料	5.45	46	11.10	52
被服	1.19	10	2.13	10
房租	1.78	15	2.78	13
柴炭	0.47	4	1.92	9
電車費等	0.71	6	0.85	4
雜費	2.25	19	2.56	12
計	11.85	100	21.34	100

上海細工每月至低限度生活費

食料	7.32	30	15.06	42
被服	2.31	12	3.94	11
房租	3.09	16	5.02	14
柴炭	0.57	3	2.51	7
電車等費	2.12	11	3.15	6
雜費	3.85	20	7.17	20
計	19.26	100	35.85	100

以上僅就最低限制的生活而言，照這樣的生活，實在是不免

時有飢寒之虞，而且疾病及其他災害，還不在內——但即是這種水平線下的非人生活，尚且不容易維持。因工人勞動所得，往往還不足此數。

工人的收入既已極低微，而物價則日漸昂貴，請閱下面的三個統計：

(一)四年來上海物價比較表

種 類	單位	1920年4月	1921年4月	1922年4月	1923年4月
		元	元	元	元
蘇常白米	担	6.120	10.032	8.500	8.484
漢口小麥	担	3.050	3.320	3.350	4.100
大麥	担	—	—	—	—
機製麥粉	袋	1.870	1.862	2.100	2.075
蕪湖豌豆	担	3.100	2.800	3.500	3.00
漢口蠶豆	担	2.550	1.290	3.450	2.170
牛肉	磅	0.125	0.134	0.135	0.166
羊肉	磅	0.132	0.141	0.142	0.173
豬肉	磅	0.203	0.199	0.200	0.255
鷄卵	打	0.140	0.133	0.164	0.198
牛乳	瓶	—	0.145	0.145	0.173
白糖	担	—	9.000	—	—
皂布	担	—	3.900	6.200	5.800



綠茶	担	—	26.000	—	—
生粗布	疋	7.120	6.000	6.300	6.000
生布	疋	5.310	4.000	5.200	5.390
棉紗(12支)	包	180.000	141.000	139.000	132.590
棉紗(26支)	包	206.500	154.000	147.500	149.500
煤油	箱	3.985	4.602	4.050	3.171
柴薪	50捆	0.735	0.725	0.728	0.921
頭等開平煤	噸	11.750	11.500	10.500	11.000

(二)上海工部局虹口小菜場價格比較表

類	別	單位	1923年	1994年	增加百分比
			角	角	122.2
肉牛		磅	1.80	2.20	
豬肉		磅	1.60	3.50	194.4
牛乳(外國乳棚)		瓶	1.80	2.50	138.9
羊肉		磅	1.80	2.50	138.9
牛乳(中國乳棚)		瓶	1.50	2.00	133.3
雞蛋		打	1.60	2.80	175.0
			元	元	
麵粉		包	3.00	3.30	110.0
			兩	兩	
廚煤		噸	9.00	21.00	233.3
大煤爐		噸	15.00	30.00	200.0
米		担	7.60	12.20	160.5

## (三)上海零售物價指數表

米		1923年5月	1924年9月	百分比
蘇常白米	斗	1,060元	1,240元	117.0
蔬菜				
青菜	斤	33文	55文	186.4
豆芽	斤	72文	70文	97.2
豆腐	塊	20文	20文	100.0
肉類				
豬肉	斤	60文	640文	114.3
牛肉	磅	350文	425文	150.0
雞蛋	個	30文	40文	133.3
和味品				
鹽	斤	90文	120文	133.8
醬油	片	140文	160文	114.3
豆	斤	439文	538文	122.6
開水	杓	2文	3文	150.0
燃料				
溫州青炭	磅	60文	80文	133.3
大反白柴	個	90文	120文	133.3
老牌火油	斤	150文	180文	120.0



## 小食

粥	盞	10文	20文	200.0
饅頭	個	10文	15文	150.0
燒餅	個	10文	15文	150.0
油條	個	10文	20文	200.0
糉角	個	10文	20文	200.0

物價的高漲既如此，工資雖也有相當增加，但總趕不上物價增加的速度，所以工人的生活自然更痛苦。工人生活既更痛苦，其要求解放之心必愈切，故鬭爭必更擴大，這是必不可免的事實。





## 第十八章

### 第四階級最初的政治主張

“第四階級發達一步(經濟的),牠的政治力量也跟着擴大起來。”(馬克思恩格斯)

第四階級的數量增加起來,牠的政治上的影響也必然跟着擴大起來。第四階級之經濟鬥爭的發展,無疑的會走上政治鬥爭的道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第四階級的數量日漸增加起來,同時牠的質量也增加起來。經濟鬥爭日漸擴大起來,表現在政治上的勢力,也一天天擴大起來,最重要的事實,是第四

階級政黨的形(一九二〇)。

第四政黨的正式成立，是在一九二〇年，該黨的第一次全國大會，就是在這年開的；但當時還不過是一個研究性質的團體，並沒有做實際的工作；不過成立以後，發展很快，到(一九二二年)開第二次全國大會的時候，已經代表有相當的勢力。該黨第一次全國大會並沒有正式公佈宣言，到第二次全國大會，始有宣言發表，這篇宣言是中國第四階級政黨第一次向社會公布牠的主張和要求，所以不僅是革命文獻中是一種極有價值的東西，而對於研究中國社會運動史上，更為重要，故特將宣言原文錄後：

#### A 國際帝國主義宰制下之中國

##### (一)

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多半是靠掠取非洲和亞洲做大市場和大掠奪場。在最近一世紀內，資本主義侵略的積累，造成二十世紀血染遍了的世界資本主義巨大骨幹；那些資本帝國主義者由競爭掠奪而出於戰爭，把他們自己造成的骨幹從根本上加以損毀；損毀之後，又想用原法鞏固而且擴大資本主義的建築物，同時他們新的損毀事業又正在準備進行中——這樣循環式的趨勢，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的必然現象。在現今這般資本主義進程中，全世界有十二萬五千萬的殖民地和被壓迫國的人民（還有資本主義國家裏數萬萬的無產階級），輻轉斃於倫敦，巴



黎，紐約，東京等處極少數銀行家工業家和他們政府重壓之下。除非把世界資本主義的組織完全剷除，這種慘酷的現狀是決不會消滅的。這些現象最值得弄個明白，因為個個中國人（不但是勞動階級）都應當知道他自己受痛苦的原因。

世界上的每個資本主義國家，都必須獲得最大的市場，來銷售他過剩的商品，吸收他需要的原料；而世界上可供掠奪的市場，只有印度，中國，土耳其，摩洛哥，埃及，波斯，高麗，墨西哥，安南，南洋羣島，南和中部的阿非利加洲等地方，因此奪取那些市場的競爭，是免不掉的。競爭的結果，便須訴諸戰爭；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屠殺，便是發源於英德兩系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爭奪近東市場的衝突。

上次世界大戰的成績，即是屠殺了數千萬的勞動羣衆，瓜分德國的殖民地，毀滅德奧等的經濟基礎，使他們變為英法的殖民地，並把全世界的經濟秩序，破壞無遺。戰後，那些帝國主義的國家又企圖恢復戰前的經濟原狀，來挽救資本主義根本覆滅的厄運，便想將戰爭的鉅大損失，取償於全世界的勞動羣衆；因此，他們先後在巴黎，華盛頓，柔佛等處開分贓會議，假借“和平”“正義”等名詞以掩飾全世界被壓迫階級的耳目；但那爭奪宰割世界而引劇烈的衝突的真相，已暴露無餘。他們那些不可消滅的利益衝突，便是第二次更猛烈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導火線。

帝國主義者開多少數次的會議，都不能免去日美在最近將來的戰爭趨勢，和英法非相見於疆場不能解決的衝突；不過他們常常被逼着去救濟資本主義無法挽回而日見擴大的世界經濟恐慌，冀圖免避社會革命的銳利鋒芒，故不得不藉此種會議的分贓妥協行爲，犧牲弱小民族的利益來掩蓋他們中間的裂縫，以苟延此不可免的大戰時期。同時並可在此苟延期間之內，加勁劫奪殖民地和弱小國家的富源和勞力，一方可以勉強按住他們本國的無產階級使之不能即時脫離羈絆，俾得從容補償前次大戰的損失，他方便做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經濟的和軍事的準備。

許多年來，東亞各民族被踏在英美法日等國鐵蹄壓迫之下，上次大戰以後，帝國主義侵略東亞各民族又更加厲害。美國勒住菲列賓羣島，一面用假裝慈悲的態度，一面繼續他的經濟侵略，不稍放鬆。英國扼着印度的喉頸，剛柔並用的壓倒印度獨立運動，以維持每年一百萬印度勞動羣衆死於英國資本家的長爪之下的現狀。安南農民更是奴伏在法蘭西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牛馬一般的種出米穀來供法商的榨取；安南儘可每年餓死多少萬種米的農民，但何時都缺不了法國米商成千萬石的米輸出。日本榨取高麗人民的血汗，更是橫暴無比，日貨盡量的輸入，米糧強迫的輸出，使二千萬高麗農民處在飢餓而死的境遇。

帝國主義的列強歷來侵略中國的進程，最足表現世界資本



帝國主義的本相。中國因爲有廣大的肥美土地，無限量的物產和數萬萬賤價勞力的勞動羣衆，使各個資本主義的列強垂涎不置，你爭我奪，都想奪得最優越的權利，因而形成中國目前在國際上的特殊地位。

## (二)

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開始於一八三九年英國艦隊的攻擊。這次攻擊實是資本主義最著名的卑污強盜行爲，因爲他的起因是由於英國政府和商人要強迫把鴉片毒害中國民衆。從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攻打大沽，直到一九〇一年義和團反抗“洋人”的暴動促成八國聯軍佔領北京這四十三年間，乃是資本主義國家宰割中國的流血時期，也是中國人在歷史上受最大痛苦和侮辱的時期。二十世紀的開始，已是到了列強因掠奪而互相衝突的形勢，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爲的是爭奪滿洲；戰爭的損失，又挖取中國人的血肉去填補。

帝國主義的列強，在這八十年侵略中國時期之內，中國已是事實上變成他們共同的殖民地了，中國人民是倒懸於他們慾壑無底的巨吻中間。帝國主義者掠取了中國遼廣的邊疆領土的島嶼和附屬國，做他們新式的殖民地，還奪去許多重要口岸，做他們的租界，並且把中國畫成幾個各自的勢力範圍圈，實行其專利的掠奪事業。在中國自己領土之內，三分之一的鐵路爲外國資本

家的所有物，其他的鐵路也是直接間接由外國債權主人管理；外國的商輪是在中國的海口內河裏面自由行駛；郵電是受嚴格監督，關稅也不是自主的，是由外國帝國主義者協訂和管理的；這樣，不但便利於他們的資本輸入和原料的吸收，而且是中國經濟生命的神經系已落在帝國主義的巨掌之中了。那些外國資本家還在中國佔據了許多礦山，并在上海天津等商埠開設了一些工廠，鞭策百萬的中國勞工在那些礦山工廠裏，做他們生利的奴隸。同時又加上外國商品如潮的輸入，漫說布疋紙張之類，舊有的針和釘都幾乎絕了種，因此生活程度日漸增高，三萬萬的農民日趨於窮困；數千萬手工業者的生活輕輕被華美的機器製造品奪去，而漸成爲失業的無產階級。中國因爲每次戰爭都要被索去一批現金賠償，加上鴉片和商品的吸收，現金日見減少，又加上二十萬萬外債連本帶利不斷的盤剝，更加上上海北京天津漢口廣州幾個外國銀行家的操縱，國家和民衆的經濟生活都陷在極恐慌的狀態之中。帝國主義者還賄賂中國的官僚政客，派遣許多的顧問牧師，出版報紙，設立學校——這是企圖更順利的達到他們貪婪掠奪的目的。同時爲防止中國民衆的反抗起見，帝國主義者的列強又掠得實際統治中國人的領事裁判權，并派遣軍隊警察軍艦駐守於中國領土之內。

### (三)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起後，歐美各國無暇東顧，日本帝國主義者便利用此千載一時之機會，奪取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佔領膠州灣，并用恐嚇賄賂等外交手段，以最著名的二十一條壓迫中國，意在使中國變爲他獨占的殖民地，從這些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就侵入了中國各種行政，財政，軍事，外交及其一切政治機關的血管裏面，控制中國經濟生命，自由指揮北京政府，以完全實現他的侵略政策；這樣雖然填滿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慾壑，但是却引起了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嫉妬，日美兩帝國主義在中國爭奪的衝突於是起了很深的一道鴻溝。

到了大戰告終，所謂巴黎和會，便是分配德國的殖民地和從新劃定資本主義國家在近東和遠東的勢力範圍的分贓會議；在那次會議席上，日本既是先行獲得中國的利益太多，美國帝國主義者又難於遷就，衝突無從調和，關於中國問題，遂擱罷而不能爲平均分配的解決。

然日美互爭掠中國的界盜行爲，已是表現得極其明白了。

美國既不能在巴黎和會上與日本調和關於中國的衝突，相互獲得平均時益，便企圖組織新銀行團——國際帝國主義的托辣斯；想用經濟優勝勢力，盡量的把資本輸入中國，以達到掠奪中國的優越地位，做完全管理中國經濟的主人翁。但日本却已佔得中國頭土的最大部分，做他的專利的勢力範圍，又豈肯輕於讓

步，所以新銀行團的計劃，未能即時實現。

在這樣日美衝突狀態之下，形成中國特殊的政治狀況。日本帝國主義者先後扶助安福系，張作霖，新舊交通系等當權的北京政府，爲的是要利用北京政府爲實現日本侵略計劃的工具。英國便站在吳佩孚派的督軍後面，爲的是要藉此鞏固他在長江一帶的權利和勢力範圍的推廣。美國却勾結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想用掩眼法來實現他國際托辣斯的經濟侵略政策。但是這種步驟不一致的侵略方法，究不能即時發展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而處於利益衝突日甚的地位。

#### (四)

英國在戰後的歐洲市場日被排斥，生產過剩，經濟恐慌，故以發展遠東市場爲救濟的唯一道路，而又陷於與日本衝突日見緊張的地位，同時又發生一個重大的問題：英國還是繼續與日本同盟來壟斷遠東的權利呢？還是和美國聯合來實現共同侵略遠東呢？在這種紛糾之下，就產生了華盛頓會議。華盛頓會議爲的是要從新分配他們遠東的市場，希圖調和那不可免的日美和英美的兩種衝突。遠東問題在英國帝國主義者看來，是他許多掠奪殖民地問題中間之一個，所以英美戰爭，或許可以久延時日，但在日本乃只有這個唯一的大市場，在美國也只有這個唯一可供發展的大市場，所以日美衝突萬難減輕，而戰爭必在最近期間內



爆發無疑，華盛頓會議那能爲力呢？不過他們在爆發之前，拿遠東——特別是中國——的豐富物產和勞苦羣衆，攔在各國集於華盛頓的外交家銀行家的晚餐席上，平均各個的貪慾，從前宰割一次罷了。

華盛頓會議所以標榜減輕軍備，完全是要欺騙在軍備負擔底下呻吟而將起來革命的勞動階級。軍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柱石，資本主義國家不但需要他來侵略弱小民族，且需要他來鎮壓本國勞動階級的反抗，因此資本主義國家裁減軍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他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那些主力艦噸數比例和陸空軍備保持的競爭，愈現出帝國主義者怎樣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計劃壓迫勞動者的陰謀。

華盛頓會議中之主要問題——中國問題，是在美國脅制之下解決的，結果，他們承認日本在滿蒙和東部西伯利亞獨占的掠奪，將中國置在他們共同侵略的“門戶開放”政策之下。美國之所以採用海約翰以來的舊調，完全是要着這個“開放”來打破英日在中國的优势，讓他自己插足進來，操縱中國的經濟生命，“開放門戶”政策的採取，顯然是美國侵略中國的第一步成功。多少年來駕御中國的英日同盟雖是廢了，但這次成立英美日法的四國吸血同盟——雖然他的根基極不穩固——却要做比他加倍有力的侵略。美國所領袖的新銀行團，從華盛頓會議算是加了一層保

障，要使中國變成國際托辣斯進貢的藩屬，從此中國的貧苦農民要納租稅給那些外國的銀行，中國所有的實業要歸為外國銀行的私產了。

華盛頓會議給中國造成一種新局面，就是歷來各帝國主義者的互競侵略，變為協同的侵略。這種協同的侵略，將要完全剝奪中國人民的經濟獨立，使四萬萬被壓迫的中國人都變成新式主人國際托辣斯的奴隸。因此最近的時期，是中國人民的生死關頭，是不得不起來奮鬥的時期。

### (五)

所有上述那些事實，都是帝國主義的列強怎樣必須佔略中國，怎樣宰割中國和剝奪中國工人和農人的貪婪的寫真。

帝國主義者們還口口聲聲唱什麼民族平等，民族自決和人類平等等好聽的名詞，想把資產階級掠奪無產階級的資本帝國主義的強國壓迫弱小民族的行爲，輕輕隱瞞過去。但是中國人民受了這九十年來被壓迫的經驗，却最易了解帝國主義者所宣稱的平等和自決是什麼意義。而且也容易了解只有打倒資本帝國主義以後，才能實現平等和自決。

但是被壓迫的中國勞苦羣衆，最要明瞭現今世界大勢，才能從受壓迫的痛苦中加快的救出自己來。最近世界政治發生兩個正相反的趨勢；(一) 是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列強企圖協同宰割



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一) 是推翻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即是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的先鋒——國際黨和蘇俄——領導的世界革命運動和各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革命運動。大戰以後，英國生產力停滯，法國經濟破產，美國生產力過剩，而各帝國主義者簡直沒法恢復戰前的經濟原狀。他們所組織的“國際聯盟”，用意是互相尊重其所得權利，互相維護其掠奪物的相互保險政策，結果又被他們自己折散了。

華盛頓會議把日美衝突弄得更明顯，柔魯會議英法背道而馳，已是回復到比大戰以前的形勢還更危險；大戰的“破壞”既然已將資本主義的牆腳掘掉了一大半，他且夕有發生塌倒的可能，還能說及恢復和再造嗎？這便可證明世界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已離他的末日不遠了。在另一方面，工人和農人的蘇維埃俄羅斯——全世界勞苦羣衆革命勢力的柱石——不斷的從根本上打擊世界的資本主義，經了五年的奮鬥，勢力日見鞏固；德國和中歐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火候，已達到最烈的頂點，英美法意等常常發生極可怕的罷工運動，已搖動了資本主義的老巢穴；就是日本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也是聲勢浩大的興盛起來；至於印度埃及愛爾蘭高麗等被壓迫民族，受了前次大戰和俄羅斯革命的影響，獨立革命運動日見有組織，日見緊張，業已驚得帝國主義者心神不寧了。這就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迅速伸長的確

證。

而且這兩種反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聯合日趨密切，這個聯合的革命勢力必定會把世界資本主義的枯骨推到資本主義自己掘成的墳墓裏去。最近數十年之內，中國人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勢力，已是大有進步，而且還會增長起來。但是中國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也一定要併入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聯合起來，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壓迫者——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中國勞苦羣衆要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中把自己解放出來，只有走這條唯一的道路。

## B 中國政治經濟現狀與受壓迫的勞苦羣衆

### (一)

帝國主義的列強既然在中國政治經濟上具有支配的實力，因此中國一切重要的政治經濟，沒有不是受他們操縱的；又因現尙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的經濟基礎上面，工業資本主義化的時期還是很遠，所以在政治方面，還是處於軍閥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軍閥們一方受外國資本帝國主義者的利用唆使，一方爲自己的利益把中國割據得破碎不全；張作霖之佔據東三省，便是最顯明的一個例。這樣的情形，即是中國政治上一切糾紛內鬨的複雜基礎。



中國目前政治狀況又另開了一個新局面。這個新局面一方面便利於帝國主義的列強實行華盛頓會議所決定的共同侵略政策，一方延長中國的糾紛情勢。最近的奉直戰爭，在吳佩孚方面，英美帝國主義者站在他的後面，爲的要協助吳佩孚打倒日本在北京的優勢，達到他們自己把持中國政治中心的慾望；在張作霖方面，自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爲其後盾，希圖維護著名親日派張作霖所栽培的交通系內閣，以保持他對於北京政府的優越地位。這次戰爭的結果，吳佩孚掃除了張作霖在北京的勢力，但是張作霖在滿洲的勢力并未失墜，仍足爲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做專心掠奪滿蒙的劊子手。吳佩孚戰勝以後，北京政府漸漸落在親美派的官僚手裏，這是美國實現對華政策一個絕好的機會。但是美國並不願意吳佩孚——是一個較進步的軍閥——製造一個統一的政府，因爲吳佩孚所主張的廢督裁兵如果實現的統一，是與中國資產階級以極大的利益，而易於發展，與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是極不利的。美國帝國主義者便轉過頭來，與日本強顏攜手，企圖共同利用張作霖曹錕和其他頑固的軍閥官僚（如安福系交通系等），以便日美互相掣肘而造成一個可以共同利用的中國傀儡政府。英國更又贊助暴露了反動行爲的陳炯明，剷除孫文派在廣東的民主勢力。這樣，他們利用軍閥，阻撓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造成軍閥勢力下之有名無實的統一政府，做英美日的共同

工具的計劃，已是顯明極了。即使中國現在能出現一個所謂統一  
的政府，但列強的壓迫不去，軍閥勢力不除，中國是萬難實際統  
一的，而且內亂還會不止呢！民國成立十一年，幾於年年都有戰  
爭，不是軍閥壓迫民主主義革命戰爭，便是軍閥內鬪，如直皖戰  
爭和奉直戰爭等。現在那些督軍間的衝突，無處不現出嚴重的形  
勢，加以帝國主義者無窮的操縱，因此內亂是有加無已的。真正  
的統一民族主義國家和國內的和平，非打倒軍閥和國際帝國主  
義的壓迫，是永遠建設不成功。因為中國還是軍閥把持和割據的  
時代，故在現今“統一”呼聲之下，發生兩種矛盾的現象：一派軍  
閥假聯省自治的名義實行割據，同時他派軍閥假統一的名義壓  
迫南方的民主革命和蒙古的自治，以增長自己的威權。兩派所假  
借的名義雖然不同，而其各想延長武人政治的命運，則是一樣  
的。但是本部各省（東三省在內）經濟上絕無根本的不同，而民國  
的歷史，若以十年來武人政治所演出的割據現象便主張劃省為  
邦，以遂其各霸一方的野心而美其名曰地方分權或聯省自治，這  
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因為十年來，一切政權業已完全分於各省武  
人之手，若再主張分權，只有省稱國；督軍稱為王了。所以聯邦的  
原則在中國本部各省是不能採用的。至於蒙古，西藏，新疆等處  
則不然；這些地方不獨在歷史上為異種民族久遠聚居的區域，而  
且在經濟上與中國本部各省根本不同：因為中國本部的經濟生



活，已由小農手工業漸進於資本主義生產制的幼稚時代，而蒙古，西藏，新疆等處，則還處在遊牧的原始狀態之中，以這些不同的經濟生活的異種民族，而強其統一於中國本部還不能統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結果只有擴大軍閥的地盤，阻礙蒙古等族民族自治的進步，並且於本部人民沒有絲毫利益。所以中國人民應當反對割據式的聯省自治和大一統的武力統一，首先推翻一切軍閥，由人民統一中國本部，建立一個真正民主共和國；同時依經濟不同的原則，一方面免除軍閥勢力的膨脹，一方面又因尊重邊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聯合而成爲中華聯邦共和國，才是真正民主主義的統一。

## (二)

那些帝國主義者，本來想完全毀滅中國舊有的經濟構造，代以完全由他們掌管的新式資本主義的經濟建築，但是他們畢竟沒有完全毀滅的本領。他們曾經百端阻撓中國經濟自動的改進；如他們不讓中國人民自己建築粵漢鐵路滬杭甬鐵路及川漢鐵路，強迫清政府借他們的款子來興工，以及他們奪取漢冶萍公司之類。但是這樣阻撓的結果，曾激成劇烈的反抗，對他們的經濟壟斷政策加以打擊，而且外國資本家初到中國的時候，究不能獨立經營，只好借助中國商人和僱用中國賬房，買辦，經紀人之類，做掠奪勾當的中間物。這麼一來，中國資產階級就漸漸完成他們

的初步積累階段。大戰期內，歐美商品不能顧及中國，日本商品又遭抵制，遂造成中國資本家發展的最好機會，如是中國資本主義也漸漸在揚子江流域一帶興旺起來了。

但是壓迫在世界侵略的資本主義極大組織之下的新興的中國資產階級，那能自由發展和自由競爭而達到獨立的地位，只不過做世界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中間物罷了。而且外國資本主義爲自己的發展和利益，反扶助中國軍閥，故意阻礙中國幼稚資本主義的興旺。中國幼稚資產階級爲免除經濟上的壓迫起見，一定要起來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奮鬥。

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已能結合全國的力量，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北京賣國政府，如一九一九年的排日運動。國民黨所組織的廣東政府，更是中國開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運動。廣東政府現在雖然倒了，但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運動在中國是不會消滅的。還有一層，中國的智識階級，商業的和工業的資產階級，要自己能夠避免美國的愚弄，他們的民主運動才能依正軌進行。

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農民因爲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災流行，戰爭和土匪的擾亂，軍閥的額外徵稅和剝削，外國商品的壓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趨窮困和痛苦。近來農民更可分爲三種界限：（一）富足的農民地



主：(二)獨立耕種的小農；(三)佃農和農業雇工。第一種占最少數，第二第三兩種的貧苦農民至少也占百分之九十五。如果貧苦農民要除去窮困和痛苦的環境，那就非起來革命不可。而且，大量的貧苦農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時可以保證中國革命的成功。

自從外國商品充斥中國市場以來，手工業者小店主小雇主也是日趨困苦，甚至破產失業，加以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增加了手工業者無產階級化的速度。這個大量的羣衆也勢必痛恨那拿痛苦給他們受的世界資本主義，加入到革命的隊伍裏面來。

中國勞動運動已是在第一個階段中發展起來，香港海員和其他工人爲經濟要求的罷工運動，足夠證明工人們的偉大勢力，工人們的組織，近來亦見迅速的擴大。而且工人們處在中外資本家的極端壓迫之下，革命運動是會發展無已的，發展無已的結果，將會變成推倒在中國的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領袖軍。

### (三)

各種事實證明，加給中國人民（無論是資產階級工人或農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此因反對那兩種勢力的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是極有意義的；即因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獨立和比較的自由。因此我們第四階級審察今日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我們第四階級和貧苦的農民

都應該援助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而且我們第四階級相信在現今的奮鬥進行中間，只有第四階級的革命勢力和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合同動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義革命格外迅速成功。

### ○ 中國第四政黨的任務及其目前的奮鬥

#### (一)

第四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第四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第四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

我們第四階級有我們自己階級的利益，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第四階級不過得著一些自由與權利，還是不能完全解決。而且民主主義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第四階級處於對抗地位。因此第四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與“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第四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鬥。如果第四階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強固，這第二步奮鬥是能跟着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即刻成功的。

#### (二)

中國第四政黨，他的目的是要組織第四階級，用階級鬭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

中國第四政黨爲工人和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幫



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中國第四政黨爲工人和貧農的利益，在這聯合戰線內奮鬥的目標是：

- 一，消滅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
- 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
- 三，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爲真正民主共和國；
-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爲民主自治邦；
- 五，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 六，工人和農民，無論男女，在各級會議市議會有限制的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絕對自由；
- 七，製定關於工人和農人以及婦女的法律：
  - 1，改良工人待遇：（甲）廢除包工制，（乙）八小時工作制，（丙）工廠設立工人醫院及其他衛生設備，（丁）工廠保險，（戊）保護女工和童工，（己）保護失業工人等……
  - 2，廢除丁漕等重稅，規定全國——城市及鄉村——土地稅則；
  - 3，廢除厘金及一切額外稅則，規定累進率所得稅；
  - 4，規定限制出租率的法律；

5,廢除一切束縛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權利;

6,改良教育制度,實行教育普及。

上面的七條,是對於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都有利益的,是解放他們脫出現下壓迫的必要條件。我們一定要為解放我們自己,共同來奮鬥!工人和貧農必定要環繞中國第四政黨旗幟之下,再和小資產階級聯合着奮鬥呀!

但是工人要在這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裏,不至為小資產階級的附屬物,同時又能為自己階級的利益奮鬥,那麼工人們要組織在第四政黨和工會裏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工人們時常要記得他們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訓練自己的組織力和戰爭力,預備與貧農聯合組織,達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 第十九章

### 陳獨秀主義——第三階級的最左翼

在中國第三階級營壘內，包含有極複雜的思想上的派系，從傾向法西斯蒂的極右傾思想，到近似社會主義的極左傾思想，無所不有，這，在以前已經說過了。陳獨秀主義就是第三階級的最左翼。

陳獨秀主義是五四運動的產物，是第三階級民族運動之更進一步的表現。

有人以為中國自從晚清以來，文化思想可分為三個階段：第

一個階段是所謂“地主之資本主義化時期”；這階段的代表及領袖是梁啟超。第二個階段是資本主義時期，這階段的代表和領袖，是胡適之。第三個階段是社會主義時期，這階段的代表和領袖是陳獨秀。

我們必須指出這是不正確的見解。梁啟超胡適陳獨秀這三個人，都是資本主義文化的使徒，我們祇能說他們有某種程度上的差異，決不能說他有階級上的不同。

事實應該是這樣的：近代中國文化的思潮，可以分成二個階段，前者是資本主義文化的時期，後在是社會主義文化的時期。陳獨秀既然是和梁啟超胡適之一樣，是資本主義文化的使徒，所以他們都是屬於第一階段中的人物。這兩個階段的時間上的劃分，大致如下：第一個階段，開始是一八九四年；第二個階段，開始於一九二七年。但這裏有二點應該注意：第一：時間上的劃分，並不是很機械，例如在一八九四年以前，事實上已有資本主義文化的萌芽；同樣，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已有社會主義文化的萌芽。第二：並不是說，這兩個階段是用刀來截做兩段的一條線，就是說，在資本主義文化階段沒有社會主義文化；在社會主義文化階段沒有資本主義文化。決不是這樣的。事實上，一九二七年在社會主義文化思潮開始以後，資本主義文化思潮依然還極有勢力。

在第一個階段 即在資本主義文化思潮的階段，又可以分成



三個時期如下：

中國資本主義文化思潮的三時期

第三時期				第二時期				第一時期			
4.	3.	2.	1.	4.	3.	2.	1.	4.	3.	2.	1.
後使的的階	背是時代資	景一問表本	景是九是物義	來與到背	到相當是	景是中國	景是中國	開背景	景是資本	代表人物是	資本主義
的第三機尤其是全國經濟的總破產最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來與到背	到相當是	景是中國	景是中國	開背景	景是資本	代表人物是	資本主義
的第三機尤其是全國經濟的總破產最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來與到背	到相當是	景是中國	景是中國	開背景	景是資本	代表人物是	資本主義
的第三機尤其是全國經濟的總破產最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來與到背	到相當是	景是中國	景是中國	開背景	景是資本	代表人物是	資本主義
的第三機尤其是全國經濟的總破產最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來與到背	到相當是	景是中國	景是中國	開背景	景是資本	代表人物是	資本主義
的第三機尤其是全國經濟的總破產最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來與到背	到相當是	景是中國	景是中國	開背景	景是資本	代表人物是	資本主義
的第三機尤其是全國經濟的總破產最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來與到背	到相當是	景是中國	景是中國	開背景	景是資本	代表人物是	資本主義
的第三機尤其是全國經濟的總破產最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來與到背	到相當是	景是中國	景是中國	開背景	景是資本	代表人物是	資本主義
的第三機尤其是全國經濟的總破產最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的級焦頭爛額而帝國主義的武力	來與到背	到相當是	景是中國	景是中國	開背景	景是資本	代表人物是	資本主義

中國資本主義文化思潮的三時期，是應該如上面所分的，孫逸仙的思想，就是集這三時期的大成。在這三個時期，無論是第一，第二，或第三時期，都包含有孫逸仙主義的精神。但是在這裏，無論那一個時期，代表人物中都沒有胡適之的地位。胡適之是不配在這裏佔一個位置的。

胡適之，不管人家稱他爲新聖人也好，稱他爲新文化運動領袖也好，也不管他自己怎樣自負，但事實上，他僅僅是一個庸俗的第三階級的學者而已。在他的全部思想學說中，找不出一點特色可以使我們景慕。在五四運動中，他的作用至多是陳獨

秀的助手。這點胡適之自己也承認，他在他的文存中曾說“白話文運動應該歸功於獨秀兄”(大意如此，原書不在手頭，無從徵引)。他是哲學博士，但是他在哲學方面有什麼成就呢？錯誤而已！這誠如葉青所說：

“總括看來，胡適底哲學意見，並沒有成體系。其成爲牠底中心思想底個人主義和實驗方法(或科學方法)，不屬於他；卽在闡揚方面，也說不上。他在這裏底努力，只是表現他把歐美底常識舶來中國大肆宣傳。至於他所添加底部分，或者和他所添加底解釋，那就十有九是錯誤。所以我們很可以說，胡適的哲學，對的不是他的，他的不是對的。

“他很想創造一個體系，尤其五四時代，眼睜睜地看見新思潮新主義輸入中國，把握了羣衆。他雖然作了‘最高的宗教’底教主，但却不曾卽時把新哲學完成，作一個新主義的創立者。因此他除了大罵人家當了‘淺薄的新典主義’底‘奴隸’外，太息道：“我們提倡有心創造無力底罪名，是不能避免的”(胡適文存二集一〇一——一〇頁)。的確，胡適對於哲學，是提倡有心，創造無力，並沒有一點理論的貢獻。”(“二十世紀”一卷八期211—212頁)

“……哲學博士和哲學教授——胡適底哲學，究竟有一樣足稱的麼？他是實用主義者，實用主義是他底哲學宗派和



基礎，然而他懂得十分淺薄，連介紹工作都沒有做好，更說不上闡揚。實在他還不完全是一個實用主義者，只是在歐美成爲常識底舊科學方法底宣傳家。即使說是，那亦不過很庸俗的市儈哲學之一淺嘗者而已。‘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他獲得博士，成名學界底著作，然而我們分析底結果，只可說牠是中國上古哲學史料底註疏，在分析和敘述方面，處處充滿了錯誤與缺憾……在世界最近哲學方面，我們發見了他底成見和無知；簡直是連普通的科學常識都沒有具備，所以處處鬧笑話……僅僅是錯誤，無知，成見底堆積。至於他自己在哲學上底貢獻呢？沒有，沒有，絲毫沒有！他不獨創造無力，而且議論無識，言出多謬！

“這不是哲學方面底胡適的寫真嗎？的確，胡適在哲學方面是完全失敗了……”（同上213—214頁）

葉青對於哲學方面的胡適的批評是很對的。

他在哲學方面既完全失敗，一無足述，在科學方面，又如何呢？我們不妨再借用葉青的批評：

“他自己並不是科學家，亦不是科學方法論者或科學的理論家。不過他到外國去了一趟，濡染得有若干科學的氣味……。胡適在五四文化運動中期——五四之年底六七月以前，他對於科學，只以美國科學的文化環境底薰陶，或

實用主義的研究，知道了實驗；而且是一個簡單的概念……至於談科學與玄學，科學與人生觀，那在五四運動後四年，而且是被動的，為張君勱丁文江們所引起。科學的理論，他更是不懂，也沒有單獨地談過。所以胡適對於科學，甚麼也說不上。”（“二十世紀”二卷一期第106—107頁）

“綜合起來，不用說，他是物質論者。但亦不用說，他不是新物質論者，而是舊物質論者——機械的物質論，並且是其末流，非常庸俗。正因為這樣，他在科學方面，無論就方法來說，理論來說，都很膚淺，是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底古董。對於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底新進步，除開進化論之常識的了解外，甚麼都不懂得。自然，也還有了解的，那就是潘加萊一流底頹廢和荒謬，因為這是與他那又頹廢又荒謬的哲學——實用主義相投的。

“因為這樣，在科學底方法上，所談甚粗淺，而且是附和人家，掛漏和錯誤更不用說了。他說得多，自視為懂解，並以此‘教人’的，尚且如此。其它呢？在科學的理論上，只於介紹實用主義時提到，錯誤得非常厲害。在科學與玄學方面，那更是連問題都不懂，他只曉得科學與神學，所以他在這裏沒有一點積極的發揮。在科學與人生觀方面，他有正式的和正面的論究，寫得很多，並且有好幾次。然而同樣地曲



解問題，始終不明白它的理論意義，只曉得當作科學與神學講話，全然文不對題。他所理解的科學理論之膚淺，平庸，完全暴露。至於他底哲學程度，更在這裏顯示得非常明瞭，比之張東蓀，一點也不如：

“所以胡適在科學方面，亦如在哲學方面，是失敗了。他不獨提倡有心，創造無力，而且理解也無力。我們說他是科學底門外漢，絲毫不錯……”（“二十世紀”二卷四期第153—154頁）

胡適之的學業的基礎，是在哲學與科學，然而他在這兩方面竟一無可取。

至於他的政治思想，始終是主張“好人政府”的。自然，如果真的能夠出現一個分於理想的“好人政府”，我們也決不反對，可是我們知道這是夢想，事實上決不會有這麼一個事實的。政治是有尖銳的階級性的，諸葛亮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諸葛亮主義已不適於二十世紀的今日。我們只有在階級的立場上去批評一個政府的好壞，決不能從個人問題着想；因為這是階級問題而不是人的問題。本來，庸俗的第三階級的學者往往諱言階級，所以也不必獨責胡適之。胡適之一方面渴望着在北京的皇宮裏能夠出現一個合乎他的理想的“好人政府”，另一方面又不想自己努力去創造自己理想的所謂“好人政府”。胡適之始終不曾反對過帝國

主義，雖然帝國主義是中國第三階級敵人；甚至在別人反對帝國主義的時候，他以爲是“海外奇談”，是“無理取鬧”，是“有失國際禮貌”。同樣，胡適之始終不會對封建勢力作過堅決的鬥爭，反而譏諷人家反對封建勢力運動（如前所述，他在五四運動中不過是陳獨秀的助手）；見了溥儀還要稱皇上，見馮玉祥驅逐溥儀，大呼有失國際信義，在這種地方簡直比馮玉祥還更落後。至於在他的文學作品中，更找不出一點發揚第三階級文化的東西。他的詩集“嘗試集”實際上簡直是一部“出醜集”；其他的文學作品更是一無足述。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功，甚至遠不及徐志摩（徐志摩多少還能寫一點歌頌第三階級文化的東西）。所謂新聖人也者，就是如此！

如果要拿這樣一無足取，一無所成的人來做資本主義文化的代表及首領人物，直是太侮辱了中國的第三階級！這是孫逸仙梁啟超的在天之靈所不容許的！

我以爲資本主義文化第二時期的代表及其首領人物，應該是陳獨秀而不是胡適之。

烏梁諾夫在一九一八年宣布考斯基爲“國際有產階級的使徒”的時候，曾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懷疑，以爲像考斯基那樣自馬克思恩格斯以來的最有權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爲什麼能夠稱他爲國際有產階級的使徒？因爲他明明是無產階級的戰士。可



是事實已經證明了考斯基的的確確是十足的國際有產階級的使徒。我把陳獨秀歸納是第三階級的使徒之列，我相信一定也會引起一部分人的懷疑與抗議，可是鐵一般的事實是最公正的證人，我們只要不否認事實，就應該承認我並不是有意攻擊陳獨秀。

陳獨秀雖然是自命爲社會主義者，乃至馬克思列甯主義者；陳獨秀雖然是中國第四階級政黨的首創人，而且是這個政黨的長期的最高指導者，可是他決不是第四階級的戰士，而是第四階級的敵人；他決不是第三階級的敵人，而是最急進的第三階級革命家，他是第三階級的最左翼，而決不是第四階級的最右翼，這點對於中國近代文化史的研究非常重要，是我們必須注意的，

我們說陳獨秀是第三階級革命家，這並不是侮辱陳獨秀，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的功績，已經寫在歷史上不容我們洗刷，不容我們塗改。戴季陶稱陳獨秀爲中國列甯，我覺得這是很不相稱的，但是我覺得即使稱他爲中國的盧梭，也不爲十分過分。

中國產業的發展，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封建殘餘的束縛這兩層阻礙，所以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剷除封建殘餘的剝削，成了中國第三階級的兩大歷史任務。五四運動就是實行這種歷史任務的鬥爭，雖然這次鬥爭並沒有完成這種任務，但這種運動的歷史意義是不可否認的。陳獨秀的確是這個動運的一個最重要的領袖，這個運動是第三階級性的，但是推動這個運動的主要

動力却是第四階級，第三階級在這個運動中並沒有表現出積極的作用。可是這並不能作為陳獨秀不是第三階級革命家的說明。第三階級在這次運動中雖沒有表現出積極的作用，可是陳獨秀的確是這個階級的最急進的代表者。

陳獨秀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所最努力的，就是反對孔夫子。爲什麼要反對孔夫子呢？因爲孔夫子的思想是代封建地主的思想，這種思想是束縛產業發展的有力衛兵之一；無情地掃除這些封建思想，正是第三階級所迫切要求的。陳獨秀代表第三階級，站在前衛戰士的地位，對於這種封建的堡壘施以有力的攻擊，所以陳獨秀實在是第三階級的功臣。

固然，第四階級也需要反對這種封建思想，所以有人說，單是以反對孔子一點，決不能作為陳獨秀是第三階級使徒的說明。這原是對的，但陳獨秀的反孔運動，完全是立脚於第三階級的觀點上，試舉一二例如下：

“……孔教爲吾國歷史上有力之學說，爲吾人精神上無形統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絕對承認之，而不懷絲毫疑義。蓋秦火以還，百家學絕，漢武獨尊儒家，厥後支配中國人心而統一之者，惟孔子而已。以此原因，二千年來迄於今日，政治上社會上學術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果，設全中國自秦漢以來，或墨教不廢，或百家並立而競進，則晚周即當時歐洲之



希臘，吾國歷史必與已成者不同，爲學而思之士，諒不河漢斯言。及今不圖根本之革新，仍欲以封建時代宗法社會之孔教，統一全國之人心，據已往之成績，推將來之效果，將何以適應生存於二十世紀之世界乎？吾人愛國心倘不爲愛孔心所排而去，正應以其爲歷史上有力之學說，正應以其爲吾人精神上無形統一人心之具，而發憤廢棄之也。若夫廢棄孔教，將何以代之？則國民教育尙焉；中外學說衆矣，何者無益於吾羣？即孔教亦非絕無可取之點，惟未可以其倫理學說統一中國人心耳，若以此統一人心，而謀有以保存之發達之，則此共和國中，尊君尊親尊男之禮教，不知發達至何程度，始爲美備也，愚實無此勇焉……”（“新青年”三卷一號一九一七年二月發行陳獨秀答俞頌華書）

在“復辟與尊孔”一文（“新青年”三卷六號一九一七年八月發行）中，說得尤其透澈：

“……張康雖敗，而共和之名，亦未必能久存，以與復辟論相依爲命之尊孔論，依舊盛行於國中也。孔教與共和乃絕對兩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此義愚屢言之，張康亦知之，故其提倡孔教必悖共和，亦猶愚之信仰共和必排孔教，蓋以孔子之道治國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

“孔子之道，以倫理政治忠孝一貫，爲其大本，其他則枝

葉也。故國必尊君，如家之有父。荀董以後所述尊君之義，世或以爲過當，非真孔道，而孟軻所言，不得謂非真孔道也。孔孟論政，純以君主賢否卜政治之隆污。故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離婁篇）。答滕文公問爲國之言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趙注：人倫者，人事也，非是。按人倫卽指五倫。孟氏語陳相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尙書之所謂五典五品五教，皆卽此也。）。所謂保民，所謂仁政，已非今日民主國所應有，而當時實以爲帝王創業之策略，故一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梁惠王篇）；再則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公孫丑篇）。陳仲子齊之廉士也，而孟氏乃以無君臣上下薄之（見盡心篇）。猶之孔門以廢君臣之義潔身亂倫，責荷篠丈人（見論語微子章）。此後乎孔子者所述之孔道也。前乎孔子論爲治之道，莫備乎尙書。夏書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傳云：近謂親之，下謂失分。）。商書仲虺之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傳云：民無君主，則恣情慾，必致禍亂。）太甲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又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咸有一德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盤庚曰：各長於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



獸(按此即韓退之‘作粟空麻絲以事其上，之說，所由出也。)  
說命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義(傳云：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又云：民以從上爲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義也。)。周書秦誓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又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傳云：言惟君得專威福，爲美食。)。凡此抑民尊君之教典，皆孔子以己意刪存，所謂‘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者也。孔氏贊易，爲其大業。班固所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卽十翼也。’是已。說易者其義多端，而要其指歸，卽繫辭之開宗明義‘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等數語。說卦云：乾，健也；坤，順也。又云：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又云：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坤爲地，爲母，……爲衆。序卦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家人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履卦象曰：上

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凡此皆與繫辭之言相證明，皆所謂不易之道，易名三義之一也（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康成採此說作易贊易論云：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孔氏視上下尊卑貴賤之義，不獨民生之彝倫，政治之原則，且推本於天地，蓋以爲宇宙之大法也矣。春秋者，孔教大義微言之所在，孟軻以之比烈於夏禹周公者也（滕文公篇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開卷卽大書特書曰：“王正月”。公羊傳云：易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所月也（何注云：以上繫於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春秋大義，莫大於尊王也可知，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孔子之道，春秋孝經，相爲表裏，忠孝一貫，於斯可徵。天子章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士章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又曰：故以孝事君則忠。聖治章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五刑章曰：要



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此即君親師并重之義）。廣揚名章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論語者，記孔子言行之書也。八佾章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子路章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一言而興邦乎？顏淵章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注曰：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季氏章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又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微子章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韓非及後世暴君之欲加刑戮於隱逸也，皆取此義。）。秦伯章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所徵引，皆羣經之要義。不得謂爲後儒僞託，非真孔教矣。然據此以言治術，非立君將以何者爲布政施教之主體乎？

“今中國而必立君，舍清帝復辟外，全國中豈有相當資格之人足以爲君者乎？故張康之復辟也，罪其破壞共和也可，罪其擾害國家也亦可，罪其違背孔教國國民之心理則不可。罪其舉動無意識，自身無一貫之理由則更不可。蓋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辟；理之自然，無足怪者，故曰：張康復辟，其事雖極悖逆，亦自有其一貫之理由也。

“張康雖敗，而所謂孔教會，尊孔會，尙遍於國中，愚皆

以爲復辟黨也。蓋復辟尚不必尊孔，以世界左袒君主政治之學說，非獨孔子一人。若尊孔而不主張復辟，則妄人也，是不知孔子之道者也。去君臣之大倫，而謬言尊孔，張康聞之，必字之曰逆。以此等人而罵張康曰逆，其何以服張康之心？

“說者或曰：孔子生於二千年前君主之世，所言治術。日本於君政立言，惡得以其不合於後世共和政制而短之耶？曰：是誠然也，愚之非難孔子之動機，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適用於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強欲以不適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會國家，將爲文明進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於一言。”

陳獨秀在這裏很明白地表示了他的反孔的階級立場——爲共和(第三階級的共和)而反孔。這些文章，還是發表於五四以前。在五四運動以前，他早就辦新青年，做了許多文章，那時新青年的態度與任務(也就是獨秀的態度與任務)，可於獨秀在新青年六卷一號(一九一九年一月發行)中所作的“本誌罪案之答辯書”一文中看出；茲錄其中一節如下：

“……他們所非難本誌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

“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



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og)和賽因斯(Scienc)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只因為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誌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之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誌，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辦法。”

德先生和賽先生是什麼呢？就是資本主義文化的精神！

在五四運動以前，陳獨秀的思想固然完全第三階級的，但在五四運動中，及在五四運動以後，獨秀的思想依然如故，並沒有絲毫本質上的不同。

在五四運動以後，陳獨秀以新青年雜誌的名義，發表宣言（載新青年七卷一期，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發行），表示他的具體主張，酌錄宣言一二節如下：

“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

“我們相信世界各國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層疊的舊觀念中，有許多阻礙進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們想求社會進化，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面

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

“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

“我們新社會的新青年，當然尊重勞動；但應該隨個人的才能興趣，把勞動放在自由愉快藝術美化的地位，不應該把一件神聖的東西當做維持衣食的條件。

“我們相信人類道德的進步，應該擴張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對於世界上各種民族，都應該表示友愛互助的情誼。但是對於侵略主義占有主義的軍閥財閥，不得不以敵意相待。

“我們主張的是民衆運動社會改造，和過去及現在各派政黨，絕對斷絕關係。

“我們雖不迷信政治萬能，但承認政治是一種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會把政權分配到人民全體，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無職業做標準，不拿有無財產做



標準；這種政治，確是造成新時代一種必經的過程，發展新社會一種有用的工具。至於政黨，我們也承認他是運用政治應有的方法；但對於一切擁護少數人私利或一階級利益，眼中沒有全社會幸福的政黨，永遠不忍加入。

“我們相信政治道德科學藝術宗教教育，都應該以現在及將來社會生活進步的實際需要為中心。

“我們因為要創造新時代新社會生活進步所需要的文學道德，便不得不拋棄因襲的文學道德中不適用的部分。

“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我們現在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

“我們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權利，已經是現在社會生活進步的實際需要；並且希望他們個人自己對於社會責任有徹底的覺悟。”

這裏的所謂具體主張，事實上祇是一些第三階級的濫調而已。尤其是關於政治的見解，所謂“對於擁護少數人私利或一階級利益，眼中沒有全社會幸福的政黨，不忍加入。”這完全是一種第三階級的庸俗觀點，因為政黨根本是有階級性的，根本只能代表一階級的利益，但是第三階級思想家是不願意知道這些的。

在一九二〇年，即在第四政黨成立的那年，他的思想還是依然如故。他在新青年七卷三號（一九二〇年二月發行）上發表了一

篇“基督教與中國人”，更充分地表現了他的第三階級的眞面目。

列寧在“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的觀點之下，否定了一切宗教，尤其是對於作為資本主義工具的基督教，非難尤力，但是獨秀在這篇論文中，一開始就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肯定了基督教的價值：

“……我以為基督教是愛的宗教，我們一天不學尼采反對人類相愛，便一天不能說基督教已經從根本崩壞了。基督教底根本教義只是信與愛，別的都是枝葉；不但耶穌如此，舊約上開宗明義就說：‘有害你們生命流你們血的，無論是獸是人，我必討他的罪。人與人是弟兄，人若害人的生命，我必討他罪。凡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為上帝造人，是按着自己形像造的。’（創世記第九章之五、六）所以基督徒或是反對者，都別忽略了這根本教義”。

“我們今後對於基督教問題，不但要有覺悟，使他不再發生紛擾問題；而且要有甚深的覺悟，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污濁的坑中救起”。

在列寧的心目中，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在陳獨秀的心目中，耶穌成了救世眞主，這是多麼不同的對照呀！然而獨秀却一再的說：



“基督教底‘創世說’‘三位一體說’和各種靈異，大半是古代的傳說附會，已經被歷史和科學破壞了。我們應該拋棄舊信仰，另尋新信仰。新信仰是什麼？就是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

在這裏，獨秀竟公然承認耶穌是他的新信仰了。

耶穌麻醉人心的東西，獨秀却拿來當作寶貝；他贊美耶穌的（1）崇高的犧牲精神；（2）偉大的寬恕精神；（3）平等的博愛精神。你看他引了耶穌的一大篇話：

“耶穌所教我們的人格，情感是什麼？（1）崇高的犧牲精神。他說：‘我是從天降下的活麵包，吃這麵包的人永生；爲了人世底生命，我所貢獻的麵包就是我的肉。’（約翰傳六之五十一）‘我的肉真是食物，我的血真是飲物。’（約翰傳六之五十五）‘吃我肉飲我血的人，與我合一，我也與他合一。’（約翰傳六之五十六）‘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門徒；愛子女過於愛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門徒。’（馬太傳十之三十七）‘不背着他的十字架隨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門徒。’（馬太傳十之三十八）‘想保全他的生命的人，將來必失去生命，他爲我失去生命，將來必得着生命。’（馬太傳十六之二十五）耶穌在將要被難之前，知道他的十二門徒中，有一人要賣他，他舉起酒杯向他們道：‘請你們滿飲此

杯，因為這是我的血，為誓約為衆人赦罪流的血。’（馬太傳二十六之二十七、二十八、）(2)偉大的寬恕精神。他說：‘你們寬免別人的罪，天父也要寬免你們的罪。’（馬太傳六之十四）‘悔改與赦罪將由他的名義從耶路撒冷起，宣傳萬國。’（路加傳二十四之四十七）‘一人悔罪，天使大喜。’（路加傳十五之十）‘我告訴你，那婦人許多罪惡赦免了，因此他愛也多；被赦免的少，愛也少了。’（路加傳七之四十七）‘神歡喜一個有罪的人悔改，過於歡喜九十九個正直的人無須悔改。’（路加傳十五之七）‘別人告訴你們：愛你們的鄰人，恨你們的敵人。我告訴你們：愛你們的敵人，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這樣才是天父底兒子；他的日光照善人也照惡人，他降雨給正義的人也給不義的人。’（馬太傳五之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勿敵惡人；有人打你右邊臉，你再把左邊向他。有人到官告你，取去你的上衣，再把外套給他。’（馬太傳五之三十九，四十，）‘我不是為無罪的人而來，乃為有罪的人而來。’（馬太傳九之十三）(3)平等的博愛精神。他說：‘使瞎子能看，跛子能走，聾子能聽，有癩病的人潔淨，死的人復活，窮人得着福音。’（馬太傳十一之五）‘尊敬你的父母，愛隣人如愛你自己。’（馬太傳十九之十九）‘賣你所有的東西，送給窮人，如此你將得着天國底財寶。’



(馬太傳十九之二十一) ‘富人入天國，比駱駝穿過針孔還難。’(馬太傳十九之二十四) ‘第一盡全心全精神全意愛你的神，第二愛隣如愛你自己，一切法律，預言者，都是遵這兩大誡。’(馬太傳二十二之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 ‘你們須相愛，你們須相愛如同我愛你們。’(約翰傳十三之三十四) ‘窮人少的布施，多過富人多的布施，因為富人布施的是他的有餘，窮人布施的是他的不足，是盡其所有。’(路加傳二十之，三，四) Pharisee 人類學者譏誚耶穌和稅吏及罪人同食，耶穌對他們說道：‘你們堂中，誰有一百隻羊，若失去一隻，他不離開這九十九隻，去將那失去的尋得嗎？尋得了，是要喜歡的把他背在肩上。他回到家裏，他要邀集他的朋友，他的鄰人，向他們說，恭喜我尋回來了我失去的羊。我告訴你們，神喜歡一箇有罪的人悔改，過於喜歡九十九個正直的人無須悔改，也是這樣。’(路加傳十五之一至七)這就是耶穌教我們的人格，教我們的情感，也就是基督教底根本教義。除了耶穌底人格，情感，我們不知道別的基督教義。這種根本教義，科學家不曾破壞，將來也不會破壞。”

這些都是耶穌替統治階級欺騙被統治者的寶貝，例如“勿敵惡人：有人打你右邊臉，你再把左邊向他。有人到官告你，取去你

的上衣，再把外套給他。”這就是替資本家向工人說：他要你做十二點鐘的工，你就替他做十三點鐘；這樣，你死後可以上天堂了。你討厭富人嗎？你覺得富人欺侮了你嗎？那是不足重視的，因為“富人入天國，比駱駝穿針孔還難。”你們現在雖然受了富人的氣，但是你們不可發怒，不可反抗，你們要忍受。你們要知道雖然你們現在吃了一點虧，但你們將來是可以上天堂的，而富人是配不上天堂的。這樣，你們可以自滿了……。耶穌一生的任務，就是拿這些鬼話來欺騙被壓迫者，統治階級利用耶穌給了被統治者一條精神上的鎖鏈，使他們永遠束縛在奴隸生活之中，不敢抬一抬頭。這是耶穌的任務，這就是耶穌對於統治者的功績！當然的，每個統治者——這是沒有國界，沒有‘國情’，沒有民族的限制的——都應該讚美耶穌，正同陳獨秀讚美耶穌一樣，因為統治階級有了耶穌，其作用勝於有了十萬個警察和十萬個偵探。

陳獨秀爲什麼這樣讚美耶穌呢？這是階級的意義！這還不明白嗎？

陳獨秀既是第三階級的代表，當然要和其他第三階級的學者一樣，要否認中國有階級的對峙——雖然他口頭上處處不離階級鬥爭，然而在有意無意之間，他和孫逸仙一樣，以爲中國沒有階級對峙的，例如他在新年青八卷四號（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發行）發表一篇“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文中，有如下一段：



“中國勞動者沒有組織，沒有階級的覺悟，不能作階級的爭鬥來抵抗資本家，以所生活極苦而工價極賤，造成外國資本家羣來掠奪底好機會；他們始而是經濟的掠奪，接着就是政治的掠奪，漸漸就快做中國底主人翁了。按諸產業競爭的原理，手工業遇機器工業必然要失敗的，小規模的機器工業遇着大規模的也是要失敗的；以組織力薄弱的中國資本家遇着組織力偉大的歐美資本家，那能夠不失敗？將來那能夠不降入勞動階級？所以我曾說過，我們中國人別輕視勞動者，不久我們都是外國資本家底勞動者；我又說過，那時革中國資本家命的，不是可憐的中國工人，乃是外國穆耦初虞洽卿先生們。這種狀態，除了中國勞動者聯合起來組織革命團體，改變生產制度，是無法挽救的。中國勞動（農工）團體爲反抗資本家資本主義而戰，就是爲保全中國獨立而戰。只有勞動團體能夠達到中國獨立之目的。所謂中國資本家都直接或間接是外國資本家底買辦，只能夠幫着外國資本家來掠奪中國人，只望他們發達起來能夠抵制外國資本家，能夠保全中國獨立，再過一兩世紀也沒有希望。”

陳獨秀在這裏所說的，完全和孫逸仙一樣。陳獨秀說以爲“以組織力薄弱的中國資本家遇着組織力偉大的歐美資本家，那能夠不失敗？將來那能夠不降入勞動階級？”這和孫逸仙以爲中

國沒有貧富的懸隔，只有大貧小貧的區分，是一個樣的。在做這篇文章的時候，第四政黨已經形成，獨秀已經是第四政黨的領袖，其思想尚且如此！

他在主持第四政黨以後，所發表的文章，還是充滿了這種冒牌社會主義的論調，例如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出版的“嚮導”第二期上，他的大作“造國論”中，他這樣寫着：

“我們中國此時在名義上雖然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在實質上，比南洋馬來羣島酋長割據的英荷殖民地高明不多，那裏算得一個獨立的國！在經濟方面：國家重要的權利大部分抵押給外國了，外國貨充滿了全國，全中國人都是外國生產的消費者，全國金融大權都直接或間接操諸外人之手。在政治方面：大小酋長分據了中央及地方，這班大小酋長之發號施令，又惟公使團之意旨是從。南洋英屬荷屬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狀況完全是這樣，如何能算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在這樣殖民地狀況之下，有何國會可言！有何法統可言！有何憲法可言！有何政治可言！所以我以為中國還在‘造國’時代，還在政治戰爭時代；什麼恢復法統，什麼速製憲法，什麼地方分權，什麼整理財政，什麼澄清選舉，對於時局真正的要求，不是文不對題，便是隔靴搔癢。時局真正的要求，是在用政治戰爭的手段，創造一個真正獨立的中華民國。



“這個問題倘然決定了，接着第二個問題，就是用什麼方法來造國？”

“我們的答案是：組織真正的國民軍，創造真正的中華民國。

“這個國民軍，是應該由全國被壓迫的各階級愛國者而不爲私利私圖的有力分子集合起來號召全國各階級覺悟的大羣衆組織而成。在這創造國家的大事業中，自然少不得許多有力的領袖，但是英雄時代賢人政治時代都快過去了，這種新勢力若不建立在大羣衆的需要與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難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軍閥。在中國的產業狀況看來，這種大羣衆決不是那一個階級的羣衆在短期內能夠壯到單獨創造國家的程度。商人說，在商言商，不與聞政治，教育家主張不談政治，至今沒有一個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發生，這都是中國資產階級沒有壯大的表徵；在私產制度之下，資產階級未壯大，無產階級也自然不能壯大；因此，我們敢說，中國產業之發達還沒有到使階級壯大而顯然分裂的程度，所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尚未成熟，只有兩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時期是已經成熟了，這個時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餘年來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的呼聲可以證明的。”

在這篇文章中，主要的意思是要“造國”，所謂“造國”，實際上就是建立第三階級的國家政權，這正是第三階級的普遍要求。陳獨秀指出了這種造國的方法，是在“組織的國民軍”。相信武力萬能，忽視一般民衆組織，這是落後的第三階級的傳統思想，急進的陳獨秀竟然也未能免俗，所以陳獨秀以爲這是唯一的方法了。誠然，我們並不反對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兩階級聯合起來，但是陳獨秀一方面戴着第四階級政黨領袖的高帽子，一方面又否認階級對峙階級鬥爭，看吧！他不是明明白白的說：“資產階級未壯大，無產階級也自然不能壯大；因此，我們敢說，中國產業之發達還沒有到使階級壯大而顯然分裂的程度。”這種否認階級存在的見解，試問與其他的落後的第三階級思想家有什麼分別？誠然，我們也承認第四階級革命尙未成熟，所以不僅在那時（一九二二年），即在以後幾年（一九二七年以前），中國革命的階級性質還是第三階級的革命，可是階級的存在却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試問如果沒有階級存在，陳獨秀所領導的××黨是一個什麼黨呢？是一個所謂“超階級”的黨嗎？如果陳獨秀不否認他那時所領導的黨，是第四階級的政黨，則就不能否認有階級的存在；既有階級存在，自然有階級對峙的現象（有第四階級，必然有第三階級）；也自然就有階級鬥爭的事實。陳獨秀雖然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可憐他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階級鬥爭說，



還不懂得，這因為陳獨秀雖然偷藏在第四階級政黨內，終究自覺地不自覺地要露出第三階級的狐狸尾巴來，因為否認階級對峙，抹煞階級鬥爭，原是第三階級學者乃至革命家最拿手的把戲！

由這樣一個觀點——忽視階級立場的觀點出發，必然要做出許多奇怪的結論。例如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八日出版的嚮導週報第十六期所作的那篇題為“革命與反革命”的論文，論革命與反革命的定義，就陷於一種最庸俗的第三階級學者的見解。例如他說：

“封建諸侯王在打破部落酋長制建設比較的統一政治時代，他是革命的，到了民主革命時代，他便是反革命的了。民主派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他是革命的，到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他便是反革命的了。在這些階級鬥爭亦即社會組織進化最顯著的時代，固然明白顯出他們革命的及反革命的性質；在這些時代之每個時代中，又復有幾多小的進化階段現出革命與反革命的爭鬥；在一些進化階段短促變化複雜的社會裏，一個黨派的思想，一個人的行爲，同時能建革命的功勞，也能造反革命的罪惡。

“秦始皇以武力兼併六國，建設統一的政制，建設統一文字，這是革命的，至於焚書坑儒壓迫言論，便是反革命的了。段祺瑞在贊成辛亥革命反對洪憲帝制討伐張勳復辟時，

本是革命的人物，後來組織賣國機關（安福俱樂部）討伐西南護法軍，便是反革命的行爲了。康梁一派人在戊戌變政時代是屬於革命性質的，辛亥革命以後完全取反革命的行動。趙恆惕在參與辛亥革命及討伐洪憲時，也算是革命份子，到了割據湖南慘殺黃龐時，便是反革命的軍閥了。陳炯明在辛亥革命時代，在漳州時代，在討伐陸榮廷莫榮新時代，都是一很好的革命黨，後來阻撓北伐，驅逐孫中山，便是反革命的行爲了。胡適之先生說陳對孫是革命行動，這實在是一個很大錯誤；因為陳炯明舉兵逐孫，不但未曾宣告孫中山反叛民主主義之罪惡及他自己有較孫更合乎民主主義之主張，而且逐孫後，做出許多殘民媚外的行爲，完全證明他是一個反革命的軍閥。吳佩孚在奉袁世凱命討伐護國軍時，在奉段祺瑞命討伐護法軍時，本是一個反革命者，但是他討伐段祺瑞安福部張作霖交通系，都是革命的行動；因為段祺瑞張作霖安福部交通系這班賣國的反動派失去政權，是給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能夠得着政治上發展的機會。”

這樣來分析革命與反革命的區別，試問是不是根據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是不是站在第四階級的階級立場上？當然不是的！這是庸俗的第三階級的“十足”唯心的分析方法。

在第四階級革命時代，第三階級固然是反革命，但在第三階



級革命時代，第三階級也有叛反的可能（一九二七年就是一個顯例），陳獨秀是完全不懂得。至於以爲段祺瑞趙恆惕陳炯明吳佩孚這些煞星是曾經“革過命”的，更是笑話！段祺瑞所謂贊成辛亥革命，與袁世凱贊成辛亥革命有什麼分別？如果段祺瑞是革命的，難道袁世凱就不能算是革命的？講一句笑話，難道因爲段祺瑞是陳獨秀的“我們安徽同鄉”，所以特別抬舉嗎？段祺瑞無論是贊成辛亥革命，或是反對洪憲帝制，或是討伐張勳復辟，都不過是爲自己個人權利之爭，沒有絲毫革命的意義。趙恆惕居然也“革起命來”，那真是天大的笑話！至於說陳炯明曾經“是一個很好的革命黨”，這與陳公博顧孟餘捧閻錫山，×××捧齊燮元一樣的肉麻！吳佩孚是第二個袁世凱，是最反動的軍閥之一，其對安福系作戰，對張作霖作戰，完全是軍閥間權利地盤之爭，爲全國民衆所激烈反對，自然更找不出一絲一毫革命的意義，而陳獨秀却尊之爲“革命的戰爭”，還要很肉麻的說“因爲段祺瑞張作霖安福部交通系這班賣國的反動派失去政權，是給資產階級能夠得着政治上發展的機會。”。試問在段祺瑞張作霖失敗以後，資產階級得倒了些什麼政治上發展的機會？

陳獨秀對於革命與反革命的觀點既然如此錯誤——這種錯誤並不是陳獨秀個人應該負責的，而是陳獨秀所代表的階級（第三階級），根本不能真正認識誰是革命的和誰是反革命的，因爲

這是階級的實際狀況所決定的。——自然要對那些本質上沒有絲毫革命氣息的反革命派生出許多幻想，例如在同期嚮導週報上他的那篇“反動政局與各黨派”的論文中，對於下列各種反動派作了唯心式的哀求與教徒式的禱告：

“好政府主義者！你們在政治的信用上，對於目前的反動政局固然不應該取消極的態度，即在個人的友誼上，依封建時代的道德也不應該袖手旁觀！幹！幹！幹！”

“……”

“益友社諸君！你們黨中很有許多有氣節有骨格的革命分子，你們若真心要打倒軍閥，我們焉有不敬仰之理，但不幸眼前的事實，你們卻一面跪在一個最黑暗的軍閥面前，一面來抵制一個較開明的軍閥，這種反動的態度；是國民所斷不能容忍的啊！”

“研究系左派諸君！你們過去在政治上雖然做了許多很大的錯誤，然終究不但不是軍閥，並不是官僚；你們的態度雖過於溫和，然終究還算有點政見的，凡是一個政黨，對於重大的政治問題發生，絕對不許取消極的態度，諸君若不決心拋棄政治生涯，便應該加入打倒軍閥官僚的聯合戰線！”

“政學會諸君！你們目下開始與革命的國民黨合作，是



很能洗去以前的過失，應該受人讚美的；因為我們評判各黨派的功罪，應當以目前行動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為標準，不應懷抱成見的。但希望你們對於目前反動的政局應該有積極的表示，僅僅消極的否認彭允彝為非政學會會員是不夠的呵！

“小孫派諸君！諸君由進步黨的左派而加入革命的國民黨，已經證明你們有了一很大的進步。諸君既已加入了國民黨，國民黨一天不拋棄革命，你們便應該和他一致行動。在現在這樣反動情勢之下，已經迫得退步的政學系更進一步；你們已經前進了一步的，便當更向前進而與革命的國民黨密切的合作呀！”

“洛派軍人諸君！你們在打倒安福部段祺瑞，打倒張作霖交通系的行爲上，不但是愛國者，並且是一種革命的行動，但同時你們謬誤的方法和軟弱的心理釀成了現在的反動政局，簡直是你們的罪惡，你們若沒有立功贖罪的決心，國民是不能寬恕你們的！”

陳獨秀從希望好政府主義者起，一直到直系軍閥（即洛派軍人），這樣對於一切反動集團的希望，充分地爆露其庸俗的第三階級的夢想。陳獨秀在這篇文章告工商業家諸君一段中，曾指出“但遊說哀求是必然無效的，望諸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可

是陳獨秀自己却要對自好政府主義至益友社，研究系，政學會乃至直系軍閥遊說哀求，而不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活畫出一個庸俗的第三階級思想家矛盾張皇的神氣。

但是陳獨秀究竟是一個比較急進的第三階級革命家，所以他對於本階級的軟弱無能的傾向也表示不滿，而要大聲絕呼的喚起他們的階級覺悟：

“資產階級的商業家及學者諸君！你們向來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你們向來是迷信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可是今天橫在你們眼前的議員受賄違憲兩個問題，並不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問題，更不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問題，乃是一般人民權利被損害的問題，尤其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所不容許的問題，你們若不出來爲此問題而奮鬥，以後還有何資格有何臉面高談什麼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嚮導週報第十七期“反動政局下兩要案”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版）

陳獨秀一生的事業，就是這樣“勸資本家革命”！

陳獨秀對於中國革命的基本概念，在第二十二期嚮導週報上那篇有名的大作“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的論文中表現得非常清楚。這篇文章可以表現陳獨秀全部的政治思想，雖然只是一篇短短的論文，却是非常重要的，茲將原文的後一段抄



錄如下：

“辛亥革命，已由和平的資本民主運動進步到革命的資本民主運動，更是中國歷史上封建帝制變化到資本民主之劇烈的開始表現。所以單以滿漢民族衝突解釋辛亥革命之原因，那便只是皮相的觀察，忘了經濟的歷史的基本條件；因為辛亥以前，已經有了十七年以上的富強維新運動，辛亥革命，正是封建派壓迫資本民主派富強維新運動之反動，所以“非革新不能自強，非推倒滿清不能革新”，是當時革命派反對立憲派之重要的理論。當時革命與立憲兩派的方法雖然不同，而兩派之目的同是維新自強，換句話說，就同是“革舊制”，“興實業”，“抗強隣”的這三個口號，明明白白是半殖民地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口號，那能說是滿漢民族之爭。

“辛亥革命所以失敗的原因（此次革命表面上雖說成功，實質上可說是完全失敗）。也正以當時幼稚的中國資產階級，未曾發達到與封建官僚階級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發達到自己階級勢力集中而有階級的覺悟與革命的需要，他們大部分只看見目前的損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們將來利益，更不懂得民主的革命黨之勝利，就是他們資產階級之勝利，所以革命事業猶在中途，他們更現出小資產階級和平苟安的根性，反對繼續戰爭，而且反對革命黨，遂使全

國的武裝及政權完全歸諸帝政餘孽北洋軍閥之手；帝國主義的英美日本等國，知道中國資本民主革命是他們的不利，極力援助北洋派壓迫革命黨；於是革命黨失敗逃亡，以帝制兩次復活，革命黨屢戰屢敗一直到現在還是孤苦奮鬥，唯一的原因就是：全國資產階級之多數缺乏階級間利害不同的覺悟，所以始終依賴他們的敵人——封建的北洋派，而漠視或更至嫉視他們的友人——民主的革命黨之故。

“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階級的革命，這是如上文所述在經濟的歷史的觀察上及革命的前因後果上可以充分說明的。但以革命運動中主要分子而論，却大部分不出於純粹的資產階級，而屬於世家官宦墜落下來非階級化之士的社會；這種非階級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資產階級親密的同情，只可以說明辛亥以來革命困難不易完成的原因，不能以說明他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將來革命事業完全成功時，社會階級分化究竟至何程度，那時對於革命的性質究竟如何解釋，我們現在還不知道，現在也沒有求其知道的必要；可是觀察過去及現在的革命運動，確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且我們也應該希望他能成功——實實在在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因為依世界的政治狀況及中國的經濟文化狀況和在國



際的地位，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正負着歷史的使命，這是毫無疑義的。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狀況，既然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這革命運動中，革命黨便須取得資產階級充分的援助；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沒有階級意義和社會基礎的革命，在革命運動中雖有一二偉大的人物主持，其結果只能造成這一二偉大人物的奇績，必不能使社會組織變更，必沒有一個階級代替他一個階級的力量，即或能夠打倒現在統治階級（北洋軍閥），而沒有真實力量牢固的占住的位置，被打倒的階級時時都有恢復故物之可能。因此，我們以為中國國民黨應該明白覺悟負了中國歷史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使命，在這革命運動中，不可有拒絕資產階級之左傾的觀念，我們對於這種左傾的觀念，自然十分感佩，但是在目前革命事業上，這種浪漫的左傾，實在是一個錯誤的觀念：因為每個階級的革命，都要建設在每個階級的力量上面，決不是浪漫的左傾觀念可以濟事的。

“同時，我們對於右傾的觀念，也不得不加以警告。原來在各階級的革命當中，實際參與的只是該階級中一部分最覺悟的革命分子，挺身出來為全階級的利益奮鬥，決不是全階級的動作與意識，並且全階級中一定還有許多失了階級

性的分子同時出來依附敵對的階級，來做不利於自己階級之反革命的行動！這是歷史上現社會上常見不足為奇的事。因此，我們雖然主張中國國民黨不可有拒絕資產階級的左傾的觀念，同時也不主張國民黨有極力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妥協之右傾的觀念。在產業幼稚資產階級勢力不集中的社會，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會，資產階級中每有分爲三部的現象：（一）是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因爲封建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妨礙大規模的工商實業發展而贊成革命，如中國海外僑商及長江新興的工商業家之一部分；（二）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因爲素來是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國家財政機關與軍閥官僚勢力，造成了畸形的商業資本，專以賣國行爲增加他們的貨幣的富，他們自然而然要依附軍閥官僚及帝國主義列強而反對革命，他們可以叫做官僚的資產階級，如中國新舊交通系之類，自盛宣懷以至張弧王克敏，乃是他們代表的人物；（三）是非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因爲所營的工商業規模極小，沒有最大的企圖，沒有在政治上直接的需要，所以對於民主革命恆取消極的中立態度，這種小工商業家，在小資產階級的中國社會居最大多數。中國國民黨應該一方面容納革命的資產階級，爲他們打倒妨碍工商發展的一切軍閥，並且爲他們排除援助軍閥而又壓



迫中國工商業的國際帝國主義者，因為在半殖民地的中國，資產階級深受外資競爭和協定關稅及種種不平等的條約之痛苦，非排除國際帝國主義的勢力，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成為完全自主的國家，實行保護政策，決不能完成資本民主革命，所以中國資本民主運動自始便以維新自強抵禦強隣外患為唯一的動因；一方面也應該提攜中立的小資產階級，引導他們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勢力；至於那班反革命的官僚資產階級，實是中國真正資產階級發展之障礙，絕對不可和他們妥協，他們為做官扒錢計，有時也鬼混到革命政府做事，一到了困難艱險的時候，他們是絲毫不負責任的，就是在沒有困難艱險時，他也有使勇敢純潔的革命黨變成官僚化的能力；他們始終是靠帝國主義的列強及國內的軍閥而生存，他們始終是阻撓革命運動，他們當中最優分子，也不過一足立在軍閥階級，一足立在資產階級，調和兩方面革命衝突，結果必然造成封建的資產階級，封建的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者及軍閥的工具，可以永遠阻住本國的資產階級自由發展及國家獨立自主；所以國民黨要想完成資本民主革命的使命，萬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資產階級妥協，因為中國此時的危機，‘軍資妥協’更險惡於‘勞資妥協’，官僚的資產階級正是軍閥與資產階級妥協之媒介物，也就是資產階

級中賣階級之姦賊，和歐美勞動運動中鼓吹‘勞資妥協’來賣無產階級之改良派（如社會民主黨）等是同樣的好惡。

“我們也知道中國資產階級勢力微弱，尚不足克服封建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所以使革命黨易於採用右傾的妥協政策，但是要知道現有一條活路橫在我們的眼前，就是與革命的無產階級攜手，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中國的經濟現狀，軍閥階級已與資產階級顯然分開，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離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資產階級應該和革命的無產階級妥協，打倒共同敵對的軍閥階級；不應該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妥協；因為勞動羣衆本來具有革命的實力，應該在革命運動中占主要部分，而且此時和革命的資產階級共同敵對的目標相同，可以聯合一個革命的戰線；官僚資產階級所處的環境，使他不得不站在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者那一方面，決不能和革命的資產階級聯成一個戰線，這是中國國民黨應該明白覺悟的。無產階級也明白知道者這種民主革命的成功誠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然而幼稚的無產階級目前只有在此勝利之奮鬥中才有獲得若干自由及擴大自己能力之機會，所以和革命的資產階級合作，也是中國無產階級目前必由之路。

“總括起來說：在每個革命運動中，浪漫的左傾觀念和



妥協的右傾觀念，都能妨礙革命進行；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應該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可是要想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完全實現，在革命運動中，革命的資產階級斷然不可忘記了兩件大事：（一）是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勢力而脫其羈絆；（二）是承認無產階級的勢力而與之攜手進行。因為本國的資產階級決沒有在外國資本帝國主義政治或經濟的侵略之下能夠發展的希望，幼稚的資產階級也很難以單獨的力量完成革命事業；所以‘反抗帝國主義’及‘聯合無產階級’這兩個原則，是全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特有的共同原則。”

陳獨秀是以第四階級政黨領袖的資格寫這篇文章的，可是在實質上，陳獨秀完全站在第三階級革命家的立場上來勸導第三階級。陳獨秀是很懂得的，第三階級如果不反對帝國主義，就完全失去了革命的意義；如果不聯合第四階級，一定不能成功。這是陳獨秀勝過其他一切第三階級革命家的地方。在上面所節錄的文章中，陳獨秀一再申述了這兩點。不錯！在落後國家的第三階級革命運動，第四階級是應該參加的，因為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後國家，都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這些國家的民族運動，必然就是反帝國主義運動。帝國主義之能夠維持其統治而且

繼續發展，一方面是依靠對國內勞動者的剝削，另一方面是依賴對一切殖民地落後國家的剝削。尤其是在帝國主義國內勞動運動興起，資本主義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候，對於一切殖民地落後國家的剝削與掠奪尤為重要；如果帝國主義失去了這些殖民地與落後國家，則必然將更快的崩潰，所以殖民地落後國家的革命運動，是推翻帝國主義統治之一個極大的助力，換言之，即世界革命之一個極重要的部分。即使這些殖民地落後國家的革命運動，是在第三階級領導之下，也不失其世界革命之主要助力的意義，因為這革命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這些國家的第三階級固然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剝削，而第四階級所受帝國主義壓迫剝削的痛苦更深，所以第四階級無疑應該參加這些第三階級的革命。可是只是參加第三階級革命，並不是投降第三階級。陳獨秀雖然自命為烏梁諾夫主義者，可是他完全不了解烏梁諾夫對於落後國家第四階級參加第三階級政黨的理論。烏梁諾夫指出：

“在落後國家中，應該與第三階級暫時妥協或協作，但是牠(指第四階級政黨——其華註)絕不能與他(指第三階級——其華註)混合，而要保存第四階級的獨立性。雖然這種第四階級運動或尚在萌芽的形勢。”(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案)

“我們幫助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僅僅當這種運動真正是革命的，且運動的代表不阻礙我們組織農民和



被壓迫羣衆的時候。倘若沒有這種條件，則我們應當奮鬥，反對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及附屬於資產階級的第二國際。”

(殖民地民族問題的演說)

可是陳獨秀的意見與烏梁諾夫完全相反，他以為現在是第三階級革命，第三階級革命應該由第三階級來領導，否則“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第四階級絕不應該有獨立性存在，只有做第三階級的工具，供第三階級的驅使。這種第三階級的理論，對於第三階級固然是十分有利，可是站在第四階級的觀點上來看，則完全是出賣第四階級的階級利益而供第三階級犧牲；因為第四階級固然應該參加第三階級革命，但絕不該忍着自己的要求，失去自己階級的獨立性，去供第三階級利用；陳獨秀爲盡忠於第三階級，乃不惜大賣氣力，以最動聽的言辭來欺騙第四階級：“軍閥階級已與資產階級顯然分開，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離的程度。”所以第四階級應該無條件聽第三階級使喚支配，這才是“革命的天職”！

在這篇文章中陳獨秀用盡了力氣去開導第三階級，可是對於第四階級在這革命中的歷史任務，却一點沒有提及。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陳獨秀完全是一位勇進的第三階級革命家，連第四階級革命家的氣味也絲毫沒有。

陳獨秀一生的努力既然是在“希望資本案革命”，自然很怕

第四階級起來革第三階級的命，所以他也如其他庸俗的第三階級學者一樣，很恐懼階級鬥爭，而緩和階級鬥爭就成了陳獨秀的主要任務。陳秀獨一方面以爲中國產業不曾發達，所以並沒有尖銳的階級對峙的現象，因而他只反對“軍資妥協”而不反對“勞資妥協”；在另一方面，極力在理論上行動上制止階級鬥爭——陳獨秀常常以第四階級政黨首領的資格，告誡他的黨員，不要宣傳階級鬥爭，以免“國民革命各階級的聯合戰線的破裂”。甚至在軍隊中，陳獨秀一再命令他的黨員，不要接受士兵加入他們的黨，尤其是在軍隊中“千萬不要宣傳階級鬥爭，以免引起軍事長官的懷疑，而妨害到革命的聯合戰線”。陳獨秀以擁護這個“各階級的聯合戰線”爲革命的最高原則，所以不惜以最無恥的理論與行動來爲第三階級保鏢。

關於陳獨秀在這一方面所犯的嚴重錯誤，實在太多了，我們固有一一指點出來的必要，可是現在的出版界還沒有這種可能性，所以只得擱着不說，好在單是上面這些事實，已足夠證明陳獨秀是一位“貨真價實”的第三階級的革命家了。

可是我們要問：爲什麼一個急進的第三階級革命家能夠長期的（其實也不過十年）留在第四階級政黨內，而且爲這個政黨的 highest 領袖呢？我們怎樣解釋這個矛盾呢？

其實這是很容易懂得的，當時一方面因爲中國革命的發展，



第三階級還沒有公然由退却而叛變，另一方面，第四階級在客觀上雖然能夠領導革命，可是在主觀上的力量還是不很堅強，尤其是理論上的武裝不夠，這因為中國不像歐洲的先進國家，社會主義之思想與運動已有一世紀以上的歷史一樣；社會主義的理論，在中國思想界起相當作用，實在是歐洲大戰以後的事；這是中國第四階級政黨理論貧弱政治水準低下的原因；另一方面，中國第四階級政黨也不像歐洲先進國家那些第四階級政黨有數十年乃至百年以上的歷史；中國第四階級政黨在大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中還不過是一個未滿十歲的孩子，這是組織力量薄弱的原因。這些原因造成了這個政黨之不正確的錯誤的政治路線。因為這個政黨在理論上組織上的力量都還很薄弱，所以那些第三階級革命家如陳獨秀譚平山之流能夠潛入其間，而且拿到這個政黨的實際指導權。可是鬥爭的發展，使第四階級羣衆的階級意識也日益向上發展，羣衆的政治水準也隨着提高，因而使那些佔據指導地位的好細也就不能不為羣衆所驅逐；在別一方面，隨着第三階級的由退却而叛變的過程，使這些“勇進的”第三階級革命家也不能不跟着“向後轉”“立正”！這是陳獨秀“轉變”的歷史意義，也就是階級關係轉變的產物。

雖然如此，我說陳獨秀是第三階級的革命家，決不是有意侮辱個人，而是根據事實的分析的結論。陳獨秀在歷史上的功績，

決不可否認的。尤其是在五四運動中，陳獨秀的確是一位新思想最前進的代表者，在最近代中國思想界，陳獨秀的確是一位極偉大的代表，所以我說陳獨秀是中國的盧梭，雖然似乎太恭維了他，但總比說他是中國列甯妥當些，因為如前所述，他只是一個第三階級的最左翼，決不如第四階級的最右翼。我們在這裏把以上這兩句話重說了一遍，實在是必要的。



## 第二十章

### 五卅運動——一九二五—二七年

#### 革命的展開

五四運動以後，第三階級的革命性並沒有消失。而且因為戰後帝國主義對中國加緊其侵略，使中國第三階級在歐戰期內偷着機會所發展的產業又歸於停滯，乃至於完全失敗的危險，這種事實逼着第三階級“革起命來”。加以第四階級之日益發展，更有力地推動了這一個革命運動。很顯然的，經過五四運動，中國革命運動是日益發展。在五四運動時，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還沒有

人公然提出，胡適之及一班所謂“進步的”(?)智識分子大學教授，還以為稱美國或法國這些國家為帝國主義是海外奇談。可是不過一二年，反帝國主義運動已經普遍的發展，成為自第三階級到第四階級及一切勞苦羣衆的共同要求。

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的改組，尤其可以表示革命運動的進展。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在同盟會最初成立的時候已經有了，但一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時候，民族主義中還沒有絲毫反帝國主義的意義。但是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在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中關於民族主義的解釋，則有：

“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則包圍如故；瓜分之說，變為共管，易言之，武力的掠奪，變為經濟的壓迫而已；其結果只使中國民族失其獨立與自由則一也。……蓋民族主義，對於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其在實業界苟無民族主義，則列強之經濟的壓迫，致自國生產永無發展之可能；其在勞動界苟無民族主義，則依附帝國主義而生存之軍閥及國內外之資本家，足以蝕其生命而有餘。故民族解放之鬥爭，對於多數之民衆，其目標皆不外反帝國主義而已……。吾人欲證實民族主義實為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努力於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民之能力。蓋國民黨與民衆深切結合之後，中國民族之真正自由與獨立，始



有可望也”。

從興中會，同盟會，到國民黨（未改組前），中華革命黨，在他們的政綱中不僅素來沒有反帝國主義的表示，而且如前所述，處處對於帝國主義表示“親善”，表示“尊重國際信義”，即是表示擁護不平等條約。可是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則完全不同。該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申述的對外政綱，很鮮明的指出：

“(一)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重主權之條約。”

“(三)中國列強所訂其他條約，有損中國之利益者，須重新審定，務以不害雙方主權為原則。”

“(五)中國境內不負責任之政府，如賄選竊僭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債，非以增進人民之幸福，乃為維持軍閥之地位，俾得行使賄買，侵吞盜用，此等債款，中國人民不負責還之責。”

國民黨改組以後，不久就發生偉大的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即爆發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的大革命，不僅是在中國革命史上，而且是在全世界革命史上，占着極光榮的一頁。

大革命高潮之到來，決不是突然地自天而降，而有牠的歷史根源。

自從國際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中國以後，引起了農村經濟的激急的破產，這種情形，前面各章都有詳細的敘述，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就是這種農村經濟破產日益嚴重所引起的結果。

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歐洲大戰，是帝國主義矛盾的決裂，但是，歐洲大戰並不會把帝國主義這些矛盾點消滅，反而使這些矛盾點更加多了，更加重了。但是因為牠（國際帝國主義）得了買階級的第三國際社會民主黨的援助，得到了相對的暫時的穩定，因此，牠更加殘酷地加重對國內被壓迫階級與國外被壓迫民族的掠奪榨取。

在中國，自從大戰告終以後，一直到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爆發這一個階段，在事實上，帝國主義的勢力——主要的是經濟的侵略——是一天天加強起來。我們不必去計算在這一個時期中，帝國主義在中國領土內增加了多少工廠，帝國主義在中國領土內的工廠銀行等事業獲了多少盈餘？只要看中國的對外貿易表就可知道。

自從一八七七年以後，中國的對外貿易，每年都有鉅額的入超，不過在大戰期中，及戰後的一二年中因帝國主義內部的危



機，入超須略減外，一九二〇年起，入超的數目又突然增加起來。

自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四年，這十年間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額如下：

年分	進口淨數	出口總數	入超實數
1915	454,475,719	418,861,164	35,614,555
1916	556,406,995	481,797,366	34,609,629
1917	549,518,774	462,931,630	86,587,144
1918	554,893,082	485,883,031	69,010,051
1919	646,997,681	630,809,411	16,188,270
1920	762,250,230	541,631,300	220,618,269
1921	906,122,429	601,225,637	304,866,903
1922	946,049,650	654,891,933	290,257,717
1923	923,402,887	762,917,416	70,485,471
1924	1,018,210,877	777,781,468	246,427,000

(以上單位海關兩)

自從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以後，中國農業經濟開始崩潰，這種趨勢到最近而更加嚴重。

五卅之前，農村經濟崩潰的情形，很顯明地表現在下面幾個統計表中：

第一是荒地面積之逐年增加，如左表：

年 分	荒 地 面 積(畝)
1914年	358,235,867
1915年	404,369,948
1916年	390,361,021
1917年	924,583,899
1918年	848,925,748

荒地面積的增加，顯然的是因為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使農村經濟破產，農民不得不成羣的離開土地。

第二是農業生產的減少。

米是主要農產品之一，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這五年間米的產額的減少，有如左表：

年 分	作物面積(畝)	收穫量(石)
1914年	579,223,868	2,133,483,039
1915年	406,136,399	2,091,955,667
1916年	247,133,746(?)	533,852,515
1917年	239,577,866(?)	528,640,703
1918年	181,676,124(?)	302,298,986

因為產額的減少，所以輸出也就跟着減少，而輸入反而增加。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這六年間主要糧食的出入口數如下：



(一)主要糧食出口表

493

494

年分	米		麥		麵	
	貨量	價額	貨量	價額	貨量	價額
1920年	32.000	109.000	8,431.000	25,395.000	3,961.000	18,252.000
1921年	35.200	183.000	5,194.000	16,886.000	2,047.000	9,366.000
1922年	45.000	222.000	1,151.000	4,235.000	593.000	3,655.000
1923年	63.000	337.000	640.000	2,173.000	131.000	783.000
1924年	42.000	225.000	140.000	541.000	157.000	714.000
1925年	35.000	222.000	207.000	825.000	286.000	1,303.000

(以上貨量單位擔,價額單位海關兩)

(二)主要糧食進口表

年分	米		麥		麵	
	貨量	價額	貨量	價額	貨量	價額
1920年	1,152.000	5,362.000	5.000	33.000	511.000	2,330.000
1921年	10,619.000	41,222.000	81.000	302.000	753.000	3,505.000
1922年	9,156.000	79,875.000	871.000	3,058.000	3,601.000	16,740.000
1923年	2,242.000	98,198.000	2,565.000	6,099.000	5,829.000	27,234.000
1924年	13,198.000	63,249.000	5,145.000	17,690.000	9,656.000	30,098.000
1925年	12,635.000	61,041.000	700.000	2,605.000	2,812.000	14,905.000

(單位同上)

另據海關報告，從一九一二年一九二五年間，糧食的進口及入超總數，如下表：

年分	進口總額	出口總額	出入超數	百分比
1912	26,693,779	10,567,292	入超 16,126,587	15.8
1913	33,252,347	11,487,246	入超 21,765,101	13.0
1914	46,420,953	8,450,185	入超 29,175,778	13.7
1915	32,747,988	9,675,494	入超 23,075,404	64.7
1916	38,829,026	4,880,551	入超 33,658,473	68.1
1917	35,743,881	8,761,339	入超 26,981,552	31.1
1918	15,806,154	6,732,145	入超 8,365,670	1.1
1919	12,119,353	39,323,518	出超 27,204,160	—
1920	11,186,823	57,765,480	出超 46,578,657	—
1921	50,894,440	33,194,893	入超 17,695,659	5.8
1922	104,389,423	22,036,857	入超 82,301,710	28.3
1923	140,388,750	21,368,581	入超 28,840,336	69.7
1924	119,753,616	25,439,733	入超 84,380,833	34.2
1925	85,487,192	29,873,738	入超 55,612,404	3.2

(以上單位海關兩)

絲茶也是主要的農產品，並且在對外貿易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但不幸年來中國的絲茶業，也日就衰落。



五卅前絲的產量的減少，有如下表：

年分	製造戶數	產量(斤)	價額(圓)
1915年	806,077	504,328,240	1,949,476,990
1916年	595,299	54,537,851	192,205,959
1917年	621,066	35,838,596	205,780,820
1918年	648,384	30,294,551	193,240,371

絲的輸出，也日就衰落；其數如左：

年分	座纜白絲	座纜青絲	生絲總數
1914年	6,491	14,659	108,589
1915年	6,780	13,245	143,097
1916年	5,947	13,867	122,243
1917年	4,612	14,492	115,820
1918年	4,159	12,361	124,95
1919年	4,468	18,669	165,187
1920年	3,248	13,410	104,315
1921年	2,248	13,967	151,064
1922年	2,593	14,433	143,476
1923年	3,111	12,613	138,422
1924年	2,928	11,453	131,275

(以上單位担)

茶的產量也逐年減少：

年 分	種茶戶數	收穫量(斤)
1914年	985,237	726,770,049
1915年	1,487,576	469,437,120
1916年	971,714	199,601,544
1917年	868,319	141,165,021
1918年	645,853	132,861,434

茶的輸出減少的趨勢如下：

年 分	担 數
1907年	1,610,125
1908年	1,176,133
1909年	1,498,443
1910年	1,560,800
1911年	1,462,802
1912年	1,481,700
1913年	1,442,169
1914年	1,495,799
1915年	1,782,353
1916年	1,542,633
1917年	1,125,535



1918年	404.217
1919年	690.155
1920年	305.966
1921年	430.328

棉的產量也是減少：

年 分	產 量(担)
1918年	10,968,532
1919年	9,316,389
1920年	6,750,403
1921年	5,433,220
1922年	8,340,441
1923年	7,144,661

此外各種農產品的產額，大也都表現出衰落的趨勢。

一方面是農業經濟的崩潰，多數的農民失業破產，以致社會秩序陷於極度的混亂；他方面，第三階級在其產業的發展上，受了帝國主義之嚴重的壓迫——在歐戰期中，中國增加了不少的工廠，但戰後大部分是停閉了。廣大的破產失業的農民羣衆，固然要尋求牠的路，而第三階級也深感覺有反抗帝國主義的必要；加以同時第四階級力量日漸發展。由這三方面的原因——農民，第三階級，第四階級——終於爆發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

大革命。

一九二三年的京漢鐵路大罷工，成了一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第一個信號。自從京漢鐵路罷工以後，工人運動更形發展，尤其是廣州香港和上海，罷工的風潮到處發生，最重要的如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的上海郵差四千人的同盟罷工等。

工人的罷工，漸漸由經濟的性質，發展到政治的性質。一九二三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廣州工會聯合會，海員工會，起落貨工會等，聯合學生聯合會等的民衆團體，舉行反抗帝國主義的大示威運動，有十餘萬工人羣衆參加。這種偉大的羣衆的反帝國主義示威運動，不僅在中國，即在所有一切被壓迫民族落後國家中，實在是很少見的。這個示威大會並一致決議，向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宣言，須與他們結成一條聯合戰線，共同反抗國際帝國主義。宣言的原文如下：

“美國的農民和勞工呀！帝國主義的資本家的美國，已經把中美親善的假面具揭穿了。所謂‘門戶開放’政策，就是要把中國變爲自由市場，開放給全世界吮血的帝國主義者，讓他們來公然的搶掠。這個政策決不是替中國數萬萬勞苦的平民打算好處，是替美國打算好處，而且也決不是替美國的農民和勞工打算好處，是替美國的資本家和中產階級打算好處。資本主義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掛了‘中美親善’的招



牌，把他們的資本輸入中國。但是這一個月裏，爲了廣州關稅問題，美國的戰艦，就集泊珠江，威嚇廣州政府，這也算定‘中美親善’嗎？美國的農民已經力爭而使美國退出國際法庭了，爲什麼現在還反對來干涉中國的事務呢？國際法庭的意思，就是向歐洲投資，干涉中國的意思，就是向中國投資；共和黨的執政者的奮鬥，並不是替美國的農民和勞工謀利益呀！他們是替美國的銀行老板謀利益啊！你們應該起來而反對共和黨執政者的對華政策，尤其要反對他們的干涉中國內部之事。

“英國的農民和勞工呀！守舊黨的對華政策，只能損害英國的農民和勞工，不能使你們得到好處。英國來干涉中國的廣州政府，支配廣州海關的關稅，結果只能引起抵制英貨運動，海軍對於南方政府的示威運動，結果徒使英國的農民和勞工失去了一切，而一無所得。

“法國的農民和勞工呀！帝國主義的法國政府佔領了魯爾，致使你們在德國的姊妹兄弟遭壓迫。現在帝國主義的法國，又借重武力，來壓迫中國的困苦的人民了。遠東的困苦的人民，和法國的被壓迫的農民和工人之間，應該成立一個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一面反抗世界的帝國主義的國家，一面須努力反抗法國。

“日本勞工呀！中國現在還在封建政治時代，封建的軍閥勾結了日本的帝國主義者，以及其他的世界的帝國主義的國家，共同壓迫平民；孫逸仙博士的廣東政府，是為解放中國平民所受的內國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兩重羈梏而奮鬥的，你們應該上前幫助廣東政府，一同反對日本軍艦在珠江的示威運動。

“意大利的勞工呀！你們應該反對汎繁黨的政府也參加列強用武力威嚇廣東政府的怪劇，這廣東政府是力謀解放遠東的貧弱的平民的。”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直接開始於上海的二月罷工。

第一次罷工的醞釀，發生於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因為日本內外棉第八工場的初紡部，全體工人被工廠辭退，四日，其他部分的工人到工廠中領取工資，日本人不但不給工資，并且又拘去工人的代表，工人忍無可忍，遂一致決議罷工，反抗虐待，他們提出的條件如下：

- 1, 以後日人不准打人；
- 2, 增加工資二分；
- 3, 第八工場辭退工人 須完全復工；
- 4, 承認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



5, 罷工期內, 工資照付;

6, 以後職工, 非犯姦通爭鬥等事者, 不得無故開除。

他們一方面提出條件, 準備罷工, 一方面成立內外棉紗廠工會, 以作工人團結鬥爭的機關。但是工廠對於這種要求, 予以拒絕, 工人大憤, 遂於二月九日, 二萬餘工人同盟大罷工實現了。內外棉紗廠工人罷工以後, 曹家渡楊樹浦等各紗廠工人都起來策應, 同盟罷工的有: 日華紗廠, 豐田紗廠, 同興紗廠, 大康紗廠, 裕豐紗廠等, 罷工的人數約七萬餘。

實際上有名的上海的二月罷工, 是開始於二月四日, 內外棉第八工場的工人。內外棉第五工場, 則於二月九日罷工; 第九, 第十三, 第十四各工場繼之, 次日, 第三第四各工場也相繼罷工了。

自從二月四日第八工場罷工起, 巡捕警察, 即嚴密監視工人, 工人之被捕者, 日有所聞。

內外棉紗廠罷工以後, 十二日, 大康紗廠(即大日本紗廠)日華曹家渡工場等, 亦先後罷工, 聲援內外棉工友。十四日, 裕豐紗廠同興紗廠等, 也繼起罷工, 十五日, 東亞製麻廠的工人也罷工了。

大罷工開始以後, 直至二月二十五日, 始由內外棉廠方代表, 與調停者共同商議。當時調停人提出條件如左:

1, 嚴禁毆打工人;

- 2, 增加工資一成;
- 3, 工資每兩週發給一次;
- 4, 回復辭職工人的職務;
- 5, 罷工時期內工資照給;
- 6, 公司規定獎勵勤勉工人, 廢止儲金制度;
- 7, 無故不得辭職工人;
- 8, 釋放被拘工人。

商議的結果, 決議下列各條:

- 1, 公司不虐待工人, 如有虐待情事, 可稟告工場長, 以待工場長的公平解決;
- 2, 工人復工者可照以前辦法;
- 3, 儲蓄獎金, 依公司規定, 滿五年者可以支付, 中途退職, 由公司規定, 如成績優良照給;

條件解決後, 工人即復工, 二月罷工結束。

上海的工人經過二月罷工, 都覺悟工人階級必須團結, 才能爭得勝利, 故紛紛組織工會, 偉大的五卅運動, 其動力實基於此。

上海的二月罷工開始以後, 青島紗廠首先受到重大的刺激。上海罷工失敗的消息傳到青島以後, 青島工人更為憤慨,

青島工人鑒於上海罷工的失敗, 是由於工人缺乏團結, 故以為組織工會, 在是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的必要手段, 所以紛紛的



籌備組織工會，但爲警察所悉，即嚴厲壓迫，青島的工潮，遂由此而起。

首先由大日本紗廠(大康紗廠)工人提出下列的條件：

- 1 承認工會；
- 2, 工資以日計者，增加至十角以上；
- 3, 包工工資，增加二成；
- 4, 夜工半夜飯錢，增加一倍；
- 5, 取消押工制度；
- 6, 因公受傷者，工資照給；
- 7, 免除房金；
- 8, 吃飯時間，延長一小時；
- 9, 禁止毆打華人；
- 10, 處罰職工，須得工會同意；
- 11, 罰金提交工會，充工人教育
- 12, 不得停雇工人代表；
- 13, 廢止二成儲蓄的制度；
- 14, 廠主承認此條件，雙方署名蓋印。

這個條件提出後，廠方即嚴行拒絕，大康紗廠工人，遂於四月十九日開始罷工。

大康罷工以後，至廿三日，內外棉及日清紗廠也罷工了。各

廠罷工以後，幾經商洽，於五月九日解決，工人爭得相當勝利。但是第一次工潮解決不久，第二次工潮接着於五月二十五日發生，因官廳聽從廠主的要求，封閉工會，拘捕工會負責人，故工人於五月二十五日作第二次罷工。

工人罷工以後，日本當局，調軍艦兩艘，由旅順入口，實行武力鎮壓，中國軍閥（奉軍）亦稟承大日本帝國的意旨，派兵到工場，強迫工人離廠，并會同日兵，向成羣的徒手工人開槍，工人死傷頗衆，經過了半個多月，工人始屈伏上工。

震動全世界的五卅慘案，是這樣起源的：

五月十五日，日本內外棉紗廠，因無故壓迫工人，引起工人反抗，日人即開手槍轟擊，當場將工人顧正紅槍斃，傷者多人，罷工又起。工人罷工以後，生活困難，不得不向外募捐，以維持生活；乃帝國主義的工部局，對於工人本來已嚴厲壓制，復於五月日十三日，拘捕為援助罷工而在馬路上募捐之文治大學學生多人。二十四日，上海大學學生，參加公祭顧正紅，道經租界，又被捕去四人。當時工部局還訂定種種苛例，如碼頭捐，印刷附加稅等，不僅對於工人，且對於各階級人民予以殘酷的壓迫；自顧正紅案發生後，人心更憤激，尤其是各學校學生。各校學手乃決定於五月三十日，出發租界講演，作反帝國主義的宣傳，巡捕即向徒手羣衆開槍，殺者多人。五卅以後，至六月四日止，華人之被巡



捕槍殺或重傷者，計有一〇四人。

五卅慘案發生後，全上海市民更爲憤慨，於是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罷課，以表示反抗。據是年六月十三日上海總工會的報告，至十三日止，罷工者已有下列工廠：

廠名	工人總數	罷工人數	何日起罷工	有工會否
內外棉第三廠	一千五百餘人	全體	六月一日	有
內外棉第四廠	三千餘人	全體	五月一日	有
內外棉第五東廠	一千四百餘人	全體	五月十五日	有
內外棉第五西廠	一千四百餘人	全體	五月十五日	有
內外棉第七廠	一千三百餘人	全體	五月十五日	有
內外棉第八廠	一千三百餘人	全體	五月十五日	有
內外棉第九廠	三千餘人	全體	六月一日	有
內外棉第十二廠	一千五百餘人	全體	五月十五日	有
內外棉第十三廠	一千五百餘人	全體	六月二日	有
內外棉第十四廠	一千餘人	全體	六月二日	有
內外棉第十五廠	一千五百餘人	全體	六月二日	有
日華第三廠	三千餘人	全體	六月二日	有
日華第四廠	三千餘人	全體	六月二日	有
小沙渡同興紗廠	二千一百餘人	全體	六月二日	有
豐田紗廠	六千餘人	全體	六月十二日	有

上海第一紗廠	一千二百餘人	全體	六月二日	有
上海第一布廠	七百餘人	全體	六月二日	有
上海第二紗廠	二千餘人	全體	六月三日	有
上海第二布廠	一千餘人	全體	六月三日	有
上海第三紗廠	二千六百餘人	全體	六月三日	有
上海第三布廠	一千八百餘人	全體	六月三日	有
楊樹浦同興紗廠	二千六百餘人	全體	六月二日	有
西華紗廠				
東方紗廠	三千餘人	全體	六月二日	有
東華紗廠	三千餘人	全體	六月二日	有
浦東日華第一廠	二千餘人	全體	六月四日	有
浦東日華第二廠	二千餘人	全體	六月四日	有
裕豐第一廠	二千餘人	全體	六月五日	有
裕豐第二廠	二千餘人	全體	六月三日	有
曹家渡絹絲廠	二千六百餘人	全體	六月四日	有
上海回絲廠	六百餘人	全體	六月三日	有
公興鐵廠	一百〇五人	全體	六月二日	有
興發勞鐵廠	三百餘人	全體	六月二日	有
江南製革廠	一百七十八人	全體	六月七日	有
成華玻璃廠	一百餘人 四十餘人		六月一日	



瑞和毛巾廠	八十餘人	全體	六月四日	
康泰絨布廠	二百餘人	全體	六月十日	
盧澤印刷所	一百餘人	全體	六月六日	
大康紗廠	四千餘人	半數		有

以上日本廠罷工者三十九處，約六萬九千餘人。

老公茂紗廠	三千數人	全體	六月一日	有
老怡和紗廠	七千五百餘人	全體	六月三日	有
新怡和紗廠	六千五百餘人	全體	六月三日	有
浦東大英烟廠	萬餘人	全體	六月四日	有
祥生造船廠	二千餘人	全體	六月四日	有
瑞鎔鐵廠	千餘人	全體	六月三日	有
楊樹浦大英第三烟廠	百餘人	全體	六月四日	有
洋琴廠	三餘餘人	全體	六月二日	有
馬燈廠	百三十餘人	四十餘人	六月一日	有
茂隆花衣廠	五百餘人	全體	六月日一	有
中國肥皂廠	三百八十八人	全體	六月八日	有
怡和洋行	三〇人	二七人	六月六日	有
通用洋行	四〇人	三八人	六月六日	有
萬泰洋行	八〇人	全體	六月六日	有
葛英洋行	五〇人	全體	六月六日	有

祥泰洋行	三〇人	二八	六月六日	有
通信洋行	五人	全體	六月六日	有
久騰洋行	五〇人	全體	六月六日	有
上海華洋德律風公司	千人	七百餘人	六月一日	有
美莪木器廠	八百餘人	全體	六月二日	有
泰昌木器廠	一百人		六月二日	
福利木器廠	一百餘人		六月二日	
彙司木器廠	一百餘人		六月二日	
崇信紗廠				
公共租界電車	一千四百人	七百餘人	六月二日	有

以上英國廠罷工者二十五處約三萬六千餘人

楊樹浦電燈廠	一千六百八七人	一千五百餘人	六月二日	有
斐倫路電氣廠	八百三〇人	全體	六月三日	有
揚州路電燈廠				
海防路電燈廠				
修馬路工人	百五十餘人	全體	六月三日	有
自來水銅匠間	百餘人	全體	六月四日	有
工部局總鐵廠	四百餘人	全體	六月二日	有
工部局工程處	一百餘人	全體	六月二日	有

以上工部局罷工者共八處約三千六百餘人



海員	一千二百餘人	六月八日	有
洋務職員	四千人	六月四日	有
浦東碼頭工人	一千四百十八人 全體	六月四日	有
楊樹浦碼頭工人	六百餘人	六月二日	有
太古碼頭工人	八百餘人	六月八日	
其他碼頭工人	三千人	六月八日	
金銀業	二千五百人 二百二十人		
怡和炭廠			
美最時牛皮廠	一百餘人 一百餘人	六月四日	有
西裝成衣匠	二百餘人		
陳順興水木工廠	四百餘人		
美倫製蛋廠	一千餘人 全體		
宰牛公司	一百餘人 全體		
安迪生電氣公司	全體		
大有榨油廠	二千餘人 全體		
慎昌洋行	六〇人 全體	六月三日	有
羅森法洋行	八〇人 全	六月七日	有
議運洋行	二五人 全體	六月六日	有
西門子洋行	八〇人 全體	六月六日	有
通迅洋行	一〇人 全體	六月六日	有

汽車行電匠	二百餘人	有
電氣升降機匠	一百二〇人	有
各電料行工人	五百餘人	有
棧房工人	五百餘人	
美亞製綢廠		
茶房工人	一百十三人	有
洗衣房屋工人	一千五百餘人	全體
飯店職工	二千餘人	
西工	一千餘人	
奶媽		
駁船工人	二千餘人	
西文排字人	二千餘人	
日文排字工人	二百餘人	
西文排字工人	五百餘人	有
中文排字工人	四百餘人	有

以上各種洋務工人罷工者共三十五處，約二萬七千餘人。

以上外國工廠罷工者，總共一百〇七處，共計十三萬六千六百餘人

恆豐紗廠 三千人 全體 六月一日 有



厚生紗廠			六月四日	
偉通紗廠				
中新紗廠	三千餘人	全體	六月五日	有
溥益紗廠	三千六百餘人	全體	六月六日	有
大豐紗廠	一千六百餘人	全體		
華豐棉紗廠	五百餘人	全體		
永安紗廠	三千四百餘人	全體	六月三日	
德大紗廠	二千二百餘人	全體		
振華紗廠	一千五百餘人	全體		
三新紗廠	三千餘人	全體		

以上中國廠罷工者共十一處，約二萬六千餘人（內一小部分已上工）。

總共罷工者：一百十八處，約十五萬六千餘人。

自從上海五卅慘案發生以後，反帝國主義的民衆革命的高潮，擴大到全國各處。上海是國際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中心地，也是本國產業最發達，第四階級最有力量的地方；所以上海不僅是這個偉大的運動的發祥地，而且是革命勢力的中心點。

無疑的，上海二十餘萬工人的罷工，就是這個偉大的五卅運動的動力。這就是說，第四階級是這個運動的領袖，

上海總工會是上海工人階級的最高機關，也是這個運動的

總指揮部，上海總工會成立，雖然是在五卅慘案發生以後，但他的確是上海工人階級自己的團體，他統轄一百幾十個工會，二十多萬會員，這二十餘萬工人，都是擁護總工會，服從總工會的命令的。

在五卅運動最初爆發時，第三階級的確是參加了的。以上海為例，當上海的工人開始罷工，學生開始罷課之後，第三階級領導的上海總商會始發出罷市的通告。但是第三階級參加革命運動的態度並不堅決，他們一方面企圖以愛國的口號利用工人的罷工來打擊外國工廠，但當他自己的工廠中工人要罷起工來，則就要堅決鎮壓。另一方面企圖利用以工人為領袖的民衆革命勢力來威脅帝國主義，求得帝國主義的相當讓步，如修改關稅協定，工部局增加華董等等。當然，帝國主義如果能夠多多讓步一點，自然更好，但是他們連做夢也不敢想澈底打倒帝國主義，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政治的經濟的統治基礎（例如否認各項外債，沒收在華的外國工廠銀行及大商店，解散在華的外國陸海軍的武裝，根本否認一切不平等條約），因為他們自己知道沒有這種能力，所以當帝國主義要對他們加以壓迫時，立刻就會屈服；在另一方面，當以工人為領袖的民衆革命勢力的展發，超過了他們的控制能力時，他們立刻就恐慌起來，要設法去鎮壓羣衆的革命勢力之發展了。自己本階級既沒有力量去鎮壓羣衆



的革命高潮，只要去借助自己的敵人——帝國主義軍閥——的力量，來鎮壓新的敵人。在一般意義上，帝國主義與軍閥當然是第三階級的敵人，因為帝國主義與軍閥的統治，是中國產業發展的最大的阻礙。但雖然如此，第三階級覺得第四階級革命勢力的發展，簡直可以致自己的死命，而帝國主義與軍閥的統治，雖然妨礙自己事業的發展，却不致如此危險，所以在利害輕重的比較上，當第四階級領導的革命勢力的發展，超過第三階級的控制能力時，第三階級自然會回轉頭來，向帝國主義與軍閥乞和(投降)而對第四階級領導的革命勢力作戰。這種轉變的形勢，在五卅運動中上海第三階級表現得尤其清楚。當五卅運動初起時，第三階級領導的上海總商會很“熱心”的援助罷工，他們籌集“愛國基金”以“愛國”這頂大帽子來利用工人與帝國主義作戰，而自己提出向帝國主義“乞憐”式的不徹底的要求條件(修改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要求條件)，當帝國主義威嚇(例如工部局電氣處停止電氣供給)利誘(例如允許給高等華人一點小小的讓步)之下，立刻就表示屈服。等到革命羣衆起來反對第三階級的妥協政策，自動與帝國主義作戰，而且對第三階級提出經濟改良的要求時，第三階級就開倒車。奉軍封閉上海總工會，顯然是第三階級與軍閥一致合作。孫傳芳祕密槍斃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劉華，尤其明白是上海總商會所嗾使。這種歷史的教訓證明了中國第三

階級決不能與帝國主義軍閥堅決作戰。

在五卅運動中，上海的第三階級固然不久即背叛革命，與帝國主義妥協，但第三階級在五卅運動初期時有相當的革命作用，這一點也不可否認。雖然這種微薄的革命作用，被革命的高潮沖洗得無影無踪，但第三階級的初衷，也還是希望能與帝國主義鬥爭一下。但是中國的銀行資產階級，則與民族資產階級不同，銀行資產階級對於這種運動完全取了一種反動的態度，完全站在帝國主義一邊去了。代表中國銀行資產階級的學者馬寅初的講演，就是這一派人的反動的最忠實的供狀！我們看吧！這位有名的經濟學家(?)是怎樣反對這種偉大的歷史意義的運動！

他於一九二五年(即五卅慘案發生的那年)六月十三日題為“上海不宜繼續罷市”的講演中，曾這樣說：

“此次英捕慘殺華人案發生後，舉國譁然，上海罷工罷市以示威……雖然，罷市可暫而不可久，況上海為全國金融之中心，商業之樞紐，一旦罷市，不啻全國罷市，影響於國家財政，國民生計，至深且大。”(馬寅初演講集第三集第七十二頁)

於是馬寅初舉出下列的例子，來證明繼續罷市之“不宜”：

“譬如浙江之寧波，亦為吾國商埠之一，與上海僅一夕之隔，所有進口貨物，運至寧波本埠，必付約定之物價，但甯



波是一轉帳碼頭，本埠各號往來，不用現銀，而用劃帳方法。故甯波無現銀可運，惟有將甯波土產與海產，裝運出口以相交換。假定貨到上海，而已罷市，當無銷路，卽有銷路，亦無法卸貨，而欠上海之進口貨價，遂無法清償。上海之進口商，勢必設法催促（洋商在此時或故意追索——原註下同此），否則無以自保其收支之均衡。在此種情形之下，甯波商號，立於兩難之間，欲付則無現可付，不付則信用攸關，其恐慌之狀態，非一言一語所能形容，惟爲自衛計，祇有向自己之顧客追索舊欠，而此類顧客，又散居於杭州紹興溫州各處，則杭紹溫等處，亦陷於恐慌之狀態矣。如是，恐慌之區，逐日擴大，非至全國破產不止，此從甯波進口貨方面推論之結果也。

“假定甯波先運土產海味出口，以便在上海交換外國貨物或他省出品，運甬出售，茲土產已去，而他貨不來（因上海罷市），故甯波商店無貨可賣，遂致商業停頓，生意蕭條，無異於罷市。若上海之罷市繼續延長，則甯波無形罷市，亦隨之延長，舖主爲免於破產起見，不得不收縮營業範圍，或辭退工人，或催收賬目，結果，引起市面陴陁不安之象，此從甯波出口貨方面推論之結果也。甯波一埠，與上海之關係如此，其餘各埠，可以類推，從此可知上海之罷市，無異於全國

罷市，經濟命脈，不絕如縷，對英交涉，尙能操必勝之左券耶？”(同上第七二——七三頁)

馬寅初的意見，完全只顧到銀行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忽略了罷工罷市不僅有嚴重的革命意義(馬寅初當然是不懂得革命的，這也難怪)，而且對於中國產業的發展，也極有意義。因為要發展中國產業，必須打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勢力；要打擊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既不能憑馬寅初一篇講演，又不能訴諸於武力(因為軍閥既是帝國主義的工具，而民衆革命的武力在那時又未建立起來)，唯一的武具，只有罷工罷市。罷工罷市一方面可以激發羣衆的革命情緒，堅強羣衆的革命意識，使其努力參加鬥爭，一方面可以使統治中國市場的外國商品失其作用，而使本國產業有發展的可能。因為如果沒有偉大的羣衆革命勢力，決不能打擊帝國主義；而沒有罷工罷市這種普遍鬥爭的發展，決不能推動偉大的羣衆的革命高潮。事實證明，五卅運動之所以能夠成爲偉大的有歷史意義的震動全世界的運動，就在於罷工罷市(特別是罷工)，如果照馬寅初的意思，不要罷工罷市，試問怎能激發這空前的羣衆的革命高潮？五卅運動之失敗，並不是由於罷工罷市，恰恰相反，正是由於第三階級陰謀破壞罷工罷市，所以失敗。這種理論當然不是馬寅初所能懂得的，因為馬寅初自從他老子娘生他出來，他這副骨頭裏就沒有一點革命的氣味。但是馬寅初既



要反對罷工罷市，又不能自圓其說，例如上述以寧波作例，就非常矛盾。他一方面也主張抵制英日洋貨（見其他講演），另一方面則切切恐懼於洋貨之不能進口，以致“商店無貨可賣，遂致商業停頓，生意蕭條”。罷工罷市的作用，正在要使洋貨不能進口；洋貨不能進口，不僅不是造成“恐慌”，而且是發展土貨的最積極的辦法，南方的省港罷工，就是顯例；省港罷工經過十八個月之久，在這十八個月中，“洋貨不能進口”，可是廣東及南方各省不僅沒有“商店無貨可賣”遂致“商業停頓”而起的“恐慌”，而且本國工業得到空前發展的機會，土貨代替了舊日洋貨統治市場的地位。試問“恐慌”在那裏？不錯！恐慌是有的，但那是帝國主義的恐慌，那是作帝國主義工具之買辦階級的恐慌，並不是中國社會經濟的恐慌。馬寅初這種忠於外國資本家的態度，真使我們看了作嘔！

至於馬寅初怕因上海罷市而致使寧波收不到貨，以致引起恐慌，這不僅完全不明瞭實際情形，尤其是沒有一點經濟學的初步常識！上海既已罷市，寧波自然不用再運貨到上海；寧波縱然需要上海貨物，亦可自己仿製，或由別處轉運，何以一定要起恐慌？寧波依賴上海的情形，總沒有廣州及廣東內地依賴香港情形那樣嚴重。在平時，廣州的貨物，至少有百分之八〇，是香港進口的，如果照馬寅初的意思，只要香港交通一斷絕，廣州及廣東內地人立刻會餓死，可是如上所述，事實適得其反。馬寅初一方面主張

抵制洋貨，另一方面又恐怕洋商不能進口，以致引起“恐慌”，這種矛盾張皇的神氣，把反動的銀行資產階級的真面目活龍活現的形容出來！

他於相同時候的題為“總罷市總罷工之足以自殺”的講演（同上第九七——九九頁）中，更大聲絕呼的說：“若罷市罷工不限於上海一隅，而波及於全國……不但不能制英日之死命，且適足以自殺，何其愚也。”

不錯！只有馬寅初是聰明的，因為他知道罷工罷市對於他的主人——從帝國主義到國內銀行老闆——是一種致命的打擊，所以他要責羣衆“何其愚也”了。

因為中國銀行資產階級，與工業的第三階級不同。工業的第三階級是希望自身的產業能夠發達起來，要產業發達起來，就必須對帝國主義軍閥鬥爭，雖然在第四階級領導的革命勢力抬頭的時候，他會與帝國主義軍閥妥協，但他本身總有過革命的要求。可是銀行資產階級就不同。本來在各先進國家，財政資本與工業資本是相互輔助而發展的，但在中國則這兩種資本有利益上的衝突，因為中國工業幼稚，對於財政資本的發展沒有多大意義，中國本國銀行主要業務，並不是投資於工業，而是投資於軍閥借款軍閥公債，完全與軍閥的利益一致。不用說，投資於軍閥借款與軍閥公債，是本國銀行的主要業務，舍此而外，就是一部



分高利貸性質的投資。

中國本國銀行對外放款利息之高，為各國所無；這種高利貸性質的投資，對於中國工業不僅沒有輔助之功，而且妨礙其發展，例如華商紗廠的宣言中，有：

“……國內金融貸款息重，廠商辛苦經營，謀償銀行錢莊欠款之子金，猶虞不足。……”

又如第五卷第十號總商會月報（上海）上聶其焜在“吾國紡織業與日本之比較”一文中，也說：

“日廠在彼國銀行用款，祇付年利六七釐之子金……若我國金融界適得其反。當民國八九年間，紗廠獲利之時，銀行錢莊，莫不以與紗廠往來為得，且其計息亦較輕；至近三年來，紗廠損耗愈鉅，而金融界之逼迫亦愈緊，向之憑信用往來者，今則以貨物廠基作押矣；向之月息八九釐者，今則加至一分以上矣。其自命眼光遠到者，對於吾業放款，逕行拒絕。若稍肯通融，則一方吸取重利，一方面尚以維持實業之美名自居……”

在同期總商會月報中，陸伯鴻之“西雅圖歸客之感想”一文中，也說：

“回顧我國實業不發達之原因：（一）由於無團結力，銀行家對於實業界之用款，必取厚利……”

銀行高利貸性質投資的情形既然如此，而這種高利貸性質的投資，在銀行界又自有其苦衷，因為：

“……夫利率之高，自有各方面之原由，而多係相互為因所發生之結果，如資本缺乏，現金之求過於供，籌碼有限，不敷應用；兼以信用制度之不發達，鈔票支票，不能廣用，交易以現款為歸宿；交通不便，貨幣之流通不速；政治不寧，放款深慮危險，皆足使利率抬高。且我國值數十年入超之後，又將大宗款項，如關稅鹽稅，盡數儲入外國銀行，以致金融枯竭，無可週轉，如此情形。而欲利率不高，安可得乎？願我以為利率之高，金融界不能獨任其咎，而金融界之未曾設法壓低，則為未可掩飾之事實。蓋我國銀行業，既無富厚之資本，而組織又復散漫，迫營業競爭，不得不出厚利以求存款，故其放出自不能不高。”（陳銘勳：“經濟改造中之中國工業問題”第一一三頁）

陳銘勳在同上著作中論中國銀行業的狀況，曾這樣說：

考我國商辦之銀行，如中南金城鹽業浙江興業上海商業浙江實業中國實業四明等，可稱為中國銀行界之代表，然其成立年限，最久者不滿三十年，實收資本，未過一千萬元，最多者亦不過七百五十萬元；即代理國庫之中交兩行資本，亦不甚厚；中國銀行資本總額六千萬元，實收僅一千九百七



十餘萬元，以視匯豐之資本總額五千萬元，實收二千萬元，公債金二千七百萬元，又英金四百五十萬鎊，一年之盈餘，達一千數百萬元者（即以民國十四年論，匯豐盈餘亦有一千五百八十四萬餘元），其相去爲何如哉？此爲資奉上薄弱之證。銀行之職務，在調劑金融，維持實業，與工商界相依爲生，中國之銀行家，資本既不甚雄厚，遇有緩急，尤不可恃，平時款項多賴錢莊爲之存放，利息本已不輕，轉手既多，益形增高，失其維持工商之效能，兼以國外無分行，外國匯兌，幾盡在外人之手，此皆金融界能力薄弱之明證也。”（同上第一一五——一六頁）

銀行界的本身既不能減低其對外放款之利息，所以就不能輔助工商業的發展，以致在外國，本來銀行資產階級與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是調和，甚至不能嚴格的劃分出來，因爲大銀行家往往就是大工廠主，大工廠股東往往就是大銀行的董事，而在中國就完全不同。在外國，銀行的創辦是爲着適應工業發展的需要，而在中國，銀行的創辦則是適應政府籌劃財政的需要。誰都知道北京政府是軍閥政府，所以適應北京政府借內外債，發公債票而創辦的銀行，自然也就成了賣國官僚的投機事業，中國最著名的銀行家，如王克敏梁士詒曹汝霖等，無一不是賣國官僚。創辦銀行既不是適應工費的需要，而這些銀行的創辦人也大多是刮地

皮的僚官政客；這些官僚式的銀行家，一方面藉銀行經營政府內外借款，操縱公債市場，得到鉅大的回扣和紅利；另一方面經營高利投資，以榨取不發達的工商業的利潤。同時這些銀行雖然是官僚資本家所創辦，可是資本並不充分，所以還要受到外國銀行的壓迫，成爲外國銀行的附屬品。在這樣狀況之下，中國銀行資產階級的本質，一方面是幫助軍閥的財閥，另一方面又是依附於帝國主義，而帶有買辦階級的成分。這樣的銀行資產階級，就成了雙料的反動勢力。所以中國的工業資產階級雖然幼稚，雖然不澈底，可是牠還有過革命的要求，實際參加過“一下”革命，而銀行資產階級則在歷史上就是雙料的反動勢力。馬寅初既然是這一派的代表，自然要咒咀罷工罷市，認爲“足以自殺”了。

中國的銀行資產階級既然在歷史就不曾有過革命的功績，自然以後也再不會有革命的奇績出現。

至於上海第三階級，在五卅運動中雖然由革命陣線中分裂出來，雖然在行動上已趨向反動，但還沒有公開的對革命作戰，不過祕密的與帝國主義軍閥勾結，所以在一九二五年的下半年，一般說來，還不能算爲第三階級公開背叛革命的時期。這時期還在以後。

第三階級背叛革命，是由下列兩種原因促成：卽一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勾結的反動勢力的高漲，使第三階級不敢再與之鬥



爭，而不得不豎起降旗；二是第四階級領導的革命勢力的發展，超過了第三階級的控制能力，使第三階級恐懼起來。所以一九二五年——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結果，並不是如陳獨秀所說的第三階級戰勝了封建殘餘，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而是第三階級投降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妥協。關於這一方面，我們覺得已經沒有多加解釋的必要了。

## 第二十一章

### 革命形式的轉變——陳獨秀主義的發展與沒落

陳獨秀主義是第三階級的最左翼，是五四運動的產物。自五四運動至一九二七年失敗，是第三階級的發展時期，也是陳獨秀主義的得勢時期。

一九二四年以後，左翼（陳獨秀主義者）在利用第四階級的形式之下，取得了優勢，經過了上海的五卅罷工，南方的省港罷工，第四階級運動的發展，更增加了陳獨秀主義的氣焰，然而也



正在這個時候，已經潛伏了陳獨秀主義崩潰的危機。

因為陳獨秀主義本是第三階級的最左翼，但牠是在利用第四階級的形式之下發展起來的。第四階級運動的發展，在最初時期，可以在表面上助長陳獨秀主義的發展，但事實上，第四階級運動發展到某種程度，自然再不能為陳獨秀主義利用，所以必然要起來肅清陳獨秀主義，尤其是下列許多原因，使陳獨秀主義必然趨於沒落：

第一：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聯合反攻的形勢下，幼稚的第三階級已不能再支持其革命的精神，於是第三階級的右翼首先開始轉變，具體的事實，就是戴聖賢主義的出現。

第二：第四階級運動的發展，超過了第三階級的駕馭能力；尤其是在右翼已經轉變之後，更不能支持，於是中間派也開始繼續了戴聖賢主義的路綫前進，具體的事實，就是一九二七年武漢的七月事變。

第三：即是如前所述的第四階級運動的發展，已不是陳獨秀主義所再能利用，而必然地被肅清出來。

簡單的說，陳獨秀主義在各階級聯合的民族運動中發展起來，而階級鬥爭的尖銳化，葬送了陳獨秀主義。

## 第二十二章

### 第三階級的右翼——聖賢主義的內容

陳獨秀主義是孫逸仙主義之左傾部份的發展，而孫逸仙主義之右傾部份的發展，則演化成爲聖賢主義，

聖賢主義的主要內容，就是極端地排斥了新興的物質論，而將孫逸仙主義玄學化了，因而造成了聖賢主義的下列兩個特點：

- 一：揚棄了孫逸仙主義的革命性，使他宗教化了；
- 二：把孫逸仙看做是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的



聖人——就是說，使第三階級與封建統治聯繫起來。

所以他以為孫逸仙的理論系統中，包含有如下兩個要點：

“(一)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子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在這一點，我們可以承認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來，中絕的中國道德文化的復活。去年有一個俄國的革命家，去廣東問先生（按係指孫逸仙——其華註）：‘你的革命思想基礎是甚麼？’先生答覆他說：‘中國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絕，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的。’那人不明白，再又問先生，先生仍舊把這一句話來答覆。我們就這一段話，就看得出先生的抱負，同時也就可以認得清楚先生的國民革命，是立腳在中國國民文化的復興上面，是中國國民創製力的復活，是要把中國文化之世界的價值高調起來，為世界大同的基礎。（二）先生所主張的國民革命，在事實上，是聯合各階級的革命。但是這一個聯合各階級的革命，一方面是治者階級的人覺悟了，為被治者階級的利益來革命；要資本階級的人覺悟了，為勞動階級的利益來革命；要地主階級的人覺悟了，為農民階級的利益來革命。所謂‘成物智也’。一面是要被治者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也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所謂‘成己仁也。’先生

認爲階級的差別，並不是絕對能夠消滅人類的仁愛性的。當初俄國革命黨人當中，許多都是貴族，有名的苦魯巴金，還是一個極貴的公爵。在一千八百六十年代，因革命而被放逐於西比利亞的貴婦人有三千多人。即此一端，已可以曉得，革命的衝動，並不單是要被壓迫的階級才有，愛人利他的仁心，更不是一定要同階級才能夠具備。那些不來革命的人，只是不知，如果是能知，他的仁愛性依然是能夠發現，依然能夠爲受痛苦的農夫工人努力。所以先生這一點，是主張各階級的人，要拋棄了他的階級性，恢復他的國民性；拋棄了他的獸性，恢復他的人性。換一句話說，就是要支配階級的人，拋棄他自己特殊的階級地位，回到平民的地位來。所以先生雖是主張各階級的聯合，但是這個聯合，是爲最受痛苦的人民而起，並且是要聯合各階級的革命分子，不是拉攏反革命的分。所以先生常說：‘革命是爲最受痛苦的平民而奮鬥。’又說：‘我的革命，是爲民生主義而革命。’（“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第43——45頁）

看吧！這是多麼玄之又玄的解釋：要統治階級覺悟了爲被統治階級的利益而革命；不待說，這種樣的革命，是人類革命史上所沒有的。但這也不是戴聖賢辭典中新創的術語，而是孫逸仙思想的展開與擴大。戴聖賢更進一步說：



“……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的論理哲學和政治哲學是全世界文明史上最具有價值的人類精神文明的結晶，要求全人類的真正解放，必須要以中國固有仁愛思想為道德基礎，把一切科學的文化，都建設在這一種仁愛的道德基礎上而，然後世界人類，才能得真正的平和，而文明的進化，也才有真實的意義……。”(上引書)

“……先生的思想是愛中國人，先生的信仰也是愛中國人，先生的力量，也是由愛中國而生。把這一個愛中國人的心，推廣起來，就是愛全亞洲的被壓迫民族，愛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推到極處就是愛一切人類，由愛中國人的心，生出救中國的行為，就是要把中國人從被壓迫的痛苦中救出來。就國家觀念來說，就是要把中國這一個國家，從世界帝國主義的鐵練束縛之下，解放出來……。”(同上)

所以他的結論說：

“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淵源於中國正統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實在是孔子以後，中國道德文化上，繼往開來的大聖。”(民生哲學系統表說明)

聖賢主義的內容，就是如此。本來，在孫逸仙思想系統中，早已包含有聖賢主義的成分，但聖賢主義的具體形成，是在一九二五年，正當五卅運動開始的時候。這是表示什麼意義呢？這是

表示第三階級右翼與封建統治的攜手！這意義是很容易明白，以第四階級作基礎的革命運動的發展，一方面加強了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反動勢力的進攻，他方面引起第三階級一部分的動搖，使他們不能不脫離了革命的陣壘，轉到敵對方而去。聖賢主義就是完成了這種轉變的任務。跟着革命鬥爭的發展，而有上海與浙江方面的賢聖主義的初步活動，更進而有西山會議，及一九二七年初期的政變，這些都是聖賢主義的擴大與展開。





## 第二十三章

### 民主派理論的解剖

陳獨秀與戴聖賢，是孫逸仙主義的兩大傑出的理論家（雖然陳獨秀往往用反面的論調來發表他的主張，但他的思想的本質，純然是孫逸仙主義的，換言之，純粹是第三階級的），除此而外，孫逸仙主義中尚有兩種可以值得注意的理論：一種是法西斯蒂的理論，這種理論現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正在開始發展，現在還找不出代表理論來。一種是民主派的理論，這種理論可稱為孫逸仙主義的中間派。



右翼的聖賢主義，於一九二五年五月開始轉變，到一九二七年五月已經澈底的完成了他的任務，但是這時時候，中間派還是與左翼的陳獨秀主義派在一起作最後的掙扎。然而帝國主義的壓迫，封建勢力的反攻，終於擊退了革命的高潮，於是，陳獨秀主義開始動搖起來了，由動搖而趨於沒落。中間派當然也要轉變了，武漢的七月事變，就是中間派跟着聖賢主義路線前進的具體表現。

但是聖賢主義與民主派，終究不能說完全是一個東西，雖然原則上兩者沒有根本的分別，然而民主派似乎比較“進步”(!)一點，他們的主張與要求，是不能完全與聖賢主義一致的。因此，他們必須單獨發表他們的主張與要求，於是產生了一九二八年的改組運動。他們居然也打起了與封建勢力作戰的大旗(事上當然是沒有這麼一回事)，吹着民主革命的洋號，以上海為中心，做起他們的改組運動來了。

但是一九二九年的政變，民主派遭了一個迎頭痛擊，不得不銷聲匿跡，於是他們就收下了鬥爭的旗，藏好了漂亮的洋號，躲到本是他們所反對的李白將軍的麾下去了。尤其是經過了一九三〇年的擁閻擁馮，一九三一年的擁陳擁李，所謂民主派的真面目，已為眾所共見，但所遺留下來的影響，還是很值得我們重視的。

關於這一派，我們實在很難舉出一個適當的理論代表，退一

步來找尋，那末主辦“革命評論”的陳公博，不能不說較為適當的代表了。

一切第三階級的思想家，他們大多是否認自己是代表第三階級，可是同時又極自然地把他們的階級的狐狸尾巴露出來，陳公博自然也不能例外。

在“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這小冊子中，陳公博裝腔作勢的不承認他自己是代表第三階級，可是在另一方面，一開始就情不自禁地說：

“在今日中國國民革命的過程中，我們的同盟者是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上引書一頁）

可見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僅僅是他們（陳公博派）的同盟，而不是他們基本部隊。他們的基本部隊是什麼呢？當然不是貴族，不是僧侶，而是第三階級。

所以他又說：

“所以在這革命期，我們所最感困苦的，我們要以產業工人作革命的中心，因人數過少，利益非普遍，事實決不可能。我們再要以手工業工人和農民為中心，而手工業者 and 農民，又決不能全去其私有性，可以作民生主義的基幹。”

（同書第一〇五頁）

產業工人既不能，農民手工業者（小資產階級）又不能，那



未，能夠做“民生主義的基幹”的，自然只有第三階級了。像這一類的文字，充滿了陳公博的這本小冊子裏。例如原書第一二四頁中，他說：

“我常常最審慮的，就是革命的力量問題。第一中國工人不過二千萬，其中產業工人既不過佔全人口二百七十餘萬，我們要根據產業工人的力量以爲革命的中心，事實決不可能。第二農民佔全人口三萬萬，似乎可以他們的力量作革命的中心，然而以農民在經濟上所佔的地位來說，就其私有性來說，以之排除封建制度以建設民主國家，完全沒有問題（這個話的意思我實在不懂——其華註）。但本其經濟的地位以建立民生主義，如果不採別一個途徑，能不能實現我們的理想，還是一個疑問。至於小資產階級的性質，實際上很難獨立，非附庸於資本主義，則附庸於非資本主義。無論在已往的歷史，在現存的事實，決無可以單獨根據於小資產階級而立一個國家之理。”

在“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這本小冊子中，陳公博對於階級的理論發揮得更其充分。他說：

“階級爭鬥是一種事實。如果有階級爭鬥的事實，我們反對也會爭鬥。如果沒有階級爭鬥的事實，我們就是拚命提倡，也鬥不起來。照馬克思的觀察，階級爭鬥自有牠的歷程，

其最要條件就是中等階級消滅，使社會上祇餘一個有產階級和一個無產階級，形成兩大壘，然後始謂之科學社會主義的階級爭鬥。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產業工人的無產階級僅有二百七十萬，我們目前絕不能單顧二百七十萬人的利益而犧牲三萬萬九千餘萬人的利益。此二百七十萬的無產階級，數量既非廣大，其質量到底幾何能夠做社會革命的部隊，很成一個問題。至於中國的有產階級，我只能證之為有錢的個人，決不能叫他們為有產階級，因為他們沒有經濟政治的組織，尤其沒有操縱社會生產和消費的權能。實際支配中國的，還是外國的有產階級。所以就中國來說，有產階級也沒有組織和訓練，無產階級也沒有組織和訓練，而最足影響中國社會的還是宣告中立的中等階級。中國現狀如此，如果提倡階級爭鬥，其結果形成多數階級的混鬥。此種階級混鬥的終極，第一使民族主義破壞，演成國民革命的危機。第二使小資產階級脫離革命陣綫，減少社會的資本和生產力。第三使社會多數階級相互仇視，民權主義無法實施。第四生產低落，無產階級愈減功能，一方面不能建設國家資本，一方面更足妨害民生主義的萌發。”（上引書第八—九頁）

拿這一段議論來和上面所引的數段來比較起來，顯然有許



多矛盾，尤其是有許多簡直不通的地方。

自命爲“歷史派”“物觀”的“社會科學家”陳公博，他一方面既很漂亮地承認了階級鬥爭是一個事實，承認“我們反對也會爭鬥，”可是另一方面又很可笑的抹煞中國的階級分化，甚至否認中國有資產階級（據陳公博說，僅僅是一些“有錢的個人”）。第三階級的學者的思想往往如此：他們披着美麗的外衣，可是裏面却穿着一件破爛得不堪修補的襯衫，我們只要把他們的漂亮外衣一剝下來，立刻就露出他的醜惡的原形來。

他一方面說“小資產階級的性質，實際上很難獨立，非附庸於資本主義，則附庸於非資本主義。”，可見他也承認決定革命的態度，不是跟了第三階級跑，就是跟了第四階級跑，決沒有另外一條獨立的或中立的道路的。可是他在這裏却又說“最足影響中國社會的還是宣告中立的中等階級，”，中國既沒有資產階級（如他所說），而小資產階級又不能“中立”，則此“中立”的中等階級真是如亞夫將軍自天而降的怪物了。

陳公博是很聰明的，但他不懂得理論，因爲他和一切第三階級學者一樣，他們的階級給他戴上了一隻馬眼罩，使他的目光只能達到他的鼻尖，在他鼻尖以外所發生的事故，他半點也不懂得。關於這一點，N. Bonkharino 說得很清楚：

“爲什麼第四階級的社會科學要比第三階級的社會科

學高明些？……

“我們先來觀摩第三階級的狀況罷。我們已經知道第三階級要維持資本主義制度，而同時誰都知道‘太陽底下，沒有什麼東西是永久存在的’。從前有過奴隸制度，有過封建制度，有過資本主義制度，這種資本主義制度直到現在還依然存在。此外，還有過其他種種形式的人類社會。既是這樣——并且絕對是這樣——則可見誰要想真正懂得社會生活，他就應該首先明瞭，一切都是變遷的，這一種形式的社會是可以而且必然被別一種形式的社會所代替。譬如舉一個生活於農奴解放時代的地主來說，他絕對想像不到今日會有這樣一種社會程度的存在，這種社會程度內，我們不能拿農民出賣，或以之交換獵犬，一個這樣的地主能不能真正了解社會的進化呢？自然不能的。什麼緣故呢？因為他所戴的不是眼鏡，而是馬眼罩。他的目光僅僅只能達到他的鼻尖，在他鼻尖以外所發生的事故，他半點也不懂得。

“第三階級所戴的，也正是這樣一副的馬眼罩。第三階級是要維持資本主義并相信資本主義是堅固而永久存在，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中，舉凡那些足以表明資本主義的不堅固，必然的滅亡（或可能的滅亡），并轉變為另一種生活程度之現象與特徵，第三階級都沒有能力夠看出。最顯



明的例證，便是上次的世界大戰與戰後的革命。在多少比較有點聲望的第三階級學者中間，有誰預先看出了世界大戰的結果呢？沒有誰！他們都只專門幫助自己的第三階級的政府，並預祝本國資本家的勝利，然因大戰而起的普遍的貧困以及空前未有的第四階級革命，却畢竟決定了人類的運命並改變了地球的全形。這正是第三階級一點也沒有看到的地方，而第四階級社會科學家對於這一切的情形却早已看得清清楚楚。這是由於第四階級不願意保存舊制度，所以目光也就遠大得多。”(N. Bodkharino：“史的唯物論”)

引了這一大段文字，對於我們這裏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只有在了解了第三階級社會科學之一般的特性這個前提之下，才能尋出第三階級矛盾理論的根源。

陳公博的理論雖然矛盾，但正因為其矛盾，更可以充分的看清楚他的第三階級的面貌。他一方面在原則上承認階級鬥爭，另一方面反對中國發生階級鬥爭（這個時候他忘記了“我們反對也要鬥爭”了）；一方面否認中國有資產階級，另一面又說只有中等階級最為重要。

在革命評論第九期，陳公博作了一篇題為“淺薄的革命力量”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所謂革命力量的淺薄，是由於下列兩點：

(一)社會對於革命力量的供給太淺薄；

(二)人民對於要求要生存認識太淺薄。

關於前者，他說：

“我以為無論那一種革命，應該有一個極強的經濟背景，就是尋常政治的變動，也必有其相當的經濟背景。反是，其力量必淺薄，其基礎必動搖。中國革命之產生總因，實產生於帝國主義對華之經濟壓迫，而一考中國本身的經濟，竟破產而至於一無所有。農村固不用說，一切生產除只能供生產者的需要以外，沒有多少剩餘換取建設的材料，都市則凡對外輸出和輸入，以至稍大的工廠，都掌握於外人。農村的封建階級逐漸崩壞，都市之新興資產階級還受帝國主義支配抬不得頭，農工還沒有生產技術的熟練，只能以熱情扶助革命，不能以生產力扶助革命，所以革命只有崩潰，雖經十餘年的掙扎和奮鬥終不能顯出革命的真力量。”

這一段文章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中國的幼稚的第三階級覺得有革命的需要而又不能革命（因為種種客觀條件的決定）的最可憐的自悲自嘆。第三階級自己沒有力量來反抗帝國主義，反抗封建殘餘，而與之妥協，反而說工農的革命力量，“雖經十餘年的掙扎和奮鬥終不能顯出革命的真力量，”這是事實嗎？當然不是！京漢路的二七罷工，沙面的洋務工人的罷工，海員的罷工，青



島紗廠員的罷工，唐山礦工的罷工，特別是上海的五卅罷工，南方的省港罷工，這不都是驚動世界的偉大的鬥爭嗎？廣東兩湖的農民運動，不是曾表現過他的偉大的戰鬥力嗎？可惜陳公博像別的第三階級學者一樣，戴了一副馬眼罩，他的目光只能看到他自己的鼻尖。

陳公博處處地方表示他不是第三階級的代表，但同時却處處地方表現出他的第三階級的主張與要求，在革命評論第一期上，他在他的論文中提出了一個其具體的政綱，這個政綱有外交綱領，財政統一，建設計劃，自治方案，軍事統一，以及對於農民，工人，商民等各項。

在所謂外交綱領中，他主張與美國聯合來對抗英日，特別是對抗蘇聯。他很勇敢地說：

“所以我們的外交，斷不能單採妥協的外交，尤其不能採無綱領外交。我們應得除去妥協，畏縮，苟安的積習，而樹立一個進攻，奮鬥，獨立的外交綱領，”（革命評論第一期第十二頁）

進攻？向誰攻進呢？當然是向蘇聯。

中國第三階級對於帝國主義的態度是很矛盾的，在主觀上，應反帝國主義，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是中國產業不能發展的最根本的原因，但是在客觀上，又不能不向帝國主義妥協，

因爲第一，中國國內的許多重要產業部門，以及金融交通各方面都是在帝國主義操縱統治之下，帝國主義如果實行封鎖政策，則中國第三階級立刻就要感覺到致命的危險。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時上海工部局停止華商工廠的電氣供給，使上海資產階級不能不立刻表示屈服；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帝國主義對於武漢的封鎖，使武漢方面的第三階級不能不對帝國主義投降。第二，國內以第四階級爲中心領導的革命勢力的突興，使第三階級感覺到恐慌而不能不轉變方向。陳公博是很知道這一點的，所以他很坦白的說：

“在目前我個人最感覺痛苦的，如果要國民革命成功，非打倒帝國主義不可，但同時如果要國民革命成功，非妥協帝國主義不可。”

在第三階級，的確有這種不得已的苦衷；至於在第四階級，這種矛盾當然是沒有的。陳公博只看到自己的鼻尖，於是就把第三階級一階級的矛盾，看作是整個中國革命的矛盾。

要打倒帝國主義，既非妥協帝國主義不可，然而既與帝國主義妥協，又怎能打倒帝國主義呢？第三階級爲要保持他那種“進攻的奮鬥的”外交精神，於是以反對蘇聯爲自己的主要任務。自然，也不僅反對蘇聯，有時也要反對英日，但只有反對蘇聯，勇敢的向蘇聯“進攻”，才是第三階級外交綱領主要骨幹，其餘不過都



是幌子。陳公博所提出的外交綱領，自然不能例外。

至於所謂財政統一，建設計劃，自治方案，軍事統一，不待說，這些都是第三階級最迫切的要求；這些要求由陳公博的筆底下寫出來，原也一點不算奇怪。

有人說，現在第三階級離開革命陣綫，他們是懼怕民衆運動；所以贊成民衆運動的，決不是第三階級；陳公博是贊成民衆運動的，所以決不能說他是第三階級。

這顯然是一種錯誤的見解。

第三階級懼怕民衆運動的興起，這是一個個事實；但正因為懼怕民衆運動，所以要消滅民衆運動。第三階級不像吳佩孚趙恆惕那樣愚蠢，他們知道消滅民衆運動不能單靠武力，需要另一樣灰色的（或是黃色的）民衆運動，把那種可怕的民衆運動消滅下去。這不僅是中國第三階級有此需要，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也是一樣。這些先進國家的第三階級自然懼怕真正工人的組織，可是另一種貴族工人的黃色組織，却是第三階級所最需要的，在歐洲有許多先進國家，在大戰中及大戰後，全靠第二國際及阿姆斯特丹國際（黃色工團國際）所屬各政黨各勞動組合的幫助，維持了牠的垂絕的生命。陳公博所需要的民衆運動，當然就是這種救過西歐第三階級垂絕的生命的黃色運動。

關於民衆運動，陳公博寫出了一個具體的綱領（革命評論第

一期)；關於農民運動的，他說：

“甲，繼續消滅劣紳土豪的勢力，根本剷除封建的思想。

“乙，極力進行農村的自治，確定下層的民主制度。

“丙，積極的組織農村的合作事業，企圖建設大農村的生產。

“丁，健全農民協會的組織，不單使其為農民革命的機關，並且使之為生產指導的機關。

“戊，嚴切指導農協的行動，必使之為地方自治的基礎，防止其因襲封建的劣紳土豪勢力。

“己，獎勵佃農和自耕農的生產力，減少鄉村間的無業遊民，并促進地方的公共事業。

“庚，繼續執行百分之二十五的減租，嚴禁鄉村間的超過規定的高利貸。

“辛，以國家和地方自治機關的力量，在全資本百分四十以內，強迫富農經營地方的水利，電氣，和公路事業。”

照這個綱領看來，不待說，是一個十足的第三階級的農業綱領，而且並不是一個急進的第三階級的農業綱領，對於農民最迫切的土地問題，一句話也沒有提出，甚至連平均地權這句所謂“革命的口頭禪”也沒有一字提到，僅僅以百分之二十五的減租為唯一主要的內容。至於標榜與封建勢力奮鬥的名義，其意義不



過是整個的農運綱領的一面幌子。

關於工人運動的綱領，一共也是八條，原文是：

“甲，統一產業和職業的組織，消滅工會的地方主義和行會色彩。

“乙，建立工會和地方的合作事業，減低工人的生活費。

“丙，促進工人的紅利制，先由國有營業創立，以次推及私人工廠，使工人不致為被掠奪階級。

“丁，設立工人藝術補助學校，增進工人的生產知識。以為建設國家資本的準備。

“戊，勵行工人強迫保險法，并以國家法令強迫廠主負擔一部分的保險金

“己，置工會完全於黨部指導之下，使每個工會都得到黨部的直接訓練。

“庚，檢查各工廠的設備和待遇，減少工人對於工廠的憎惡性。

“辛，政府須嚴切的調查工廠的生產和剩餘，使工人於紅利以外，得到政府的強迫加薪。”

對於這個勞動綱領，我們可以不必再加以解釋，因為在這八條綱領中找不出絲毫革命的氣味，即使是用了最精良的顯微鏡，也看不出一點近乎革命的痕跡，連中國第三階級最崇拜的福特

汽車廠待遇工人的規則還遠不及，甚至連八小時制也沒有提出，除了“置工會完全於黨部指導之下”外，別無所有，比上舉的農業綱領，更爲灰色，所以有人說這是一個黃色綱領，我說簡直是一個黑色綱領。

陳公博同時提出的商民運動的綱領，更是充分的表現了他的第三階級的真面目。這個綱領的原文計有六條，如下：

“甲，取消總商會和商協會的分界，而使商人得一個整個的組織。

“乙，於交通及國外貿易，政府須立即採用專利的政策，畫出整資本百分之四十，獎勵商人的投資。

“丙，關於各地之電氣水利，目前應保護和獎勵私人資本，但予以一定年度的限制，和預先規定勞資的權義條件。

“丁，每一個地方的經濟，在政府指導之下，必使商人籌畫一個最低度的穩定和發展計劃，使商人不至脫離政治的關係，引起其參加革命的興味。

“戊，每一個地方的合作事業，須使商人爲部分的參加，使工人和商人的中間，有經濟的溝通線，逐漸泯除兩階級的歧點。

“己，在有國營實業的地方，對於私人企業的擴大 須立即制限，以免商人成爲特殊階級，因商人如果獨成優越的階



級，亦足惹起爭鬥而危及商人本身的生存。”

這個綱領的要點有二：第一是“在政府指導之下，必使商人籌畫一個最低度的穩定和發展計劃”；第二是“逐漸泯除兩階級的歧點”。不待說，這些都是第三階級目前最迫切的要求。

在革命評論第七，八，十，十二各期，陳公博作了一篇題為“目前怎樣建設國家資本？”，這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但是失望得很！文章的內容除了空想一些發展實業，發展交通的計劃外，一無所有。

中國的第三階級往往歡喜用“建設國家資本”這塊招牌，來表示他與私有資本主義奮鬥的決心，這實在是非常可笑的。只要看了他們的每篇關於所謂“建設國家資本”的文章的內容，都不過是一些發展實業的空論，就可以知道幼稚的落後的中國第三階級永遠只有沉淪在可憐的空想的領域！

在陳公博的一切文字中，除了以上這些意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意見，就是企圖建設一個所謂“東方國際”，或“民族國際”。不僅陳公博有這個意見，一切的第三階級空想家的英雄，都有這種計劃，計劃的本身雖然非常可笑，而其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見，却是一個事實。

據陳公博說：

“中國國民革命，決不能與國際無關；一國的生存，尤不

能脫離國際而獨立。目前形成有力的國際的，一個是資本主義的國際聯盟，一個是共產主義的第三國際；資本主義的國際既壓迫中國國民革命，而共產主義的國際又擾亂中國國民革命，則中國欲保革命的成功而使革命不至中墮，惟有組織××主義的國際，另在東方形成被壓迫民族集團的壁壘；而且我們更要進一步推想，資本主義的國際若在東方穩定，××主義必無以自存，共產主義的國際若在東方發展，××主義亦從失敗。而且我更相信：經濟最發展的國，如果革命，必不會形成蘇俄式的國家，經濟最落後的國，如果革命，也不會形成蘇俄式的國家（此理由待另為文論之——原註），尤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更不會形成蘇俄式的國家，根據東方的民族性，客觀的條件，被壓迫民族的環境，都非火速建築一個東方國際不可。但當這破碎支離的現象，新的國際，自難形成，縱使形成，也乏領導。我們為要保障中國的革命，領導東方民族的革命，所以要建一個東方國際。”（革命評論第十八期：黨的改組方法和時期）

據陳公博說：這個東方國際應該由中國領導組織，而中國是具備了這種領導的條件的，陳公博舉出了下列四個理由：

“第一，要反對帝國主義，必須有極強固的組織，其條件非有相當的武力，則必有整個的經濟，在久於受帝國主義統



治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武力的條件不容易完全，就是經濟的要件也時時感受着缺乏。所以反抗帝國主義的武器唯一是民族主義的統一，……………所以除了中國以外，其他各殖民地縱使能夠獨立，其奮鬥的犧牲和期間，必須比中國重大而悠久，我在上文已說過中國領導東方民族自有他的資格，也是基於這個原則。

“第二，東方最大的市場是中國，遠東問題的中心也是中國，其餘各殖民地皆是掠奪中國的附庸工具。如果中國給帝國主義分割妥當，各殖民地可以說絕沒有脫離帝國主義者的希望。如果中國能夠獨立，一切帝國主義皆生動搖。……然而中國的革命……提高在東方領導各民族的地位。

“第三，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反抗帝國主義，基於經濟的環境，絕不能建設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並且我們也不願意去建造；同時也絕對不能建設蘇俄式的國家，因為中國的客觀條件不允許。所以從反抗帝國主義中建設新國家，須要採第三個方式，即是從建設國家資本以至實現××主義，東方一切被壓迫民族，其經濟和歷史，皆與中國相同，所以××黨應當領導東方民族在同一主義之下，對外為反抗帝國主義的聯合，對內為經濟生產的聯合。

“第四，在東方各民族中，中國民族有其悠久歷史的影

響。除印度外，在各殖民地中，中國人種——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血統，可以佔總和百分之二十。實質來說，東方各殖民地，經濟上受西方的侵略，文化上是受中國的影響。尤其印度與中國，在歷史上有二千年的共通文化。所以中國的獨立足以使東方民族再建一個新紀元，而形反抗世界帝國主義的同盟壁壘。總括一句話，中國對於世界革命，目前的工作應聯合反帝國主義的國家共同向帝國主義爭鬥，而最終的使命，須領導東方民族為經濟上民族上的大同盟，為世界反帝的大本營。”（“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第七七—八〇頁）

誰都知道，現在世界上分成兩大營壘，而陳公博却想於兩大營壘之外，另立一個營壘，使其鼎足而三，這是什麼意義呢？這完全是由於中國第三階級之矛盾的經濟背景所決定。

中國產業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侵略而不能發展，這是衆所週知的事實。要使中國產業發展，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這是中國的第三階級在本質上必須反對帝國主義的原因。要反對帝國主義，就必須有鉅大的力量，因為帝國主義是國際的勢力，所以也必然聯合國際的勢力才能與之爭抗。但是中國第三階級在一九二七年以後，已不敢與對抗帝國主義的國際勢力結合，因為第一，中國第三階級礙於國內革命勢力的發展，對



於國外的革命勢力發生恐懼心；第二，第三階級受了帝國主義勢力的威脅，不敢與這種國際勢接近。由這兩個原因，使中國第三階級由國際革命勢力的營壘中退出轉到帝國主義的營壘去的過程中，發生這種另找出路的幻想。自然，幻想只是幻想而已。

陳公博以爲組織這種所謂東方國際，應該由中國作領袖，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因爲中國數千年來以上國天邦自居，中國在歷史上的對外關係僅僅是海外的小邦“年年進貢，歲歲來朝”，落後的中國第三階級一直到現在還羨慕而且夢想着過去的盛況，所謂“數千年聲明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的光輝的上國，當然應該“發奮爲雄”而“統率四海蠻夷”。

在實際上，中國的革命的確是世界革命中主要的一部；中國革命的確是東方革命中最主要的一部，因爲中國以第四階級爲中心領導的革命鬥爭，已經震動了全世界；中國大革命雖然暫時遭遇了失敗，但革命的基本勢力不僅依然存在，而且日益發展。的確，牠是可以領袖東方革命勢力的。但我在這裏所說的，與陳公博所說的完全不同。我是指以第四階級爲中心領導的革命可以領袖東方革命，但他決不能與西方革命勢力分開。陳公博是說中國第三階級可以領導東方民族形成一個新的國際來反抗帝國主義，不待說，這是一種夢想。中國第三階級已經再沒有戰鬥能力了。

## 第二十四章

### 帝國主義統治作用的深刻化——殖民地 化的危機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是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革命，然而這一革命是失敗了，以帝國主義為主盟的一方面完全得了勝利，雖然在這種勝利的反面隱伏着自己崩潰的危機，然而在這一階段，無可否認的，帝國主義是勝利了。

一九二七年結束以後，展開了中國歷史的一個新階段，在這一階段，帝國主義鎮壓了一切的革命勢力，成爲中國的最高統治



者，加強了中國殖民地化的過程。這些事實是很明顯的，然而陳獨秀在這裏發表了一個荒謬的意見，他說：

“……中國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無論是如何失敗，無論是如何沒有完成其任務，終不失其歷史的意義，因為他已開始了中國歷史的一大轉變時期；這一轉變時期的特徵，就是社會階級關係的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勢的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增加了他的階級力量之比重；封建殘餘在這一轉變時期中，受了最後的打擊，失了統治全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至少是在失去對立地位的過程之中，變成了殘餘的殘餘；牠爲自存計，勢不得不努力資本主義化，就是說，不得不以全力來爭取城市工商業的經濟勢力，做他們各個區域內的統治基礎。”

陳獨秀在這裏所說，完全是無常識的造謠！關於這，我自從一九三〇年春讀到這篇文章以後，即曾加以嚴格的批評，雖然在那時九一八事變沒有發生，東北三省沒有淪亡，而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統治作用的深刻化，已顯然可見，但陳獨秀却說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第三階級作了讓步與幫助。誠然，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開始了中國歷史的一大轉變時期，但是這一轉變，決不是如陳獨秀所說，是第三階級取得了勝利，戰勝了封建殘餘，取得了

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却相反，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勝利了，將第三階級俘虜過去，成了他們營壘中的一份子。

這一個歷史的轉變時期到現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已經四年了，這四年來的事實還不明白嗎？這四年來的嚴酷的事實不是很明白地證明了陳獨秀的謬誤嗎？

顯然的，一九二七年以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作用，加強了十倍。第一：新興的統治者不能從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的外債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且因為金貴銀賤的影響（外債中大部分以金貨幣計算），所以在一九二七年外債的總額還不過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至一九三一年已超過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了。第二：新興的統治者不僅不能減弱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勢力，而且外國銀行的獲利愈多，外國工廠的營業更爲發達，而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也愈加增多了。第三：新興的統治者不僅不能減弱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武裝勢力，而且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武裝顯然是增加了十倍，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方面。第四：新興的統治者不僅不能削弱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而且更增加了許多新的特權。所謂“關稅自主”，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這是每個有常識的人所能了解的，毋庸加以解釋。因此，即使沒有一九二八年的濟南五三事變，沒有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亦可斷定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勢力比一九二七年



以前加深了許多，而以上這些事變的發生，也就成了自然而且必然的事了。

九一八事變的意義還不能明瞭嗎？這決不是張學良個人的過失（當然我不是爲張學良辯護），而是一九二七年的歷史轉變以後的必然結果。

還是遠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前，我曾作了一篇“中國往何處去？”的長文，指出中國只有兩個前途：一是帝國主義澈底地完成了鎮壓中國革命的任務，實行武裝共管中國，成爲帝國主義的公共殖民地；這是殖民地化的前途。一是革命勢力取得了最後勝利；這是革命勝利前途。這篇文章連載於一九三二年大連出版的日文“滿鐵調查月報”上，在現在，我還認爲這兩個前途都有可能。

誠然，我們決不完全抹煞革命勝利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是隨時存在着。可是我們必須指出：以爲中國決不會有殖民地化的危險，這是一種極大的錯誤。九一八事變更證明了中國的沉淪爲殖民地的危機。

新興的統治者顯然已經失去了恢復國內社會秩序的能力，對於羣衆運動顯然已經失去了澈底鎮壓的能力，這是帝國主義所不能坐視的，於是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中國的危機是將不可避免地臨到。這種武裝干涉的形式，或者是出於各帝國主義有計劃

的武裝共管，或者是出於各帝國主義的單獨行動。這兩種干涉都是可能的，而前者（武裝共管）的可能性尤為充分。這樣，整個的中國就完成了牠的殖民地化的過程，中國終於走上了東三省的道路。因為統治者固已完全屈服於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強大的武裝進攻之下，如果沒有世界革命發生，沒有其他重大的足以影響帝國主義統治的國際變故發生，中國的革命運動，有被帝國主義暫時鎮壓下去的可能（當然也祇是暫時的，因為歷史始終是前進的）。

這一個危機，將一天天嚴重地臨到我們頭上！

然而在這裏我們必須回轉來說，革命勝利的前途，依然是有可能的。帝國主義內部之不能一致，這是衆所週知的事，因而帝國主義內部的戰爭——特別日美帝國主義間的戰爭，將不可避免地爆發。這種帝國主義戰爭可以燃起世界革命的火焰，特別是燃起日本的社會革命的火焰，日本帝國主義表面上是非常強硬，而牠的國內經濟危機，日益嚴重，所以在日美戰爭中，如果日本失敗，那末日本帝國主義之運命，將與舊俄帝國主義一樣，為社會革命所葬送。日本如果失敗，這種社會革命既是必然地要爆發的，而日美戰爭中，日本的失敗，是有充分可能的。即使退一步說，日本戰勝了美國，但勝利的日本帝國主義，其國內仍舊有爆發社會革命的可能，因為日本國內的經濟危機，也決不是戰勝美



國所能解決。日本帝國主義即使能夠戰勝美帝國主義，但決不能挽救日本帝國主義日趨崩潰的運命，何況這種勝利是絕無把握的。日本如果爆發了社會革命，則高麗與台灣，及東三省等處的解放，自不成問題，而中國及整個的東方，就成了革命的領域，再與西方的革命勢力聯合起來，簡直可以完成全世界的革命。這決不是空想，這是經過科學地分析的結論。

## 第二十五章

### 經濟危機與農村革命

本章因字數太多，非本書篇幅所能容納，故全部刪去，





## 第二十六章

### 結論——中國往何處去？

現在我要爲本書作一結論，但我又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研究中國近代社會史的最終目的，當然是探究中國的前途，但關於這，我在前面第二十四章中已大概說過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脫稿——



54  
257044

朱其華先生近著

## 一九二七年底回憶

這本書的出版，使荒蕪的文壇頓呈生氣。這是描寫大時代的唯一的巨著，為這一時代中的青年不可不讀之書。

全書250,000言，要目如次：

1. 從廣東到江西
2. 在南昌
3. 武漢印象記
4. 河南之役
5. 分家之前
6. 九江與南昌
7. 南征途中
8. 逃亡雜記
9. 香港與上海

實價一元六角寄費加一

總經售處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書名	中國近代社會史解剖
著作者	朱其華
出版者	上海新新出版社
總代售處	上海作者書社 四馬路中市
出版日期	初版1933年10月10日
初版數部	1—2000部
實價	二元
寄費	外埠每部加掛號寄費 一角六分
版權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